



MIKE DAVIS

PLANET OF SLUMS

#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美] 迈克·戴维斯 著

潘纯林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PDG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将贫民窟 slum 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之高密度人口聚居区”。美国城市理论家迈克·戴维斯预言，未来的地球是一个贫民窟星球。他追溯了非正式人居的全球轨迹：自1960年代以来“希望的贫民窟”开始，经由1970至1980年代债务十年中城市贫困的“大爆发”，直到今天百万人口以上的贫民窟。从利马不断延展的栅栏到马尼拉的垃圾山，城市化与工业化甚至经济增长分离开来。大批被正式世界经济逐出的人群，必须把他们的生活押在危险的山坡、河漫滩或临近散发毒气的垃圾场等不可避免的灾难上。城市重建和“美化”的冷酷机器把数百万贫民驱逐到城市附近灰色地带的绝望处境之中。不是都市未来主义者们一度想象过的“光明城市”，21世纪的大多数城市蜷伏在泥泞之中，被污染和腐烂所包围。未来的城市更有可能是一种“贫民窟城市”。

本书描绘了21世纪极端扩展的城市贫苦景观：除了里约热内卢、金沙萨到孟买的贫民窟生活状况，还指出了城市贫困的不断加剧所带来的严重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后果。戴维斯对世界城市贫民灾难性困境的忠实描绘不仅是为了唤起愤慨，也为了引起更多的关注。

ISBN 978-7-80225-660-6



9 787802 256606 >

定价：32.00 元

MIKE DAVIS  
PLANET OF SLUMS

#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美] 迈克·戴维斯 著

潘纯林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 (美) 戴维斯著; 潘纯琳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11

(城市研究丛书)

ISBN 978-7-80225-660-6

I. 布... II. ①戴...②潘... III. 城市—发展—研究—世界 IV. F29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2380 号

---

**Planet of Slums by Mike Davis**

First published in 2006 by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Copyright © 2006 Mike Dav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美] 迈克·戴维斯 / 著 潘纯琳 / 译

责任编辑: 吕 林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嶷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960 × 1300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2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一版 200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660-6

定 价: 32.00 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贫民窟,半贫民窟和超贫民窟……

城市革命将为此而来临。

帕特里克·格迪斯〔1〕

---

〔1〕 (Patrick Geddes)引自刘易斯·芒福德:《历史中的城市:变革与前景》(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纽约,1961年,第464页。

##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迈克·戴维斯 (代译序)

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1946年出生在美国加州,为当代知名的社会评论家、都市研究者、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现为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创意写作系教授、《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编辑,并为一些刊物,如《民族国家》(*The Nation*)和英国的《新政客》(*New Statement*)有关专栏撰稿。他获得过诸如“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Fellowship Award, 1998)和“兰南非虚构文学奖”(Lannan Literary Award for Nonfiction, 2007)等多项奖项。有趣的是他没有完成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史学博士学位。

对许多中国人而言,这个名字还很陌生,因为这是他的专著第一次在中国翻译出版。此前只有包亚明、宁光杰、张晓歌等学者对他作过零星介绍。但迈克·戴维斯在美国都市社会学界却是大名鼎鼎,以其书中普遍的批判主题及反传统观点而著称。戴维斯在著作中大量揭露了经济、社会、环境和政治的种种不公正现象以及都市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暖、失控的资本主义等等。

作为一个活跃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及政治活动家,迈克·戴维斯具有比较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犀利的批判立场。他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萨义德的论点,“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1〕他称

---

〔1〕 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页。

自己为国际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环保人士”，如他在《恐惧的生态学》(*Ecology of Fear*)中引用的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和加勒特·埃克博(Garrett Eckbo)一样，他在社会主义者/建筑师/地区主义者所倡导的传统中写作。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马克思依据当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运作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极具洞察力的B/S分析模式，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辨方式，在哲学、政治和社会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的元命题，将人与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全面、持续的解放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可以说，马克思作为近代思想史的集大成者，其解释和分析系统对于当时的市场经济社会状况是一针见血且十分有效的。“马克思是阐述从个体之间的契约市场关系而来的自治型、准形式化、自我调节经济模式的第一位社会学家。”〔2〕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元理论基础，因而，只要资本主义社会持续存在，那么不论其具体形态是什么，马克思所提出的元命题就将持续地成为理论的起点并拥有理论再生产的生命力，并会以各种新的形式呈现在相关领域中。

迈克·戴维斯研究美国工人阶级史的早期著作《美国梦的囚徒：美国工人阶级史上的政治和经济》(*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he History of the U. S. Working Class*, 1986)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国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国家研究以及革命集合主义(Revolutionary integrationism)学说的一个重要贡献。1990年他又出版了备受争议的畅销书《石英之城：在洛杉矶挖掘未来》(*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 1990)。该书形成对洛杉矶城市景观最为权威的批判性审视。此书使他一举成名，他也因此被喻为研究洛杉矶社会及历史的先锋学者。2003年出版的论文集《无生命城市》(*Dead Cities, And Other Tales*, 2003)更大大拓宽了关于都市生活及其未来的研究。

---

〔2〕 Benjamin Lee:《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分析》，前引书，第14-15页。

戴维斯一直坚持在公共领域中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独立的思考,并始终坚持一种坚定的立场,对固有问题和新的社会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并利用媒介进行发言,向人们预示严峻的未来,从而迫使我们去审视、去思考那些我们不愿意见到和不喜欢见到了从而视而不见的现实。关键是,这些预见还往往不幸成为现实,如他在《石英之城》中对1992年洛杉矶暴动的预言和《近在咫尺的幽灵:禽流感的全球威胁》(*The Monster at Our Door: The Global Threat of Avian Flu*, 2005)中对于禽流感的预言都一一成真。以至于《城市异见者迈克·戴维斯的灾难修辞学》(*Urban controversialist Mike Davis's rhetoric of catastrophe*)〔3〕一文征引了戴维斯多部著作的灾难性预言之后,直接将戴维斯的风格总结为“灾难修辞学”。

总之,戴维斯以其著作生涯很好地实践了萨义德在其《知识分子论》一书中的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在意见与言论自由上毫不妥协,是世俗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弃守此一堡垒或容忍其基础被破坏,事实上就是背叛了知识分子的职守”〔4〕。

现代都市的贫民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早在1890年,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雅各布·A. 里斯(1849-1914)就已经关注到纽约下东区的贫民生活,其著作《另一半人怎样生活》(1890)就促使官方通过立法对经济公寓进行改革。1902年他在《与贫民窟作斗争》一文中发出“要么我们消除贫民窟,要么贫民窟将我们消灭,二者必居其一”的呼声。里斯强烈呼吁政府尽社会福利的责任,改善城市贫困状况以最终消除贫民窟现象。近年来,贫民窟数目因第三世界城市人口膨胀而大幅增加,根据联合国人居署2006年报告,英联邦国家的贫民窟住有3.27亿人,接近当地人口的

〔3〕 *Urban controversialist Mike Davis's rhetoric of catastrophe*, *Irish Times*, Feb 20, 2007.

〔4〕 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76页。

六分之一。在 1/4 的英联邦国家之中(11 个非洲国家,2 个亚洲国家,1 个太平洋国家),超过 2/3 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其中很多国家仍在急速城市化。预计至 2030 年全球将有约 20 亿人口沦为贫民窟居民。

2003 年 10 月,联合国人居署出版了一份严肃的历史性报告《贫民窟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Slums*)。该报告的主要论题是贫民窟惊人地密布于地球。贫民窟(slum),一般指穷人居住之所,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将其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之高密度人口聚居区”。据《2007 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贫民窟”这一术语被用来代指许多类型的住房,包括可改良的住房。“贫民窟”、“棚户区”、“非正规住区”、“棚户住房”和“低收入社区”等术语往往可以互换使用。这一词语传统上指曾一度有名望,但随着先前的居民搬迁到城市中更新更好地区而衰落的居住区;如今,此词还包括发展中地区城市中大量临时居所。

毋庸置疑,贫民窟的产生首先是经济问题,但贫民窟形成之后却涉及到了政治、文化、环境、人权等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了一个必须共同关注的问题。贫民窟如今已经成为都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一困扰,发展中国家尤其严重。贫民窟常伴有犯罪、毒品、违章建筑、垃圾、饮水等问题。但是,对人口过百万的大型贫民窟(megaslum)兴起的讨论一直被排除在主流政治议程之外,因为世界银行和“华盛顿共识”不乐于听到这样的声音。

戴维斯一直坚定地履行公共知识分子的真正职责。对他而言——“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知识分子并不是登上高山或讲坛,然后从高处慷慨陈词。知识分子显然是要在最能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要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5〕所以,戴维斯不仅一直关注贫民窟问题,而且公开发表了他关于贫民窟问题的意见。早在

---

〔5〕 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 年版,第 23、85 页。

2004年,他就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布满贫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 *New Left Review* 26, March/April 2004)的文章。2006年5月11日,戴维斯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向200名听众作了一个关于“贫民窟”问题的演讲。

他在其新著《布满贫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 2006)里预言了我们地球的未来——城市贫民窟星球。戴维斯不是未来学家或预言家,他的预言和推测全部建立在权威机构的统计数字和已经存在的实例之上。他征引了联合国人居署2003年的报告《贫民窟的挑战》,概述了贫民窟的悲惨现实及未来:目前,10多亿贫民窟居民完全脱离于他们的国家或全球经济生活;未来的半个世纪里20—30亿人最有可能的去处是贫民窟。

首先,戴维斯指出:“地球城市化的速度甚至快于罗马俱乐部先前在其马尔萨斯式报告《增长的极限》(*Limits of Growth*, 1972)中所作的预报。1950年代,世界上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有86个;今天有400个,到2015年将有至少550个。”〔6〕据《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Review*)估计,到2025年,单是亚洲可能就会有10到11个超大城市(hypercity,人口2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包括雅加达(2490万),达卡(2500万)和卡拉奇(2650万)。〔7〕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地球上大多数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

但是,这些城市人口的大部分在忍受可怕的贫困。2020年城市人口中将有45%—50%属于贫困人口,2030年居住在城市贫民窟的居民将达到20亿。贫民窟的扩大已经达到了极限——免费的可擅自定居的土地缺乏、贫民窟居民的谋生能力下降。这已引起宗派暴力、遗弃儿童和其他

---

〔6〕 联合国经济社会局人口司:《世界城市化展望》(2001年修订版)(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纽约,2002年。转引自《布满贫民窟的星球》,第2—3页。

〔7〕 《远东经济评论》之《1998年亚洲年鉴》(“*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sia 1998 Yearbook*)第63页。转引自《布满贫民窟的星球》,第6页。

对绝望处境的理性反应。“未来的城市,不是像早期都市学家们所想象的那样,由玻璃和钢铁构成,而更多地由粗糙的砖头、稻草、回收塑料、水泥块和废木头所构成。不是光彩夺目直达天堂的城市,21世纪的大多数城市蜷伏在泥泞之中,被污染、粪便和腐烂所包围。”〔8〕换句话说,未来的城市是一种“贫民窟城市”而非“光明城市”。

这些“贫民窟城市”是一种贫富差距极大化的“夹缝城市”。寥寥可数的中产阶级富人区被淹没在贫民窟的汪洋大海之中。一方面,大批的农村移民将以城市无法消化的速度迅速拥进;另一方面,再也负担不起市中心昂贵生活成本的原城市居民则被大量迁出。他们唯一可能的去处就是贫民窟。城市贫民窟事实上是乡村城市化和城市乡村化的双向变迁所形成的独特聚居形态。德国建筑学家和城市理论家托马斯·西韦特(Thomas Sieverts)指出:“这种扩散的都市生活(他称之为“夹缝城市”(德语,Zwischenstadt;英语,“in-between city”))快速成为21世纪富裕和贫困国家的决定性景观。”〔9〕这是一种拥有城市人口密度但没有传统城市基建和结构的空間,住在那里的居民挤得像城市人但却保存了农村的生活方式。

戴维斯追溯了贫民窟(slum)一词的定义:“据报导,首次公开出版这一定义的是作家哈代·沃克斯(Hardy Vaux)1812年的《闪客词典》(*Vocabulary of the Flash Language*),该书中‘贫民窟’与‘敲诈勒索’或‘罪恶交易’是同义词。然而,到了1830至1840年代霍乱盛行的年月,贫民在贫民窟中生活而非从事交易。卡迪纳尔·怀斯曼(Cardinal Wiseman)因其在关于城市改革的著作中把‘贫民窟’(低级行为发生的空间)从一个街头俚语变革为一个被附庸风雅的作家们随意使用的术语而不时受到赞

〔8〕《布满贫民窟的星球》,第22页。

〔9〕托马斯·西韦特:《无城之城:对夹缝城市的解释》(Thomas Sieverts, *Cities Without Citie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Zwischenstadt*),伦敦,2003年,第3页。转引自《布满贫民窟的星球》,第11页。伊恩·耶博阿(Ian Yeboah)使用的是另一个术语城乡融合区(desakota, “city village”)。

扬。到19世纪中叶,贫民窟一词在法国、美国和印度被确认,并被广泛认可为一种国际现象。”〔10〕

戴维斯指出:“全世界可能有20多万个贫民窟,人口规模从几百人到上百万人不等。单是南亚最大的5个大都市(卡拉奇、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和达卡)就包括将近1.5万个确认无误的贫民窟社区,其人口总数超过2亿。”他还列出了全世界30个最大贫民窟的居民人数(2005年的数据),如墨西哥市的勒扎尔/凯尔克/伊兹塔(Nezal/Chalco/Izta)(400万);加拉加斯的自由区(Libertador)(220万);波哥大的苏尔/玻利瓦尔市(El Sur/ Ciudad Bolivar)(200万);利马的圣胡安鲁力安切(San Juan de Lurigancho)(150万)和利马的南锥体区域(Cono Sur)(150万)等等。

戴维斯还指出,左翼政治的传统重点——如乡村失地农民和非正规经济部门劳动力的运动——需要转向大多数贫困人口的社会和地理学分布。事实上,近年来最令人振奋的政治斗争是由大城市中那些被边缘化的“非正式部门”的劳动者——从加拉加斯山脚的贫民窟、太子港臭名昭著的“太阳城”(cite soleil)到巴黎种族隔离的郊区——所掀起的。最后,他充满希望地描绘了一幅贫民窟作为蓬勃发展的抵抗运动孵化器的图景。

总之,《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不仅描绘了21世纪极端扩展的城市贫困景观:从里约热内卢、金沙萨到孟买的贫民窟生活状况,而且指出了城市贫困的不断加剧所带来的严重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后果。戴维斯对世界城市贫民灾难性困境的这些忠实描绘不仅是为了唤起愤慨而要引起更多的关注。《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的出版使得“贫民窟”问题日渐瞩目。如《静音》(Mute)杂志就在《布满贫民窟的星球》的影响下推出了关于全球贫民窟的特刊“裸露的城市——全球贫民窟中的斗争”(Naked Cities - Struggle in the Global Slums)。〔11〕

2006年6月19日至23日,联合国人居署主办的“第三届世界城市论

〔10〕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第24-25页。

〔11〕 Mute, Co. 2 No. 3, August 2006 (accessed 2008-05-29).

坛”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论坛的主题是：“我们的未来——可持续的城市。”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论坛邀请辞中指出：“城市是人类一半人口的家园。城市在提供众多机遇的同时，也是人们遭受痛苦的地方。随着贫民窟和贫困居住区与广大舒适安逸的富裕地区共同存在，我们在城市中经常看到富人与穷人之间、得益于城市化发展的群体与在城市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群体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他在大会致辞中又说：“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机遇与贫困是休戚相关的。此届论坛认识到，全球贫困现象的发生地正在向城市转移，这一进程被称为贫困的城市化。如果照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那么在这一时期的赤贫城市人口数量也将翻一番达到 20 亿。要应对贫民窟改造和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对资金带来的挑战，关键是需要提高财力，来实现《千年宣言》中的贫民窟改造目标。要把规划作为城市发展和环境管理的工具，作为预防未来贫民窟发展的手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一致认为，可持续发展及其与贫困的联系是所有城市都将面对的重大挑战。”

2007 年 5 月 1 日，香港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梁文道先生在其主持的节目“开卷八分钟”中对《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的推荐则使得贫民窟这一话题进入了更多中国人的视野。越来越多的学术领域和学者开始关注贫民窟问题，关注贫民窟居民的尊严和人权问题，这正是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的初衷所在。

纯琳是我在四川大学指导的博士生。2006 年，在写作其博士论文《论 V. S. 奈保尔的空间书写》时接触到了都市社会学的理论，并阅读了迈克·戴维斯的一些相关著作。以前她也应邀参加了一些英汉翻译，包括我主持翻译的《文化研究指南》等。因缘际会，在陈恒先生的介绍下开始了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的翻译，这是她的第一部独立完成的译著，作为译界的新人，其严谨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是为序。

王晓路

2008 年 12 月

## 目 录

代译序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迈克·戴维斯 /1

第一章 城市更年期 /1

第二章 贫民窟的盛行 /23

第三章 政府的背叛 /61

第四章 自助的幻象 /83

第五章 热带地区的奥斯曼 /113

第六章 贫民窟生态学 /143

第七章 结构调整计划中的第三世界 /178

第八章 一种过剩的人性? /203

结语 走在“越南街”上 /232

关键词索引 /241

## 第一章 城市更年期

---

我们生活在城市的时代,城市是我们的一切——它耗尽我们,为此我们赞美它。

——奥诺欧柯米·欧柯米〔1〕

某年某时,一个女孩将出生在拉各斯(Lagos)阿伊冈勒(Ajegunle)贫民窟\* ;一名青年男子将为着雅加达(Jakarta)的灯红酒绿而离开他在西爪哇(west Java)的村庄;或者一个农夫把他贫困的家搬到利马(Lima)一个普埃布洛人聚居区\*\* 。这些个别的特定事件是无足轻重的,将转瞬即逝而不会引起任何注意。但它将构成人类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是地球上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堪与新石器时代或工业时代革命

---

〔1〕 奥诺欧柯米·欧柯米:《书写令人焦虑的城市:尼日利亚国内影碟片中拉各斯的形象》(Onookome Okome, "Writing the Anxious City: Images of Lagos in Nigerian Home Video Films,"),收入奥奎·恩维佐等编:《围攻之下:四个非洲城市——弗里敦、约翰内斯堡、金沙萨和拉各斯》(Okwui Enwezor et al. (eds), *Under siege: Four African Cities-Freetown, Johannesburg, Kinshasa, Lagos*),奥斯特菲尔登-鲁特,2002年,第316页。

\* “贫民窟”这一术语被用来代指许多类型的住房,包括可改良的住房。“贫民窟”、“棚户区”、“非正规住区”、“棚户住房”和“低收入社区”等术语往往可以互换使用。——引自《2007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译者注

\*\* pueblos juvenes,美洲西班牙语,意为美国和墨西哥的印第安人聚居区。——译者注

媲美。事实上,考虑到第三世界人口普查的不精确,这一划时代变迁可能早已发生。

地球城市化的速度甚至快于罗马俱乐部\* (The Club of Rome) 先前在其马尔萨斯(Malthus)式报告《增长的极限》(*Limits of Growth*, 1972)中所作的预报。\*\* 1950年代,世界上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有86个;今天有400个,到2015年将有至少550个。〔2〕实际上,城市已经吸纳了自1950年代以来全球人口爆炸的近三分之二,如今正以每周100万新生儿和移民的速度增长。〔3〕世界城市劳动力自1980年代以来已经翻了不止一番,目前城市人口——32亿——远远超过了约翰·F.肯尼迪

---

\* 1968年,正当工业国家陶醉于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随之而来的“高消费”的“黄金时代”时,由意大利学者和工业家 Aurelio Peccei, 苏格兰科学家 Alexander King 发起,在阿涅尔利基金会的资助下,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的约30位企业家和学者聚集在罗马,共同探讨了关系全人类发展前途的人口、资源、粮食、环境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并对原有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这批人士的聚会后来被称为罗马俱乐部。罗马俱乐部是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被称为“无形的学院”。其宗旨是要促进人们对全球系统各部分——经济的、自然的、政治的、社会的组成部分的认识,促进制订新政策和行动。外界批评罗马俱乐部有马尔萨斯主义和西方精英主义倾向。——译者注

\*\* 罗马俱乐部的研究小组考察了最终决定和限制我们星球增长的基本因素,并出版了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L. Meadows)教授等撰写的,是他们集体研究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其主导思想从该书的副书名“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上即可一目了然。这份报告预言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因为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它是有关环境问题最畅销的出版物,卖出了三千万本,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1973年的石油危机加强了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译者注

〔2〕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局人口司:《世界城市化展望》(2001年修订版)(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纽约,2002年。

〔3〕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传播项目中心,人口信息项目:《迎接城市挑战》,人口报告(Population Information Program, Centre for Communication Programs, the 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Meeting the Urban Challenge*, Population Reports),第30卷,第4号,巴尔的摩,2002年秋,第1页。

(John F. Kennedy)就任总统时的世界人口总数。<sup>[4]</sup>其间,全球乡村人口已经达到其最高点,并将在2020年之后开始下降。其结果是,未来世界人口的增长将主要发生在城市,预计205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一个顶峰,即100亿左右。<sup>[5]</sup>

## 大城市与城乡融合区

最终,95%的人口增长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该地区下一代人口将翻倍到近40亿。<sup>[6]</sup>实际上,中国、印度和巴西的人口总和已经大致与欧洲和北美相当。此外,第三世界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甚至连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都望尘莫及。1910年的伦敦比1800年大了7倍,但如今的达卡(Dhaka)、金沙萨(Kinshasa)和拉各斯都分别比它们1950年代时大了约40倍。中国——“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城市化——在1980年代所增加的城市居民人数超过了全欧洲(包括俄国在内)在整个19世纪增加的城市居民数量!<sup>[7]</su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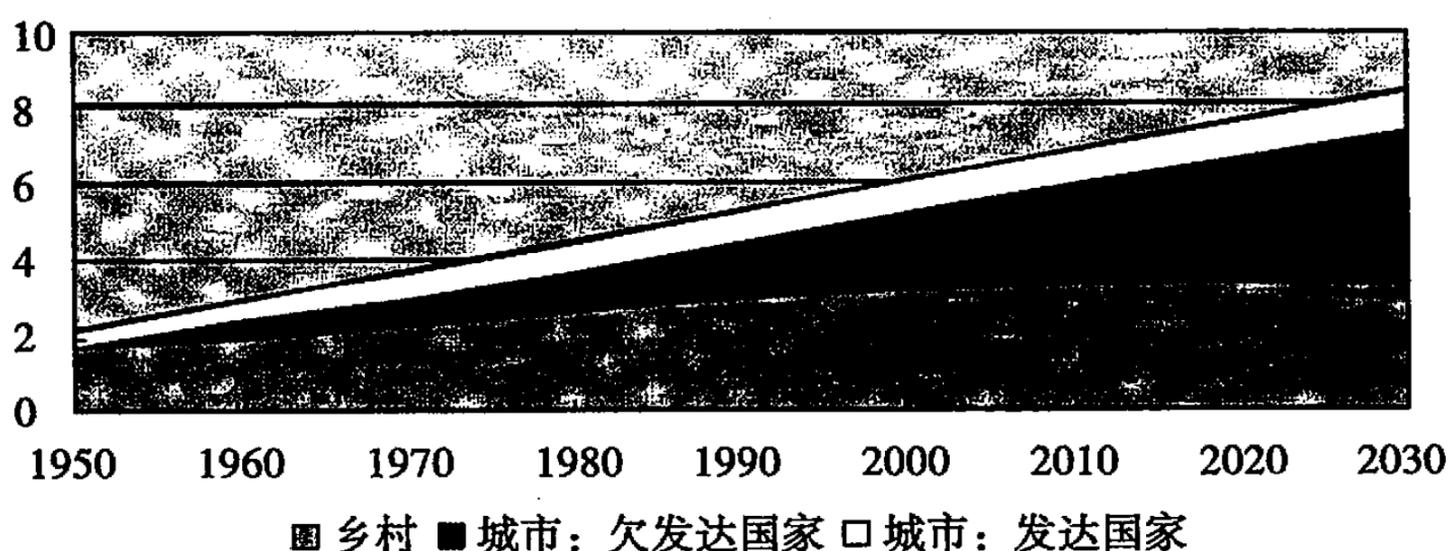
[4] 丹尼斯·尤迪内利和约翰·卡萨达:《创造第三世界城市就业机会有需要》,收入约翰·D.卡萨达和艾伦·M.帕内尔等编:《第三世界城市:问题、政策和前景》(Dennis Rondinelli and John Kasarda, "Job Creation Needs in Third World Cities," in John D. Kasarda and Allan M. Parnell (eds), *Third World Cities: Problems, Policies and Prospects*), 纽伯利帕克,1993年,第101页。

[5] 沃尔夫冈·卢茨,沃伦·桑德森和谢尔盖·舍博夫:《世界人口不太可能翻倍》,载于《自然》(Wolfgang Lutz, Warren Sanderson, and Sergei Scherbov, "Doubling of World Population Unlikely," *Nature*), 第387期(1997年6月19日),第803-804页。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人口将增长3倍,印度将增长2倍。

[6] 尽管全球城市化速度无需怀疑,某些城市的增长率在面临规模大小与拥挤程度冲突时,还是可能突然停顿。著名的例子是墨西哥城的“极化反转”,人们曾广泛预测在1990年代其人口将达到2500万(当前人口是1900万至2200万之间)。参见杨汝万:《大城市时代的地理学》,载于《国际社会科学》(Yue-man Yeung, "Geography in an Age of Mega-Citi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总第151期,1997年,第93页。

[7]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04年7月27日;戴维·德拉克斯基-史密斯:《第三世界城市》(David Drakski-Smith, *Third World Cities*),第2版,伦敦,2000年。

图表 1 世界人口增长(人口以 10 亿计)



来源: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前景:2001 年修订本》2002 年,表格 A.3 和 A.4 (United Nations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1 Revision* (2002): tables A.3 and A.4) \*

图表 2 第三世界(人口超过 100 万的)大城市人口 [ 8 ]

单位:百万人

城 市	1950	2004
墨西哥市	2.9	22.1
首尔(原汉城)	1.0	21.9
纽约	12.3	21.9
圣保罗	2.4	19.9
孟买	2.9	19.1

\* 具体数据参见下表,由译者据联合国官方网站 <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wup2001/wup2001dh.pdf> 所提供资料整理而成。表中人口数量以 10 亿计。——译者注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2030
乡村	1.768641 *	2.002947	2.334414	2.673523	2.969128	3.194959	3.312036	3.342351	3.289426
城市:欠发达国家	0.304352	0.454424	0.674055	0.982189	1.439163	1.964003	2.578507	3.263440	3.975879
城市:发达国家	0.446502	0.562806	0.682455	0.774035	0.846529	0.897753	0.935193	0.973487	1.004758

[ 8 ] 据联合国人居署 2002 年城市指标数据库综合而成 (Composite of UN-HABITAT Urban Indicators Database (2002)); 托马斯·布尔克霍夫:《世界的主要人口密集地带》(Thomas Brinkhoff, "The Principal Agglomerations of the World"), <http://www.citypopulation.de/World.html>, 2004 年 5 月。

(续表)

城市	1950	2004
德里	1.4	18.6
雅加达	1.5	16.0
达卡	0.4	15.9
加尔各答	4.4	15.1
开罗	2.4	15.1
马尼拉	1.5	14.3
卡拉奇	1.0	13.5
拉各斯	0.3	13.4
上海	5.3	13.2
布宜诺斯艾利斯	4.6	12.6
里约热内卢	3.0	11.9
德黑兰	1.0	11.5
伊斯坦布尔	1.1	11.1
北京	3.9	10.8
大曼谷府(曼谷)	1.4	9.1
豪登省(威特沃特斯兰德)	1.2	9.0
金沙萨/布拉柴维尔	0.2	8.9
利马	0.6	8.2
波哥大	0.7	8.0

当然,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人口 800 万以上的新兴大城市和更壮观的、居民 2000 万以上——约为法国大革命时代世界城市人口总数——的超大城市的迅速发展。据联合国人口司的报告,到 2000 年,只有大都市东京无可置疑地越过了这一分水岭(尽管墨西哥、纽约和首尔列出了其他清单)。<sup>[9]</sup> 据《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Review*)估计,到 2025 年,单

[9] 联合国人居署 2002 年城市指标数据库 (UN-HABITAT Urban Indicators Database (2002))。

是亚洲可能就会有 10 到 11 个那样的集合城市\*，包括雅加达(2490 万)，达卡(2500 万)和卡拉奇(2650 万)。上海，其发展被蓄意滞后城市化(Underurbanization)的政治冰冻了数十年，在其最大的沿海都市地区将有 2700 万居民。与此同时，孟买预计将达到 3300 万人口，尽管没有人知道这样巨大的贫困浓缩在生物或生态层面上能否维持下去。〔10〕

发展中世界激增的城市也正在编织新的城市网络、走廊和等级制度。在美洲，地理学家们已经谈到了被看作庞然大物的里奥-圣保罗泛都市区(Rio/São Paulo 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 RSPER)。它包括巴西两个最大城市间 500 公里长的交通运输系统中轴线上的两个中型城市，以及坎皮纳斯(Campinas)治下的重要工业区。它目前有 3700 万人口。这一早期的巨大都市区已经超过了东京—横滨(Yokohama)都市带。〔11〕同样，墨西哥市的巨大变形虫，已经耗尽了托卢卡(Toluca)，正将其触角伸向更广大区域，最终将囊括墨西哥中部大部地区，包括库埃纳瓦卡(Cuernavaca)、普埃布拉(Puebla)、库奥特纳(Cuautla)、帕卓加(Pachuca)和克雷塔罗(Queretaro)等城市，在 21 世纪中叶组合成一个人口总数约为 5000 万的大都市群——大致相当于全国人口总数的 40%。〔12〕

更令人惊讶的是，西非泛都市群(据估计到 2015 年将达到 2300 万人)以拉各斯作为支点，沿几内亚湾(Gulf of Guinea)迅速联合起来。经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一项研究表明，到 2020 年……总数超过 6000 万的居民将生活在贝宁

---

\* Conurbation, 拥有卫星城的特大城市。——译者注

〔10〕 《远东经济评论》之《1998 年亚洲年鉴》(*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sia 1998 Yearbook*)第 63 页。

〔11〕 汉密尔顿·托罗萨:《里奥-圣保罗泛都市区:谋求全球经济一体化》,载于《区域科学编年史》(Hamilton Tolosa, "Rio/São Paulo 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 A Quest for Global Integration,"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第 37 期,第 2 卷,2003 年 9 月,第 480、485 页。

〔12〕 古斯塔沃·格拉扎:《全球经济、大都市动态与墨西哥的城市政治》(Gustavo Garza, "Global Economy, Metropolitan Dynamics and Urban Policies in Mexico,"),载于《城市》第 16 期,1999 年,第 154 页。

城(Benin City)与阿克拉(Accra)之间由东至西 600 公里长的地带上。<sup>[13]</sup>可悲的是,它可能也是地球上最大的城市贫困带之一。

图表 3 几内亚湾的城市化<sup>[14]</sup>

城市	1960	1990	2020
10 万人以上	17	90	300
5000 人以上	600	3500	6000

然而,最大型的后城市结构正出现在东亚。珠江三角洲(香港 - 广州)<sup>[15]</sup>和长江三角洲(上海),京津走廊,正在成为可与东京 - 大阪、下莱茵河流域和纽约 - 费城相比的工业大都市。实际上,中国——发展中国家中独一无二的国家——正雄心勃勃地计划以东京 - 横滨和美国东海岸跨地区规模城市为发展样板。创建于 1983 年的上海经济区(Shanghai Economic Zone)是世界上最大的地方规划实体,包含了中心都市和五个邻近省份,总人口数几乎与美国相当。<sup>[16]</sup>

两项重要研究表明,这些新兴的中国大都市也许只是“从日本/韩国

[13] 让-玛丽·库尔和塞尔日·斯勒瑞希编:《预备未来:2020 年西非视野》(Jean-Marie Cour and Serge Snrech (eds),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A Vision of West Africa in the Year 2020*), 巴黎,1998 年,第 94 页。

[14] 让-玛丽·库尔和塞尔日·斯勒瑞希编:《预备未来:2020 年西非视野》(Jean-Marie Cour and Serge Snrech (eds),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A Vision of West Africa in the Year 2020*), 巴黎,1998 年,第 48 页。

[15] 参见杨汝万:《视点:珠江三角洲的整合》,载于《国际发展规划评论》(Yue-man Yeung, “Viewpoint: Integration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 2003 年,第 25 期,第 3 页。

[16] 艾珀迪逊·拉奎因:《国家城市化策略和区域发展政策对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影响》,参见加文·琼斯和普拉文·维萨瑞亚编:《发展中大国的城市化:中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印度》(Aprodicio Laquian, “The Effects of National Urban Strateg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on Pattern of Urban Growth in China,” Gavin Jones and Pravin Visaria (eds), *Urbanization in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Indonesia, Brazil, and India*), 牛津,1997 年,第 62 - 63 页。

一直延伸到西瓜哇的连续城市走廊”出现的第一阶段。<sup>[17]</sup>城市的这种巨龙式延展形成于上个世纪,并将构成千年来城市革命的物质和人口高峰。接下来,东亚沿海的优势将确定无疑地推进东京-上海(在全球资本和信息流动控制方面平行于纽约-伦敦轴的)“世界城”。

然而,这一新兴城市秩序的代价将是:不同大小和经济特性的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不平等的不断增加。实际上,中国专家们目前正在争论:古老的城乡收入与发展差距现在是否正被一种特别是内陆小城市与沿海大城市之间同等重要的鸿沟所取代。<sup>[18]</sup>然而,中小城市恰恰是大部分亚洲人将要生活的地方。如果大城市是城市框架中最璀璨的星星,未来世界人口增长3/4的压力将由黯淡的二级城市和中小城市承担:正如联合国研究者们强调的那样,这些地方“几乎没有安顿这些人或给他们提供服务的规划。”<sup>[19]</sup>据官方数据显示,1993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3%——官方的“城市”数目已经从1978年的193个猛增到640个,但最大的大都市,尽管飞速增长,在城市人口相对比例方面实际上有所下降。事实上,正是中小城市和近来“城市规模”的城镇吸纳了大多数因1979年后的市场改革而富余的乡村劳动力。<sup>[20]</sup>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有意计划的结果:19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促进工业投资和计划生育的政策。<sup>[21]</sup>

---

[17] 杨汝万和罗福全:《全球重组与亚太地区新兴的城市走廊》(Yue-man Yeung and Fu-chen Lo,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emerging Urban corridors in Pacific Asia,"); 参见罗福全和杨汝万编:《亚太地区新兴的世界城市》(Lo and Yeung, *Emerging World Cities in Pacific Asia*), 东京,1996年,第41页。

[18] 顾定国:《农民何处去?中国南部的乡村城镇化》(下文简称《农民何处去?》)(Gregory Guldin, *What's a Peasant to Do? Village Becoming Town in Southern China*), 博尔德,2001年,第13页。

[19] 联合国人居署:《贫民窟的挑战:2003年全球人居报告》(下文简称《挑战》)(UN-HABITAT, *The Challenge of Slums: Global Report on Human Settlement 2003*), 伦敦,2003年,第3页。

[20] 顾定国:《农民何处去?》(Gregory Guldin, *What's a Peasant to Do?*)

[21] 西德尼·戈尔茨坦:《中国城市化水平》,参见马泰伊·多贡和约翰·卡萨达编:《大都市时代:卷一 巨型城市的世界》(Sidney Goldstein, "Level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in Mattei Dogon and John Kasarda (eds), *The Metropolis Era: Volume One-A World of Giant Cities*), 纽柏利帕克,1988年,第210-221页。

相比之下,在近来的新自由主义变革中,印度小城镇已经丧失了经济牵引力和人口份额——几乎没有中国模式的“双轨制”城市化证据。但1990年代其城市比率从总人口的1/4猛增到1/3,中型城市——如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萨哈兰普尔(Saharanpur),旁遮普(Punjab)的卢迪亚纳(Ludhiana)和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最著名的维萨卡帕特南(Visakhapatnam)——都已经迅速成长起来。海得拉巴(Hyderabad),过去25年来几乎每年增长5%,预计到2015年将成为一个人口1050万的大城市。据最近的人口普查,35个印度城市现在超过100万人,总人口将近1.1亿。〔22〕

在非洲,如拉各斯(从1950年的30万人增加到今天的1350万人)等一些城市的超级新星式增长已经堪与几十个小城镇和绿洲的转变相媲美:如瓦加杜古(Ouagadougou)、努瓦克肖特(Nouakchott)、杜阿拉(Douala)、坎帕拉(Kampala)、坦塔(Tanta)、科纳克里(Conakry)、恩贾梅纳(Ndjamena)、卢本巴希(Lumumbashi)、摩加迪沙(Mogadishu)、塔那那利佛(Antananarivo)和巴马科(Bamako)等。它们已经变成比旧金山(San Francisco)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还大的无计划扩展城市(Sprawling city)。也许,最壮观的是,一度荒凉的姆布吉马伊(Mbuji-Mayi)刚果钻石贸易中心(Congolese diamond-trading center)从1960年代一个2.5万人的小镇转变为一个人口200万的当代大都市,其增长主要发生在最近十来年。〔23〕在拉丁美

---

〔22〕 印度信息普查与统计委员会办公室:《2001年人口普查》(Census 2001, Office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 and Census Commissioner, India); 阿兰·迪朗-拉舍维和劳伦·诺斯顿编:《坚持他们的立场:保卫发展中国家城市贫民的土地占有权》(Alain Durand-Lasserve and Lauren Royston (eds), *Holding Their Ground: Secure Land Tenure for the Urban Po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伦敦,2002年,第20页。

〔23〕 姆布吉马伊是巴宽加矿业公司(Société Minière de Bakwanga)在卡阿塞(Kaasai)地区经营的“旗舰公司”的中心。参见米凯拉·朗:《沿着库尔茨先生的足迹:活在刚果灾难的边缘》(Michela Wrong, *In the Footsteps of Mr. Kurtz: Living on the Brink of Disaster in the Congo*), 伦敦,2002年,第20页。

库尔茨先生是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中的人物,他自称文明的传播者却讽刺地遭到这片黑暗大陆的魔力而“黑化”。——译者注

洲,最初的城市长期垄断性增长,二级城市如圣克鲁兹(Santa Cruz)、瓦伦西亚(Valencia)、提华纳(Tijuana)、库里蒂巴(Curitiba)、德慕歌(Temuco)、马拉凯(Maracay)、布卡拉曼格(Bucaramanga)、萨尔瓦多(Salvador)和贝伦(Belem)现在也开始繁荣起来,其中,人口低于50万人的城市发展最快。〔24〕

此外,正如人类学家顾定国(Gregory Guldin)强调的那样,城市化必须被概念化为沿着城乡联合道路(和城乡相互作用的增强)而进行的结构变革。顾定国在其对中国南部的个案研究中发现:乡村正被就地(拉丁语,*in situ*)城市化并产生了新型移民;“村庄变得更像市场和乡(*xiang*)镇,村镇和小城变得更像大城市。”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乡下人无须再移民到城市:乡村就地把他们“移民”为城里人。〔25〕

马来西亚情况也大致相同,新闻记者杰里米·西布鲁克(Jeremy Seabrook)描绘了槟榔屿(Penang)渔夫的命运:“不曾移民但被卷入城市化,他们的生活被颠覆,即便仍留在他们出生之地。”渔夫们的家被一条新公路与大海隔断,他们的渔场被城市废水污染,临近山坡的森林被砍伐殆尽以建筑公寓大楼。在此之后,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把他们的儿女送进附近日本人开办的血汗工厂。西布鲁克强调:“这不仅毁灭了一直与大海共生的人们的生计,而且也毁灭了渔夫们的肉体和精神。”〔26〕

在中国、东南亚大部地区、印度、埃及或许还包括西非,乡村与城市的冲突是一个复合景观。顾定国认为,部分城市化了的乡村可能是“人居和发展的一条有意义的新路径……一种既非乡村亦非城市而是两者混合的

---

〔24〕 米格尔·比利亚和豪尔赫·罗德里格斯:《拉丁美洲大都市的人口统计学趋势,1950—1990年》,参见艾伦·吉尔伯特编:《拉丁美洲的大城市》(Miguel Villa and Jorge Rodríguez, “Demographic Trends in Latin America’s Metropolises, 1950—1990,” in Alan Gilbert (ed.), *The Mega-City in Latin America*), 东京 & 纽约,1996年,第33—34页。

〔25〕 顾定国:《农民何处去?》(Gregory Guldin, *What’s a Peasant to Do?*)

〔26〕 杰里米·西布鲁克:《在南部城市中:发展中世界的景象》(Jeremy Seabrook, *In the Cities of the South: Scenes from a Developing World*), 伦敦,1996年,第16—17页。

形式,一张密实的网络把大城市核心与它们周边地区联系起来。”〔27〕德国建筑学家和城市理论家托马斯·西韦特(Thomas Sieverts)指出,这种扩散被他称为“夹缝城市”(德语:Zwischenstadt;英语:in-between city)的城市快速成为21世纪富裕和贫困国家的决定性景观,无论其先前的城市历史如何。然而,与顾定国不同,西韦特把这些新兴城市群概念化为既无传统核心又无可辨认边界的多中心网络。

横跨整个世界的文化,他们具有特殊的共同特征:一种完全不同于城市环境的、一眼望去每个岛的地理结构模式均是分散或无序的结构;一种没有一个清晰中心,但有或多或少功能明确的地区、网络与交叉点的结构。〔28〕

地理学家戴维·德拉卡克斯-史密斯(David Drakakis-Smith)写道,这种“延展的大都市区域,特别是新德里,代表了一种城市和乡村发展的联合,其中城乡差别被模糊为城市沿交通道路延展,绕过或围绕着随后就地发生功能和作用变化的小镇或村庄。”〔29〕在印度尼西亚,一种相似的城乡混杂进程在雅加达(更大的雅加达地区)发展得

---

〔27〕 顾定国:《农民何处去?》(Gregory Guldin, *What's a Peasant to Do?*),第14-17页。也可参见“结构和空间经济学变化及其对中国近来城市化的影响”,收入琼斯和维萨瑞亚编:《发展中大国的城市化》(Jing Neng Li, “Structural and Spatial Economic Change and Their Effects on Recent Urbanization in China,” in Johns and Visaria, *Urbanization in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第44页。伊恩·耶博阿(Ian Yeboah)发现沿着阿克拉发展的一个城乡融合区(*desakota*, “city village”)模式,其延展形式(1990年面积增加了188%)和他近来试图描绘的结构调整政治。耶博阿:《加纳阿克拉人口和住房方面的结构调整与新兴的城市形式》(Yeboah, “Demographic and Housing Aspects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Emerging Urban Forms in Accra, Ghana”),载于《今日非洲》,2003年,第50期,第108,116-117页。

〔28〕 托马斯·西韦特:《无城之城:对夹缝城市的解释》(Thomas Sieverts, *Cities Without Citie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Zwischenstadt*),伦敦,2003年,第3页。

〔29〕 德拉卡克斯-史密斯:《第三世界城市》(Drakakis-Smith, *Third World Cities*),第21页。

更为深远,研究者们称这些新的土地利用模式为“城乡融合区(*desakota*)”,并为它们究竟是转型期景观或是新兴戏剧性城市而争论不休。〔30〕

面临新兴的、没有清晰城乡边界的多中心城市体系时,拉丁美洲都市主义者中产生了一种类似的争论。地理学家艾德里安·阿吉拉尔(Adrian Aguilar)和彼得·沃德(Peter Ward)将“区域性城市化”(region-based urbanization)这一概念推进为以墨西哥市、圣保罗(São Paulo)、圣地亚哥(Santiago)和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城郊的当代发展为特征的概念。“与大都市的低比率增长相一致的是,城市中心与其内地间更多的商品、人力和资本流通,城乡边界更为模糊,去中心化的制造业向大都市周边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周围的城郊空间或城乡结合部发展。”阿吉拉尔和沃德相信,“正是在这一城郊空间,劳动再生产最可能集中在21世纪世界最大的那些城市中”〔31〕。

无论如何,新旧不容易混合,在科伦坡(Colombo)的城乡融合区郊区,“社

---

〔30〕 参见 T. G. 麦吉的概述:《亚洲城乡融合区的出现——拓展一种假说》,收入诺顿·金斯伯格,布鲁斯·科裴尔和 T. G. 麦吉编:《泛大都市:亚洲过渡模式》(T. G. McGee, “The Emergence of *Desakota* Regions in Asia: Expanding a Hypothesis,” in Norton Ginsburg, Bruce Koppel, and T. G. McGee (eds), *The Extending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 火奴鲁鲁, 1991 年。菲利普·凯利(Philip Kelly)在其论马尼拉的书,赞同麦吉对于南亚城市化模式特殊性的观点,但认为城乡融合区景观是不稳定的,农业慢慢被挤压出去。凯利:《日常都市化:马尼拉泛都市区发展的社会动态》(Kelly, *Everyday Urbanization: The Social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in Manila's 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 伦敦, 1999 年, 第 284 - 286 页。

〔31〕 艾德里安·阿吉拉尔和彼得·沃德:《拉丁美洲的全球化、区域发展与大型城市扩张:墨西哥近郊腹地分析》(Adrian Aguilar and Peter Ward, “Globalizatio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Mega-City Expansion in Latin America: Analyzing Mexico City's Peri-Urban Hinterland,”), 《城市》2003 年第 201 期, 第 4, 18 页。作者宣称,非洲没有发生城乡融合区式的发展:城市发展坚定不移地以城市和大城市为基础,并限制在清晰界定的区域中。城市核心不存在与之相关联并为其所驱动和推动的中介城市(metaurban)或城郊区域发展。第 5 页。但威特沃特斯兰德的豪登省必然会被视为一个类似于拉丁美洲范例的“区域城市化”例子。

区是被划分开的,外人和自己人不能建立联系和共享社区”〔32〕。但正如人类学家玛格达莱娜·诺克(Magdalen Nock)谈到墨西哥时指出的那样,这一进程是不可逆的:“全球化已经增加了人力、货物、服务、信息、新闻、产品和金钱的流动,因此催生了乡村地区的城市特征和城市中心的乡村特点。”〔33〕

## 回到狄更斯

第三世界城市化的动力概括和混合了19世纪及21世纪早期欧洲和北美的先例。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工业革命是全欧规模的人口从乡村到烟雾窒息、高楼林立的城市阿基米得式转化:据估计,自1970年代末的市场改革以来,2亿多中国人从乡村搬到城市。另外2.5亿或3亿人——下一个“农民潮”——预计将在未来十年中出现。〔34〕作为这样一种惊人变迁的结果,2005年将有166个城市(当时美国仅有9个城市)超过100万人口。〔35〕新兴工业都市如东莞、深圳,佛山市和郑州是后现代的谢菲尔德(sheffields)和匹兹堡(Pittsburgh)。正如《金融时报》最近指出的那样,近十年来“中国(将)停止成为千年来的主导型乡

〔32〕 兰吉特·达亚拉丁和拉贾·萨马拉维克勒马:《授权社区:科伦坡城郊地区》,《环境与城市化》(Ranjith Dayaratne and Raja Samarawickrama, “Empowering Communities: The Peri-Urban Areas of Colombo,”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003年4月, 15:1, 第102页。

〔33〕 玛格达莱娜·诺克:《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墨西哥农夫与埃基多(Ejido, 指墨西哥遵循传统印第安土地使用制度的、为社区共有而由个体使用的农村土地。埃基多包括:耕地、牧场、其他未耕地。——译者注)》,参见德博拉·布赖森,克瑞斯托巴尔·凯和乔斯·穆杰编:《消失的农民? 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乡村劳动力》(Magdalena Nock, “The Mexican Peasantry and the *Ejido* in the Neo-liberal Period,” in Deborah Bryceson, Cristóbal Kay, and Jos Mooij (eds), *Disappearing Peasantries? Rural Labour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伦敦, 2000年, 第173页。

〔34〕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2003年12月16日, 2004年7月27日。

〔35〕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2004年7月28日。

村”。<sup>[36]</sup> 实际上,就此而言,上海的世界金融中心可能很快成为一个毛泽东或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没有想象过的广大城市世界最引人瞩目之处。

图表 4 中国的工业城市化<sup>[37]</sup> (城市比率)

	人口	GDP
1949	11	
1978	13	
2003	38	54
2020	63	85

50年前没有人会想到,首尔的擅自定居区和战争遗迹会飞速(1960年代每年11.4%的惊人增长速度)质变为与纽约一般大小的都市——但同样,维多利亚人能想象一个像1920年代的洛杉矶那样的城市吗?然而,正如其特殊的当地历史和城市奇迹不可预测一样,当代东亚城市化(自1965年来人均GDP增长3倍)保持了制造业增长与城市移民间的一种半古典关系。如今,马克思所谓的工业无产阶级的80%生活在中国或某个西欧与美国之外的地方。<sup>[38]</sup>

然而,在大多数发展中世界,城市增长缺乏中国、韩国和台湾那种强

[36]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转引自《金融时报》,2003年11月23日。

[37] 戈尔茨坦:《中国城市化水平》(Goldstein, "Level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表格7.1,第201页;1978年数据来自吉杨·法布雷(中文名:蒲吉兰):“中国”,见于蒂埃里·帕科:《城里人:城市规划前景》(Guilhen Fabre, "La Chine," in Thierry Paquot, *Les Monde des Villes: Panorama Urbain de la Planète*),布鲁塞尔,1996年,第187页。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世界银行与法布雷的时间序列并不相同,前者指出1978年城市化比率为18%而非13%。(参见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2001),CD光盘版。)

[38] 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一体化世界中的工人》(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Workers in an Integrating World*),纽约,1995年,第170页。

有力的制造业出口机制和中国大量引入外资的机制(目前相当于整个发展中世界外资总量的一半)。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孟买、约翰内斯堡、布宜诺斯艾利斯、贝洛奥里藏特(Belo Horizonte)和圣保罗——都出现大批工厂倒闭和去工业化的倾向。在其他地区,城市化已经越来越无关乎工业化甚至发展本身。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化则与假定的城市化要素及上升的农业生产率无关。其结果是,城市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关联甚少,反之亦然。图表5说明了最大的大都市区人口与GDP排行间的不等。

图表5 人口与GDP排行:十个最大的城市〔39〕

序号	按2000年的人口排行	按1999年的GDP排行
1	东京	东京(1)
2	墨西哥市	纽约(3)
3	纽约	洛杉矶(7)
4	首尔	大阪(8)
5	圣保罗	巴黎(25)
6	孟买	伦敦(19)
7	德里	芝加哥(26)
8	洛杉矶	旧金山(35)
9	大阪	杜塞尔多夫市(46)
10	雅加达	波士顿(48)

有人会认为,无工业化的城市化是对一种不可阻挡趋势的表达:高科技资本主义的内在趋势解除了生产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联系。正如我们随后将看到的那样,无增长的城市化,显然是全球政治危机——1970

〔39〕 人口排行来自托马斯·布尔克霍夫的网站([www.citypopulation.de](http://www.citypopulation.de)); GDP排行来自丹尼斯·皮曼:《比例规律与城市系统》,收入《圣达菲学院4月2日工作报告》(Denise Pumain, "Scaling Laws and Urban Systems," *Santa Fe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04-02-002), 圣达菲, 2002年, 第4页。

年代末期世界范围内的债务危机与随即的 1980 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领导的第三世界经济重建——的产物, 而非任何先进技术的必然趋势。

此外, 在整个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早期的破坏性岁月中, 第三世界城市化继续其非常危险的快速步伐(从 1960 年到 1993 年每年 3.8% 的增长率), 尽管实际工资下降、商品价格暴涨, 城市失业率剧增。<sup>[40]</sup> 在传统经济学看来, 城市衰退的否定性反馈将减慢甚至逆转乡村向城市的移民, 因而上述这种城市繁荣的保持令大部分专家们感到吃惊。<sup>[41]</sup> 发展经济学家奈杰尔·哈里斯(Nigel Harris)1990 年感到惊讶:“如此看来, 低收入国家城市收入的显著下跌可能不一定会在短期内导致乡村移民的下降。”<sup>[42]</sup>

非洲的情况特别自相矛盾: 科特迪瓦(Côte d'Ivoire)、坦桑尼亚(Tanzania)、刚果(金)(Congo-Kinshasa)、加蓬(Gabon)、安哥拉(Angola)和其他城市——经济每年缩减 2% 到 5%——如何能够支撑每年 4% 到 8% 的人口增长率?<sup>[43]</sup> 在 1980 年代城市经济处于深度衰退的情况下, 拉各

[40] 约瑟夫·古格勒:《导论——二 城乡移民》, 参见古格勒编:《发展中世界的城市: 议题、理论与政策》(Josef Gugler, “Introduction-II.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Gugler (eds.), *Cit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ssues, Theory and Policy*), 牛津, 1997 年, 第 43 页。

[41] 萨莉·芬德利强调 1980 年代的每个人都低估了持续的城乡移民程度和城市化的最终比率。芬德利:《第三世界城市》, 参见卡萨达和帕内尔等编:《第三世界城市: 问题》(Findley, “The Third World City,” in Kasarda and Parnell, *Third World Cities: Problems*), 第 14 页。

[42] 奈杰尔·哈里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经济发展与政策》, 载于《国际人居》(Nigel Harris, “Urban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bitat International* 14: 4), 第 14 期, 第 4 卷, 1990 年, 第 21-22 页。

[43] 戴维·西蒙:《非洲城市化, 全球化与经济危机》, 参见卡罗尔·拉科迪编:《城市化在非洲的挑战: 非洲大城市的成长与管理》(David Simon, “Urba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Crisis in Africa,” in Carole Rakodi (ed.), *The Urban Challenge in Africa: Growth and Management in Its Large Cities*), 东京, 1997 年, 第 95 页。关于 1800—1850 年代英国工业城市的增长率, 参见阿德纳·韦伯:《19 世纪城市增长: 统计学研究》(Adna Weber, *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Study in Statistics*), 纽约, 1899 年, 第 44, 52-53 页。

斯怎么可能像尼日利亚一样增长两倍人口？<sup>[44]</sup>实际上，非洲作为一个整体，目前正处于一个不景气的、城市就业和农业生产率陷入低谷的萧条期，如何能够维持一个比维多利亚成长高峰期大多数欧洲城市的年城市化率(2.1%)还高的比率(3.5%到4%)？<sup>[45]</sup>

当然，部分秘密在于：即便是在城市已经停止成为就业机会的生产机器时，放松管制的农业政策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加强的金融规则仍然促使乡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贫民窟输出。正如黛博拉·布赖森(Deborah Bryceson)——欧洲一位重要的非洲文化研究者——在其最近的土地研究概论中强调的那样，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全球农村史无前例的剧变时代：

一个接一个的联合政府，债务缠身，变得受制于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简称 SAPs)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限制。一度改善了农业投入和乡村基础结构建设的补贴遭到大幅度削减。正如已被放弃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农民“现代化”尝试，农民们受制于国际金融制度的“成败全靠自己”(sink or swim)经济策略。国家市场的撤消把农业生产者推进全球商品市场。在那儿，中农和贫农一样发现很难与别人竞争。结构调整计划和经济自由化政策代表了世界范围的去土地化(de-agrarianization)力量，并推

---

[44] A. S. 奥贝南：《第三世界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就业与贫困：政策问题分析》(A. S. Oberai, *Population Growth, 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Third - World Mega - Cities: Analytical Policy Issues*)，伦敦，1993年，第165页。

[45]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非洲环境展望：过去、现在和未来》(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African Environment Outlook: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erspectives*)，转引自《金字塔周报》(开罗)(*Al Abram Weekly*(Cairo))，2003年10月2日-8日；阿兰·雅克曼：《第三世界城市发展与新兴城镇：新孟买经验的教训》(Alain Jacquemin, *Urban Development and New Towns in the Third world: Lessons from the New Bombay Experience*)，艾迪索特，1999年，第28页。

进了去农业化(de-peasantization)的国家政策的聚合。〔46〕

随着当地安全网络的消失,贫穷农民越来越无力抵抗外来冲击:旱灾、通货膨胀、利率的提高或商品价格的下降。(或疾病:约60%的高棉小自耕农因为医疗债务而被迫卖掉他们的土地搬到城里。〔47〕)

与此同时,贪婪的军阀和长期的内战,经常是由附加债务的结构性调整的经济混乱或外国经济掠夺者(如在刚果和安哥拉)所激发,已经改变了整个农村的生活方式。城市——尽管它们呈现停滞或经济衰退,缺乏新的公共建设、教育设施或公共卫生体系所必须的投资——是这一世界土地危机的唯一赢家。不再是劳动力集中的乡村与资本集中的工业都市经典原型,第三世界如今出现了许多资本集中的乡村和劳动力集中的工业城市的例子。换句话说,“过度城市化”被贫困的再生产而不是就业机会的提供所驱动。这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新自由世界秩序未曾预料到的发展轨迹。〔48〕

从卡尔·马克思到马克斯·韦伯,经典社会理论相信未来的大城市将沿着曼彻斯特、柏林和芝加哥的工业化足迹前进——实际上,洛杉矶、圣保罗、釜山(Pusan)和今天的华雷斯城(Ciudad Juárez)、班加罗尔(Bangalore)及广州都大致模拟了这一经典策略。然而,绝大多数南半球城市的发展更近似于维多利亚时代的都柏林(Dublin)。正如历史学家埃米特·拉金(Emmet Larkin)曾强调的那样:“在所有产生于19世纪西方世界的贫民窟中,都柏林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其贫民窟并非工业革命的

---

〔46〕 黛博拉·布赖森:《消失中的农民?新自由时代及其后的农村劳动力冗余》,收入布赖森,凯和穆杰:《消失中的农民?》(Deborah Bryceson, “Disappearing Peasantries? Rural Labour Redundancy in the Neo-liberal Era and Beyond,” in Bryceson, Kay, and Mooij, *Disappearing Peasantries?*),第304-305页。

〔47〕 塞巴斯蒂安·德·狄阿努斯:“柬埔寨受苦的人们”,载于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Sébastien de Dianous,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du Cambodge,” *Le Monde diplomatique*),2004年9月,第20页。

〔48〕 约瑟夫·古格勒:《过度城市化再思考》,收入古格勒:《发展中世界的城市》(Josef Gugler, “Overurbanization Reconsidered,” in Gugler, *Cit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第114-123页。

产物。事实上,都柏林所遭遇的问题更多地来自 1800 至 1850 年代的去工业化而非工业化。”〔49〕

同样,尽管进口替代工业逐步崩溃,公共部门日渐缩小,中产阶级每况愈下,金沙萨、罗安达(Luanda)、喀土穆(Khartoum)、达累斯萨拉姆(Dar-es-Salaam)、瓜亚基尔(Guayaquil)和利马仍然保持了惊人长势。全球力量——爪哇和印度的农业机械化,墨西哥、海地(Haiti)和肯尼亚(Kenya)的食品出口,蔓延整个非洲的内战和干旱,小块自留地(holding)联合为大块土地,工业规模的农业商业(agribusiness)竞争——把人们从乡村“推”开。这些力量看起来甚至在城市“魅力”被债务和经济萧条削弱时维持了工业化。其结果是,结构性调整、货币贬值和财政紧缩背景下的快速城市增长已经成为贫民窟大市场不可避免的处方。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简称 ILO)的一项研究估计,第三世界的正式房地产市场仅仅供应了 20% 多的新房储备。如此大的供需差距使得人们转而求助于自建简易房、非正式出租房、私占土地或人行道。〔50〕联合国声称,“过去 30 或 40 年来,非法或非正式的土地市场已经为南半球大多数城市的大多数新建房储备提供了地皮。”〔51〕

自 1970 年代以来,南半球各地贫民窟的增长已经超过其城市化。因此,回顾 21 世纪末的墨西哥市,城市规划专家普里西拉·康纳利(Priscilla Connolly)发现,“60% 的城市增长是人(特别是女人)的增长。他们勇敢地把自己的居住区兴建在无任何公共服务的外围土地上,而他们赖以

---

〔49〕 拉金为杰辛塔·普朗蒂《都柏林贫民窟,1800—1925:都市地理学研究》一书所作前言(Forward to Jacinta Prunty, *Dublin Slums, 1800—1925: A Study in Urban Geography*),都柏林,1998 年,第 9 页。当然,拉金忘了与都柏林相应的地中海城市:那不勒斯(Naples)。

〔50〕 A. S. 奥贝南:《第三世界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就业与贫困:政策问题分析》(A. S. Oberai, *Population Growth, 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Third-World Mega-Cities: Analytical Policy Issues*),第 13 页。

〔51〕 联合国人居署:《一个正在城市化的世界:全球人居报告》(UN-HABITAT, *An Urbanising World: Global Report on Human Settlements*),牛津,1996 年,第 239 页。

为生的非正式工作在总就业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52〕圣保罗的贫民窟——1973 年仅占总人口的 1.2%，但 1993 年就达到了总人口的 19.8%——在整个 1990 年代以每年 16.5% 的爆炸性比率增长。〔53〕在全世界城市边界增长最快的亚马逊流域，80% 的城市增长是贫民窟增长，它们大部分没有已建成的公用事业和市立交通运输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因此使得“城市化”成为“贫民窟化”的同义词。〔54〕

同样的趋势在亚洲随处可见。据北京市警察局估计，每年约 20 万“流动人口”（没有登记的农村移民）抵达北京，他们中的许多人涌入首都南边的非法贫民窟。〔55〕与此同时，1980 年代末的一项研究表明，90% 以上的南亚城市住房增长发生在贫民窟。〔56〕卡拉奇不规则延伸的棚户区（*Katchi abadi*）擅自定居者人口每十年翻一番，印度贫民窟继续以比总人口快 250% 的比率增长。〔57〕据孟买的估计，每年 4.5 万套的住宅赤字转

---

〔52〕 普里西拉·康纳利：《墨西哥市：我们共同的未来？》载于《环境与城市化》（Priscilla Connolly, “Mexico City: Our Common Future?”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1:1），1999 年 4 月，第 56 页。

〔53〕 伊沃·因帕拉托和杰夫·鲁斯特：《贫民窟升级与参与：来自拉丁美洲的教训》（Ivo Imparato and Jeff Ruster, *Slum Upgrading and Participation: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华盛顿，2003 年，第 333 页。

〔54〕 约翰·布劳德和布赖恩·戈弗雷：《热带雨林城市：巴西亚马逊流域的城市化、发展与全球化》（John Browder and Brian Godfrey, *Rainforest Citie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of the Brazilian Amazon*），纽约，1997 年，第 130 页。

〔55〕 杨文忠和王功繁：《农民运动：警方观点》，收入迈克尔·达顿编：《中国街头生活》（Yang Wenzhong and Wang Gongfan, “Peasant Movement: A Police Perspective”, in Michael Dutton (ed.), *Streetlife China*），剑桥，1998 年，第 89 页。

〔56〕 迪莱尼·居内瓦尔德纳：《南亚的城市贫困：我们知道什么？我们需要知道些什么？》收入《缓解贫困和社会发展讨论会的工作报告》（Dileni Gunewardena, “Urban Poverty in South Asia: What Do We Know? What Do We Need to know?”, *Working paper, Conference on Poverty Reduction and Social Progress*），孟加拉国 Rajendrapur，1999 年 4 月，第 1 页。

〔57〕 阿里夫·哈桑：“导言”，收入阿赫塔尔·哈米德汗：《欧兰治试点项目：回忆与反思》（Arif Hasan, “Introduction”, in Akhtar Hameed Khan, *Orangi Pilot Project: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卡拉奇，1996 年，第 34 页。

变为非正式贫民窟住房的相应增长。<sup>[58]</sup> 每年移民到德里的 50 万人中,估计有 40 万人定居在贫民窟中;到 2015 年,印度首都将有超过 1000 万的贫民窟人口。规划专家高塔姆·查特吉(Gautam Chatterjee)警告说:“如果这样一种趋势持续不衰的话,我们将会只有贫民窟而不再有城市。”<sup>[59]</sup>

当然,非洲的情形更为极端。非洲贫民窟以两倍于欧洲大陆城市的速度增长。实际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89 至 1999 年间 80% 的肯尼亚人口增长被吸纳于内罗毕(Nairobi)和蒙巴萨(Mombasa)恶臭熏天的、拥挤不堪的贫民窟。<sup>[60]</sup> 与此同时,任何缓解非洲城市贫困的现实希望都从官方视野中消散了。2004 年 10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度联合会议上,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及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发现,最初计划在 2015 年达成的联合国非洲千禧年发展目标(UN'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for Africa)将不可能在几代人中实现:“一直到 213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才会获得普通的初级教育;2150 年,贫困率将降低 50%;而可避免的婴儿死亡要到 2165 年才能完全消除。”<sup>[61]</sup> 到 2015 年,黑非洲(Black Africa)将有 3.32 亿贫民窟居民,这一

---

[58] 苏克图·梅塔:《极限城市:孟买的得失》(Suketu Mehta, *Maximum City: Bombay Lost and Found*),纽约,2004 年,第 117 页。

[59] 高塔姆·查特吉:《一致与对抗》,载于《人居论争》(Gautam Chatterjee, “Consensus versus Confrontation”, *Habitat Debate* 8: 2),第 8 期,第 2 卷,2002 年 6 月,第 11 页。德里的数据来自拉凯什·K. 辛哈:“新德里:形成中的世界贫民窟首都”,载于《南亚一家》(Rakesh K. Sinha, “New Delhi: The World's Shanty Capital in the Making,” *One World South Asia*),2003 年 8 月,第 26 期。(One World South Asia,人权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一个慈善组织。——译者注)

[60] 哈维·赫尔和京特·卡尔:《全球贫民窟居民估计:千禧年发展目标 7,目标 11 监测》,收入《联合国人居署工作报告》(Harvey Herr and Guenter Karl, “Estimating Global Slum Dwellers: Monitoring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7, Target 11,” UN-Habitat working paper),内罗毕,2003 年,第 19 页。

[61] 戈登·布朗(Gordon Brown),转引自《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2004 年 10 月 4 日。

数字将以每 15 年翻一番的速度持续增长。〔62〕

因此,未来的城市,不是像早期都市学家们所想象的那样,由玻璃和钢筋构成,而更多地由粗糙的砖头、稻草、回收塑料、水泥块和废木头所构成。不是光彩夺目直达天堂的城市,21 世纪的大多数城市蜷伏在泥泞之中,被污染、粪便和腐烂所包围。实际上,居住在后现代贫民窟的 10 多亿城市居民可能会充满嫉妒地回顾安那托利亚高原地区(Anatolia)查塔·休于(Çatal Hüyük)遗址上结实耐用的泥土房废墟。这些泥土房兴建于 9000 年前城市生活刚刚兴起之际。

---

〔62〕 联合国数据,转引自约翰·维达尔:《城市如今是贫困前线》,载于《卫报》(John Vidal, "Cities Are Now the Frontline of Poverty," *Guardian*), 2005 年 2 月 2 日。

## 第二章 贫民窟的盛行

---

当他凝视这个半贫民窟半乐园的城市时，  
他让自己的思绪飘散。  
一个地方怎么能如此丑陋和充满暴力，  
而又如此美丽？

——克里斯·阿巴尼〔1〕

2003年10月，联合国人居署出版了一份严肃的历史性报告《贫民窟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Slums*)。该报告的主要论题是贫民窟惊人地盛行。这是沿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亨利·梅休(Henry Mayhew)、查理·布思(Charles Booth)和雅可布·里斯(Jacob Riis)的著名足迹对城市贫困第一次真正全球意义上的清算；是近两个世纪以来发轫于詹姆斯·怀特劳(James Whitelaw)1805年《都柏林贫困调查报告》(*Survey of Poverty in Dublin*)的、对贫民窟生活科学考察研究的高潮。这也是对世界银行1990年代发出的警告——城市贫困将成为“下个世纪最显著的、最具政治爆炸性的问题——期待已久的实证文献”。〔2〕

---

〔1〕 克里斯·阿巴尼：《恩赐之地》(Chris Abani, *Graceland*)，纽约，2004年，第7页。

〔2〕 石安庆：《城市饮用水及下水道驳引设施对儿童死亡率的影响》，收入世界银行金融发展研究小组：《工作报告》(Anqing Shi, “How Access to Urban Potable Water and Sewerage Connections Affects Child Mortality”, Finance,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working paper, World Bank), 2000年，第14页。

《贫民窟的挑战》是一百多个研究者的合作成果,整合了三个新的分析和数据资源。第一,它基于对从阿比让(Abidjan)到悉尼(Sydney)的34个大都市的贫困、贫民窟状况和住房政策的概要的个案研究;这一计划由联合国人居署委托伦敦大学学院发展规划部(Development Planning Unit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统一协调。<sup>〔3〕</sup>第二,它应用了由联合国人居署城市指标方案(UN-HABITAT Urban Indicators Programme)为“2001年伊斯坦布尔暨五国城市首脑会议”(2001 Istanbul + 5 Urban Summit)所创建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对世界范围内237个城市进行比较的数据库。<sup>〔4〕</sup>第三,它囊括了中国和前苏联在内,从而为全球住房调查数据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联合国权威人士肯定了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特殊贡献,他最先倡导以这些调查作为研究全球不平等的强力显微镜。在他的一篇论文中,米拉诺维奇解释道:“在人类历史上,研究者们第一次拥有了关于90%以上的世界人口收入或福利分配(支出或消费)的相当准确的数据。”<sup>〔5〕</sup>如果说跨政府专门小组对于气候变化的报告意味着对全球变暖危险史无前例的科学性一致认识,那么《贫民窟的挑战》就是一份关于世界范围内城市贫困大灾难的同样权威的警告。

---

〔3〕 伦敦大学学院发展规划部与联合国人居署:《理解贫民窟:2003年全球人居报告的个案研究》(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Development Planning Unit and UN-HABITAT, *Understanding Slums: Case Studies for the Global Report on Human Settlements 2003*),网址:www.ucl.ac.uk/dpu-projects/Global-Report. 这些研究中的绝大部分都被概述在《贫民窟的挑战》一书背后的附录中。然而漏掉了贾拉勒·埃尔丁·埃尔塔耶比(Galal Eldin Eltayeb)对喀土穆(Khartoum)的优秀调查,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伊斯兰主义,极权主义政体”特点。

〔4〕 参见《挑战》(*Challenge*)一书,第245页。

〔5〕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1988和1993年真实的世界收入分配:第一次仅仅基于住宅调查的估计》,世界银行《工作报告》(Branko Milanovic, “True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1988 and 1993: First Calculation Based On Household Survey Alone”, *working paper*, World Bank),纽约,1999年,未注明出版商(n.p)。

但什么是“贫民窟”呢？据报导，第一个公开出版的定义见于作家詹姆斯哈代·沃克斯(Janes Hardy Vaux)1812年的《闪客词典》(*Vocabulary of the Flash Language*)，该书中“贫民窟”与“敲诈勒索”或“罪恶交易”是同义词〔6〕。然而，到了1830和1840年代霍乱盛行的年月，贫民在贫民窟中生活而非从事交易。卡迪纳尔·怀斯曼(Cardinal Wiseman)因其在关于城市改革的著作中把“贫民窟”(低级行为发生的空间)从一个街头俚语变革为一个被附庸风雅的作家们随意使用的术语而不时受到赞扬。〔7〕到19世纪中叶，贫民窟一词在法国、美国和印度被确认，并被广泛认可为一种国际现象。专家们和外行们(法文:flâneurs)争论人类在何处堕落得最可怕:白教堂区(Whitechapel)还是拉夏贝尔(La Chapelle)、格拉斯哥(Gorbals)还是自由区(Liberities)、穷巷(Pig Alley)还是茂比利湾(Mulberry Bend)。在1895年的一份关于“大城市中的贫民”的调查中，《史克里伯纳杂志》(*Scribner's Magazine*)把那不勒斯(Naples)的商住综合体(fondaci)称为“地球表面最恐怖的人类居住区”，但高尔基认为莫斯科(Moscow)最臭名昭著的克绰维(Khitrov)公园实际上是“更低级的深渊”；而吉卜林(Kipling)讽刺地把读者带入加尔各答(Calcutta)“越来越静默的”科洛欧托拉(Colootollah)“恐怖之夜”中“一切最低级的堕落”。〔8〕

〔6〕 普朗蒂:《都柏林贫民窟》(Prunty, *Dublin Slums*),第2页。

〔7〕 J. A. 耶林:《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贫民窟与贫民窟清理》(J. A. Yelling, *Slums and Slum Clearance in Victorian London*),伦敦,1986年,第5页。

〔8〕 罗伯特·伍兹等著:《大城市中的贫民:他们的问题以及正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Robert Woods et al., *The Poor in Great Cities: Their Problems and What is Being Done to Solve Them*),纽约,1895年,第305页。〔《史克里伯纳杂志》(*Scribner's Magazine*)〕;布莱尔·鲁布尔:《二级大都市:镀金时代的芝加哥、白银时代的莫斯科和明治时期的大阪的实用主义多元论》(Blair Ruble, *Second metropolis: Pragmatic Pluralism in Gilded Age Chicago, Silver Age Moscow and Meiji Osaka*),剑桥,2001年,第266-267页。希特罗夫(Khitrov);鲁亚德·吉卜林:《暗夜之城及其他诗歌》(Rudyard Kipling, *The City of Dreadful Night, and Other Poems*),伦敦,1891年,第71页。

这些经典的贫民窟具有臭名昭著的地方性和别具一格的当地性，但改革者们一致同意查理·布思的观点——废弃伦敦的“利文斯敦博士”<sup>\*</sup>——即所有贫民窟都是以破烂住宅、过度拥挤、疾病、贫困和邪恶的混合为特征。当然，对19世纪自由主义者而言，道德维度是决定性的，贫民窟最先和首先被想象为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不可救药的、野兽般的社会“渣滓”堕落在一种不道德的和常常是放荡的狂欢之中；实际上，一大批文学作品曾以那些来自城镇阴暗面的可怕故事取悦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在《城市中的人性》(*Humanity in the City*)一书中，查平牧师(Reverend Chapin)狂热地说道：“野蛮不是在阴暗的森林中，而是在煤气灯下和警察眼中；带着一种战争狂欢(war-whoops)和夜总会般的狂热，他们衣冠楚楚，内心却与犯罪分子一样残酷。〔9〕40年后，新的联合国劳工部(US Department of Labor)在对美国廉价公寓生活的第一次科学“调查”〔《巴尔的摩、芝加哥、纽约和费城的贫民窟》(*The Slums of Baltimore, Chicago, New York, and Philadelphia, 1894*)〕中仍把贫民窟定义为“肮脏的背街地区，特别是当其为一些流动和犯罪人口所居住时”〔10〕。

---

\* Dr. Livingstone, 即 Dr. 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利文斯敦的身份比较复杂，他是传教士、医生、探险家、科学家，毕生投身于反奴隶制度的斗争中。他在非洲度过了30年，足迹遍及非洲大陆的三分之一。作为第一个从西到东横跨非洲大陆的先行者，利文斯敦获得伦敦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金质奖章。尽管他未能完成自己的人生目标之一——尼罗河探源，但作为第一个发现赞比亚西南部维多利亚瀑布的白人，他名垂青史，瀑布旁边的城市以他命名。利文斯敦熟谙非洲语言，由于他同情原著民，不惜与白人征服者为敌。1865年52岁时，利文斯敦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旅行。途中他目睹了贩奴者的血腥屠杀并函告英国，此信迫使英国政府干涉桑给巴尔的奴隶贸易。——译者注

〔9〕 埃德温·查平牧师：《城市中的人性》(Rev. Edwin Chapin, *Humanity in the City*)，纽约，1854年，第36页。

〔10〕 参见卡罗尔D.赖特：《巴尔的摩、芝加哥、纽约和费城的贫民窟》(Carroll D. Wright, *The Slums of Baltimore, Chicago, New York, and Philadelphia*)，华盛顿，1894年，第11—15页。

## 全球贫民窟户口普查

《贫民窟的挑战》一书的作者们抛弃了这些维多利亚式的诽谤,而以另外的方式保留了贫民窟的经典定义:以过度拥挤、贫穷或非正式住房、安全饮水、下水道设施的缺乏和工作的无保障等为特征。这一可操作性定义在2002年10月内罗毕举行的一次联合国会议上被正式采用,“仅限于居住区的物质和法律特征”,避开了更难测量的“社会维度”,尽管它在大多数情况下等同于经济和社会边缘性。<sup>[11]</sup> 这一定义将城郊棚户区 and 内城廉价公寓涵盖在内。对界定贫民窟具有什么样的特质而言,这种多维方式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方法;许多读者将对联合国相应的实证发现感到吃惊:仅有19.6%的墨西哥市民居住在贫民窟中(当地专家曾承认将近2/3的墨西哥人居住在贫民窟价格低廉或老旧的廉价公寓中)。即使采用这一限制性的定义,联合国研究者估计2001年至少有9.21亿贫民窟居民,而2005年将超过10亿:约等于青年恩格斯1844年首次在圣吉尔斯(St. Giles)和曼彻斯特旧城(Old Town Manchester)主要街道上冒险时的世界人口总数。<sup>[12]</sup>

实际上,自197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已经使得狄更斯《荒凉山庄》(*Bleak House*)第五章《汤姆一个人呆着》(*Tom-all-Alone's*)中臭名昭著的贫民窟按指数成倍增加。贫民窟居民,尽管只占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的6%,构成了最不发达国家(least-developed countries,简称LDCs)城市人口的78.2%,这相当于全球城市人口总数的1/3。

据联合国人居署的报告,全世界贫民窟居民比率最高的地区是埃塞

[11] 《挑战》(*Challenge*),第12-13页。

[12] 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执行主任安娜·蒂拜朱卡(Anna Tibaijuka),转引自“十多亿人称城市贫民窟为他们的家园”,收入《城市市长报告》(*More than One Billion People Call Urban Slums Their Home*, *City Mayor Report*),2004年2月,网址:[www.citymayors.com/report/slums.html](http://www.citymayors.com/report/slums.html)。

俄比亚(Ethiopia)(令人震惊地占到城市人口的99.4%)、乍得(Chad)(也是99.4%)、阿富汗(Afghanistan)(98.5%)和尼泊尔(Nepal)(92%)。孟买有1000万到1200万强占土地者和廉价公寓居民是全球贫民窟住宅的中心,接下来是墨西哥市和达卡(分别是900万到1000万),再下来是拉各斯、开罗、卡拉奇、金沙萨-布拉柴维尔、圣保罗、上海和德里(分别是600万到800万)。<sup>[13]</sup>

图表6 按国家计算的最大贫民窟人口<sup>[14]</sup>

国 家	贫民窟人口与城市人口的百分比	数字(以百万计)
中国	37.8	193.8
印度	55.5	158.4
巴西	36.6	51.7
尼日利亚	79.2	41.6
巴基斯坦	73.6	35.6
孟加拉国	84.7	30.4
印度尼西亚	23.1	20.9
伊朗	44.2	20.4
菲律宾	44.1	20.1
土耳其	42.6	19.1
墨西哥	19.6	14.7
南朝鲜	37.0	14.2
秘鲁	68.1	13.0
美国	5.8	12.8
埃及	39.9	11.8

[13] 联合国人居署:《世界贫民窟:新千年城市贫困的面孔?》(UN-HABITAT, "Slums of the World: The Face of Urban Poverty in the New Millennium?"),《工作报告》,内罗毕,2003年,附录3。

[14] 这些估计来自2003年联合国人居署个案研究以及许多不同资源的平均值,这些资源因数目太多而无法在此一一列出。

(续表)

国 家	贫民窟人口与城市人口的百分比	数字(以百万计)
阿根廷	33.1	11.0
坦桑尼亚	92.1	11.0
埃塞俄比亚	99.4	10.2
苏丹	85.7	10.1
越南	47.4	9.2

贫民窟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是如今的俄罗斯联邦(Russian Federation),特别是其依靠一种单一的、如今已倒闭工业的前“社会主义公司城镇”(ex-“socialist company towns”)和先前的苏维埃共和国(Soviet republics),在那儿,城市遗弃、经济不平等和市政投资缩减以同样令人厌恶的速度滋生。据1993年联合国城市指标方案(Luyban Indicators programme)报告,在阿塞拜疆(Azerbaijan)的巴库(Baku)和亚美尼亚(Armenia)的埃里温(Yerevan),贫困率均为80%甚或更高。<sup>[15]</sup>同样,苏联时代(concrete-and-steel Soviet-era)的钢筋混凝土城市核心乌兰巴托(Ulaanbaatar)现在被50万生活在被称为蒙古包(gers)帐篷中的、先前的田园主义者或更贫困的人包围,他们中很少有人能设法做到每天吃一餐以上。<sup>[16]</sup>

然而,已发现的最穷城市人口可能在罗安达、马普托(Maputo)、金沙

[15] 克里斯蒂安娜·格鲁塔尔特和珍妮·布雷思韦特:《东欧和前苏联贫困的决定因素》(Christiana Grootaert and Jeanine Braithwaite, “The Determinants of Poverty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收入珍妮·布雷思韦特、克里斯蒂安娜·格鲁塔尔特和布兰科·米拉诺维合编:《转型期国家的贫困与社会援助》(in Jeanine Braithwaite, Christiana Grootaert, and Branko Milanovi (eds), *Poverty and Social Assistance in Transition Countries*),纽约,2000年,第49页;联合国人居中心(U)1993年全球指标数据库(N Center for Human Settlements,简称UNCHS, Global Indicators Database 1993)。

[16] 乌兰巴托市市长办公室:“城市贫困数据图”(Office of the mayor, Ulaanbaatar City, “Urban Poverty Profile,” submitted to World Bank, n. d.,)网址:infocity.org/F2F/poverty/papers2/UB(Mongolia)%20Poverty.pdf.

萨和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 (Cochabamba), 在那儿 2/3 或更多居民每天赚的钱还不够维持他们每日食物所需的最低费用。<sup>[17]</sup> 在罗安达, 1/4 的家庭人均日消费少于 75 美分, 1993 年 (5 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是使人惊骇的 32%, 全世界最高。<sup>[18]</sup>

可以确信的是, 并非所有城市贫民都居住在贫民窟中; 也并非所有贫民窟居民都是贫民; 事实上, 《贫民窟的挑战》强调: 在一些城市中, 大多数贫民实际上居住在贫民窟外面。<sup>[19]</sup> 尽管“城市贫民”与“贫民窟居民”这两个范畴的意义显然有大部分的重叠, 但城市贫民的数目大得多: 至少一半的世界城市人口被相对的国家贫困起点所限定。<sup>[20]</sup> 此外, 约 1/4 的城市人口 (正如 1988 年调查表明的那样) 生活在几乎不可想象的“绝对”贫困中——以某种方式靠每日 1 美元甚至更少的钱维生。<sup>[21]</sup> 如果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是准确的, 富裕城市如西雅图 (Seattle) 与贫困城市如伊巴

---

[17] 西蒙:《非洲城市化, 全球化与经济危机》, (Simon, “Urba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Crisis in Africa,”), 第 103 页; 让-吕克·皮耶梅:“金沙萨: 一座缓刑的大城市?” 收入拉科迪文集 (Jean-Luc Piermay, “Kinshasa: A Reprieved Mega-City?,” in Rakodi, ), 第 236 页; 卡门·莱多·加西亚:《玻利维亚国家经济走廊城市中的城市化与贫困》(Carmen Ledo García, *Urbanization and Poverty in the Cities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rridor in Bolivia*), 代尔夫特, 2002 年, 第 175 页。(60% 的科查班巴人日薪 1 美元甚至更少)

[18] 罗安达的儿童死亡率比法国雷恩 (Rennes, 这个城市 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最低) 高出 400 倍。石安庆:《城市饮用水及下水道驳引设施对儿童死亡率的影响》(Shi, “How Access to Urban Portable Water and Sewerage Connections Affects Child Mortality”), 第 2 页。

[19] 《挑战》(Challenge), 第 28 页。

[20] 卡维塔·达塔和加雷思·A. 琼斯合著:《前言》, 收入达塔和琼斯合编:《发展中国家的住房与财政》(Kavita Datta and Gareth A. Jones, “Preface,” in Datta and Jones (eds), *Housing and 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伦敦, 1999 年, 第 16 页。例如, 在加尔各答 (Kolkata), 贫困线被划定为每日 2100 卡食物的货币等价物。因此欧洲最穷的人很可能成为加尔各答的一个富人, 反之亦然。

[21] 世界银行报告, 转引自艾哈迈德·索利曼:《可能的出路: 埃及城市中非正规住宅的正规化》(World Bank report quoted in Ahmed Soliman, *A Possible Way Out: Formalizing Housing Informality in Egyptian Cities*), 兰纳姆博士, 2004 年, 第 125 页。

丹(Ibadan)的家庭人均收入差异高达 739:1——一种难以置信的不平等。〔22〕

实际上很难得到准确的统计数据,因为贫民和贫民窟人口经常被官方蓄意和大量地少算。例如,在 1980 年代,曼谷银行发布的官方贫困率仅为 5%,而调查发现近 1/4 的人口(116 万)生活在 1000 个贫民窟和擅自定居区中。〔23〕同样,墨西哥政府在 1990 年代宣称仅有 1/10 的城市人口是真正的贫民,尽管联合国数据毋庸置疑地显示该国近 40% 的人口每日生活费不足 2 美元。〔24〕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统计数据也因为掩盖城市贫困而声名狼藉。大多数研究者估计雅加达 1/4 的人口是贫民窟居民,当地的官方数字(低于 5%)纯属荒谬。〔25〕在马来西亚,地理学家乔纳森·里格(Jonathan Rigg)抱怨:官方的贫困线“未能考虑到城市生活的更高花费”,并蓄意把华裔贫民排除在外。〔26〕与此同时,都市社会学家埃哈德·伯纳(Erhard Berner)相信,马尼拉的贫困估计被蓄意模糊,至少 1/8 的贫民窟人口没有计算在内。〔27〕

---

〔22〕 石安庆:《城市饮用水及下水道驳引设施对儿童死亡率的影响》(Shi, “How Access to Urban Portable Water and Sewerage Connections Affects Child Morality,”),附录 3,源自联合国人类居住中心 1993 年全球指标数据库(UNCHS Global Indicators Database 1993),伊巴丹的数据可能点错了一个小数点。

〔23〕 乔纳森·里格:《东南亚:一个变革中的地区》(Jonathan Rigg, *Southeast Asia: A Region in Transition*),伦敦,1991 年,第 143 页。

〔24〕 因帕拉托和鲁斯特:《贫民窟升级与参与:来自拉丁美洲的教训》(Imparato and Ruster, *Slum Upgrading and Participation*),华盛顿,2003 年,第 143 页。

〔25〕 保罗·麦卡锡:《雅加达,印度尼西亚》,联合国人居署个案研究(Paul McCarthy, “Jakarta, Indonesia”, UN-HABITAT case study),伦敦,2003 年,第 7-8 页。

〔26〕 里格:《东南亚》(Rigg, *Southeast Asia*),第 119 页。

〔27〕 埃哈德·伯纳:《捍卫城里的一块土地:马尼拉主城区的居所与城市土地争夺》(Erhard Berner, *Defending a Place in the City: Locali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Urban Land in Metro Manila*),奎松城,1997 年,第 21,25,26 页。

## 一种贫民窟类型学

全世界可能有 20 多万个贫民窟,人口规模从几百人到上百万人不等。单是南亚最大的 5 个大都市(卡拉奇、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和达卡)就包括将近 1.5 万个确认无误的贫民窟社区,其人口总数超过 2 亿。“大贫民窟”兴起于棚户区以及由强占土地者社区合并而成的非正式居住区和贫民区(经常是在城市周边)连续带之中。例如,1992 年,墨西哥市约有 660 万低收入人口生活在蔓延 348 公里的非正式居住区中。<sup>[28]</sup>同样,绝大部分利马贫民生活在由中心城市辐射出来三个大型边缘贫民窟中;在非洲和中东,城市贫困如此巨大的空间集中现象也很普遍。另一方面,在南亚,城市贫民趋向于生活在以一种呈不规则碎片分布的复杂性模式更广泛地散落在整个城市建筑中的、更多数目的不同贫民窟中。例如,在加尔各答,数千个密集的贫民窟——5 幢简陋的房屋分别有 9 个临时营房,分为若干个 45 平方米的房间,通常,难以置信地每间住着 13.4 人——与种种其他居住状况和土地利用混杂在一起。<sup>[29]</sup>在达卡,把非贫民窟区域看作处于势不可挡的极度贫困矩阵中的飞地\*可能更有意义。

尽管一些贫民窟有很长的历史——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的第一个贫民窟摩洛达普罗丹西亚(Morro de Providencia)形成于 1880 年代——大多数大贫民窟兴起于 1960 年代。例如,1957 年内萨瓦尔科约特尔市(Ciudad Nezahualcóyotl)仅有 10 万居民;今天,墨西哥市的这一贫

---

[28] 基思·佩佐利:《人居规划的生态可持续性:墨西哥城个案》(Keith Pezzoli, *Human Settlements and Planning for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The Case of Mexico City*),剑桥,1998 年,第 13 页。

[29] 尼塔伊·昆道:《印度加尔各答》,联合国人居署个案研究(Nitai Kundau, “Kolkata, India,” UN-HABITAT Case Study),伦敦,2003,第 7 页。

\* enclave,被包围的领土。——译者注

困郊区有 300 万居民。开罗郊区不规则延展的曼施纳赛尔 (Manshiet Nasr) 贫民窟源自一个 1960 年代修建纳赛尔 (Nasr) 城郊的建筑工人营地。而卡拉奇巨大的贫民窟欧兰治/巴尔迪雅 (Orangi/Baldia), 及其来自印度的穆斯林避难者和来自阿富汗边境的“住在印度西北国境的阿富汗人” (Pathan) 的混杂人口, 形成于 1965 年。利马最大的贫民窟之一埃尔萨尔瓦多村 (Villa El Salvador) 形成于 1971 年, 在秘鲁军事政府的资助下, 在短短几年中拥有 30 多万人口。

图表 7 30 个最大的贫民窟 (2005) [30]

排行	贫民窟名称	人口 (以百万计)
1	勒扎尔/凯尔克/伊兹塔 (墨西哥市) Nezal/Chalco/Izta (Mexico City) [31]	4.0
2	自由区 (加拉加斯) Libertador (Caracas)	2.2
3	苏尔/玻利瓦尔市 (波哥大) El Sur/ Ciudad Bolivar (Bogotá)	2.0
4	圣胡安鲁力安切 (利马) San Juan de Lurigancho (Lima) [32]	1.5
5	克罗苏尔 (利马) Cono Sur (Lima) [33]	1.5
6	阿伊冈勒 (拉各斯) Ajeunle (Lagos)	1.5
7	萨德尔城 (巴格达) Sadr City (Baghdad)	1.5
8	索韦托 (豪登省) Soweto (Gauteng)	1.5
9	加沙 (巴勒斯坦) Gaza (Palestine)	1.3

[30] 这些数据资源取自许多极端数据的中间值。

[31] 包括内萨瓦尔科约特尔 (Nezahualcoyotl, 150 万人)、凯尔克 (Chalco, 30 万人)、伊斯塔帕拉帕 (Iztapalapa, 150 万人)、基玛华坎 (Chimalhuacan, 25 万人) 和其他都市东南区邻近的 14 个代表团 (delegation) 和村政府 (municipio, 在许多拉美国家乡村由几个村庄或村社组成的村政府。——译者注)。

[32] 包括圣胡安鲁力安切 (S. J. de L., 75 万人)、科马斯 (Comas, 50 万人) 和独立区 (Independencia, 20 万人)。

[33] “克罗苏尔 (Cono Sur)” 包括: 埃尔萨尔瓦多村 (Villa El Salvador, 35 万人)、圣胡安德米拉福洛列斯 (San Juan de Miraflores, 40 万人) 和玛丽亚·德·特伦佛村 (Villa María de Triunfo, 40 万人)。

(续表)

排行	贫民窟名称	人口(以百万计)
10	欧兰治镇(卡拉奇)Orangi Township (Karachi)	1.2
11	开普平原(开普敦)Cape Flats(Cape Town) [34]	1.2
12	皮金(达喀尔)Pikine (Dakar)	1.2
13	印巴巴区(开罗)Imbaba (Cairo)	1.0
14	埃兹贝特埃尔-哈格嘎纳(开罗)Ezbet El-Haggana (Cario) *	1.0
15	卡增加(罗安达)Cazenga (Luanda)	0.8
16	达拉维(孟买)Dharavi (Mumbai)	0.8
17	基贝拉(内罗毕)Kibera (Nairobi)	0.8
18	奥尔托(拉巴斯)El Alto (La Paz)	0.8
19	死城(开罗)City of the Dead (Cario)	0.8
20	苏格(加拉加斯)Sucre (Caracas)	0.6
21	伊斯兰萨尔(德黑兰)Islamshahr (Tehran) [35]	0.6
22	特拉尔潘(墨西哥市)Tlalpan (Mexico city)	0.6
23	英安达(德班)Inanda INK (Durban)	0.5
24	曼施纳赛尔(开罗)Manshiet Nasr (Cario)	0.5
25	阿尔丁塔格(安卡拉)Altindag (Ankara)	0.5
26	玛萨瑞(内罗毕)Mathare (Nairobi)	0.5
27	阿瓜斯布兰卡斯(卡利)Aguas Blancas (Cali)	0.5
28	阿吉基(拉各斯)Agege (Lagos)	0.5
29	太阳城(太子港)Cit�-Soleil (Port-au-Prince)	0.5
30	玛斯纳(金沙萨)Masina (Kinshasa)	0.5

[34] “开普平原(Cape Flats)”包括:卡雅利沙(Khayelitsha,40万人)、米切尔平原(Mitchell's Plain,25万人);十字镇(Crossroads,18万人)和一些小镇(1996年人口普查数据)。

\* Ezbet El Haggana 是开罗东北部一个无计划扩张的贫民窟,是环绕该城市的最大的城市非正规居住区之一。它的居民人数超过100万,是埃及最穷的贫民可以找到住得起的住房的为数不多的地方之一。——译者注

[35] 伊斯兰萨尔(Islamshahr,35万人)和察哈尔·但格(Chahar Dangeh ,25万人)。

无论在第三世界的什么地方,住房选择都是一件很难精确计算的、令人迷惑的交易。正如无政府主义建筑师约翰·特纳(John Turner)的著名论断,“住房是一个动词”。当城市贫民尽力对住房花费、职位稳定性和避难所的质量、工作行程和有时甚至是个人安全持乐观态度时,他们不得不解决一个复杂的方程式。对一些人来说,包括一些人行道居民,靠近一个工作地点——即,一个产品市场或火车站——甚至比栖息之所更重要。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免费或近乎免费的土地值得从边缘搬到中心。对每个人而言,最糟的处境是一个没有市政服务和占有权的、不适当的昂贵住所。在特纳的著名模型中,基于其1960年代关于秘鲁的著作,乡村移民首先从边远省份搬迁到城市中心——不惜一切代价安顿下来——去找工作;然后,为了职位的稳定性,他们搬迁到边缘,在那儿,所有权是可获得的。当然,从(用他的术语来说)“桥头堡人(bridgeheader)”到“联合者(consolidator)”的这一进步是一种只能反映一个州或国家一个历史瞬间状况的理想化。〔36〕

在一种更复杂的分析中,住宅专家艾哈迈德·索利曼(Ahmed Soliman)讨论了开罗贫民的四种基本住房策略。第一,如果进入中心就业市场的机会是最重要的,家庭可以考虑租一套公寓;廉价出租公寓提供了职位的中心性和安全性。第二种选择是处于中心但非正式的避难所:一种被索利曼描绘为“一个非常小的房间或有屋顶的处所,环境质量糟、租金便宜,或完全不要租金,有很好的工作机会但职位安全性无法保证;这样一种非法居民最终将被迫搬到强占土地者营地及半正式住房中。”〔37〕

---

〔36〕 参见约翰·特纳:《现代化国家的住房优先权,居住模式与城市发展》,载于《美国规划协会月刊》,第34期(John Turner, “Housing Priorities,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Moderniz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34), 1968年,第354-363页;约翰·特纳:“作为一个动词的住房”,收入约翰·特纳和罗伯特·菲克特合编:《建筑自由:住房进程中的居民控制》(“housing as a Verb”, in John Turner and Robert Fichter (eds), *Freedom to Build: Dweller Control of the Housing Process*), 纽约,1972年。

〔37〕 索利曼:《可能的出路》(Soliman, *A Possible Way Out*), 第119-120页。

第三种也是最廉价的住房解决方案是擅自占用公有土地,常常是开罗荒芜的郊区并几乎总是处于污染的下风口;地下交易包括以非常高的代价交换就业机会或政府忽略了的公共建设。“例如,埃尔-德克拉区(El Dekhila district)的合法或非法擅自定居区(squatter settlements)已经有40年的定居历史,没有来自当地官方的公共行动或干预。”

第四种解决方案,最终为大多数开罗贫民所选择,是在有合法所有权但没有官方建筑许可证的广大半正规开发区\*或农民村庄购买的土地上购买一块宅基地。尽管远离就业机会,但这样一块地方是安全的,在经过相当多的社区动员和政治谈判之后,通常会由政府提供基本的市政服务〔38〕。

对所有城市而言,同样的理性选择模式可能被特殊化,并催生出一大批地方化的、特殊的占有和居住模型。图表8所展示的类型是一种为了全球比较目的而从当地重要特征中抽象出来的分析简化。其他分析可能会对合法的住房状况(正规与非正规的)比较有优势,但我想大多数城市新移民的第一个决定是他们能否负担居住在靠近主要就业中心(核心与边缘)所需费用。

图表8 贫民窟类型学

一、主城区核心

(一)正规的(Formal)

1. 廉价公寓(tenements)

(1)二手房(hand-me-downs)

\* 经常是在向贝都因人(Bedouins),居住在叙利亚、阿拉伯等地带的阿拉伯游牧人。——译者注

〔38〕 索利曼:《可能的出路》(Soliman, *A Possible Way Out*),第119-120页。

(续表)

---

(2) 安居房 (built for poor)

2. 供低收入家庭租用的政府住房 (public housing)
3. 旅舍 (尤指青年旅舍)、极廉价旅社等等 (hostels, flophouses, etc)

(二) 非正规的 (Informal)

1. 强占土地的 (squatters)
  - (1) 合法的 (authorized)
  - (2) 非法的 (unauthorized)
2. 人行道居民 (pavement - dwellers)

---

二、边缘 (Periphery)

(一) 正规的 (Formal)

1. 私人出租房 (private rental)
2. 供低收入家庭租用的政府住房 (public housing)

(二) 非正规的 (Informal)

1. 强占土地的 (pirate subdivision)
    - (1) 房主自住的 (owner - occupied)
    - (2) 出租的 (rental)
  2. 强占土地的 (squatters)
    - (1) 合法的 (authorized) 包括提供建房用地及基本设施 (site and service)
    - (2) 非法的 (unauthorized)
  3. 难民营 (Refugee Camps)
- 

当然,在第一世界,环形的 (donut-shaped) 美国城市 (贫民们集中在城市被放弃的核心和内部区域) 与盘状的 (saucer) 欧洲城市 (移民和无职业人口孤立无援地困守在城市郊区的多层住宅中) 间有一种原型的区分。可以说,美国贫民住在水星;欧洲贫民住在海王星或冥王星。正如图表 9 显示的那样,第三世界贫民窟居民占据了种种城市区域,主要集中在边缘地带的低层住宅中。与欧洲相比,南半球供低收入家庭租用的政府

住房是一个例外——新加坡、中国大陆和香港——而非规律。约 1/5 到 1/3 的城市贫民住在城市核心内部或靠近城市核心,主要在老旧的多住户出租房中。

图表 9 贫民住在何处<sup>[39]</sup> (贫困人口百分比)

城 市	内城贫民窟	边缘贫民窟
卡拉奇	34	66
喀土穆	17	83
卢萨卡	34	66
墨西哥市	27	73
孟买	20	80
里约热内卢	23	77

### 1. 内城贫困

在北美和欧洲的城市中,“二手房(hand-me-downs housing)”和“安居房(built-for-poor tenements)”有着本质区别。前者如哈莱姆(美国纽约市黑人居住区)的赤褐色砂石建筑(Harlem brownstones)和都柏林的格鲁吉亚风格建筑(Dublin Georgians);后者如柏林的军营式建筑(Mietskaserne)和下东区(Lower East Side)臭名昭著的“哑铃式建筑”。尽管在非洲

[39] 基思·佩佐利:《墨西哥的城市住房环境》,收入布赖恩·奥尔德里奇和兰文迪·桑胡合编:《安置城市贫民:发展中国的政策与实践》(Keith Pezzoli, "Mexico's Urban Housing Environments," in Brian Aldrich and Ranvinder Sandhu (eds.), *Housing the Urban Poor: Policy and Practi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伦敦, 1995年,第145页;K. 西瓦拉玛克瑞希兰:“城市管理权:全球压力与当地力量”(K. Sivaramakrishnan, "Urban Governance: Global Pressures and Local Forces"), 华盛顿, 1997年,第229页;玛丽安娜·费克斯,佩德罗·艾伦特斯和吉泽尔·M. 塔纳卡合著:“圣保罗,巴西”,联合国人居署个案研究(Mariana Fix, Pedro Arantes, and Giselle M. Tanaka, "São-Paulo, Brazil," UN-HABITAT Case Study), 伦敦,2003年,第9页;雅克曼:《第三世界城市发展与新兴城镇》(Jacquemin, *Urban Development and New Towns in the Third World*), 第89页。

的新兴城市中极为少见,二手房,包括改造过的殖民官邸和维多利亚式别墅,在拉丁美洲和一些亚洲城市则非常普遍。无论它们先前如何荣耀,大多数危地马拉市(Guatemala City)的乡间别墅(西班牙语:Palomares)、里奥(Rio)的大宅(西班牙语:avenidas)、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和圣地亚哥的私人住宅(西班牙语:conventillos)、基多(Quito)的庄园(quintas)和哈瓦那旧城(Old Havana)的大院(cuarterias)如今均是摇摇欲坠的危房而且挤满了太多的人。例如,建筑师戴维·格拉瑟(David Glasser)参观了一所位于基多的先前的私家别墅,现在住了25个家庭共128人,但没有任何市政服务。<sup>[40]</sup> 尽管破败的市区迅速被拆除或重建成中产阶级居住区,墨西哥市的社区(西班牙语:Vecindades)仍然和赫氏古堡(Hearst Castle)的主建筑卡萨格兰特(Casa Grande)一样拥挤。该建筑是一幢可容纳700人的著名砖式居住区,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的《桑切斯的儿女》(*The Children of Sanchez*, 1961)一书使得其声名远播。<sup>[41]</sup> 在亚洲,同样的建筑是朽坏了(如今置于市镇管辖下的)加尔各答的柴明达尔\*宅第和有着诗意名字的科伦坡(Colombo)“贫民窟花园(slumgardens)”。<sup>[42]</sup> 最大规模的例子,可能是北京内城的贫民窟,尽管如今城市重建使其在尺寸和人口方面都大大缩减,其古城包括

---

[40] 戴维·格拉瑟:《厄瓜多尔共和国不断增长的住房危机》,收入卡尔·帕顿编:《自发的避难所:国际观点与展望》(David Glasser, “The Growing Housing Crisis in Ecuador” in Carl Patton (ed.), *Spontaneous Shelter: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 费城, 1988年, 第150页。

[41] 奥斯卡·刘易斯:《桑切斯的儿女: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Oscar Lewis, *The Children of Sanchez: Autobiography of a Mexican Family*), 纽约, 1961年。

\* Zamindar 一词原是波斯文的复合字, Zamin 指土地, dar 指持有者, 合起来意为“地主”。——译者注

[42] 卡林加·图德·西尔韦和卡鲁拉提西亚·阿瑟克纳拉合著:《Watta 居民:对斯里兰卡部分城市低收入社区的社会学研究》(Karlinda Tudor Silva and Karunattissa Athukorala, *The Watta-Dweller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Selected Urban Low-Income Communities in Sri Lanka*)。

了缺乏现代设施的明清四合院。〔43〕

就像圣保罗一度很时尚的艾利赛欧广场(Campos Eliseos)或利马的部分殖民都市风景一样,整个中产阶级居住区常常变为贫民窟。另一方面,在阿尔及尔(Algier)的著名海滨胜地巴勃-圣-乌尔德区(Babel-Oued),本地贫民已经取代了所谓的科隆(colon)工人阶级。尽管支配性的全球模式是把贫民赶出市中心,一些第三世界城市再现了美国式城市种族隔离,后殖民中产阶级从市中心搬到有大门有保安的小区 and 所谓的“边缘城市”。这已经成为金斯顿(Kingston)长期以来的事实,在那儿25万贫民居住在充满犯罪行为的但有文化活力的城市商业区,而中产阶级居住在城镇非商业区。同样,正如1970和1980年代富人们为了更有吸引力的东海岸居住区而开始放弃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市中心一样,无家可归的贫民们搬进废弃住房和地区旅馆。在利马,这一系列变动发生得更早:1940年大地震之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开始离开历史上的市中心;然而,据称,1996年对街头贩卖的一次镇压展开了一场政府导向的、从安第斯(Andean)工人阶级手中收复失地的运动\*。〔44〕与此同时,在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最近几年来全体政府机关和高档商店已经搬到主要的北部白人郊区。贫民窟廉价公寓和中产阶级公寓复杂地混合在一起的中心商务区——一度是整个欧洲大陆的金融首府——已经变成一个非正式贸易和非洲小企业的

---

〔43〕 薛凤旋:《北京:中国首都的本质和规划》(Feng-Hsuan Hsueh, *Beijing: The Nature and the Planning of the Chinese Capital City*), 奇切斯特,第182-184页。(Feng-Hsuan Hsueh 即 Victor Fung-shuen Sit 薛凤旋教授,香港大学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所客座教授。——译者注)

\* 西班牙语:reconquista。——译者注

〔44〕 汉斯·哈姆斯:《住在市中心:拉丁美洲的城市中市中心临近地区的住房与房客》,载于《环境与城市化》第9期第2卷(Hans Harms, "To Live in the City Centre: Housing and Tenants in Central Neighborhoods of Latin American Cities,"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9:2), 1997年10月,第197-198页。

中心。〔45〕

关于通过遗产继承而得到的住房储备 (inherited housing supply), 最独特的例子无疑是开罗的死城 (City of the Dead), 那儿的 100 万贫民用阿拉伯奴隶兵 (Mameluke) 的坟墓作为预制件住房的构成要素。巨大的苏丹和埃米尔 \* 墓地, 是一个环绕着拥挤高速公路的、有围墙的城市岛屿。最初的居民 (在 18 世纪) 是富裕开罗家庭的守墓人; 接下来是采石场工人; 再下来 (在现代) 是 1967 年战争中从西奈半岛 (Sinai) 和苏伊士 (Suez) 迁离的难民。开罗美国大学的一名研究者杰弗里·内多罗谢克 (Jeffrey Nedoroscik) 发现, “入侵者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把坟墓用于满足居住的需要。纪念碑和大墓碑被用作写字台、床头板、桌子和搁板。墓碑之间挂着绳子晾晒衣物。”〔46〕在开罗 (一个拥有 29 个正规犹太教堂的城市) 各地, 更小群的强占土地者接管废弃的犹太公墓。新闻记者马克斯·罗登贝克 (Max Rodenbeck) 写道: “在 1980 年代的一次参观中, 我发现一对年轻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惬意地安顿在一个特别壮丽的法老墓穴中。坟墓居民们拆开放骨灰瓮的壁龛, 发现它弄得很适合放衣服、烹调用的罐子和彩电。”〔47〕

然而, 在大多数第三世界, 二手房不如廉价公寓和专门出租房普遍。在殖民地印度, 统治者吝啬地拒绝给城市印度临近地区提供最基本饮水供应和下水道设施, 这与事实上依赖于当地地主精英们贪婪的住房政策连在一起。地主精英们兴建的可怕的、拥挤不堪的、不卫生

---

〔45〕 参见乔·比尔、欧文·克兰克肖和苏珊·帕内尔合著:《整合一个分裂的城市:约翰内斯堡的管理与社会排外》(Jo Beall, Owen Crankshaw, and Susan Parnell, *Uniting a Divided City: Governance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Johannesburg*), 伦敦, 2002 年, 特别是第 7 章。

\* emirs, 某些穆斯林国家的酋长、王公、统帅等的称号。——译者注

〔46〕 杰弗里·内多罗谢克:《死者之城:开罗的公墓社区史》(Jeffrey Nedoroscik, *The City of the Dead: A History of Cairo's Cemetary Communities*), 西港, 1997 年, 第 43 页。

〔47〕 马克斯·罗登贝克:《开罗:胜利之城》(Max Rodenbeck, *Cairo: The City Victorious*), 纽约, 1999 年, 第 158 - 159 页。

的但获利甚丰的廉价公寓至今仍居住着上百万印度人。〔48〕在孟买,典型的分间出租的宿舍(chawl)(占城市正规住房的75%)是一种破烂的、六口之家共用一个15平方米单间的出租房,公共厕所常常与其他六个家庭共享。〔49〕

正如孟买的分间出租宿舍一样,利马的廉价公寓也是专门建来出租给贫民的,大多由城市最主要的贫民窟地主、天主教教堂等拥有。〔50〕总的说来,它们是粗劣的泥砖房或秘鲁毛竹房\*,朽坏得很快并经常是摇摇欲坠。对廉价公寓的一项研究表明:85人共享一个水龙头,93人合用一个公共厕所。〔51〕同样,1980年代边缘贫民窟迅速兴起之前,大多数圣保罗贫民居住在被称为单元房(葡萄牙语:Cortiços)的内城廉价公寓出租房中,其中一半左右是专门建造的廉价公寓,另一半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的二手房。〔52〕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木头和薄金属板房(inquilinator)最初是码头边缘地区的贫民窟,如像为贫穷意大利移民而建造的波卡(La Boca)和巴拉凯斯(Barracas)贫民窟。然而,从上次债务危机以来,许多从前的中产阶级家庭被迫搬出他们的私人住宅而挤到一个木头和薄金属板房单间中,与其他五个甚至更多的家庭共用一个公共厨房和浴室。危机深重的过去十来年间,单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联邦区(Federal District)就有10

---

〔48〕 参见南迪尼·古普图:《21世纪早期印度城市贫民的政治》(Nandini Gooptu, *The Politics of the Urban Poor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India*),英国剑桥,2001年,第91-102页。

〔49〕 雅克曼:《第三世界城市发展与新兴城镇》(Jacquemin, *Urban Development and New Towns in the Third World*),第89页。

〔50〕 海尔特·卡斯特:《利马的内城出租房:描绘与阐释》,载于《城市》,第18期第1卷(Geert Custers, "Inner-City Rental Housing in Lima: A Portrayal and an Explanation," *Cities* 18: 1),2001年,第252页。

\* quinchá,木头框架覆以泥浆和稻草而成。——译者注

〔51〕 海尔特·卡斯特:《利马的内城出租房:描绘与阐释》,载于《城市》,第18期第1卷(Geert Custers, "Inner-City Rental Housing in Lima: A Portrayal and an Explanation," *Cities* 18: 1),2001年,第254页。

〔52〕 费克斯、艾伦特斯和塔纳卡:《圣保罗,巴西》(Fix, Arantes, and Tanaka, "São Paulo, Brazil. ")。

多万强占土地者住在废弃建筑和工厂中。〔53〕

相比而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老旧的内城廉价公寓住宅相对较少。地理学家迈克尔·爱德华(Michael Edwards)指出:“在前英国殖民地,廉价公寓是很少的,因为城市缺乏一个历史上的市中心。尽管在独立前的非洲,出租房几乎是很普遍的。房客们居住在旅社(尤其指青年旅社,如果是单身汉)或小镇住房(如果是家庭)而不是廉价公寓中。”〔54〕阿克拉和库马西(Kumasi)的更老旧的部分,传统的地主所有制(landownership)仍然很普遍;而出租房是占优势的,家族纽带经常杜绝了在拉各斯和内罗毕很普遍的高额租金。事实上,这种基于亲属关系的住宅大院——贫民与富裕的亲戚一道居住在扩展的家庭住宅——使得大多数加纳人(Ghanaian)的邻里情谊比他们在其他非洲城市的对应者更经济。〔55〕

其他的内城住宅选择权(正式和非正式的),包括一系列巧妙的非法的房屋增建部分、极廉价旅社、非法占据的空屋和小的棚户区。在香港,每100万人中有1/4住在屋顶的非法房屋增建部分或建筑工地的工棚(airwell)中。然而,最糟的情况是“笼子里的人”的遭遇。(“‘笼子’,一个当地术语,指的是单人床位,‘笼子’暗示这些房客安装金属丝网覆盖在他们的床位上以防止他们的财物被盗窃的趋势。这些床位寓所中,一个房间的平均房客数是38.3人,而人均生活空间是19.4平方英尺。”〔56〕)在大多数亚洲大城市中,旧式

〔53〕 戴维·基林:《布宜诺斯艾利斯:全球及地方危机》(David Keeling, *Buenos Aires: Global, Local Crises*),奇切斯特,1996年,第100页。

〔54〕 迈克尔·爱德华兹:《出租房与城市贫民》,收入菲利普·埃米斯和彼得·劳埃德合编:《非洲城市穷人的住房问题》(Michael Edwards, “Rental Housing and the Urban Poor” in Philip Amis and Peter Lloyd (eds), *Housing Africa's Urban Poor*),曼彻斯特,1990年,第263页。

〔55〕 A.格雷厄姆·蒂普尔和戴维·科勃合著:《加纳的住房贫困》,收入奥尔德德里奇和桑胡合编:《城市穷人的住房问题》(A. Graham Tipple and David Korboe, “Housing Poverty in Ghana,” in Aldrich and Sandhu, *Housing the Urban Poor*),第359—361页。

〔56〕 艾伦·斯马特:《腾出空间:香港的擅自定居者清理》(Alan Smart, *Making Room: Squatter Clearance in Hong Kong*),香港,1992年,第63页。

美国“极廉价旅社(flophouse)”的变形也是很常见的。例如,在首尔,从城市传统的强占土地房被驱逐出来的人与失业人口一起涌入大约 5000 个廉价旅社(Jjogbang)的按日付租床位,在那里 15 个房客共用一个洗手间。〔57〕

一些贫困的内城居民生活在空中。1/10 的金边(Phnom Penh)居民睡在屋顶上,正如难以置信的 150 万开罗人和 20 万亚历山大人所做的那样。〔58〕开罗所谓的“第二城”比内城的廉价公寓更寒冷,但屋顶居民更暴露在交通、水泥厂和来自沙漠的灰尘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中。与此同时,漂浮的贫民窟,尽管在东南亚仍然很普遍,在香港正在迅速消失。在那儿,船屋一度提供了 10% 的英国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避难所,主要是被大多数汉人当作劣等人的“疍民”\* 和客家人\*\* 所建。〔59〕

最后,街道本身也成为贫民窟。洛杉矶是第一个世界无家可归者的首都,拥有大约 10 万无家可归者,包括露宿在城市商业区或偷偷地生活在公园和高速公路的景观美化带中的、数目不断增加的家庭。第三世界人行道居民数目最多的城市可能是孟买,据 1995 年研究估计,那儿有 100 万人住在人行道上。〔60〕印度人行道居民的传统原型是一个贫困农民,

---

〔57〕 河晟奎:《韩国的城市贫民,租赁住所及住房政策》,载于《城市》,第 19 期第 3 卷(Seong-Kyu Ha, “The Urban Poor, Rental Accommodation, Housing Policy in Korea,” *Cities* 19: 3), 2002 年,第 197-198 页。

〔58〕 亚洲住房权利联盟:《在柬埔寨金边建立一种城市贫民运动》,载于《环境与城市化》(Asian Coalition for Housing Rights, “Building an Urban Poor People’s Movement in Phnom Penh, Cambodia”,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001 年 10 月,第 12 期第 2 卷,第 63 页;索利曼:《可能的出路》(Soliman, *A Possible Way Out*), 第 119 页。

\* Tanka, 指广东海诏一带以船为家的水上居民。——译者注

\*\* Hakka, 指古代迁入广东/福建等地的中原人后裔。——译者注

〔59〕 布鲁斯·泰勒:《香港的飘浮住所》,收入帕顿:《自发的避难所》(Bruce Taylor, “Hong Kong’s Floating Settlements”, in Patton, *Spontaneous Shelter*), 第 198 页。

〔60〕 米纳尔·平普尔和利萨·约翰:《所有权安全:孟买的经验》,收入迪朗-拉舍维和诺斯顿编:《坚持他们的立场》(Minar Pimple and Lysa John, “Security of Tenure: Mumbai’s Experience”, in Durand-Lasserve and Royston, *Holding Their Ground*), 第 78 页。

刚刚从乡下来到城里,靠寄生的乞讨过活,但正如关于孟买的研究所揭露的那样,几乎所有人行道居民(97%)至少是一个自力更生的人,70%的已经呆在城市至少6年,1/3曾被从一个贫民窟或一个分间出租的宿舍(chawl)驱逐过。〔61〕事实上,许多人行道居民只不过是工人——人力车夫、建筑工人和市场搬运工——他们为其工作所迫而住在人行道上,否则无法负担住在市中心的费用。〔62〕

然而,住在街上也很难是免费的。正如埃哈德·伯纳所强调的那样,“在印度或菲律宾,即便是人行道居民也不得不付一定费用给警察或黑社会组织。”〔63〕在拉各斯,私人企业主出租从建筑基地借来的独轮小车,作为无家可归者的床的代用品。〔64〕

## 2. 强占土地的城市化

世界上大多数城市贫民不再住在内城。自1970年代以来,世界城市人口增长的绝大部分被第三世界城市周边的贫民窟社区所吸纳。长时间以来,都市无计划扩展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只是北美特有的现象。贫穷城市的“地平线(horizontalization)”经常如其人口增长一样令人诧异不已:例如,1988年,喀土穆开发区比1955年大了48倍。〔65〕事实上,许多贫困

---

〔61〕 雅克曼:《第三世界城市发展与新兴城镇》(Jacquemin, *Urban Development and New Towns in the Third World*),第90页。

〔62〕 弗雷德里克·托马斯:《加尔各答贫民:超越虚伪的城市挽歌》(Frederic Thomas, *Calcutta Poor: Elegies on a City Above Pretense*),纽约州:阿尔蒙克,第47,136页。

〔63〕 埃哈德·伯纳:《向非正规市场学习》,收入卫定达和德博拉·伊德合编:《城市与发展:发展实践》(Erhard Berner, “Learning from Informal Markets”, in David Westendorff and Deborah Eade (eds), *Development and Cities: Essays from Development Practice*),牛津,2002年,第233页。

〔64〕 艾米·奥特切特:《拉各斯:下定决心者的幸存》,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月刊》(Amy Otchet, “Lagos: The Survival of the Determined.” *UNESCO Courier*),1999年。

〔65〕 贾拉勒·埃尔丁·埃尔塔耶比:《喀土穆,苏丹》,联合国人居署个案研究(Galal Eldin Eltayeb, “Khartoum, Sudan,” UN-HABITAT Case Studies),伦敦,2003年,第2页。

城市的郊区地带现在是如此之广阔,以至于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边缘(peripherality)”一词的含义。例如,在卢萨卡,城市人口的2/3住在外围棚户区住房中——这导致一位作家指出:“这些有围墙(或篱笆等的)住宅群(compound)被称为‘准城市’,但事实上被边缘的恰恰是城市本身。”〔66〕土耳其社会学家恰拉尔·凯德尔(Çağlar Keyder)对伊斯坦布尔周围的一夜建成区(土耳其语:gecekondus)有相似看法:“事实上,把伊斯坦布尔看作这种有限组织整体的一夜建成区聚集物可能不够准确。随着新的一夜建成区不断增加——不可避免地向外围边缘发展——更多交叉点以一系列方式扭结到城市网络上。〔67〕

于是,在第三世界无计划扩展的城市中,“边缘”是一个高度相对性、时间特定性的术语:今天的城市周边、邻接的田地、森林或沙漠,明天可能变成密集的市中心的一部分。东亚则是例外,那儿有边缘国有住宅的重要详细目录(如北京老工业郊区石景山区和丰台区长辛店镇)。第三世界城市周边地区发展采用了两种主要方式:擅自定居和——用哥伦比亚人的术语——城市化强占土地(Urbanization Piratas)。二者都以大比例的自建房、基础结构很差的不够标准的住房催生了“棚户区”景观。尽管强占而来的小块土地(subdivision)经常被误认为擅自定居区,但二者有着本质差异。

当然,擅自定居是对非出售土地或无主土地的占有。“零成本”的边缘土地经常被当作第三世界都市生活的秘密魔法而加以讨论:相当于给贫民的大笔额外津贴。然而,擅自定居很少没有预付成本。擅自定居者经常被迫付一定的贿赂给警察、流氓团伙或有权介入的警方,他们可能要

---

〔66〕 西瓦拉玛克瑞希兰:《城市管理权》,收入柯恩:《为城市未来作准备》(Sivaramakrishnan, “Urban Governance,” in Cohen, *Preparing for the Urban Future*), 第229页。

〔67〕 恰拉尔·凯德尔:《从非正规到全球化的住房市场》,收入凯德尔编:《伊斯坦布尔:全球与地方之间》(Çağlar Keyder, “The Housing Market from Informal to Global,” in Keyder (ed.), *Istanbul: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兰哈姆,1999年,第149页。

持续以现金或选票的方式支付这样的非正式“租金”许多年。此外,还有远离市中心空地的苛刻费用。事实上,当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正如埃哈德·伯纳在其对马尼拉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擅自定居不一定比买一块地便宜。其主要吸引力是“不断增加的发展和建设改善可能性所导致的土地阶段性增值。”〔68〕

擅自定居有时会成为政治戏剧的重头戏。在拉丁美洲,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正如在不同时期的埃及、土耳其和南非一样,擅自定居采用了一种土地侵略的方式,经常为激进团体或少数的民粹主义联合政府(1960年代的秘鲁;1980年代的尼加拉瓜)所支持。依赖于公众同情心,擅自定居者传统上把未开发的公共用地或一个大地主(他有时会得到事后补偿)的庄园作为目标。擅自定居经常变成一种对抗政府镇压机构的意志和忍耐力的长期考验。1970年代,一个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加拉加斯(Caracas)研究小组写道,“这并不奇怪:一个擅自定居区在一夜之间建成,第二天被警察拆除,第三天晚上重建,接下来再被摧毁、再被重建,直到当局厌倦了这场战争。”〔69〕同样,土耳其作家拉蒂菲·泰金(Latife Tekin)在其小说《伯金·克里斯汀:来自垃圾山的故事》(*Berji Kristin: Tales from the Garbage Hills*)中解释了为什么伊斯坦布尔贫民窟被称作一夜建成区(土耳其语:gecekondus,“set up overnight”):“菊池(Flower Hill)”勇敢的擅自定居者们在夜晚建设和重建每个简陋小屋,因为当局每天清晨拆除它们。在为期37天的荷马史诗式围困(Homeric siege)之后,政府才最终让步并允许这个新的一夜建成区在一座垃圾山上生根。〔70〕

〔68〕 伯纳:《捍卫一块土地》(Erhard Berner, *Defending a Place*),第236-237页。

〔69〕 肯尼思·卡斯特、默里·施瓦茨和奥德丽·施瓦茨合著:《加拉加斯地方行政区中的法律改革》(Kenneth Karst, Murray Schwartz, and Audrey Schwartz, *The Evolution of Law in the Barrios of Caracas*),洛杉矶,1973年,第6-7页。

〔70〕 拉蒂菲·泰金:《伯金·克里斯汀:垃圾山的故事》(Latife Tekin, *Berji Kristin: Tales from the Garbage Hills*),伦敦,1996年(1984年出版于土耳其)。

然而,研究德黑兰和开罗的社会学家阿塞夫·巴亚特(Asef Bayat)把大多数擅自定居区称作“普通人的静默强占”:对边缘或空隙地点的小规模、非对抗性渗透。不像贫穷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布莱希特式\*抵抗模式”——因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研究而著名——在巴亚特看来,当城市贫民们不断地扩展生存空间和被剥夺的公民权时,他们这些斗争“不仅仅是保卫性的”,而且是“秘密进攻性的”。〔71〕这样一种擅自定居,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那样,屡次与土地占用的有利时机(例如一场紧张的选举、自然灾害、政变或革命)同时发生。

种种擅自定居或许在1970年代的拉丁美洲、中东、南亚达到其顶峰。今天,擅自定居,狭义而言(拉丁语: *stricto sensu*),继续发生在低价的城市土地上,常常是有危险的或极端边缘的地点如河漫滩、山坡、沼泽地和受污染的棕色地带(*brownfield*)上。正如城市经济学家艾琳·斯蒂尔瓦根指出的那样:“本质上,擅自定居者们占据无租金的土地,这些土地的价值如此之小以至于没有人费心去拥有或坚持其所有权。”〔72〕例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多数临时村落(土耳其语 *villas de emergencia*, “emergency villages”)——经常为非法的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移民所居住——分布在严重污染的雷孔基思塔词和玛坦扎河(Río de la Reconquista and Río de la Matanza)臭气熏天的沿岸。地理学家戴维·基林在一次对雷孔基思塔河沿岸典型贫民窟的参观中写道:“臭气熏天和未经处理的污水发出一种使人无法忍受的恶臭,整个地区老鼠横窜、蚊子肆虐、苍蝇成群、昆虫遍地。”

---

\* 布莱希特是德国著名戏剧家与诗人,其代表作《伽利略传》、《四川好人》都是表现强权制度下,个人选择妥协还是抵抗的矛盾心境与态度。他本人提倡的是一种积极的反抗。——译者注

〔71〕 阿塞夫·巴亚特《野蛮社会:‘非法居民’的政治》,载于《第三世界周刊》(Asef Bayat, “Un-civil Society: The Politics of the ‘Informal People’”,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97年,第18期第1卷,第56-57页。

〔72〕 艾琳·斯蒂尔瓦根:《发育不良的生命,停滞的经济:贫困、疾病和欠发达》(Eileen Stillwaggon, *Stunted Lives, Stagnant Economies: Poverty, Disease and Underdevelopment*), 纽布朗斯维克, 1998年,第67页。

这些贫民窟被忍受仅仅是因为这些棕色地块在萧条经济中是暂时没有价值的。〔73〕同样,在加拉加斯,擅自定居者们的不稳定简陋房屋(ranchos)继续缓慢地向高低不平的和有山体滑坡倾向的山坡(没有一个明智的发展商会认为其有销路的地产)扩张。擅自定居已经成为一场对抗不可避免灾难的赌博。

但平坦的边缘土地,即使是沙漠,也有市场价值。今天,大多数低收入居住区坐落在城市周边,尽管经常以擅自定居为特色,实际上被一个看不见的房地产场所操纵。〔74〕1970年代末,这种“强占土地的城市化(Pirate Urbanization)”才为世界银行的拉克西·莫罕(Rakesh Mohan)及其研究小组第一次仔细研究:

这些强占小块土地(subdivision)居住区并非来自土地强占的结果:土地实际上通过合法购买而换手。恰恰是这些小块土地本身常常不合法。但这些居住区更多地被描述为“违章的”而非“不合法的”。低收入、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一直被正规住房市场摒之门外,只能从企业家那里购买地皮。在不符都都市区域划分法规、小块土地条例或服务规章标准的情况下,企业家获得大片未开发土地并把它们分割出售。这些出售的地皮通常只提供最低限度的服务,常常是除了一些街道和消防栓之外别无它物。典型情况是,在居民已经入住之后,这些基础公共设施才不断改善。〔75〕

---

〔73〕 基林:《布宜诺斯艾利斯》(Keeling, *Buenos Aires*),第102-105页。

〔74〕 保罗·鲍罗什《土地开发序列分析:合法和非法居所的价格问题》,收入保罗·鲍罗什和让·范·德·林登合编:《第三世界城市土地供应体系的变革》(Paul Baróss, "Sequencing Land Development: The Price Implications of Legal and Illegal Settlement Growth", in Paul Baróss and Jan van der Linden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nd Supply Systems in Third Cities*),艾迪索特,1990年,第69页。

〔75〕 拉克西·莫罕:《理解发展中的大都市:波哥大、卡利和哥伦比亚城市研究的教训》(Rakesh Mohan,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ing Metropolis: Lessons from the City Study of Bogotá and Cali, Colombia*),纽约,1994年,第152-153页。

强占土地的城市化实际上是强占土地的私有化。在 1990 年代的一个重要研究中,住房专家保罗·鲍罗什(Paul Baróss)和让·范·德·林登(Jan van der Linden)将强占土地居住区(Pirate settlements)或“不够标准的商品房地皮(substandard commercial residential subdivisions”(SCRSs)的特点总结为贫民住房的新标准。与真正的擅自定居者相比,强占小块土地(Pirate subdivisions)的居民已经在法律或是事实上获得他们地皮的所有权,这些地皮所有者通常是投机商、大庄园主(latifundista)、大农场主,乡村社区(如一个墨西哥埃基多)或一个惯常实体(customary entity)[如一个贝都因人部落(Bedouin tribe)或村委会(village council)],如像戴维·基林(David Keeling)讨论过的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居住区案例一样,在一种精明的期望下(政府将被迫承诺最终的补偿和公共建设的发展),土地拥有者甚至可能鼓励居民们组织起来成为土地强占者。〔76〕

在第二种事实上的(拉丁语 de facto)所有权案例中,土地通常是国有的,但定居者已经从当权政治家、部落领袖或犯罪团伙(例如,三合会\*,香港最重要的非正规房地产发展商)那里获得一种所有权承诺。〔77〕另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卡拉奇的贫民窟达拉斯,被著名的欧兰治实验计划\*\*创始人阿克塔·哈默德·克罕(Akhtar Hameed Khan)描绘为,“私人承包商已经学会联合和操纵我们贪婪的警方和官僚。利用他们的高价赞助,达拉斯贫民窟弄到了大片(公共)土地的所有权,购买了反驱逐保护并获得了供水和交通设施。”〔78〕达拉斯贫民窟统治了将近半数卡拉奇人居住的临时窝棚(乌尔都语,Katchi abadis)——像欧兰治棚户区一样

〔76〕 基林:《布宜诺斯艾利斯》(Keeling, *Buenos Aires*),第 107 - 108 页。

\* 历史上著名的反清复明的组织,始于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现在实质上的三合会已经不存在,由于很多华人黑社会组织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清朝的三合会,所以现在,尤其在香港,一般用来泛指华人黑社会组织。——译者注

〔77〕 关于三合会对强占者的控制,参见斯马特:《腾出空间》(On Triads' s control of squatting, see Smart, *Making Room*),第 114 页。

\*\* Orangi Pilot Project, 因该计划在巴基斯坦卡拉奇郊外棚户区欧兰治进行而得名。——译者注

〔78〕 汗:《欧兰治试点项目》(Khan, *Orangi Pilot Project*),第 72 页。

一样的强占小块土地。〔79〕

尽管事实上的住房几乎总是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正式许可,强占小块土地,不同于许多擅自定居区,一般被分割为有着惯常街道网格的均匀地块;然而,只有基本的或根本不存在的公共服务,土地买价基于居民们自己地下交易或磋商公共建设改善的能力。鲍罗什和范·德·林登写道:“简言之,无计划布局、低服务水平、郊区位置、高度的所有权安全、与城市发展计划的不一致和自建房是不够标准的商品房地皮(SCRSs)的一般特征。”〔80〕虽然有着各自的当地特点,这一界定概括了墨西哥市、波哥大、圣保罗、开罗、突尼斯(Tunis)、哈拉雷(Harare)、卡拉奇、马尼拉和数百个其他城市的边缘发展——包括经合组织联盟中里斯本(Lisbon)和那不勒斯附近的(Clandestinos)与近来埃尔帕索(El Paso)和棕榈泉(Palm Springs)外的贫民窟。

在一些国家,周边贫民窟发展的商业化已经有十多年历史。城市规划专家艾谢费·约德尔(Ayse Yonder)解释说“到1960年代中期,伊斯坦布尔已经不再使用传统意义上的‘擅自定居’这一术语。居住者不得不为了占用即使是公用土地的权利而向当地要人付费。在1970年代中期,有着地下关系的承包商们开始控制伊斯坦布尔某些区域的公用土地,卖地并垄断所有建筑活动。”〔81〕在内罗毕——如今是一个穷房客支付高

---

〔79〕 城市资源中心:《城市贫困与交通:卡拉奇个案研究》,载于《环境与城市化》(Urban Resource Center, “Urban Poverty and Transport: A Case Study from Karachi”,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001年4月,第13期第1卷,第224页。

〔80〕 保罗·鲍罗什和让·梵·德·林登合著:《导论》,收入保罗·鲍罗什和让·范·德·林登合编:《第三世界城市土地供应体系的变革》(Paul Baróss and Jan van der Linden, “Introduction,” in Paul Baróss and Jan van der Linden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nd Supply Systems in Third Cities*), 第2-7页。

〔81〕 艾谢费·约德尔:“住房政策双重标准问题:伊斯坦布尔非正式居住区的发展”,收入埃德索·费尔南迪斯和安·瓦利合编:《非法城市: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和城市变革》(Ayse Yonder, “Implications of Double Standards in Housing Policy: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Settlements in Istanbul,” in Edésio Fernandes and Ann Varley (eds), *Illegal Cities: Law and Urban Cha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伦敦,1998年,第62页。

额租金的城市——成熟商业化兴起于1970年代早期,当时富裕的外来者发现擅自定居创造了一个有着合法化意外之财的新兴土地市场。地主们(经常是先前的亚洲地主继承人)开始挨户兜售未经许可的小块土地。在贫困研究者菲利普·埃米斯(Philip Amis)看来,“他们实际上侵略了他们自己的土地,根据他们自己的计划兴建了未经许可的住房……这种冒险得到了很丰厚的回报。没有哪一种对秩序的破坏有如此之高的收益和投资回报。”〔82〕

### 3. 看不见的房客

作为一种潜规则,关于非正规住房的通俗和学术文献都有把擅自定居者们浪漫化而忽略房客的倾向。正如世界银行研究者最近承认的那样,“对低收入出租市场的研究是少之又少的。”〔83〕地主所有制事实上是引起世界各地贫民窟生活不和谐的基本社会关系。正是以这种主要方式,城市贫民能实现他们(正式或非正式)的公平,但经常是在一种对那些更穷的人的剥削关系中。非正式住房的商品化包括了特殊出租区的快速发展:在老旧棚户区的填充式发展,或强占土地上的多家庭建筑。可以确定的是,西非大多数城市贫民总是向地主租用土地,正如在达卡和一些其他亚洲城市(在曼谷,2/3的“擅自定居者”实际上租用他们兴建自己棚屋用的土地)大部分居民所做的那样。〔84〕在拉丁美洲、中东和南非城市的周边,租用也已经变得比通常所认为的更为普遍。例如,在开罗,经济状况稍好的贫民向农场主购买强占土地,而稍穷一些的人在市立土地上

---

〔82〕 菲利普·埃米斯:《内罗毕的商品化出租房》,收入帕顿编:《自发的避难所》(Philip Amis, “Commercialized Rental Housing in Nairobi,” in Patton, *Spontaneous Shelter*),第240,242页。

〔83〕 玛丽安妮·费伊和安娜·维伦斯坦:《保住每人头上的屋顶》,收入费伊编:《拉丁美洲的城市穷人》(Marianne Fay and Anna Wellenstein, “Keeping a Roof over One’s Head”, in Fay (ed.), *The Urban Poor in Latin America*),华盛顿,2005年,第92页。

〔84〕 里格:《东南亚》(Rigg, *Southeast Asia*),第143页。

违章建房；而贫民中最穷的人则向擅自定居者们租房。<sup>〔85〕</sup>同样，正如城市地理学家艾伦·吉尔伯特(Alan Gilbert)1993年在拉丁美洲发现的那样：“绝大部分新兴出租房坐落在统一的自建区边缘而非市中心。”<sup>〔86〕</sup>

在这一点上，墨西哥市是一个重要的案例。尽管颁布了一部《贫民窟底层阶级示范法》(*Model Law of the colonias proletarias*)以试图禁止低收入住房中的不在场所有权、“侵占”和投机买卖，洛佩斯·波蒂略(Lopez Portillo)政府(1976—1982)允许贫民窟居民按市场行情出售他们的占用权。这一改革的一个结果是中产阶级将一些处于较好地段的、从前的贫民窟改造为良好的中产阶级居住区；另一个结果是小地主所有制的盛行。社会学家苏珊·埃克斯坦(Susan Eckstein)在1987年回到她15年前第一次研究过的贫民窟时发现，25%到50%的原来的擅自定居者已经兴建了小型的、可以容纳2到15个家庭的社区(*vecindades*)以出租给更穷的新来者。她写道：“存在一个双重住房市场，反映了贫民窟中的社会经济差异。”她还发现，“从我上次去那儿以来，人们的社会经济水平‘日趋没落’……更穷的房客阶层规模扩大。”尽管一些老房客已经变为房东，新一代房客改善其社会经济状况的希望比早先一代更小，作为一个整体的贫民窟不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贫民窟”。<sup>〔87〕</sup>

事实上，房客通常是贫民窟居民中最看不见的和最无力量的。面对重新开发和驱逐时，他们几乎都没有资格获得补偿和重新安置。此外，不像21世纪早期柏林或纽约的廉价公寓居民，与利用贫民窟陋旧公寓索取高租金的恶劣房东(*slumlord*)相比较，当时的他们享有紧密结合的团结。如今的贫民窟房客几乎都缺乏组织成为房客组织或者发动租金罢工的能力。正如两个重要的住房研究者所解释的那样：“房客们分散在有着若干

〔85〕 索利曼：《可能的出路》(*Soliman, A Possible Way Out*)，第97页。

〔86〕 艾伦·吉尔伯特等著：《寻找一个家园：拉丁美洲的出租房和合租房》(Alan Gilbert et al., *In Search of a Home: Rental and Shared Housing in Latin America*, Tucson), 1993年，第4页。

〔87〕 埃克斯坦(Eckstein)，第60, 235-238页。

非正规出租房的不规则的居住区中,他们通常不可能组织为一个可以施加压力以保护自身的群体。”〔88〕

大型周边贫民窟,特别是在非洲,通常是亲属网络、所有权体系和租赁关系的复杂组合物。黛安娜·李-史密斯(Diana Lee-Smith),内罗毕马辛吉拉研究所(Mazingira Institute)的创建者之一,曾仔细地研究过内罗毕市东边的一个大贫民窟科罗戈乔(Korogocho)。科罗戈乔包括7个提供不同住房和租赁类型选择的村庄。最悲惨的村庄葛罗根(Grogan)包括从市中心附近的一个老棚户区中逐出的、主要是女性单亲家庭(female-headed households)所居住的单间硬纸板棚屋。另一方面,兵营般的基萨(Githaa)“是一个完全投机的村庄,是承包商专为出租而兴建的”,尽管事实上土地是公有的。附近的丹罗拉(Dandora)采用的是提供建房用地及基础设施(sites-and-service)系统体制,那儿半数拥有者是不在场的地主。李-史密斯强调小地主所有制和转租(或分租)是贫民的主要财产策略,房主们迅速成为更穷的人的剥削者。尽管擅自定居者作为自建房者(self-builder)和私房房主(Owner-occupier)有着持久的英雄形象,事实上科罗戈乔和其他内罗毕贫民窟的租赁和小型剥削(petty exploitation)在无法抑制地增加。〔89〕

索韦托已经从一个郊区发展为一个将近200万人的卫星城市,同样展示了各种住房状况。2/3的居民生活在私人住宅的正规单元房(formal-sector)中(典型的中产阶级)或更普遍地生活在市建住房中(传统的工人阶级);在市建住房的后院,居民非法兴建了棚屋并租给年轻家庭或单身汉。更穷的人,包括乡村移民,租住旅社(尤其指青年旅社)单间或在索韦托郊区违章建房。约翰内斯堡高度种族隔离时代以来的另一个著名贫

---

〔88〕 迪朗-拉舍维和诺斯顿:《国际趋势和国家背景》(Durand - Lasserre and Royston, "International Trends and Country Contexts"),第7页。

〔89〕 黛安娜·李-史密斯:《内罗毕的擅自定居者房东:科罗戈乔个案研究》,收入埃米斯和劳埃德合编:《非洲城市穷人的住房问题》(Diana Lee-Smith, "Squatter Landlords in Nairobi: A Case Study of Korogocho," in Amis and Lloyd, *Housing Africa's Urban Poor*),第176-185页。

民窟亚历山德拉(Alexandra),更加贫困并拥有更少正式住宅。大多数人口是擅自定居者、房客或旅舍房客。〔90〕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型贫民窟中,占用权和住房形式的分化造成了非常不同的利益观念,这并不出人意料。正如地理学家彼得·沃德(Peter Ward)在墨西哥市案例中指出的那样,“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看法可能被其住房状况所形成”:

非稳定居住区的异质性……通过居住区分化逐渐损害了集体反应。这种居住区分化基于土地获取模式、合作“阶段”、居民的服务优先权、社区领导结构、社会阶层和首要的所有权关系(所有者、分租者与房客)。这些所有权的多元分离仍然进一步使得全体居民堕落或被分化……房客,不断被骚扰的擅自定居者,取代城市商业区的房客而成为可能比那些事实上已经被政府通过连续的住房政策买通的人更激进和更倾向于反政府示威运动的人。〔91〕

#### 4. 贱民的边缘

进一步的分析从第三世界城市中心移开,认识论迷雾更加浓厚。正如历史学家埃伦·布伦南(Ellen Brennan)强调的那样,“关于土地转让模式、过去一年中兴建的住房单元(非正规的和正规的)数目、基础建设的部署模式、小块土地模式等等,大多数[第三世界]城市缺乏准确的当前数据。”〔92〕政府

---

〔90〕 参见乔·比尔、欧文·克兰克肖和苏珊·帕内尔合著:《约翰内斯堡的地方政府、扶贫与不平等》,载于《环境与城市化》(Jo Beall, Owen Crankshaw, and Susan Parnell, “Local Government, Poverty Reduction and Inequality in Johannesburg”,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000年4月,第12期第1卷,第112-113页。

〔91〕 彼得·沃德:《墨西哥城:城市环境的生产与再生产》(Peter Ward, *Mexico City: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an Urban Environment*), 伦敦,1990年,第193页。

〔92〕 埃伦·布伦南:《第三世界面临的土地和住房问题》,收入卡萨达和帕内尔合著:《第三世界城市》(Ellen Brennan, “Urban Land and Housing Issues Facing the Third World”, in Kasarda and Parnell, *Third World Cities*), 第80页。

对其城郊边界——那些乡村化城市向城市化乡村转化的特殊边缘地带——知之甚少。〔93〕

城市周边是城市离心力与乡村内爆力相碰撞的社会冲突地带。因此,研究者穆罕默德·阿卜杜勒(Mohamadou Abdoul)指出,达卡的大型贫困郊区皮金(Pikine)“始于1970年代两次大规模人口流动:从达喀尔(Dakar)工人阶级临近地区和棚户区驱逐(经常是武装驱逐)——出来的人和正赶上乡村移民潮的人”。〔94〕同样,200万班加罗尔贫民——包括从市中心被驱逐出来的贫民窟居民和失去了土地的农村劳动力在内——迅速拓展了贫民窟周边地区。在墨西哥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拉丁美洲城市周边地区,新乡村移民棚户区紧挨着(远离市中心犯罪和不安全、有围墙的)中产阶级郊区的现象是很普遍的。〔95〕

污染、有毒和大多非法的工业移民潮也追求城市周边地区所许可的隐匿性。地理学家汉斯·申克发现,亚洲城市周边是一个管理真空,一个“达尔文击败凯恩斯”的真正三不管地带。那里的掠夺型企业家和腐败政治家大都不受法律或公共监督的制约。例如,北京的大多数小型服装血汗工厂都隐匿在一个处于城市南边的、大部分仍然是农村和棚户区的海洋之中。如像班加罗尔,其城市周边是一个企业主们主要靠廉价劳工的超负荷劳动赢利的地方。〔96〕数百万临时工和背井离乡的农民也拥塞

〔93〕 参见西布鲁克:《在南部城市中》(Jeremy Seabrook, *In the Cities of the South*),第187页。

〔94〕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城市生产与城市非正规化现象》,收入恩维佐等编:《围攻之下》(Mohamadou Abdoul, “The Production of the City and Urban Informalities,” in Enwezor et al, *Under Siege*),第342页。

〔95〕 居伊·蒂利埃:《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都市区有大门和保安的住宅小区》,载于《住房研究》(Guy Thuillier, “Gated Communities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of Buenos Aires,” *Housing Studies*),2005年3月,第20期第2卷,第255页。

〔96〕 汉斯·申克:《亚洲的城市周边:记号与计划》,收入I. S. A. 鲍德和J. 波斯特合编:《城市化世界中的角色调整:发展视角下的管理与制度》(Hans Schenk, “Urban Fringe in Asia: Markers verse Plans”, in I. S. A. Baud and J. Post (eds), *Realigning Actors in an Urbanizing World: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s from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第121-122页,123页。

在像苏拉特(Surat)和深圳这样超级盘剥的世界大都市周边。这些劳工在城市和乡村都没有根,常常在一种城乡之间的、令人绝望的布朗运动\*中度过他们的一生。与此同时,在拉丁美洲产生了一种反向逻辑:包工头(labor contractor)越来越多地雇佣城市棚户区居民来做地里的季节性或临时性农活。〔97〕

但第三世界城市周边的主要功能仍然是人口聚集地。在某些情况下,城市剩余劳动力聚在一起,正如那些臭名昭著的“垃圾贫民窟”,如像贝鲁特(Beirut)郊外巧妙命名的科兰蒂那\*\*、喀土穆郊外的希拉特-库沙(Hillat Kusha)、墨西哥市外的圣克鲁兹-迈耶华尔科(Santa Cruz Meyehualco)、马尼拉从前的烟雾山(Smoky Mountain)或加尔各答(Kalkata)边上的达尔帕(Dhapa)等难民营和贫民窟。在对抗贫民窟的市政战争进程中,仓库居住人口被排除在外的、凄凉的政府收容所以及仅提供建房用地及基础设施(提供建房用地及基本设施)的简陋安居房也同样普遍。例如,在槟榔屿和吉隆坡(Kuala Lumpur)外面,被逐出贫民窟的人在临时难民营被陷于孤立。正如住房行动主义者解释的那样:

术语“长屋”使人想起一些先前的本地马来人房屋样式的丰富形象,但事实上这些临时难民营是相当不同的。这些长屋是易损坏的胶合板或石棉瓦陋室组成的单调线条,一间挨一间地朝向没有铺砌也没有树荫的巷道对面更多的陋室,仅有一些零星的基础设施。

---

\* Brownian motion,传统意义上的布朗运动属于物理范畴,即任何悬浮在液体或气体中的非常小的微粒都永远处于无休止的不规则运动状态。英国植物学家 R. 布朗于 1827 年观察到该现象并由此命名。——译者注

〔97〕 克瑞斯托巴尔·凯:《拉丁美洲的土地革命:农民化与无产阶级化》,收入布赖森、凯和穆杰合著:《正在消失的农民?》(Cristóbal Kay, “Latin America’s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Peasantization and Proletarianization”, in Beryceson, Kay and Mooj, *Disappearing Peasantries?*), 第 131 页。

\*\* Quarantina,意大利语,意为“四十天”。在基督教盛行的欧洲大陆,受圣经影响,当时的人们认为“四十”是一个非常神圣而吉祥的数字。由此,意大利的威尼斯人最早将对外来船舶的防疫隔离期确定为四十天。——译者注

毕竟这些长屋被证明并非是很临时性的。二十年来,许多被逐出者仍然呆在那儿等待政府实现其低收入住房的承诺……〔98〕

冒着被捕的危险,人类学者莫尼卡·斯基德摩尔(Monique Skidmore)访问了城市周围一些凄凉的小镇——所谓的“新领地”——仰光(Rangoon)外面军事专政强制重新安置的成千上万都市人。他们先前居住的贫民窟妨碍了市中心主题乐园的重建。“居民们述说失去以前居住区的遗憾和痛苦……卖酒的商店、垃圾堆、臭水潭、稀泥和未处理过的污水环绕着大多数家庭。”另一方面,曼德勒(Mandalay)周边棚户区的情况甚至更糟。斯基德莫尔解释说:“那儿的棚户区居民必须步行到杉山(Shan mountains)脚下去找柴火。那儿不像仰光一些重新安置的小镇那样拥有雇用非全日性劳工的工业区、服装厂和其他血汗工厂。”〔99〕

国际难民和境内难民(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DPs)经常受到甚至比城市驱逐者还要苛刻的待遇——第三世界一些大型难民营已经因其利益而和边缘城市结合在了一起。因此加沙(Gaza)——被一些人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本质上是一个城市化了的难民营聚集地(75万名难民),其中2/3的人口靠每天不到2美元维持生活。〔100〕就在肯尼亚(Kenyan)境内的达达阿德(Dadaad),像1990年代中期扎伊尔(Zaire)的戈马(Goma)一样,居住了12万5千名索马里人。当时的戈马是一个提供给大约70万罗安达人(Rwandans)的可怜避难所,由于公共卫生状况

---

〔98〕 亚洲住房权利联合会:《关于穷人如何对付逐出的特殊议题》,载于《亚洲人住房》,第15期(Asian Coalition for housing Rights, “Special Issue on How Poor People Deal with Eviction,” *Housing by People in Asia* 15)2003年10月,第19页。

〔99〕 莫尼卡·斯基德摩尔:《卡拉OK法西斯主义:缅甸与恐怖政治》,(Monique Skidmore, *Karaoke Fascism: Burma and the Politics of Fear*),费城,2004年,第150-151页,第156页。(Long House,马来语rumah panjang。长屋,顾名思义就是长长的屋子。它是沙捞越大多数土著民族的集体聚居住所,一般居住人口都在几十户到上百户。——译者注)

〔100〕 《概况介绍》,加沙 Al-Dameer 人权协会 (*Fact sheet, Al-Dameer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Gaza*),2002年。

十分糟糕,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死于霍乱。喀土穆的沙漠边缘包括四个大型难民营——梅奥农场(Mayo Farms),杰贝勒奥利亚(Jebel Aulia),达尔萨拉姆(Dar-es-Salaam)和瓦德巴希尔(Wad al-Bashir)——容纳了40万名旱灾、饥饿和内战的受害者。另外150万无家可归的境内难民——主要是南方人(Southerners)——生活在苏丹(Sudanese)大都市周围的许多大型擅自定居区内。〔101〕

同样地,成千上万战争受害者以及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归国难民占用了喀布尔(Kabul)郊外山坡上许多没有饮水和下水道设施的贫民窟。据《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2002年8月报道,“在卡特-阿里亚纳地区(Karte Ariana district),数百个家庭逃离了塔利班(Taliban)和阿富汗南部乡村反政府武装的控制。如今,他们挤在乱七八糟的贫民窟中,没有厨房和浴室,15到20人同住一间房。”由于终年少雨、许多水井早已干涸;这些贫民窟中的孩子因为饮水污染而经常患喉炎或各种疾病。他们的生活期望处于世界最低水平。〔102〕

全世界境内难民人口最多的两个地方是安哥拉(Angola)和哥伦比亚(Colombia)。安哥拉被1/4世纪前的内战(1975到2002)强制城市化——为比勒陀利亚\*和白宫的机械化所激励——这使得30%的人口流离失所。许多难民不可能回到他们从前的家乡,那儿已经成为废墟并充满危险,而是代之以占用罗安达、洛比托(Lobito)、卡宾达(Cabinda)和其他城市周围荒凉の木塞克\*\*中。其结果是,安哥拉,在1970年代仅有14%的城市地区,如今主要是一个城市国家。其大部分城市居民都既是赤贫人口又几乎完全为政府所忽略,据1998年的估计,仅有1%的公共教育和福利预算用在他们身上。〔103〕

〔101〕 埃尔塔耶比:《苏丹,喀土穆》(Eltayeb, “Khartoum, Sudan”),第2页。

〔102〕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2002年8月26日。

\* Pretoria,南非首都。——译者注

\*\* musseques,安哥拉地区巨大的、迷宫一般的平房居住区,最大的木塞克可以容纳40万人。——译者注

〔103〕 托尼·霍奇斯:《安哥拉》(Tony Hodges, *Angola*),第二版,牛津,2004年,第22页。

哥伦比亚无休无止的内战同样给波哥大(Bogotá)的城市贫困带——包括苏玛帕日(Sumapaz)、玻利维亚区(Giudad Bolívar)、乌什梅(Usme)和索阿查(Soacha)的非正规聚居区在内——增加了超过40万的境内难民。非政府组织的一名助理解释说：“大多数流离失所者被社会从正规生活和工作中驱逐和排挤出去。现在,653,800名波哥大人(2002年)没能在城里找到工作,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中半数以上是29岁以下的年轻人。”没有城市工作技能和通常缺乏教育机会,这些年轻农民及其孩子成为街头帮派和反政府武装的理想人选。其结果是,当地商人被组成豹子党(grupos de limpieza)并勾结右翼敢死队的地痞们任意欺压。他们屠杀的儿童曝尸城边。〔104〕

同样的噩梦盛行在卡里(Cali)郊区,人类学者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用但丁(Dante)的“地狱(Inferno)”来描绘两个“非常危险”的边缘贫民窟中的生存斗争。纳瓦罗(Navarro)是一座臭名昭著的“垃圾山”,饥饿的妇女儿童刨垃圾而年轻枪手(Malo de malo)被当地右翼武装雇佣或者消灭。其他居住地,如卡洛斯阿尔弗雷多迪亚兹(Carlos Alfredo Díaz),随处可见“小孩子拿着自制猎枪或手榴弹满街跑”的现象。陶西格写道:“我开始明白,正如游击队在广袤的卡克塔(Caquetá)森林中、在巨大的亚马逊盆地边缘有着其最重要的基础,青年人完全失控的帮派世界也有其恐怖森林,就在盆地边缘这儿,靠着卡洛斯阿尔弗雷多迪亚兹甘蔗地的贫民窟。”〔105〕

---

〔104〕 咨询服务项目:《日益恶化的波哥大:市中心的位移与战争》,载于《哥伦比亚地区报道:波哥大》(Project Counseling Services, “Deteriorating Bogotá: Displacement and War in Urban Centres”, *Colombia Regional Report: Bogotá*),2002年12月,第3-4页。

〔105〕 迈克尔·陶西格:《不法之地的法律:一个哥伦比亚豹子党成员的日记》(Michael Taussig, *Law in a Lawless Land: Diary of a Limpieza in Colombia*),纽约,2003年,第114-115页。

### 第三章 政府的背叛

---

如果说十足的资本主义有一副不大受欢迎的面孔,一个代表富人的腐败政府则更为糟糕。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试图改善体系也收效甚微。

——艾伦·吉尔伯特和彼得·沃德〔1〕

近来,两个地理学家抱怨“令人吃惊的是,没有一个作家曾追溯过整个战后时期第三世界低收入居住区变化的地理学”〔2〕。当然,也没有人尝试对非正式居住区的全球模式作一个现代的历史性总括。如此繁多的民族国家历史和城市具体性使得这一总括成为一项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无论如何,冒险对世界贫困城市化作一种突出其基本趋势和分水岭的分期是可能的。

但在考虑第三世界城市及其贫民窟为什么在 21 世纪后半叶增长得如此迅速之前,首先需要明白为什么他们在前半叶增长得如此缓慢。尽

---

〔1〕 艾伦·吉尔伯特和彼得·沃德:《住房、政府与穷人:三个拉丁美洲城市的政策与实践》(Alan Gilbert and Peter Ward, *Housing, the State and the Poor: Policy and Practice in Three Latin American Cities*),剑桥,1985年,第254页。

〔2〕 理查德·哈里斯和马拉克·沃赫拜:《低收入住房的城市地理学:开罗(1947—1996)例示了一种模型》,载于《国际城市与区域研究杂志》(Richard Harris and Malak Wahba, “The Urban Geography of Low-Income Housing: Cairo (1947—1996) Exemplifies a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总26期,2002年3月,第1期,第59页。

管有一些例外,今天的南半球大多数大城市当时都采用了一种共同的策略:一种相对缓慢(甚至延迟)的增长制度,然后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突然加速到快速增长,乡村移入人口越来越多地栖身于周边贫民窟。21世纪更早时期,乡村贫困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情况被经济和政治障碍——更重要的是,体制控制了大部分农业人口的城市进入权和城市户口——所阻止。

## 不准农民进入

当然,一个基本的障碍是欧洲殖民主义,其最极端的形式(东南非的英国殖民城市)否认其当地人的城市土地所有权和永久居住权。英国一直秉承分化和统治理论,害怕城市生活将使非洲人“失去部落的特征”并心怀反殖民团结的野心。〔3〕城市移民被《通过法》(*pass law*)控制,而《流浪者法令》(*vagrancy ordinances*)规定对非法劳工应处以刑罚。例如,直到1954年,在种族隔离地区内罗毕,非洲人仅仅被看做临时劳工,不能拥有自己租赁的财产。〔4〕同样,据卡琳·努鲁(Karin Nuru)的研究,“达尔萨拉姆贫民窟的非洲人仅仅被当作临时劳工来接受,并不得不在退休后回到乡下。”〔5〕在津巴布韦的罗得西亚(Rodesia),非洲人一直到独立前夕才获得自己城里家园的合法权利,而在卢萨卡——规划为“一个严格按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分区的高度有条理的城市”——非洲居民被看作“或多或少的临时都市人,其在城里的惟一目的是充当政府

---

〔3〕 加思·迈尔斯:《两个非洲城市中的殖民和后殖民现代性》,载于《加拿大非洲研究杂志》(Garth Myer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Modernities in Two African Cities”, *Canadian Journal of Studies*), 2003年37期第2-3页。

〔4〕 埃米斯:《内罗毕的商业化出租房》(Amis, “Commercialized Rental Housing in Nairobi”), 第238页。

〔5〕 卡琳·努鲁:《坦桑尼亚》,收入科斯塔·马惹:《社会主义第三世界的住房政策》(Karin Nuru, “Tanzania”, in Kosta Mathéy, *Housing Policies in the Socialist Third World*), 第334页。

雇员”〔6〕。

当然,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把这种体制发挥到其反乌托邦极致。建立在一种殖民种族主义的基础之上,战后南非的法律不仅判定城市移民为非法行为,而且异常残酷地铲除了内城中历史上的有色人种社区。将近100万有色人种被逐出假定的“白人”区,其结果是净城市化比率在1950年(43%)到1990年(48%)间几乎没有增长;事实上,在1960年代,非洲人只被允许从城市区域迁出。〔7〕然而,最终“白人城市,黑人乡村”的理想与大资本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及受害者的英勇抵抗相冲突。

在印度次大陆,英国也隔离和监视了来自乡村的流动人口。在其对内战期间北方邦(Uttar Pradesh)城市的杰出研究中,南迪尼·古普图(Nandini Gooptu)对殖民官员和重新被给予了公民权的本国精英们把贫民们推到城边和城外的持续努力进行历史编年。特别是最新的城镇改造基金(Town Improvement Trusts)被大量用于从更好的住宅和商业区周边清除贫民窟和搬迁所谓“罪恶之源”,留出环绕殖民者和本国中产阶级区的空间隔离带。同时积极加强“《侵占法》(*encroachment law*)”,禁止擅自定居和街头贩卖。〔8〕与此同时,城市经济增长低于战前统治时期,充其量是断续发展——即便是有着著名的企业精英和纺织品工厂的孟买也增长缓慢,从1891年到1941年其人口都没有翻倍。

尽管他们反感当地大型的城市居住区,但英国人可以说是所有时代最大的贫民窟制造者。他们在非洲的警察局强迫当地劳工居住在城市隔离区和限制区边缘那些臭名昭著的棚户区内。在印度、缅甸(Bur-

---

〔6〕 迈尔斯:《两个非洲城市中的殖民和后殖民现代性》(Meyer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Modernities in Two African Cities,”),第334页。

〔7〕 米谢尔·加雷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化、贫困与儿童死亡率》(Michel Garenne, *Urbanization, Poverty and Child Mortality in Sub-Saharan African*),巴黎,2003年,表格1,第22页。

〔8〕 参见古普图:《21世纪早期印度城市贫民的政治》(Gooptu, *The Politics of the Urban Poor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India*),第3章。

ma)和锡兰(Ceylon),他们拒绝改善公共卫生状况或提供最基本的公共设施给当地居民,这导致大批人死于21世纪早期流行病(瘟疫、霍乱、流行性感冒),并造成被独立后的本国精英所继承的城市贫困的无数遗留问题。

其他帝国,以其或大或小的努力,也试图限制和惩罚城市移民。少有例外,殖民港口或交通中心几乎没有剩下多少可以导致就业和城市增长的制造业或加工业的价值增值。每个当地劳工都被放逐到贫民窟和棚户区。据最近的历史,刚果殖民政府维持一种相对有效的城市流入控制和一种围绕城镇的触手式管理网络,既抑制了指定渠道的外来小型贸易又抑制了“无政府主义的”住房建设。〔9〕

与此同时,历史学家让·叙雷-卡纳勒(Jean Suret-Canale)提醒我们,在热带非洲,法国紧密控制乡村劳工运动,同时把非洲城镇居民放逐到可怕的边缘。在贫民窟——如像达喀尔的麦地那(Medina)、阿比让(Abidjan)的特雷西维尔(Treichville)和布拉柴维尔市(Brazzaville)的波陶波陶(Poto-Poto)——街道“除了沙和泥的巷道外别无他物……充当排水系统的仅有一些阴沟,经常是敞开的或用石板随便盖一下;饮水供应严重不足,公用水管前从一大清早就排起了长队。只在欧洲人居住区才有路灯。过度拥挤对健康造成极大损害。”〔10〕事实上,这几乎是普遍现象:直到1950年代,拒绝提供即使是最基本的公共设施给“当地居民区”已经到了吝啬的地步:这尖锐地象征了任何当地“城市权”的缺乏。

但欧洲殖民主义不是唯一的城市增长控制国际体制。尽管兴起于农民革命的赋权,亚洲斯大林主义也试图防止来自乡村的人潮。最初,1949

---

〔9〕 克劳福德·杨和托马斯·特纳:《扎伊尔政府的兴起和衰落》(Crawford Young and Thomas Turne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Zairian State*),麦迪逊(威斯康星州),1985年,第87页。

〔10〕 让·叙雷-卡纳勒:《热带非洲的法国殖民主义,1900—1945》(Jean Suret-Canale, *French Colonialism in Tropical Africa, 1900—1945*),纽约,1971年,第417页。

年中国革命向回乡难民和急需工作的退伍农民军人开放了城市大门,其结果是城市人口不可控制的泛滥:4年内增加了1400万人。<sup>[11]</sup>最后,1953年的新管理控制了乡村食物并严格控制境内移民。同时,毛主义赋予了城市工人阶级特权——享受“铁饭碗(iron rice bowl)”和从摇篮到坟墓(Cradle-to-grave)的福利——并采用了一种把社会身份联系到一个工作单位的固定成员身份的家庭登记制度(户口,汉语拼音:hukou)以严格限制城市人口的增长。

到1960年为止,北京市已经使无家可归者移住新居并取缔了大多数城市棚户区,但仍然对非正规乡村移民保持高度警惕。城市和乡村被认为是分离的世界,仅仅在党和政府仔细界定的情况下有所交叉。如果说城市居民有时还会获得官方允许并调到另一个城市,但几乎没有听说过农民获得许可离开他们的社区。此外,在1960年代早期,大批没有登记的城市移民——有人估计最多的时候有5000万——被遣送回乡。<sup>[12]</sup>据勒阿弗尔大学(University le havre)汉学家蒲吉兰(Guilhem Fabre)的研究,其结果是城市人口百分比从1960年20%的顶点下降到1971年的12.5%。<sup>[13]</sup>对乡村向城市移民的类似控制在1950年代被引入到朝鲜、阿尔巴尼亚和北越,尽管意识形态的反城市主义的高潮首推布尔波特1975年对金边市民的残酷驱逐。

拉丁美洲也有针对城市移民的可怕障碍。二战之前,大多数贫穷的拉丁美洲人住在内城出租房中,但在1940年代末期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刺激之下,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擅自定居者侵入墨西哥市及其他拉丁美洲城市郊区的浪潮。在城市中产阶级大力支持下,许多国家官方势力对

---

[11] 黎安国:《城市发展与贫民窟居所的逻辑》,收入奥德里奇和桑胡合著:《城市穷人的住房供给》(On-Kwok Lai),“The Logic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Slum Settlement,” in Aldrich and Sandhu, *Housing the Urban Poor*),第284页。

[12] 多萝西·索林杰:《争取中国城市户口:农民工、政府与市场逻辑》(Dorothy Solinger,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伯克利,1999年,第2、41页。

[13] 表格1,蒲吉兰(Fabre),“中国”,第196页。

非正规居住区展开了大规模镇压,以应对增长迅速的棚户区。既然许多新的城市移民曾是契约劳工(Indigenistas)或奴隶的后裔,这种“擅自定居战”通常具有种族主义色彩。

委内瑞拉(Venezuela)的战后独裁者——马科斯·埃万格利斯塔·佩雷斯·希门内斯(Marcos Evangelista Pérez Jiménez)——是非正规住房的一个特别臭名昭著的敌人。三个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作者写道:“(他的)政府解决贫民窟的办法是推土机。在某个指定的清晨,警察和卡车将来到贫民窟;在官员指挥下把居民的家当装上卡车;警察负责制服那些反抗者;当居民及其家当都被弄到新公寓时,房子已经被夷为平地。”擅自定居者们被驱逐到加拉加斯(Caracas)郊区,在那里他们被移居到步行街区(superbloques),而他们对此深恶痛绝。〔14〕

墨西哥市的传统中产阶级把欧内斯特·乌鲁丘尔图(Ernesto Uru-churtu)捧为名人。在其就任市长的整个任期中(1952—1958年,1964—1966年),他一直在与城里的游荡乡村贫民潮流作斗争。这一潮流是由民主改革党(PRI)“少数人为中心(DF-centric)”的国民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当他在1952年就职时,每个月都有成千上万来自墨西哥中部(Central Mexico)的乡下人“空降”到城市周边。擅自定居区,被称作大众贫民窟(colonias Populares),1947年仅仅居住了微不足道的2.3%的人口,5年中其居民增加到墨西哥市居民的1/4。〔15〕乌鲁丘尔图决定通过推行伞兵行动(西班牙语:Paracaidistas)来阻止农民流动,赶走街头小贩,反对贫民窟财产所有权和基础设施。正如社会学家黛安娜·戴维斯(Diane Davis)指出的那样,乌鲁丘尔图对增长的控制策略反映了构成其政治基础的种族偏见:“像许多城市居民一样,乌鲁

〔14〕 卡斯特,施瓦茨和施瓦茨:《加尔各答贫民窟的法律变迁》(Karst, Schwartz, and Schwartz, *The Evolution of Law in the Barrios of Caracas*),第7页。

〔15〕 佩佐利,收入奥德里奇和桑胡合著:《城市穷人的住房问题》(Pezzoli, in Aldrich and Sandhu, *Housing the Urban Poor*),第147页。

丘尔图指责大批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移民——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印度裔——对城市面貌和社会造成破坏。”〔16〕

## 泛 滥

亚非殖民者镇压和民族独立悖论地联合，而拉丁美洲独裁和缓慢发展制度陷入崩溃。二者搬掉了城市快速增长的制度绊脚石。贫民们被残酷和不可抗拒的力量驱赶到城市，急切宣称他们的“城市权”，即便那仅仅意味着城边的一个小窝棚。对1950和1960年代的非正式城市化而言，内战和镇压的推动力甚至比饥荒和债务更大。

因此，就印度次大陆而言，分裂及其种族宗教余波把上百万人驱赶到贫民窟中。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卡拉奇、拉合尔(Lahore)和达卡都被迫吸纳1948年(印度次大陆分裂)、1964年(印巴战争)和1971年(孟加拉国脱离英联邦)暴力革命余波中的大量难民。〔17〕随着一贫如洗的巴基斯坦难民的拥入，以及随之而来的(尽管更慢)纺织工业的扩张，孟买人口——在过去十年的殖民统治中至少每年增长2%——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早期几乎翻了一番。〔18〕与此同时，1950年代卡拉奇和海得拉巴(Hyderabad)的半数人口是“穆哈吉尔(Muhajirs)”，即来自东部旁遮普邦(Punjab)的穆斯林难民。他们后来与成千上万贫困的比哈尔人(Biharis)——穆斯林农民和“二重移民”(先逃到东巴基斯坦，然后在孟加拉国独立后逃到巴基斯坦)——结合在

〔16〕 黛安娜·戴维斯：《城市巨兽：21世纪的墨西哥城》(Diane Davis, *Urban Leviathan: Mexico C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费城，1994年，第132-135、155页。

〔17〕 弗雷德里克·托马斯：《加尔各答穷人：超越虚伪的一曲城市悲歌》(Frederic Thomas, *Calcutta Poor: Elegies on a City Above Pretense*)，纽约：阿蒙克，1997年，第41页。

〔18〕 苏亚塔·帕特尔：《孟买的城市困境》，收入帕特尔和艾丽丝·索纳编：《孟买：现代印度的隐喻》(Sujata Patel, "Bombay's Urban Predicament", in Patel and Alice Thorner (eds), *Bombay: Metaphor for Modern India*)，德里，1996年，第16页。

一起<sup>[19]</sup>。从一开始,这些贫民窟难民人口就严重地依赖政治掮客和腐败政党的机器。其结果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贫民窟的发展周期因与选举周期同步而变得著名:在卡拉奇,土地强占和小块土地私有化在选举年显著增加;而在印度,选举提供给擅自定居者借贷机会以使得他们的“贫民窟(bustees)”合法化或得到改善。<sup>[20]</sup>

在南越(South Vietnam),被动城市化——以无意识的奥威尔式\*讽刺描绘为“现代化”——是美国军事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据军事战略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言,自从越共(Vietcong)建构为“一种只要这一选区继续存在就不能从其选区逐出的强有力的力量”,他和其他鹰派人士(Hawks)劝说取消这一“选区”。美国恐怖轰炸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威力,导致了大批农民移民到城市,以至于毛主义(Maoist Doctrine)关于革命战争的基本假定不再适用。毛主义所激发的农村革命被美国支持的城市革命彻底摧毁。”<sup>[21]</sup>正如历史学家玛丽莲·杨(Marilyn Young)指出的那样,在战争期间,南越城市人口比率从15%剧增到65%,500万背井离乡的农民变成贫民窟或难民营居民。<sup>[22]</sup>

在阿尔及利亚(Algeria),7年残酷无情的殖民战争(1954—1961)同样使得半数乡村人口流离失所。1962年独立之后,这些无根民众拥入城

---

[19] 奥斯卡·维尔卡埃克:《移民与武装分子:巴基斯坦的娱乐与城市暴力》(Oskar Verkaaik, *Migrants and Militants: Fun and Urban Violence in Pakistan*),普林斯顿,2004年,第64页。

[20] 罗伯特-让·巴肯和让·范·德·林登:《第三世界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土地分配》(Robert-Jan Baken and Jan Van der Linden, *Land Delivery for Low Income Groups in Third World Cities*),奥尔德肖特,1992年,第31页。

\* Orwell,反乌托邦小说《1984》和《动物庄园》的作者。——译者注

[21] 塞缪尔·亨廷顿:《协商的基础》,载于《外交事务》(Samuel Huntington, “The Bases of Accommodation”, *Foreign Affairs* 46: 4),第46期,第4卷,1968年7月,第650—653页。

[22] 玛丽莲·杨:《越战:1945—1990》(Marilyn Young, *The Vietnam War: 1945—1990*),纽约,1991年,第177页。

市。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阿尔及利亚人口翻了3倍,当时贫穷移民拥入波纹状分布的都市近郊贫民窟(bidonvilles)或优先占据90万结肠病死者空出来的公寓。新政权最初只强调苏联的集团模式重工业化而相对忽略现有农业,这加剧了农民的移民。阿尔及利亚很快变得非常拥挤,许多人都硬挤在摇摇欲坠的旧房子里。卡斯巴\*许多旧房子的自然坍塌经常使得居民丧生。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都市近郊的贫民窟继续扩展到城市郊区和主干道沿线。〔23〕

与此同时,在战后土耳其(Turkey),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受到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援助、农业现代化和进口替代型生产增长的刺激。但,正如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恰拉尔·凯德尔发现的那样,基马尔主义作好准备,也没有把国有土地转让给私营开发商——而代之以“惰性民粹主义委托制度的盛行”。安那托利亚(Anatolian)移民被迫与当地官员协商在安卡拉(Ankara)和伊斯坦布尔郊区建造他们自己的棚户城市,于是1955—1965这十年成为擅自定居者的英雄时代,当时一夜建成区(gecekondu)人口从城市人口总数的5%(25万)激增到23%(220万),自那以后,这一百分比没有发生太大变动。〔24〕至少在早期,一夜建成区对政治体系的协同支持使得他们成为大众住房的最初模式。凯德尔还指出:“一般说来,政治家们宁愿保留任意批准建房和维持大众支持的特权,并以此巩固他们自己的位置。这种保护主义的存在基于土地的非正规拨用。”〔25〕

---

\* Qasbah,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旧城区。——译者注

〔23〕 贾法·莱斯比:《阿尔及利亚》,收入马太:《社会主义第三世界的住房政策》(Djaffar Lesbet, “Algeria”, in Mathéy, *Housing Policies in the Socialist Third World*),第252-263页。

〔24〕 凯德尔:《伊斯坦布尔》(Keyder, *Istanbul*),第147页;H. 塔瑞克·森居尔:《论土耳其的城市化策略》(H. Tarik Sengul, “On the Trajectory of Urbanization in Turke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 25:2),2003年,第160页。

〔25〕 凯德尔:《从非正规化到全球化的房屋市场》(Keyder, “The Housing Market from Informal to Global”),第147页。

中东其他地区,非正式城市化的最大浪潮发生在一二十年之后——1970年代早期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繁荣时期。艾哈迈德·索利曼(Ahmed Soliman)认为,1974到1990年是开罗“城市居住非正规化的高潮”。移民工人的收入从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流回开罗,以填平纳赛尔社会福利国家主义(Nasserite welfarism)的破产所留下的缺口。〔26〕同样地,1970年代早期,成千上万失去土地的劳工和工匠搬到德黑兰去寻找砖厂和建筑工地的的工作,1976年后他们只好面临失业。他们的幻灭和愤怒很快变成伊斯兰革命(Islamic Revolution)的原料。〔27〕反过来,这次革命为贫民窟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独特空间。阿塞夫·巴亚特解释说,“当革命推进到大城市街道上时,忙着拓展他们所占有的社区并把更多城市土地置于(恶性)发展的正是贫民。”此外,在伊朗国王(Shah)逃跑之后,“趁警察控制崩溃之机,贫困家庭接管了成千上万空房和半成品的石块,并整修为他们自己的财产”。令传统商人懊恼不已的是,新来的贫民已建立了数千个摊位、小商品零售亭和手推车货摊,使得“街道人行道转变为富有活力和丰富多彩的购物地带”。〔28〕

独立后不久,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农民开始拥入城市。自1960年代以来,南非除外的大多数国家城市增长率一直是自然人口增长率的两倍。到1980年代,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增长得到了强制性政策的资助,这一政策强迫农民以低于市场价值的(below-market-value)价格出售农产品并对乡村人口征收不成比例的税收。例如,在扎伊尔,蒙博托(Mobutu)总统定期地公开抨击“增长型城市发展的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和犯罪的恶魔”,而又继续如此残酷地压榨乡村以至于农民除了逃到城市地区

〔26〕 索利曼:《可能的出路》(Soliman, *A Possible Way Out*),第51页。

〔27〕 法哈德·卡泽米:《伊朗的贫困和革命:移民贫民、城市边缘与政治》(Farhad Kazemi, *Poverty and Revolution in Iran: The Migrant Poor, Urban Marginality, and Politics*),纽约,1980年,第114页。

〔28〕 阿塞夫·巴亚特:《野蛮社会》(Asef Bayat, “Un-civil Society”),第53页。

之外几乎别无选择。<sup>[29]</sup>但非洲发展中的所谓“城市偏见”对于新兴城市大众的优势几乎不起作用——事实上,随着后殖民精英和武装力量对乡村的封锁,城市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迅速恶化。<sup>[30]</sup>

与此同时,拉丁美洲独裁政府的垮台为土地侵占和擅自定居创造了临时机会,就在强大的反对党和革命的潜在威胁都用土地和基础设施来拉选票时,城市移民获得了意外的机会。最新研究表明,委内瑞拉“加拉加斯贫民窟(Caracas barrios)形成的关键期是1958—1960年。”在佩雷斯·希门内斯被逐和罗慕洛·贝坦科尔特(Rómulo Betancourt)当选之前,临时政府暂时搁置了对贫民窟的驱逐,并给失业者提供了公共救济;其结果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40万最穷的人搬到加拉加斯。后来,两个主要政党——左翼中心的民主行动党(Acción Democrática)和右翼中心的基督教社会党(Social Christian Party,简称COPEI)——间选票的激烈竞争打开了城市周围山上非正式贫民窟暴涨的(佩雷斯·希门内斯曾试图关闭的)防洪闸。结果是加拉加斯及其他委内瑞拉城市以非洲速度发展:1960年代,国家从30%的城市率变为30%的乡村率。<sup>[31]</sup>

在墨西哥市,乌鲁丘尔图反对贫民窟和控制发展的策略最终被证明无法满足工业家和外国投资者对廉价劳工的需求及工人对廉价住房的需求。势力强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们同样感到被市长保守的计划委员会(Comisión de Planificación)置于困境。忍耐极限是乌鲁丘尔图对城市主

---

[29] 杨和特纳:《扎伊尔政府的兴衰》(Young and Turne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Zairian State*),第98页;德博拉·波舍尔:“1950年代和1960年代非洲城市化的抑制”,收入马克·史威林、理查德·汉弗莱斯和赫拉·苏布内合编:《过渡时期的种族隔离城市》(Deborah Posel, “Curbing African Urbanization in the 1950s and 1960s”, in Mark Swilling, Richard Humphries, and Khehla Shubane (eds), *Apartheid City in Transition*),开普敦,1991年,第29-30页。

[30] 卡罗尔·拉科迪:《非洲的全球力量,城市变化及城市管理》,收入拉科迪:《非洲的城市挑战》(Carole, “Global Forces, Urban Change, and Urban Management in Africa”, in Rakodi, *The Urban Challenge in Africa*),第32-39页。

[31] 城市规划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加拉加斯灾难防御》(Urban Planning Studio, Columbia University, *Disaster-Resistant Caracas*),纽约,2001年,第25页。

城区建设的反对。1966年9月,他命令以推土机清除位于阿加斯科(Ajusco)的圣乌尔苏拉贫民窟(Colonia Santa Ursula),这是其最后一次挑战。在此之后,他被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Gustavo Díaz Ordaz)总统(一个因与外国资本家和土地投机商勾结而臭名昭著的政治家)免职。一项快速发展议事日程——为实现市中心的城市复兴而忍受城郊强占土地的城市化——成为首都革命制度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简称PRI)的政策。〔32〕

在那些消除了人口流动和非正式城市化障碍之后的同时代国家中,中国于1980年代早期开始放松其对城市增长的控制。中国有着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储备(据《人民日报》,包括半数以上的四川劳工),其官方障碍的放松导致了一次“农民洪流(peasant flood)。”〔33〕官方许可的移民远远少于未经许可的移民或“盲流”的洪流。没有城里人由家庭户口簿所赋予的正规居民身份,大批贫穷农民(近来的估计是1亿)不能享受合法的社会服务或住房津贴。尽管他们成为珠江三角洲出口血汗工厂及上海和北京建筑工地中的超级廉价劳工,他们自己却住在城边的临时棚屋和过度拥挤的房子中。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回归带来了流动的城市贫民窟。

最后,1980年代晚期,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贫民窟起义(黑人城镇区的“民权”运动),南非统治者被迫取消了一度限制非洲城市移民和定居的极权主义控制体系——1986年首先废除《通过法》(*Pass Law*),1991年又废除了《种族区域法》(*Group Areas Act*)。作家瑞安·马兰(Rian Malan)描绘了这一点对大都市开普敦(那儿的非洲黑人人口在1982至1992年间翻了三番)的影响:

可恨的《通过法》被废除后,就像一道巨大的水坝被打破。大批绝望而又满怀希望的人潮水般漫过山区分散到开普平原(Cape

---

〔32〕 戴维斯:《城市巨兽》(Davis, *Urban Leviathan*),第135,177-180页。

〔33〕 多萝西·索林杰:《争取中国城市户口》(Solinger,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Flats)。他们按照每日 80 到 90 户家庭的比率到来,赤手空拳建造他们的家,用木杆、白铁皮、从垃圾填埋地和塑料垃圾袋中捡来的零零碎碎来挡风遮雨。两年中,沙丘消失在简陋木屋和棚屋的汪洋大海之中,密密挤在一起就像一座老式的城市,住满了各种各样的人——私贩酒类者、流氓匪徒、拉斯特法里(Rastafarians)教徒、军火贩、大毒贩和近 100 万普通工人。〔34〕

### 破碎的承诺和被窃的梦想

贫民窟不是无法避免的城市未来。例如,1960 年代早期,在传奇人物帕斯托瑞塔·努涅兹(Pastorita Núñez)领导下,古巴新兴的国家储蓄与住房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avings and Housing)开始用居民们自己安装的预制构件房屋来替代哈瓦那臭名昭著的棚户区[拉亚瓦斯(Las Yaguas)、勒噶吕庞(Llega y Pon)和拉奎瓦斯休摩(La Cueva del Humo)等等]。7 年前,在他攻击蒙卡达(Moncada)军营的路上,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向古巴人承诺:将巩固 1940 年进步宪法对于体面住房的保证。1958 年,1/3 左右的古巴人住在贫民窟和擅自定居区中。相应地,在革命的第一个黄金年代,国家花了很大力气使贫民移住新居,即便是那些计划,回过头来看,也是现代主义的拙劣改编。〔35〕

尽管革命的古巴对于“新城市主义”的承诺具有先锋性,但大众住房权的理想在同时代(1950 年代末和 1960 年代初)的第三世界并非独一无二:纳赛尔、尼赫鲁(Nehru)和苏加诺(Sukarno)也都承诺过重建贫民窟和兴建无数新房。纳赛尔的“埃及合同”保证给每一个中学毕业生提供公职。革命的阿尔及利亚通过立法来保证免费的普通保健和教育,以及贫

〔34〕 韦斯顿,转引自瑞安·马兰(Rian Malan quoted in westen, ),第 22 页。

〔35〕 约瑟夫·斯卡尔帕奇、罗伯托·赛格雷和马里奥·科约拿:《哈瓦那:安替列群岛首府的两副面孔》(Joseph Scarpaci, Roberto Segre, and Mario Coyula, *Havana: Two Faces of the Antillean Metropolis*),教堂山,2002 年,第 199-203 页。

困居民的租房补贴。1960年代早期，“社会主义”非洲政府与坦桑尼亚一起开始启动雄心勃勃的项目来把城市贫民窟居民重新安置在新建的低收入住房中。在乌鲁丘尔图的年代，墨西哥市支持零星分布的移居者的服务，如包豪斯\*的汉斯·迈耶(Hannes Meyer)还亲自为工会工人和政府雇员设计高层建筑住宅。与此同时，在巴西(Brazil)，乔·古拉特总统(Jão Goulart)和激进的南里奥格兰德州(Rio Grande do Sul)州长莱昂内尔·布里佐拉(Leonel Brizola)均因他们的城市新政而赢得广泛支持。在之后的十多年间，秘鲁(Peru)左倾军事独裁者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Juan Velasco Alvarado)从菲德尔古巴革命主义(Fidelismo)那里学了一招：支持大城市的土地强占，并建立一个野心勃勃的政府项目来改造贫民窟[他乐观主义地将其重命名为新镇(pueblos jovenes)]。

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古巴进步的收容所项目已经被苏联(USRR)解体之后“特殊时期”的财政紧缩减速到蜗牛步伐，住房供应远远滞后于乡村令人印象深刻的卫生和教育成就。除了香港和新加坡的特例之外，1980和1990年代间的发展中世界，只有中国政府设法兴建了大量适宜的住房。尽管这一“无声的革命”，正如城市专家理查德·柯克比(Richard Kirkby)所言，远远不能满足千百万进城农民的需要。

在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干涉主义政府强力承诺的社会住房和就业发展理想看来不过是幻觉或冷笑话，因为政府很久以前就放弃了反对贫民窟和整治城市周边的任何严肃努力。在许多很穷的城市，市民与政府的关系类似于内罗毕贫民窟居民向卫报记者描述的情况：“政府在这儿什么也没做。饮用水、学校、下水道设施、公路和医院统统没有提供。”事实上，

---

\* Bauhaus 由德文 Bau - Haus (Bau 建筑，动词 bauen 为建造之意；Haus 为名词，房屋之意) 一词倒置组成，是国立包豪斯学校(德文：Staatliche Bauhochschule, Bauhaus, 1919—1933)的简称。1919年，该校由德国著名建筑大师沃尔特·格罗佩斯(Walter Gropius, 1883—1969)创立于德国威玛。包豪斯是一所艺术和建筑学校，讲授并发展设计教育。包豪斯注重建筑造型与实用机能合而为一，在调和“人”与“人为环境”的工作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由于其对于现代建筑学的深远影响，今日的包豪斯早已不单是指学校，而是其倡导的建筑流派或风格的统称。

记者发现,居民们从私人经销商那里买水,并靠自发组织的治安维持会来维持治安,而警察只在集体受贿时才会到场。〔37〕

国民政府在住房供应方面的最低限度作用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近来所制订的新自由经济信条进一步削弱。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强加给债务国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要求政府财政紧缩方案和(常常是)住房市场私人化。然而,第三世界的社会政府甚至早在结构调整计划敲响福利主义的丧钟之前就已经萎缩。因为如此众多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工作的专家认为,政府供应的城市住房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从那些(乍一看)看来是政府规划失败的主要例外开始来重新探讨一些个案的历史是很重要的。

在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热带城市,政府为低收入者所建的大批住房已经取代了贫民窟。作为一个有着严格移民政策的国家,前者并没有遭遇一个贫穷农业内陆城市通常被迫面临的人口压力。“许多问题被输出到新山\*——新加坡的提华纳\*\*。”〔38〕另一方面,香港不得不吸纳数百万的难民和如今来自内陆的移民。这个从前的英国直辖殖民地成功地把擅自定居者、廉价公寓房客和内战难民移居到新建的政府公寓大楼中,但这并不完全是经常描绘的人道主义奇迹。

正如艾伦·斯马特(Alan Smart)所展示的那样,香港的住房政策曾是一个由房地产开发商、制造业资本和大众抵抗所构成的、以中国内陆的潜在介入为繁荣背景的、利益分离的、聪明的三角关系。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使得持续的廉价劳工供应与剧增的土地价值保持平衡。据斯马特1971年的报道,首选的解决办法不是高租金——那会迫使工资上

---

〔37〕 安德鲁·哈丁:《内罗毕贫民窟生活》,系列报道,载于《卫报》(Andrew Harding, “Nairobi Slum Life”, (Series), *Guardian*), 2002年10月4日、8日、10日和15日。

\* Johor Baru, 马来西亚柔佛州首府。——译者注

\*\* Tijuana, 墨西哥西北部城市。——译者注

〔38〕 伯纳:《向非正规市场学习》(Berner, “Learning from Informal Markets”), 第244页。

升——而是被边缘化和过度拥挤的 100 万擅自定居者被迫移居到“仅有从前所占土地的 34% 那么大的一块更边缘更廉价土地上”的新居。同样地,数十万的来自先前中心地带低价住房中的贫穷房客被迫移住新居。1960 年代早期的公共住房仅给每个成年人分配 24 平方英尺\*的空间,以及整层楼共用的洗手间和厨房。尽管在后来的兴建计划中,条件有所改善,但香港的正式居住密度仍然是世界最高的:摩天办公楼和昂贵的市价公寓的地皮价格已攀升到最高点。〔39〕

在他们重构的香港空间经济学中,规划者们很少注意到城市贫民的实际生活策略,以及他们经常把家当成作坊或用于满足住得靠近中心市场或工厂的需要。当然,贫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非正式经济与周边高层住宅的不协调已经成为历史:这是十多年来一直为全世界城市改革者和城市独裁者所重复的一个原罪。实际上,回溯到 1850 年代,奥斯曼男爵 (Baron Haussmann) 的第二帝国工人住宅样板房——拿破仑式的巴黎——因其千篇一律和“军营”样式被其预期居民所抛弃。据历史学家路易丝·夏皮罗所言:“他们抱怨慈善家和建筑行会开始像中世纪一样把劳苦大众贬谪到特殊居住区,敦促政府对闲置公寓课税以迫使租金降价,并使得大批人能寄宿在市中心的混合住宅中。”最后,奥斯曼的著名计划是“只安置资产阶级房客”。〔40〕

现代第三世界有许多拿破仑式城市的追随者。例如,在雅加达,因其没有为家庭作坊提供空间,公共住房并不能吸引大量的非正式劳工;其结果是,大多数房客是私人保安和公务员。〔41〕在北京,高层建筑导致了居

---

\* 相当于 2.0064 平方米。——译者注

〔39〕 斯马特:《腾出空间》(Smart, *Making Room*),第 1、33、36、52、55 页。

〔40〕 安-路易丝·夏皮罗:《巴黎》,收入 M. J. 多顿:《工人的住房问题,1850—1914:比较视野》(Ann-Louise Shapiro, “Paris”, in M. J. Dauntton (ed.), *Housing the Workers, 1850—1914: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伦敦,1990 年,第 40—41 页。

〔41〕 汉斯-迪特尔·埃弗斯与吕格迪·科尔夫:《东南亚都市主义:社会空间的形式与权力》(Hans-Dieter Evers and Rüdiger Korff, *Southeast Asian Urbanism: The Meaning and Power of Social Space*),第 218—219 页。

住空间真正的数量增长,尽管如此,塔楼居民们还是为社区的消逝而惋惜。居民调查报告显示,窜门子、邻里交往和孩子们做游戏的频率日渐降低,与此同时,老年人的寂寞和孤独与日俱增。<sup>[42]</sup>同样地,在曼谷,据两个欧洲研究者的调查,贫民更愿意选择他们旧有的贫民窟而不是新的塔楼。

贫民窟拆迁规划机构认为,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住在廉价高层公寓的选择;但贫民窟居民知道,拆迁和住在那些公寓中将减少他们再生产的方式和生存生产的可能性。此外,那些公寓所处的位置使得就业机会变少。这是贫民窟居民选择呆在贫民窟中并反抗拆迁的单纯原因。对他们而言,贫民窟是在日渐恶化的环境中仍然能再生产的地方。对都市规划者而言,这只是城市的痛症。<sup>[43]</sup>

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对公共住房或政府补贴住房的“偷猎(poaching)”——正如住房专家所称呼的那样——已经成为一种半普遍性现象。例如,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阿尔及利亚把城市有保留地细分为小块土地,并以补贴价供应建筑材料。表面看来,这是为了住房合作开发;然而,正如建筑师贾法·莱斯比(Djaffar Lesbet)发现的那样,政府资助与当地自筹资金间这种理论上的优雅平衡并没有使得住房民主化:“小块建筑用地使得那些具有领导特权的人可以获得他们自己的住房。而通过把这个国家问题转换为一个私人问题,他们也削弱了住房危机的戏剧和政治的声音。”<sup>[44]</sup>其结果是,公务员及

[42] 维克多·西特:《北京:中国首都城市的自然与规划》(Victor Sit, *Beijing: The Nature and Planning of a Chinese Capital City*), 奇切斯特, 1995年, 第218-219页。

[43] 埃弗斯和科尔夫:《东南亚都市主义》(Evers and Korff, *Southeast Asian Urbanism*), 第168页。

[44] 莱斯比:《阿尔及利亚》(Lesbet, "Algeria", ), 第264-265页。

其他人已经获得了各自的家和别墅,而真正的贫民仍然居住在贫民窟的擅自定居区中。尽管缺乏阿尔及利亚的革命热情,突尼西亚(Tunisia)也开发了潜在的政府资助住房,其中的75%不是贫民所能承担的,他们只好挤在突尼斯的泛贫民窟,如埃塔哈门(Ettadhamen)、梅拉塞内(Mellassine)和也贝尔拉马(Djebel Lahmar)中。〔45〕

印度以不同面貌呈现了同样的趋势。例如,在1970年代,市政和政府当局提出了一项非常野心勃勃的计划:在背对着孟买半岛的本土创造一个现代的双子城。城市贫民被许诺将在闪闪发光的新孟买(Navi Mumbai)拥有新家和工作。但实际上,本土的当地人因为丧失了土地和生计而流离失所,而大批新房则落到了公务员和中产阶级手中。〔46〕同样地,在德里,发展署(the Development Agency)分配了50万块土地,但“大多数被富人们攫取”。研究表明,在一个目前有45万户“非法”贫民窟拆迁居民的城市,仅有11万所住房是真正为贫民们建造的。〔47〕

加尔各答左翼阵线(Left Front)于1970年代末掌权,本应该有一个不同的故事,既然(马克思主义的)印度共产党一直在为贫民窟居民的“解放”而斗争。然而,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早期那个使贫民移住新居的承诺已经屈服于拉拢特权阶层选票的需要。作家弗雷德里克·托马斯(Frederic Thomas)说:“贫民的需要仍然被空头支票所搪塞,而大部分财政预算被用于中高等收入的加尔各答人。加尔各答都市发展处

---

〔45〕 弗赖·斯坦布里:《突尼斯:住房危机和城市恢复》,收入埃米斯和劳埃德:《非洲城市贫民的住房问题》(Frej Stambouli, "Tunis: Crise du Logement et Réhabilitation Urbaine", in Amis and Lloyd, *Housing Africa's Urban Poor*),第155页。

〔46〕 阿兰·雅克曼:《第三世界城市发展与新兴城镇》(Alain Jacquemin, *Urban Development and New Towns in the Third World*),第196-197页。

〔47〕 尼莉玛·里斯巴德:《德里的财产安全政策》,收入迪朗-拉舍维和诺斯顿:《坚持他们的立场》(Neelima Risbud, "Policies for Tenure Security in Delhi", in Durand-Lasserre and Royston, *Holding their Ground*),第61页。

仅仅预算了10%的投资用于贫民窟发展。”〔48〕同样,在越南,革命住房政策已经被操纵来使国家精英受益,几乎不会留给真正的贫民。研究者阮·达克·努安(Nguyen Duc Nhuan)和科斯塔·马太(Kosta Math y)写道:“政府或市政住房主要被留给公务员和军人,他们享有法律规定的两室一厅的权利,他们试图把自己不用的房子租给别人以增加收入。”〔49〕

尼日利亚(Nigeria)曾经夸口将用其暴增的石油税来为城市贫民重建新居,但第三个和第四个国家发展计划(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成为对这一雄心勃勃承诺的歪曲——直到第五个计划,住房才真正被建造起来,大多数还落到了其他人而不是贫民手中。〔50〕同样地,在卡诺(Kano),提供给公务员的低价住房(殖民传统的延续)曾经被那些无资格的、但政治上有权的个人占用,他们的收入远远高于分房资格的条件限制。〔51〕牙买加(Jamaica)是另一个民粹主义言词从来没有与其行动相匹配的国家。诚然,国家住房信托基金(National Housing Trust,简称NHT)有着相对更大的资金基础,但——正如托马斯·克拉克(Thomas Klak)和马琳·史密斯(Marlene Smith)强调的那样——实际上它做了各种各样的事,但就是不包括为贫民盖房。“目前大多数国家住房信托基金的资金被用来发放自己职员的薪水,帮助丰富中央政府保留的要求,提供更高收入甚至非国家住房信托基金住房建设的临时资助,资助相对少数和大多数高收入捐赠者的

〔48〕 托马斯:《加尔各答贫民》(Thomas, *Calcutta Poor*),第147页。

〔49〕 阮·达克·努安和科斯塔·马太:《越南》,收入马太:《社会主义第三世界的住房政策》(Nguyen Duc Nhuan and Kosta Math y, “Vietnam”, in Math y, *Housing Policies in the Socialist Third World*),第282页。

〔50〕 T.奥科耶:《尼日利亚住房政策的历史沿革》,收入埃米斯和劳埃德:《非洲城市贫民的住房问题》(T. Okoy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Nigerian Housing Policies”, in Amis and Lloyd, *Housing Africa's Urban Poor*),第81页。

〔51〕 H.梅因:《大都市卡诺的住房问题和擅自定居的解决方案》,收入罗伯特·波特和阿德莫拉·萨莱合编:《第三世界的城市与发展》(H. Main, “Housing Problems and Squatting Solutions in Metropolitan Kano”, in Robert Potter and Ademola Salai (eds), *Citi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伦敦,1990年,第22页。

抵押。〔52〕

1980年代,墨西哥正式住宅市场供应不超过实际需求的1/3,大量住房被军人、公务员和一些有权势的组织(如石油工人工会)所瓜分,最穷的人只得到政府补贴的残汤剩水。因此银行住房融资基金(FO-VI)\*——服务于住房市场的中间部分(最高到10倍于最低工资)政府信用基金——流通了50%的联邦住房资源;而国家公共住房基金(FON-HAPO)\*\*——服务于最穷的人——仅仅剩下4%的房源。〔53〕约翰·贝坦库尔(John Betancur)发现波哥大有相似的境况,那儿的中等收入群体得到了很多的土地,而政府仅给贫民住房需求提供勉强的援助。〔54〕同样地,在利马,大多数公共住房(供低收入家庭租用的政府住房)和分配的住房被中等收入群体和政府雇员所攫取。〔55〕

第三世界的城市精英和中产阶级在逃避市政税收方面也非常成功。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的A.奥贝南(A. Oberai)写道:“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动产税的潜能没有充分开发。现存税收体系倾向于向贫民征税,免税及贫民们在收税时的行为对税收基础有着

---

〔52〕 托马斯·克拉克和马琳·史密斯:《牙买加的官方住房财政部》,收入达塔和琼斯的《发展中国家的住房与信贷》(Thomas Klak and Marlene Smit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mal Sector Housing Finance in Jamaica,” in Datta and Jones, *Housing and 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第72页。

\* 西班牙语:Fondo de operación y Financiamiento Bancario a la Vivienda;英语:Banking Finance Fund for Housing),1963年墨西哥联邦政府通过财政部和公共信贷银行而成立的公共信托基金。其目的是为建造和购买住房提供财政支持和社会保障。——译者注

\*\* 西班牙语:Fondo Nacional de habitaciones populares 英语:National Fund for popular Housing 国家公共住房基金。——译者注

〔53〕 佩佐利:《墨西哥的城市居住环境》(Pezzoli, “Mexico’s Urban Housing Environment,”),第142页。

〔54〕 约翰·贝坦库尔:《哥伦比亚的自发定居》,收入奥德里奇和桑胡合著:《城市穷人的住房供给》(John Betancur, “Spontaneous Settlement in Colombia,” in Aldrich and Sandhu, *Housing the Urban Poor*),第224页。

〔55〕 约翰·伦纳德:《利马:城市剪影》,载于《城市》(John Leonard, “Lima: City Profile”, *Cities*),第17卷第6期,2000年,第437页。

实质性腐蚀。”〔56〕奥贝南的表达太含蓄了：在非洲、南非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城市富人猖獗甚至违法地从当地政府偷税漏税。此外，正如财政吃紧城市逐渐依赖于退步的销售税和使用费——如墨西哥市40%的税收就由这些构成——税收压力甚至更多地单方面从富人转向贫民。在一个少有的、对10个第三世界城市中的财政管理的比较分析中，尼克·德瓦斯(Nick Devas)发现一种一贯退步的模式，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曾有过任何严肃的努力来评估和征收富人的财产税。〔57〕

部分责难必定会加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第三世界财政的管家，他到处倡导降低公共服务的用户费和使用费，但从未建议相应地提高对富人、奢侈消费或不动产的税收。同样地，世界银行为第三世界城市的“善治(good governance)”而奋斗，却很少支持积极税收。这实际上破坏了“善治”的可能性。〔58〕

当然，“偷猎”和财政偏向是整个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大部分贫民缺乏政治影响的表现；城市民主仍然是例外而非规则，特别是在非洲。即便是在贫民有投票权的贫民窟，他们很少能利用这种权利来影响支出和税收资源的再分配：大量结构性策略——包括大都市政治框架、地方或国家财政预算控制及自治机构的建立——曾被用来隔离城市决策与大众公民权。在其对孟买地区的研究中，阿兰·雅克曼(Alain Jacquemin)强调，土地权被城市开发办取消。城市开发办的作用是建立允许贫穷城市中先富的人使自己——仅仅是他们自己——跻身于世界电脑经济的现代框架中。他写道：“这些当局进一步损害了(原本就由于部门责任、资金和人力资源的缺乏而遭到削弱的)民主选举的自治政府的任务和功能。难怪

---

〔56〕 奥贝南：《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雇佣和贫困》(Oberai, *Population Growth, 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Third-World Mega-Cities*), 第169页。

〔57〕 尼克·德瓦斯：《南方城市政府能拯救穷人吗？》载于《国际发展与规划评论》(Nick Devas, “Can City Governments in the South Deliver for the Po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Review*), 第25卷第1期, 2003年, 第6-7页。

〔58〕 奥贝南：《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雇佣和贫困》(Oberai, *Population Growth, 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Third-World Mega-Cities*), 第165, 171页。

在自治组织层面上,仍然没有听到当地需求的表达。〔59〕

于是,极少例外,后殖民政府已经广泛地背叛了其对城市贫民的最初承诺。城市学者的共识之一是:第三世界公共住房(供低收入家庭租用的政府住房)和政府补贴住房主要使城市中产阶级和精英受益,他们期望纳更少的税并获得更高标准的自治服务。在埃及,埃哈迈德·索利曼得出结论说,“公共(住房)投资已被极大浪费,”其结果是“将近 2000 万人至今还住在会损害他们健康和安全的住房中。”〔60〕

印度的情形非常相似,南迪尼·古普图描绘了甘地时代扶贫(pro-poor)政策的逆转:

最终,城市变革的宏大概念被蚕食和调整以适宜有产阶级的直接利益。城镇规划方案不是作为社会复兴的理想主义计划,而是作为进一步实现有产者利益和目的,并不断把贫民边缘化的工具而展开。消灭贫民窟的战争越来越接近于一场控制贫民的定居和居住的战役,实际上是对贫民的一次进攻。〔61〕

---

〔59〕 雅克曼:《第三世界的城市发展与新兴城镇》(Jacquemin, *Urban Development and New Towns in the Third World*),第 41、65 页。参见 K. 西瓦拉玛克瑞希兰:“城市管理权:变更中的现实”(K. Sivaramakrishnan, “Urban Governance: Changing Realities”),第 232-233 页。

〔60〕 索利曼,收入阿南亚·罗伊和尼扎·阿萨伊德合编:《城市非正规化现象:中东、拉丁美洲和南亚的跨国透视》(Soliman, in Ananya Roy and Nezar Al Sayyad (eds), *Urban Informality: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from the Middle East, Latin America, and South Asia*),兰哈姆(美国马里兰州),2004 年,第 171、202 页。

〔61〕 古普图:《21 世纪早期印度城市穷人的政治》(Gooptu, *The Politics of the Urban Poor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India*),第 84 页。

## 第四章 自助的幻象

---

从一个谬误(贫民窟是罪孽、疾病和绝望之地)到其反面  
(他们会乖乖呆在那儿照顾他们自己)都会是很愚蠢的。

——杰里米·西布鲁克〔1〕

当第三世界政府在 1970 年代放弃消灭贫民窟的战役时,布雷顿森林 (Bretton Wood) 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坏伙伴”而世界银行是“好伙伴”——的假定在城市住房政策参数的设定中扮演了越来越权威的角色。世界银行城市发展贷款从 1972 年的 1000 万美元增加到 1988 年的 20 亿美元。〔2〕1972 到 1990 年间,世界银行为 55 个国家中的 116 个提供建房用地和基础设施或升级贫民窟的方案提供了资金。〔3〕当然,对于实际需求而言,这只是杯水车薪,但它确立了世界银行对于国家

---

〔1〕 西布鲁克:《在南部城市中》(Seabrook, *In the Cities of the South*), 第 197 页。

〔2〕 S. 塞苏拉玛:《城市贫困与非正规经济部门:对当前战略的批判评价》,国际劳工组织工作报告 (S. Sethurama, “Urban Poverty and the Informal Sector: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Current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working paper), 日内瓦, 第 2-3 页。

〔3〕 塞德里克·佩什:《世界银行在住房问题中的作用》,收入奥尔德里奇和桑胡合编:《城市穷人的住房问题》(Cedric Pugh, “The Role of the World Bank in Housing”, in Aldrich and Sandhu, *Housing the Urban Poor*), 第 63 页。

城市政策的巨大杠杆作用,以及当地贫民社区和非政府组织(NGO)的直接赞助关系;这也使得世界银行可以把其自身理论强化为世界范围的城市政策信条。

改善贫民窟而不是取代它,成为公共和私人介入的最低目标。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新思维所主张的解决办法,不是城市贫困自上而下的结构变革(由欧洲战后社会民主国家提出,并为1950年代革命民族主义领导人所倡导的),而是政府与国际捐助者和非政府组织结盟,成为贫民“赋权者”。在其最初的字面意义上,新的世界银行哲学,受英国建筑师约翰·特纳(John Turner)的观点影响,强调通过“提供建房用地和基础设施”提供基本的“湿件”\*(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的方式来帮助合理化和升级自建房。然而,到1980年代末,世界银行支持住房供应的全面私有化,并迅速成为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倡导以微型企业(micro-entrepreneurial)解决城市贫困的秘鲁经济学家——模式最强有力的体制麦克风。

## 贫民的朋友

1970年代,世界银行总裁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与建筑师约翰·特纳的智力联合是非常奇特的。因为,前者曾是维也纳战争的主要策划者,而后者一度是英国无政府主义报纸《自由》(*Freedom*)的主要撰稿人。1957年,特纳离开英国到秘鲁去工作,在那儿他被自己在擅自定居工作中迸发出来的创造性才能迷住。他不是第一个对贫困人群的社区自发组织能力和充满智慧的建筑能力充满热情的建筑师:法国殖民建筑师和规划师们,如国际现代建筑协会阿尔及尔分会(Congrès Internationaux d'Architecture Moderne, Groupe CIAM Alger),曾赞扬“都市近

---

\* wet,计算机专用术语,指软件、硬件以外的其他“件”,即人脑,通常也指人脑和机器连接起来的设备。——译者注

郊贫民窟”的自然秩序,建筑与空地的“有机”关系(对城堡的怀旧),空地与住房之间不同功能的过渡,能满足使用者不断改变的需要。〔4〕然而,特纳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推广者和宣传者。他与社会主义者威廉·芒然(William Mangin)合作,宣称贫民窟不是问题而是解决办法。尽管其前提不无偏颇,特纳的核心项目——自助、增值式建筑和自发城市化的合法化——的确是解决麦克纳马拉感兴趣的都市危机的实用和划算方法。

到1976年,第一届联合国人居署(UN Habitat)会议召开和特纳的《自建房:建筑环境的自治》(*Housing by People: Towards Autonomy in Building Environment*)出版那年,这一无政府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混合物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信条,“极度不同于公共住房的规划,赞同提供建房用地和基础设施项目和贫民窟就地(in situ)升级计划”。世界银行新成立的城市发展部将是这一策略的主要支持者。塞德里克·佩什(Cedric Pugh)继续说:“这一意图在于使得住房成为没有特别津贴的低收入家庭可以承受的消费,与此相对的是大力资助公共住房(供低收入家庭租用的政府住房)的方式。”〔5〕在对于“帮助贫民自助”的大肆宣传中,几乎没有注意到世界银行对于贫民窟住宅的美化中所暗含的、对权利的公开和重大削减。盛赞贫民的惯例成为免除政府救济贫困者和无家可归者承诺的烟幕。杰里米·西布鲁克写道:“通过示范贫民窟人民自我救助的能力、勇气和能力,为撤回国家及当地政府的干涉和支持做好准备。”〔6〕

此外,特纳及其世界银行崇拜者们把擅自定居型增值住房的代价和后果大大罗曼蒂克化了。正如卡维塔·达塔(Kavita Datta)和加雷思·琼斯(Gareth Johns)的研究表明的那样,缺乏规模效应的住宅建筑意味着建

---

〔4〕 泽伊内普·切利克:《城市形式与殖民比较: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尔》(Zeynep Çelik, *Urban Forms and colonial Confrontations: Algiers under French Rule*),伯克利,1997年,第112页。

〔5〕 佩什:《世界银行在住房问题中的作用》,(Pugh, “The Role of the World Bank in Housing”),第64页。

〔6〕 西布鲁克:《在南部城市中》(Seabrook, *In the Cities of the South*),第196-197页。

筑材料的高昂单位成本(从附近的零售商那里少量购买)或者是二手的劣质材料。此外,达塔和琼认为,“自建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神话:大多数自建房实际上是在付费工匠和专业技术工人帮助下完成的”。〔7〕

更重要的是,世界银行贷款的成本回收条款——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强化了的新自由主义信条——有效地使用价格标杆把最穷的贫民排除在自助贷款市场之外。1987年,据世界银行最尖锐的批评家之一的丽莎·皮蒂(Lisa Peattie)估计,30%到60%(据各国情况而定)的底层人民不能满足升级贷款或提供建房用地和基础设施的金融规定。〔8〕此外,即便是最野心勃勃和最具招徕性的方案都经常被中产阶级或非贫困人士利用占据公共住房的相同方式来攫取。

菲律宾——世界银行新全球策略的一个试点国——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适当例子。与马科斯(Marcos)独裁政府一起,银行职员确定了253个“为了优先发展”而摧毁的区域,从马尼拉市的弧形海滩沿岸广阔的贫民窟住宅开始。埃哈德·伯纳指出,“投资”都直接落到土地开发商和建筑业的腰包里。例如,巴石(Pasig)的圣·约瑟夫村(St. Joseph)被广泛宣传为贫民家庭规划项目的一个典型,伊梅尔达·马科斯(Imelda Marcos)甚至宣称罗马教皇保罗六世(Pope Paul VI)为其官方支持者。然而,据伯纳所言,在五年内,“所有当地居民都离开了,因为他们的房子都卖给了富有的家庭。”〔9〕这一失败是如此的尴尬,以致世界银行改组了项目,集中援助马尼拉市外的重新安置区提供建房用地和基础设施的项目。这些安置区偏远的地理位置使其不可能被改造为良好的中产阶级居住区,但同时又为贫民所憎恶,因为它们远离工作和服务地点。伯纳说,尘埃落定

---

〔7〕 卡维塔·达塔和加雷斯·琼斯:《前言》,收入达塔和琼斯:《发展中国家的住房与信贷》(Kavita Datta and Gareth Johns, “Preface,” in Datta and Johns, *Housing and 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第12页。

〔8〕 丽莎·皮蒂:《负担能力》,载于《国际人居》(Lisa Peattie, “Affordability,” *Habitat International*),1987年,第11卷,第4期,第69-76页。

〔9〕 伯纳:《捍卫一块土地》(Berner, *Defending a Place*),第31页。

之后,世界银行在马尼拉的英雄努力留下了许多“和从前一样拥挤和破旧不堪”的贫民窟。〔10〕

在孟买,世界银行大力宣扬的另一块试验田,大规模的贫民窟升级(影响300万人)被承诺,但结果仍是无效。例如,环境卫生项目,曾指望每20个居民1个厕所位,但达到的比率仅仅是100人1个,不时维修的设施抵消了公共卫生的优势。与此同时,据专家评论,“到1989年,贫民窟升级计划因缺乏前景而失败了,仅有9%的受益者是低收入群体。”〔11〕

在非洲,世界银行城市计划的第一个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同样揭示了其黯淡或乖张的后果。在达累斯萨拉姆贫民窟(Dar-es-Salaam),世界银行(1974—1981年)一场雄心勃勃的干涉结束之后,一项研究发现:“由提供建房用地和基础设施的项目配给了土地的大部分擅自定居者都卖掉了他们的土地,并回去在城区边缘的未开垦土地上违章建房。”大多数提供建房用地和基础设施的项目用地都落到了政府雇员和中产阶级手中。〔12〕规划专家查尔斯·科吉尔(Charles Choguill)说,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世界银行所要求的、申请建房贷款的最低限度存款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它自动排除了大多数擅自定居者。〔13〕同样,在卢萨卡的另

〔10〕 埃哈德·伯纳:《扶贫与脱贫》,载于《国际城市和区域研究杂志》(Erhard Berne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Eviction of the Poore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search* 24:3),第24卷第3期,2000年9月,第558—559页。

〔11〕 格雷格·奥·赫尔、蒂娜·艾布特与迈克尔·巴克:《孟买贫民窟住房政策评论》,载于《城市》(Greg O’Hare, Dina Abbott, and Michael Barke, “A Review of Slum Housing Policies in Mumbai,” *Cities*),1998年,第15卷,第4期,第279页。

〔12〕 A. 莫萨:《坦桑尼亚的擅自定居区与贫民窟居住区》,收入奥德里奇与桑胡:《城市穷人的住房问题》(A. Mosa, “Squatter and Slum Settlements in Tanzania,” in Aldrich and Sandhu, *Housing the Urban Poor*),第346页;约翰·坎贝尔:“世界银行在东非的城市庇护所计划”,收入埃米斯和劳埃德:《安置非洲城市贫民》(John Campbell, “World Bank Urban Shelter Projects in East Africa,” in Amis and Lloyd, *Housing Africa’ Urban Poor, Housing the Urban Poor*),第211页。

〔13〕 查尔斯·科吉尔:《第三世界城市发展计划未来》,收入奥德里奇与桑胡:《城市穷人的住房问题》(Charles Choguill, “The Future of Planned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in Aldrich and Sandhu),第408页。

一个提供建房用地和基础设施项目,仅有 1/5 达到目标,达喀尔的结果几乎同样前途黯淡。〔14〕

1993 年,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简称 ILO)的 A. 奥贝南得出结论说,世界银行贫民窟升级和提供建房用地和基础设施方案大部分没有能够对第三世界的住房危机产生明显影响:“尽管努力制订了可以推广的计划,但计划的实现方法妨碍了一些地方多种来源和机构的努力,不能达到住房储备的预期水平。因此计划的实现途径不可能对解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住房问题产生有意义的影响。”〔15〕另外的批评家们指出了住房供应与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巨大分裂,以及提供建房用地和基础设施方案不可避免地被安置于地处边缘的、公共交通服务贫乏地带的趋势。〔16〕然而世界银行继续推行自建房增值——城市发展部现在重组和更名为“住房开发部”——为改善贫民窟的最好策略。

## 软性帝国主义

1990 年代中期以来,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WNDP)和其他援助机构使得不断分路或短路的(short-circuited)政府直接与当地及附近的非政府组织合作。事实上,非政府组织革命——如今第三世界城市中有千百万个——已经重塑了城市发展援助景观,以类似于 1960 年代贫困战

---

〔14〕 坎贝尔:《世界银行在东非的城市住房项目》,收入埃米斯和劳埃德:《安置非洲城市贫民》(Campbell,“World Bank Urban Shelter Projects in East Africa,”*Housing Africa's Urban Poor*),第 211 页;理查德·斯特伦:“非洲的城市住房”(Richard Stren,“Urban Housing in Africa,”),出处同上,第 41 页。

〔15〕 奥贝南:《第三世界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就业与贫困》(Oberai, *Population Growth, 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Third-World Mega-Cities*),第 122 页。

〔16〕 《生计与避难所无疑被看作一体而非分离的存在》,收入卡尔帕纳·夏尔马:《重新发现达拉维:来自亚洲最大贫民窟的故事》(“Livelihood and Shelter Have to Be Seen as One Rather than Separate Entities,” in Kalpana Sharma, *Rediscovering Dhara-vi: Stories from Asia's Largest Slum*),新德里,2000 年,第 202 页。

争的方式变革华盛顿、大城市政治机器与叛乱的内城选区之间的关系。〔17〕随着政府仲裁作用的下降,通过其下属的成千上万个贫民窟和贫穷城市社区中的非政府组织,大型国际机构获得了他们的基层影响力。典型地,一个像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署(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 DFID)、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和德国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the German 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这样的借贷-捐赠机构将通过一个主要的非政府组织来发挥作用,反过来,也提供专家的意见给一个当地的非政府组织或该国接受者。这一资金与合作的层级体系经常被描绘为“赋权”、“协同作用”和“参与式统治”中的最新成果。

在世界银行方面,随着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生于澳大利亚的金融家和博爱主义者——1995年6月就任世界银行总裁以来数十年领导之下的银行目标的再定位,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不断增加。据传记作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所言,沃尔芬森作为一个自我吹嘘的世界定位者(World-fixer)而来到华盛顿,并通过减贫和“合伙”其议程中的新中心“追求复兴麦克纳马拉的银行救世主能量”。第三世界政府被要求介入非政府组织和加入准备减贫战略文件(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s,简称 PRSP)——银行现在要求提供的、援助确实到达了目标人群的证明——的倡导人。作为麦克纳马拉集团的一个新成员,沃尔芬森也追求把非政府组织上层世界整合到世界银行的功能网络中——尽管出现了一个反全球化运动,正如马拉比指出的那样,他基本上成功地“把1994年马德里(Madrid)首脑会议敌人变成了工作伙伴。”〔18〕

尽管之前的一些批评家们欢呼世界银行的这一“参与式转向”,真正

〔17〕 达塔和琼斯:《前言》(Datta and Jones, “preface,”),第17页。

〔18〕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世界的银行家:失败政府、金融危机、国民财富与贫困的故事》(Sebastian Mallaby, *The World's Banker: A Story of Failed States, Financial Crises, and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纽约,2004年,第89-90页,第145页。

的受益者看起来是大型非政府组织而非当地人民。在一个对近来研究——包括伦敦本地的帕勒斯研究院(London-based Pnos Institute)的一份主要报告——的评论中,丽塔·亚伯拉罕森(Rita Abrahamsen)得出结论说:“不是授权给‘市民社会’,减贫战略进程已经在一个小同性质‘铁三角’(重要政府部门特别是财政部门、多边和双边发展机构及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跨国专家们之间制造了分歧。”〔19〕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其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短暂任期间所描绘的一种正在出现的“后华盛顿共识”也许描绘为“软性帝国主义”更为恰当。这种软性帝国主义伴随着重要非政府组织对国际捐赠议程的把持,以及基层组织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单纯依靠。〔20〕

在所有关于民主、自助、社会资本和市民社会力量的热忱修辞中,这个新的非政府组织世界中的实际权力关系不同于任何传统的代理人制度。此外,正如由1960年代贫困战争所庇护的社区组织一样,第三世界非政府组织已经证明在增选当地领导为其成员,以及把传统上由左翼势力把持的社会空间同质化方面表现突出。即使有一些著名的例外——比如好战的非政府组织对创建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的巨大作用——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革命”的广泛影响,正如甚至是一些世界银行的研究者们承认的那样,已经变得官僚化和非激进化。〔21〕

因此,发展经济学家黛安娜·米特林(Diana Mitlin)在其关于美洲的

---

〔19〕 丽塔·亚伯拉罕森:《评论:减贫或调整的另一个名字》《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Essay: Poverty Reduction or adjustment by Another Name?”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2004年,第99期,第185页。

〔20〕 斯蒂格利茨1998年演讲,“更多手段和更广目标;迈向后华盛顿共识”,在约翰·彭德:“从‘结构调整’到‘综合发展框架’:限制性转换?”一文中被加以讨论,载于《第三世界季刊》(Stiglitz’s 1998 speech, “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s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is discussed in John Pender, “From ‘Structural Adjustment’ to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Framework’: Conditionality Transformed?” *Third World Quarterly*),2001年,第22卷,第3期。

〔21〕 因帕拉托和鲁斯特:《贫民窟升级与参与》(Imparato and Ruster, *Slum Upgrading and Participation*),第255页。

著作中描绘到,一方面,在接管决策权和协调权时,非政府组织如何“优先获得社区层面的能力建设”,而另一方面,他们受到捐赠人财物管理困难的限制,集中关注短期项目基金、财政责任和有形资产的产出。〔22〕与阿根廷市的例子相似的是,建筑师吕邦·卡佐利(Rubén Gazzoli)抱怨,非政府组织以相同于传统政治机器的方式垄断了专家知识和中间人作用。〔23〕反过来,莱亚·耶利内克(Lea Jellinek),一个花了1/4世纪的时间来研究雅加达贫民的社会历史学家,重新评价了一个著名的非政府组织,“开始于一个小小的草根计划,由当地妇女的需要和能力所推动”的一个邻近社区小型银行,弗兰肯斯坦式\*地发展为一个“对其低收入基础不再有价值和支持力”的“巨大的、复杂的、综合的和技术导向的官僚机构”。〔24〕

从一个中东人的视角,阿塞夫·巴亚特(Asef Bayat)探索了非政府组织的夸张法,指出“非政府组织对于独立和民主组织的潜能通常被高估了。其专业化趋向于减少基层行动主义的动员特征,同时建立一种新型的代理制度”〔25〕。弗雷德马克·托马斯关于加尔各答的著作指出,“此外,非政府组织本质上是保守的。其上层成员是退休的公务员和商人,

---

〔22〕 黛安娜·米特林:《市民社会与城市贫困调查情结》,载于《环境与城市化》(Diana Mitlin, “Civil Society and Urban Poverty-Examining Complex,”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001年10卷,第13期,第164页。

〔23〕 吕邦·卡佐利:《城市阿根廷民众组织的政治和制度语境》,载于《环境与城市化》(Rubén Gazzoli, “The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Urban Argentina,”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996年4月,第8期,第163页。

\* Frankenstein-like, 弗兰肯斯坦是玛丽·雪莱1818年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那个疯狂科学家的名字,他用许多碎尸块拼接成一个“人”,并用闪电将其激活。“弗兰肯斯坦”一词后来用以指代“顽固的人”或“人形怪物”,以及“脱离控制的造物”等。——译者注

〔24〕 莱亚·耶利内克:《成功重压下的崩溃:雅加达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载于《环境与城市化》(Lea Jellinek, “Collapsing under the Weight of Success: An NGO in Jakarta,”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003年4月,第15期,第171页。

〔25〕 巴亚特,收入罗伊和阿萨伊德编:《城市非正规化现象:来自中东、拉丁美洲和南亚的跨国观点》(Bayat in Roy and Al Sayyad (eds), *Urban Informality: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from the Middle East, Latin America, and South Asia*), 第80-81页。

下层成员是社会工人,受过教育的无职业人士、家庭主妇和其他并非扎根贫民窟的人士。”〔26〕

退役军人和孟买住房行动主义者 P. K. 达斯(P. K. Das)对贫民窟导向的非政府组织作了更为尖锐的批评:

它们通常的努力是破坏、蒙蔽和腐化人们,使他们远离阶级斗争。它们利用和繁殖对恩惠、同情和人道立场的乞求行为,而非唤醒人们对其权力被压迫的意识。事实上,这些机构和组织体系化地介入,以防止人们采用过激方式来赢取他们的要求。它们的努力经常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更大的帝国主义政治罪恶转移到仅仅是当地事务上来,混淆人们区分敌我的界限。〔27〕

达斯的抱怨被吉塔·维尔玛(Gita Verma)在其2002年的《贫民窟印度》(*Slumming India*)一书中详尽发挥为对于城市非政府组织著名模式的一种好斗的、斯威夫特式\*进攻。作为一个不同于她称之为“体系”的反抗的计划者和流亡者,维尔玛把非政府组织的特征描绘为“新阶级”中间人。它们受到国外博爱人士的赞扬,攫取贫民的话语权。她反对把贫民窟看作是一个永恒现实的世界银行贫民窟升级范例,也反对提出更极端要求的反拆迁运动。她说:“留下并非更大的特权……它可能会终止一些时不时发生的对抗,其余的,除了用一些印刷精美的创造性标语将标签从‘问题’改换到‘解决’而外没有任何超越。”她补充说,特别是德里,“‘解决贫民窟’实际上是对1/5到1/4居住在仅为5%城市土地上的城

〔26〕 托马斯:《加尔各答贫民》(Thomas, *Calcutta Poor*),第131页。

〔27〕 P. K. 达斯:《一个住房激进主义者的声明》,收入帕特尔和索纳编:《孟买》(P. K. Das, “*Manifesto of a Housing Activist*,” in *Patel and Thorner, Bombay*),第179-180页。

\* Swiftian, 乔纳森·斯威夫特,英国-爱尔兰作家。讽刺文学大师,以《格列佛游记》和《一只桶的故事》等作品闻名于世。——译者注

市人口的不平等的背书。”〔28〕

维尔玛的描述包括了对近年来在印度进行的两个最有名的贫民窟升级计划的爆炸性揭露。英国赞助的印多尔方案 (UK-sponsored Indore scheme)——曾荣获 1996 年第二届伊斯坦布尔人居会议奖 (Istanbul Habitat II) 和 1998 年的阿加·汗 (Aga Khan) 国际建筑奖——据称给城市贫民窟提供了个人饮水和下水道,但维尔玛说它是一种“假冒的成功,实际上是一场城市灾难。”尽管居住区现在有了下水道,但居民连饮用水都不够,更别提冲洗下水道的水,因此脏水经常泼在家和街道的背面;疟疾和霍乱盛行,居民开始死于受污染的水。维尔玛写道,每个夏天,计划受益人(或者,也许该称作计划波及人)都为更为短缺的用水、更令人烦恼的下水道、更多的疾病、更季节性的混乱和更多的原因而抱怨这一劣质计划的基础设施和低劣品质……”〔29〕

维尔玛同样痛斥了浪得虚名的亚兰重新安置计划 (Aranya resettlement Project): 计划仅仅重新安置了小部分拆迁户和擅自定居者,但确认了他们“贫民窟救星”的国际知名度。然而,在这一个案中,大多数计划的成就都仅仅是纸上谈兵。

然而,关于亚兰的真相是,使得其获奖的因素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没有镇中心、没有人行道绿化带,没有 4 万名贫民住在那儿。这些仅仅存在于亚兰的文献中,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欢呼的这个蓝图,这个设计创意,我们并不确信它是否会起作用,因为它还没有被检验过。〔30〕

即使是不如维尔玛尖锐的观察者们也都同意,尽管世界银行/非政府

---

〔28〕 吉塔·维尔玛:《贫民窟印度:贫民窟及其救星纪事》(Gita Verma, *Slumming India: A Chronicle of Slums and Their Saviours*), 新德里, 2002 年, 第 150-152 页。

〔29〕 同上书, 第 8-15, 33-35 页。

〔30〕 同上书, 第 90-91 页。

组织的贫民窟升级方案可能生产一些当地的成功故事,却把绝大部分贫民置于脑后。行动主义者和作家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发现,非政府组织的功能“仅限于与一个有压力的厨师亲切交谈。它们转移和升华政治愤怒以确保不会造就一个领头者。”〔31〕诸如“赋权”、“善治”等甜蜜的官方保证回避了全球不平等和债务等核心事件,最终它们只是掩盖缺乏任何缓解城市贫困宏观政策的语言游戏。也许对承诺与需要间巨大鸿沟的罪恶感解释了一些国际借贷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拥护赫尔南多·德·索托——已成为全球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导师的秘鲁商人——观念的热情。

正如约翰·特纳在1990年代的宣称一样,德·索托声称第三世界城市的饥荒,更多地不是因为缺乏投资和就业机会,而是因为人为造成的所有权短缺。德·索托宣称,通过挥舞土地所有权的魔杖,他的自由与民主学会(Institute for Liberty and Democracy; ILD)能够魔法般地使贫民窟把自己救出资本的泥淖。他主张,贫民实际上是富人。他们不能获得他们的财富(非正式部门房地产的改进)或将其变为流动资本,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正式的契约或所有权。他宣称,所有权将立即创造巨大的平等,而政府只需付出极少代价甚至无需任何代价;反过来,这种新财富的一部分将为缺乏信用的微型企业主提供资本以创造贫民窟的新就业机会,于是棚户区将变成“黄金地段”。他谈到“数以兆计的美元已经准备好投入使用,只要我们能解开资产如何被转化为活资本的神秘面纱”〔3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民众资本主义弥赛亚\*的德·索托,在实

---

〔31〕 阿兰达蒂·罗伊:《支票簿与巡弋导弹:阿兰达蒂·罗伊访谈录》(Arundhati Roy, *The Checkbook and the Cruise Missile: Conversation with Arundhati Roy*), 波士顿,2004年,第82页。

〔32〕 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奥秘: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取得了胜利而在其他地方遭到了失败》(Hernando de Soto,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纽约,2000年,第301-331页。

\* Messiah, 救世主。——译者注

践方面的建议仅只是非正式住房的所有权。而这正是拉丁美洲左翼或加尔各答(马克思主义的)印度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在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正如土地所有权专家杰弗里·佩恩(Geoffrey Payne)指出的那样,土地所有权是一把双刃剑。“对所有者而言,它代表了他们正式跻身于官方城市,以及实现资产急剧增加的机会。对房客或那些没有能力支付常常是随之而来的附加税的人而言,将把他们从住房的梯子上一把推下来。”换句话说,所有权加速了贫民窟的社会分层,而对救助房客(许多城市中绝大多数真正贫民)却毫无帮助。佩恩警告说,这甚至冒着“造就一个更大的下层阶级”的危险,“他们将完全没有任何形式的能够负担或可以获得的住房”。〔33〕

彼得·沃德承认,所有权——或者说是“正规化”——在墨西哥市已经成为对贫民窟的一种混合祈福。“这并不单是一种把完整的财产所有权扩展到贫民的方式,而且增加了一种把他们合并到课税基础中去的方式。”用住家来合法增加的利益被一种新的可见性税收和市政设施所抵消。通过把住房斗争私人化和给予具有所有权的私房房主利益以使得他们分化于其他贫民窟居民,正规化也消解了贫民窟内部的团结。沃德认为:“事实上,房客,疲倦的擅自定居者,无家可归的闹市区房客,可能比那些已经被政府通过一系列住房政策收买了的人更为激进并更有反政府示威运动的倾向。”〔34〕

这甚至就是圣保罗的事实,当地工党(Worker's Party, PT)政府从1989年开始,试图把贫民“巨大的非法城市”正规化和升级。尽管工党改革产生了一定值得赞扬的结果,在仔细研究过其当地影响之后,苏珊娜·塔施纳(Suzana Taschner)指出其相应的负面影响:“不幸的是,在升

---

〔33〕 杰弗里·佩恩,1989年未出版的报告,转引自艾伦·吉尔伯特和安·瓦利:《房东和房客:墨西哥城贫民的住房问题》(Geoffrey Payne, unpublished 1989 report, quoted in Alan Gilbert and Ann Varley, *Landlord and Tenant: Housing the Poor in Urban Mexico*),伦敦,1991年,第4页。

〔34〕 沃德:《墨西哥城》(Ward, *Mexico City*),第193页。

级过程中,房地产黑市一统贫民窟的天下。土地和房屋都成为消费品并价格飙升。”后果之一是塔施纳称作“贫民窟中的贫民窟”的出现,当擅自定居者的家被劣质公寓出租给贫民中最穷的人的单间所替代时。〔35〕换句话说,在房地产市场上,如果没有决定性的公众介入,所有权本身很难成为举起大量贫穷的城市居民财产的阿基米得(Archimedean)杠杆。

然而,德·索托式的万灵药方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仍然非常流行:所有权策略承诺了只需一支笔即可获得巨大社会效益,因此把生活退回世界银行已经放弃了的自助范式;它完全符合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反政府意识形态,包括银行当前对私人住房市场的政府便利及广大房主所有权推进的关注;这对政府而言同样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承诺了一些东西——如稳定、选票、税收等等——而几乎无需任何付出。菲利普·埃米斯(Philip Amis)指出:“对非法住房的接受是一种痛苦相对较少、有潜在收益可能的、能安抚第三世界城市贫民的方式。”〔36〕此外,正如地理学家艾伦·吉尔伯特(Alan Gilbert)和安·瓦利(Ann Varley)在拉丁美洲个案研究中强调的那样,这也是一种保守的阶级变革:“恰恰是自建房的本质进程有助于政局平定。广大私房房主已经个人化了,否则他们可能会组织一场超越社区范围的斗争。”〔37〕

沿着同样的思路,埃哈德·伯纳提供了一些来自马尼拉的、令人沮丧的例子:土地购买和所有权正规化已经产生了垂直的社会分层,并在一度极富战斗精神的擅自定居者运动内部制造了痛苦的竞争。他写道:

这样一个任务——确定土地社会价值,使其为成员们所接受以

---

〔35〕 苏珊娜·塔施纳:《巴西擅自定居区和贫民窟》,收入奥德里奇与桑胡:《城市贫民的住房问题》(Suzana Taschner, “Squatter Settlements and Slums in Brazil,” in Aldrich and Sandhu, *Housing the Urban Poor*), 第216-219页。

〔36〕 埃米斯:《内罗毕的商品房》(Amis, “Commercialized Housing in Nairobi,”), 第237页。

〔37〕 吉尔伯特和瓦利:《房东和房客》(Gilbert and Varley, *Landlord and Tenant*), 第11页。

及最终驱逐那些没有能力或不愿意为此付费的人——实际上是对每个当地协会的一种严峻考验。擅自定居者协会(squatter association, 简称 K-B)可能被误解为反体制“社会运动”的一部分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既然他们已经变成了土地拥有者,擅自定居者协会领导人认为他们与其他擅自定居者组织的联盟是没用的,并转而强调他们与政府机构的关系。〔38〕

## 贫困的利益

即便是在非政府组织和发展借贷组织胡乱修补“善治(good governance)”和增加贫民窟发展投资的情况下,更多强有力的市场力量正所向无敌地把大部分贫民推到城市生活更偏远的边缘。跨国慈善事业和其他国家调控的正面成就完全被土地通货膨胀和财产投机买卖的负面影响所抵消。正如我们在强占土地城市化例子中看到的那样,房地产市场开始向贫民窟报复。尽管有着长期以来的、英勇的擅自定居者和免费土地的神话,城市贫民仍不断沦为地主和开发商的附庸。

当然,利用贫民窟陋旧公寓索取高租金的恶劣房东习俗(slumlordism)是一个古代恶魔,其当代化身与其19世纪的前辈们不相上下。历史学家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在其对伦敦下东区(London's East End,维多利亚时代最大的贫民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描绘了一个恶性循环:房屋毁坏、租金涨价、过度拥挤和疾病。他发现“真正的高额利润不是来自于剧增的郊区住房投资,而是来自内城区域(年租金几乎与地产值相当的)高额租金(rack-renting)的暴涨。”〔39〕如圣伊莱斯(St. Giles)、白教堂区(Whitechapel)和贝斯纳格林(Bethnal Green)这

〔38〕 伯纳:《捍卫一块土地》(Berner, *Defending a Place*),第179页。

〔39〕 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被逐出伦敦的人们:维多利亚社会中的阶级关系研究》(Gareth Stedman Jones, *Outcast London: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es in Victorian Society*),伦敦,1971年,第209页。

样一些贫民窟吸引了贵族投资者以及有经济头脑的中产阶级。前者“对海外投资的高回报已经不抱希望”；而对后者而言，内城住房是“最流行和最容易的资本获利方式”。琼斯发现了伦敦社会的一个巨大横截面（cross-section）：从贫民窟公寓的大房东如托马斯·弗莱特（Thomas Flight，因从1.8万多户住房手中榨取租金而闻名）到小商人、退休的建筑商和人均拥有或出租一两套房子的教区委员都从伦敦东区的惨况中获利甚丰。”〔40〕

在有着“欧洲加尔各答”之称的、世纪末（Fin-de-siècle）的那不勒斯，情况也大同小异。当代观察者们对这一奇观感到惊异：一直在涨的租金来自越来越穷的贫民和处境更为悲惨的商号雇员（fondaci）及民宿房客（locande）。弗兰克·斯诺登在其对那不勒斯贫民的优秀研究中写道：

到本世纪末，租金已经翻了五番而城市居民变得越来越穷。此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每平米租金最高的是贫民窟中最破的房子。因为这些房子在绝对意义上花费最少，需求量最大。不幸的是，对贫民窟住房的需求随着不断增加的贫困而增长，因此进一步扭曲了影响那些至少能够付费的人的租金曲线。〔41〕

同样可憎和悖论的收益仍在压榨城市贫困。数代人以来，第三世界的乡村地主精英已经把他们自己变成了城市贫民窟房东。汉斯-迪特尔·埃弗斯（Hans-Dieter Evers）和吕格迪·科尔夫（Rüdiger Korff）写道：“实际上，不在场的地主所有制（absentee landlordism）在很大程度上是一

---

〔40〕 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被逐出伦敦的人们：维多利亚社会中的阶级关系研究》（Gareth Stedman Jones, *Outcast London: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es in Victorian Society*），伦敦，1971年，第212-213页。

〔41〕 弗兰克·斯诺登：《霍乱时期的那不勒斯，1884—1991》（Frank Snowden, *Naples in the Time of Cholera, 1884—1911*），剑桥，1995年，第39页。

个城市现象。”〔42〕拉丁美洲私房房主和合法化的擅自定居者相对广泛的基础与许多非洲和亚洲城市中地主所有制的巨大集中形成对比。在他们开创性的比较研究中,这两个德国研究者发现:在16个东南亚城市中,平均53%的土地为5%的大地主所拥有;与之相对照的则是德国城市中17%的土地为5%的大地主持有。〔43〕事实上,据埃哈德·伯纳所言,屈指可数的几个家族就拥有了几乎半个马尼拉。〔44〕

与此同时,在印度,大约3/4的城市空间为6%的房子所占据,孟买绝大部分空地控制在91个人的手中。〔45〕与此同时,正如埃伦·布伦南解释的那样,卡拉奇和其他大型巴基斯坦城市中土地投机与住房改革交织在一起:

卡拉奇政府试图通过限制单个人能够拥有的土地数量来控制投机。法律被家庭代理很容易地规避了。此外,卡拉奇的财产税和资本收益税使得投资者们占有了他们从未试图占据的土地。例如,1970年代卡拉奇发展规划局(Karachi Development Authority)26万个发展计划中的8-10万个被投资者攫取并闲置了十多年。〔46〕

此外,城市大领地(latifundia)的发展趋势紧紧地扎根于生产经济的

〔42〕 埃弗斯和科尔夫:《东南亚都市生活》(Evers and Korff, *Southeast Asian Urbanism*),第180页。

〔43〕 同上书,正如作者强调的那样,“尽管这一论题很重要,关于城市土地所有权的数据是非常稀少的。这与对于乡村地区土地所有权的研究形成尖锐对比。”(As the authors emphasize,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topic, data on urban land-ownership are extremely rare. This contrasts sharply with research on land tenure in rural areas.”),第184页。

〔44〕 伯纳:《捍卫一块土地》(Berner, *Defending a Place*),第21页。

〔45〕 巴肯和范·德·林登:《第三世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土地转让》(Baken and van der Linden, *Land Delivery for Low Income Groups in Third World Cities*),第13页。

〔46〕 布伦南:《第三世界所面临的的城市土地和住房问题》(Brennan, “Urban Land and Housing Issue Facing the Third World”),第78页。

危机和衰退中。大致说来,一度有这样—个时代:土地价值与经济增长和工业投资同时飚升。然而,1970年代末以来,当城市土地迅速成为国家存款的资本圈套,那种关系就解体了。债务危机、飞速通膨,以及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等一连串事件摧毁了刺激家庭工业和公共雇佣生产性投资的最大动机。反过来,结构调整计划为国内制造业和福利存款开辟了进入土地投机(land speculation)市场的道路。阿克拉政治经济学家夸铎·科纳杜-阿杰曼(Kwadwo Konadu-Agyemang)写道:“高通货膨胀率和大规模贬值阻碍了存款,并使得对未开发或部分开发土地的投资成为最安全和收益最高、而且能卖给外国资金的财产持有方式。”〔47〕

其结果是:在经济普遍停滞甚或衰退之际,房地产泡沫出现并保持坚挺。因此在伊斯坦布尔,正如恰拉尔·凯德尔指出的那样,“在1980年代通货膨胀情况下,房地产成为收益最高的部门……政治腐败、资本家开发与国际资金交互作用。”〔48〕在安卡拉,大量资金注入一夜建成区转换为高档公寓区的繁荣市场中。规划师厄泽勒姆·丁达尔(Özlem Dündar)解释说,旧一夜建成区的中心位置使得它们成为大型开发商们复兴和将日渐破败的市区改造为良好的中产阶级居住区(gentrification)的不可抗拒的目标,只有他们“有政治影响和资金能力来解决这些一夜建成区区域混乱的所有权问题”〔49〕。

在阿拉伯世界,正如珍妮特·阿布-卢格霍特(Janet Abu-Lughod)一直强调的那样,石油税收和海外盈利不是流入生产,“而是流入作为资本

---

〔47〕 夸铎·科纳杜-阿杰曼:《非洲城市发展和住房政治经济学:从殖民时代到1998年间加纳的经验》(Kwadwo Konadu-Agyema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Africa: Ghana's Experience from Colonial Times to 1998*), 西港,2001年,第123页。

〔48〕 凯德尔:《从非正规到全球化的住房市场》(Keyder, *The Housing Market from Informal to Global*), 第153页。

〔49〕 厄泽勒姆·丁达尔:《安卡拉的非正规住房》,载于《城市》(Özlem Dündar, “Informal Housing in Ankara”, *Cities*), 2001年,第18卷,第6期,第393页。

‘银行’的土地。这已经导致了土地投机的猖獗(这使得理性的城市规划化为泡影),极度膨胀的土地价值和(某些情况下)豪华套房的过多建造”〔50〕。在埃及的例子中,至少,1990年代城市土地的繁荣被银行部门和有政治背景的开发商们巨大的公共资助所强化。正如地理学家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在其对被称作“梦境”的开罗郊区的、引人注目的研究中解释的那样:

……结构调整趋向于催生一种出口繁荣,而不是一种建筑繁荣。埃及将因把水果和蔬菜卖到欧洲和海湾地区(the Gulf)而不是靠推平田地来兴建环形公路(ring road)而繁荣昌盛。但房地产现在已经取代农业成为埃及继制造业和旅游业之后的第三大非石油投资部门。事实上,它可能是最大的非石油部门,既然许多旅游业投资进入旅游村(tourist village)和度假村(vacation home)建筑——另一种形式的房地产行业。〔51〕

虽然开罗主城区已经在5年中扩大了一倍,新郊区向西延展到了沙漠,但住房危机仍然非常尖锐;对贫民而言,新房子太贵了;大部分房子都空着,因为其房主总是在沙特阿拉伯(Saudia Arabia)或海湾地区工作。杰弗里·内多罗谢克写道:“100万套以上的公寓仍然是空着的……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存在住房短缺的问题。事实上,开罗充满了只有一半住了人的建筑。”〔52〕

埃伦·布伦南解释说:“在达卡——世界上最穷的特大城市——可以

---

〔50〕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特:《阿拉伯世界与国际体系中的城市化》,收入古格勒:《发展中世界的城市》(Janet Abu-Lughod, “Urban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Gugler, *Cities of the Developing World*),第196页。

〔51〕 蒂莫西·米切尔:《梦境:你们渴望的新自由主义》,载于《中东报告》(Timothy Mitchell, “Dreamland: The Neoliberalism of Your Desires,” *Middle East Report*),1999年春,np (internet archive)

〔52〕 内多罗谢克:《死者之城》(Nedororscik, *The City of the Dead*),第42页。

看到密集的土地投机。大约 1/3 的国外汇款被用来购买土地。土地价格比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涨速快了 40% 到 60%，现在已经完全超出收入水平。”〔53〕另一个南亚的例子是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Colombo)，那儿的房地产价值在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间上涨了 1000 倍，大批年老的、贫穷的城市居民被赶到了城郊地区。〔54〕

与此同时，过度拥挤、摇摇欲坠的贫民窟住房的收益率高于其他类型的房地产投资。在巴西，许多中产阶级都是贫民窟房东，对几套廉价公寓的所有权使得许多专业人员和中层经理过上了科帕卡巴纳\* 式的生活。联合国人居署的研究者们惊讶地发现：“圣保罗廉价公寓每平米的租金大约比正规市场高出 90%。”〔55〕在基多，富有的地主把位于山脚下和陡峭沟壑的小块土地——经常高于 2850 米（市政系统能够用管道送水的最高高度）的限制——廉价出售给渴求土地的移民，使得居民们在此之后一直为获得市政服务而奋斗。〔56〕在对于波哥大“掠夺性住房市场”的讨论中，土地经济学家温贝托·莫利纳 (Umberto Molina) 宣称，投机商们在以“垄断价格”和巨额利润开发城市周边地带。〔57〕

---

〔53〕 布伦南：《第三世界所面临的土地和住房问题》(Brennan, "Urban Land and Housing Issue Facing the Third World"), 第 76 页。

〔54〕 达亚拉丁和萨马拉维克勒马：《授权社区》(Dyaratne and Samarawickrama, "Empowering Communities"), 第 102 页。

\* Capacabana, 里约热内卢著名的海滩, 像一轮弯月, 是里约热内卢市的标志之一。——译者注

〔55〕 费克斯、艾伦特斯和塔纳卡合著：《圣保罗，巴西》(Fix, Arantes and Tanaka, São Paulo, Brazil, ), 第 18 页。

〔56〕 格拉瑟：《厄瓜多尔不断增长的住房危机》(Glasser, "The Growing Housing Crisis in Ecuador"), 第 151 页。关于基多的情况, 参见格里特·布尔格瓦：《一个基多擅自定居区的历史》(Gerrit Burgwal, *Caciquismo, Paralelismo and Clientelism: The History of a Quito Squatter Settlement*), 阿姆斯特丹, 1993 年。

〔57〕 温贝托·莫利纳：《波哥大：城市土地市场的竞争与更替》，收入巴肯和范·德·林登所编书中 (Umberto Molina, "Bogotá: Competition and Substitution Between Urban Land Markets," in *Baken and van der Linden*), 第 300 页。

玛格丽特·派尔(Margaret Peil)在其关于拉各斯的著作中解释道：“这里的擅自定居……少于东非和拉丁美洲，因为政府对建筑的低水平控制意味着合法住房能够很容易和很划算地建造：安置贫民是桩好生意……是可得到的最安全投资，能产生迅速的资本回报。”〔58〕富裕一些的拉各斯地主们选择出租而不是出售土地，以保证他们仍然能够控制迅速增值的土地市场上的收益权。〔59〕如东非肯尼亚，政治家和传统的酋长们都是贫民窟住房大投机商中的知名人士。〔60〕

与此同时，内罗毕的贫民窟是许多为政治家和中产阶级上层所持有的、用于出租的种植园。尽管大部分私人租赁开发“没有正规的合法基础……财产权关系和所有权（因为一个腐败的政治体系）只在事实上存在。”〔61〕在玛萨瑞(Mathare)贫民窟4A区，2.8万人——最穷的贫民——租住着9米×12米的泥巴和篱笆(mud-and Wattle)棚屋。据一个交通部(Ministry of Road)研究者所言，不在场的地主们是“有实权的、强有力的幕后者，并经常是著名公众人物，那些与他们相勾结的人是非常富有的个人或公司”。〔62〕联合国研究者在另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内罗毕一个贫民窟中57%的房屋属于政治家和公务员，这些简陋木屋是城里收益率最高的房子。一个贫民窟房东花160美元购买一间100平方英

---

〔58〕 玛格丽特·派尔：《拉各斯：城市即人》(Margaret Peil, *Lagos: The City Is the People*)，伦敦，1991年，第146页。

〔59〕 玛格丽特·派尔：《西非以英语为母语之人的城市住房与服务》，收入哈密什·梅因和斯蒂芬·威廉斯：《第三世界的环境与住房》(Margaret Peil, "Urban Housing and Services in Anglophone West Africa," in Hamish Main and Stephen Williams (eds), *Environment and Housing in third World Cities*)，切切斯特，第176页。

〔60〕 德拉卡克斯-史密斯：《第三世界城市》(Drakakis-Smith, *Third World Cities*)，第146页。

〔61〕 埃米斯：《内罗毕的商业出租房》(Amis, "Commercialized Rental Housing in Nairobi")，第245页。

〔62〕 帕特里克·瓦西克：“内罗毕大型非正规居住区的重建”，道路与公共事务部(Patrick Wasike, "The Redevelopment of Large Informal Settlements in Nairobi," Ministry of Roads and Public Works)肯尼亚，nd.

尺的简陋木屋,可以在数月内收回全部投资。”〔63〕

正如内罗毕的这些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土地投机甚至能够在官方的公共领域中兴旺发达——埃及、巴基斯坦、中国和西非国家马里提供了另外一些极坏的例子。建筑规划师哈立德·阿扎姆(Khaled Adham)写道,在开罗主城区,“一些公共土地的廉价出售给开罗周边沙漠向私人所有权的转换提供了方便。”他补充说,受益者是“一个新兴的、越来越多地联系着国家和跨国公司的企业主阶层”。据传闻,穆巴拉克(Mubarak)政权的高层人员在开发位于吉萨金字塔(Giza Pyramids)附近沙漠西部郊区的公司中有着隐形利益。〔64〕

卡拉奇周边是被认为控制在卡拉奇发展局(Karachi Development Authority)手中的公共土地。然而,据彼得·涅尼德(Peter Nientied)和让·范·德·林登所言,“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土地方面已经完全失败了”,正如前面已经提到那样,城市周边土地已经被公共官员、腐败的警察和被称为 Dalals 的中间人非法地瓜分了。最后,贫民窟居民除了最低限度的赞助外没有别的办法。“既然整个操作是非法的,需求明显地总是为着好恶,而不是为着是非。”〔65〕同样地,在海得拉巴,据埃哈德·伯纳研究,“土地攫取者们与公路局相勾结”,篡改了重新安置贫民的计划,向居民勒索非法费用并窃取大片公共用地。伯纳解释说,“警察站在财团一边并

---

〔63〕 “靠几个硬币为生”,《洛杉矶时报》,第四版(Cited in Davan Maharaj, “Living on Pennies,” part four, *Los Angeles Times*), 2004年7月14日。

〔64〕 哈立德·阿扎姆:《开罗的城市似曾相识感》,收入亚西尔·埃尔斯海西塔维编:《中东城市规划:全球化世界中的城市万花筒》(Khaled Adham, “Cairo’s Urban Déjà vu,” in Yasser Elsheshtawy (ed.), *Planning Middle Eastern Cities: An Urban Kaleidoscop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65〕 彼得·尼安提德和让·范·德·林登:《卡拉锡政府在供应合法和非法土地中的作用》,收入巴肯和范·德·林登:《第三世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土地转让》(Peter Nientied and Jan Van der Linden,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Supply of Legal and Illegal Land in Karachi,” in Baken and van der Linden, *Land Delivery for Low Income Groups in Third World Cities*), 第230, 237-238页。

开始烦扰居民们时,情况恶化了。”〔66〕

与此同时,城市周边土地的非法投机已经成为中国官员腐败的基本形式之一。《纽约时报》报道,“在富裕的浙江省一个村子,农民们获得的土地补偿仅为3040元/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城市官员按122000元/亩的价格把同一块土地转让给开发商。”一个老农抱怨“官员们把土地给了开发商,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山西的情况也大致相似,一名女抗议者被一名官员呵斥:“你个烂农民还想反抗市政府?你就是到死也不会有机会。”〔67〕

在巴马科(Bamako),公有土地与市场土地共存。既然需求量增加了,城市周边土地,被认为应该依照习惯法按户头细分。实际上,在卡拉奇,新兴官僚集团劫持了这一体系。研究者奥古斯特·范·韦斯顿(August Van Westen)发现,“2/3专门划拨的土地被用于投机性转让而非安顿原来的土地所有者家庭。问题在于两种互相抵触的土地供应模式的并存——一种是正规的平均主义公共分配体制,另一种是已经注册了土地所有权的纯粹商业市场——使得投机者非常容易获取潜在利益。”商人和公务员把他们自己变成地主,而比率不断增加的人口成为房客或“由政党建设部门政治持有并赎回的……非法居住区”的占据者。〔68〕

最后,违章建房甚至能够成为精英们操纵土地价值的一个秘密策略。在其1970年代关于利马的著作中,地理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描绘了擅自定居者们如何被地主们当成城市开路先锋来

---

〔66〕 伯纳:《向非正规市场学习》(Berner, “Learn from Informal Markets,”),第241页。

〔67〕 《被繁荣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踢到一边的农民》,载于《纽约时报》(“Farmers Being Moved Aside by China’s Booming Market in Real Estate,” *New Yorker Times*), 2004年12月8日。

〔68〕 奥古斯特·范·韦斯顿:《针对低收入住房的土地供应:巴马科》,收入鲍罗什和范·德·林登编:《第三世界城市土地供应体制的变革》(August Van Westen, “Land supply for Low-income Housing: Bamako,” in Baróss and Van der Lind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nd Supply Systems in Third World Cities*),第93,101-102页。

利用。

地主和私人开发商常常操纵擅自定居者以迫使部分土地进入房地产市场,通过从市政当局那里为擅自定居者们获得一些市政设施,以此提高土地价值并为有利可图的房屋建筑扫清道路。在第二阶段,擅自定居者们被逐出他们曾占据过的土地,并被迫再次冲击因为他们的努力而不断扩展的城市边界。〔69〕

最近以来,埃哈德·伯纳在马尼拉发现“被容忍的强占(tolerated invasions)”的同样进程,那儿的擅自定居者们“非法占用山坡上的营房、边缘的土地或房屋用地上的沼泽地”,因此为驱逐房客或提高租金的所有者们抬高了土地价值。〔70〕

## 城市边界的终点?

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看到的那样,无论是作为受害者或是英雄,擅自定居者仍然是第三世界城市主要的人类象征。擅自定居的黄金时代——免费或低价占据城市周边土地——到1990年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事实上,早在1984年,一群顶级的住房专家在曼谷举行会议,警告“不付任何代价的土地占据是一种临时现象,(对住房危机)非正式解决的选择自由已经减少,将很快出现更多由强有力的、联合一致的私人组织控制的边缘城市化。”在他们看来,可转换的土地所有权的正式化(区别于所有权安全)实际上正在加速企业主们避税或腐败的进程。这一规划进程能使得

---

〔69〕 曼纽尔·卡斯特尔:《城市与基层:都市社会运动中的跨文化理论》(Manuel Castells,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纽约, 1983年, 第191页。

〔70〕 伯纳:《向非正规市场学习》(Berner, “Learning from Informal markets”), 第234-235页。

擅自定居私有化。〔71〕

几年后,艾伦·布伦南重复了同样的警告:“许多先前提供给低收入人群的解决办法,比如没有使用过的公共用地等,正在迅速消失。即便是边缘的土地也正变得不断受到限制。实际上,城市周边和其他地方的空地正被开发商合法或非法地集中开发。”布伦南发现,在城市土地大部分属于公共所有的地方(卡拉奇和德里),以及城市周边大部分是私人财产的地方(马尼拉、首尔和曼谷),问题都同样尖锐。〔72〕

在同一时期,艾伦·吉尔伯特带着不断增长的乐观主义而写作,他把擅自定居和自建房看作拉丁美洲城市社会冲突的未来安全阀。他预测,强占土地的城市化、经济停滞和交通成本的集合将使得边缘郊区和棚户区的私房所有权不如过去那样有吸引力:“更多的家庭将占据更小的地盘,将花更长的时间来统一他们的家庭,将被迫在没有任何公共服务设施的情况下生活更长时间。”〔73〕尽管他强调边缘的房地产市场仍然为中产阶级家庭提供了一种价格超过他们先前居住地的重要替代,另一个土地管理的世界权威阿兰·迪朗-拉舍维(Alain Durhand-Lasserve),还是同意布伦南和吉尔伯特的观点:商业化已经“排除了真正的贫民们先前所享有的、非正式和几乎是免费地获得土地的权利。”〔74〕

各地最有权的当地利益者——大开发商、政治家和军人集团——使他们自己从针对贫困移民和工薪族的边缘土地买卖中捞到好处。例如,

---

〔71〕 鲍罗什和范·德·林登:《导言》,收入《第三世界城市土地供应体制的变革》(Baróss and Van der Linden, “Introduc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nd Supply Systems in Third World Cities*),第1、2、8页。

〔72〕 布伦南:《第三世界所面临的土地和住房问题》(Brennan, “Urban Land and Housing Issue Facing the Third World”),第75-76页。

〔73〕 吉尔伯特等:《寻找一个家》(Gilbert et al., *In Search of a Home*),第3页。

〔74〕 阿兰·迪朗-拉舍维:《发展中国家正规和非正规土地市场的结合点:问题和趋势》,收入鲍罗什和范·德·林登:《第三世界城市土地供应体制的变革》(Alain Durhand-Lasserve, “Articulation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Land Markets in C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ssues and Trends,” in Baróss and Van der Lind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nd Supply Systems in Third World Cities*),第50页。

雅加达边缘土地所有权的一个例子揭示了“大片土地,特别是在勃良安(Priangan)山区,都已经几度易主,如今属于印度尼西亚将军们及其家庭、政府高官和印度尼西亚社会上层的其他成员。”〔75〕基思·佩佐利(Keith Pezzoli)发现,墨西哥市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大多数贫民窟居住区如今都从埃基多(乡村社区)那儿分割出来,“埃基多所有制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取代,开发商和投机商联合控制了拆建土地。”〔76〕在波哥大,大开发商把中产阶级居住区移植到边缘,城市周边土地的价值暴涨到超出贫民的承受力;而在巴西,投机分子攫取各种类型的土地,估计有1/3的建筑空间被闲置以满足未来增长的预期需要。〔77〕

在中国,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城市周边已经成为一个市政府与贫困农民相竞争的竞技场,而政府在这一竞争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在开发办对经济区和郊区新土地永不满足的胃口面前,农民们被最低限度的补偿费推到一边;与此同时,经常是为了满足腐败官员和领导的利益,传统工人阶级居住区和乡村经常被夷为平地以进行更高档的开发。当地人的抗议在遭遇警察和面临被捕的威胁时就停止了。〔78〕

与此同时,在疯涨的土地价值使得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拥有正式住房的情况下,马尼拉贫民们被迫采取非法行为。城市环境历史学家格雷格·班科夫(Greg Bankoff)报道说:“1980年代,奎松城\*的土地价格涨了35到40倍,马卡蒂\*\*涨了50到80倍,蒂利曼(Diliman)涨了250到400倍,在埃斯科尔塔(Escolta)涨了惊人的2000倍。1996年,中心商务

〔75〕 埃弗斯和科尔夫:《东南亚都市主义》(Evers and Korff, *Southeast Asian Urbanism*),第176页。

〔76〕 佩佐利:《人居》(Pezzoli, *Human Settlements*),第15页。

〔77〕 吉尔伯特和瓦利:《房东与房客》(Gilbert and Varley, *Landlord and Tenant*),第3,5页。

〔78〕 参见2004年12月8日《纽约时报》第5版,吉姆·亚拉德利关于中国城乡不平等问题的杰出论述。(see the fifth installment in Jim Yardley's outstanding series on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hina in the *New York Times*, 8 December 2004)

\* Quezon city, 菲律宾吕宋岛西南部城市。——译者注

\*\* Makati, 菲律宾的金融重镇。——译者注

区土地价值年度增幅为 50%，而周边土地增幅为 25%。”〔79〕其结果是，正式住房对数千万贫民而言是无法企及的。甚至连偏远的城边土地都在疯涨，对马尼拉最穷的人而言，仅有的选择是冒着生命危险呆在伊斯特诺斯(esteros)河床上的城市泄洪区或危险的河岸擅自定居区，或占据暴力冲突时产生的更宽的村落\*空隙。

于是，整个第三世界，贫穷的擅自定居者们获得免费土地的约翰·特纳时代已经结束了：“希望的贫民窟”已经被城市大领地(Latifundia)和“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所取代。接下来，边缘非市场住宅机会的限制或关闭对城市贫民稳定性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房客比率的不断上升，短期内最引人注目的后果是第三世界贫民窟一直暴增的人口密度——正式就业停滞或下降背景之下，土地价格的膨胀已经成为推动人口压缩的活塞。现代超大贫民窟——如内罗毕的克比拉(Kibera)和太子港(Port-au-Prince)的“太阳城”(Cité-Soleil)——其人口密度堪与养牛场相比。每个低层建筑里挤着越来越多的人，拥挤程度超过了著名的拥挤公寓区——如 1990 年代的下东区(Lower East Side)或当代高楼林立的中心如东京和曼哈顿市中心。实际上，亚洲最大的当代贫民窟——孟买的达拉维(Dharavi)——有着最高的人口密度。罗伊·卢博夫(Roy Lubove)认为 19 世纪纽约和孟买街道人口密度是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地

〔79〕 格雷格·班科夫：《建筑弱点：马尼拉洪灾的历史、本质和社会生成》，载于《灾难》(Greg Bankoff, “Constructing Vulnerability: The Historical, Natural and Social Generation of Flooding in Metropolitan Manila,” *Disasters*), 2003 年底 27 期, 第 3 卷, 第 232 页。

\* barangay (balagay), 在菲律宾语中可以解释为 village, 和它意思相同的有 nayan baryo 等, 是菲律宾语中表达“村、区、街区、镇”等的词, 也是菲律宾最小的地方政府单位。——译者注

\*\* Crony capitalism,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 Crony capitalism (裙带资本主义) 一词在学术界和媒体中迅速流行起来, 它又被称为“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保罗·克鲁格里将它定义为“商界和政府通过合作使国民福利最大化”。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这种合作固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的力量引到最利于经济发展的途径上, 但随着日积月累, 它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的“道德风险”。按吴敬琏、钱颖一等人的理解, 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 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迅速致富, 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 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种种方式大加阻挠。——译者注

球上最拥挤的地方”的两倍以上。〔80〕

这种由于不断拥入而导致的城市人口爆炸和过度拥挤几乎是对官方谎言的公然蔑视。例如,在加尔各答的贫民窟,平均 13.4 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如果市政统计数据是可靠的,达拉维每亩地上 10 × 15 米的房间里挤了 1.8 万人,形成了另一个人口密度高峰。〔81〕曼西耶特-纳赛尔贫民窟(Manshiyet Naser)位于尼罗河东边穆盖塔姆山(Muqattam Hills)山脚下,拥挤程度仅仅略低一点点:50 多万人挤在 350 公顷土地上。〔在其南部边缘,据《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报道,在“但丁式降格”\* 的状况下,著名的萨巴林贫民窟居民(Zaballeen)以捡垃圾为生。〕〔82〕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擅自定居的土地,里奥的贫民窟正在迅速被曼哈顿化(Mahattanized),因此萌生了对出租房的需要。苏珊娜·塔施纳写道:“我们能看到,随着里奥贫民窟的边缘化,那些四五层高的最破旧的房子,从上到下都用来出租。”〔83〕

由于边缘开发的商业化,高密度在周边地区 and 市中心已经变得几乎同样普遍。例如,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Caracas),贫民窟的密度几乎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在山脚的贫民窟密度更是直线上升。哥伦比

---

〔80〕 “第 11 区某些区域每平方公里土地上有 243,641 人,而孟买的库姆巴瓦纳贫民窟是每平方公里 187,722 人”,收入罗伊·卢博夫:《进步与贫民窟:纽约市 1890—1917 年廉租房改革》(“A Certain district of the eleventh ward had 243,641 people per square kilometer, and Koombarwara in Bombay, 187,722.” Roy Lubove, *The Progressives and the Slums: Tenement House Reform in New York City, 1890 - 1917*), 匹兹堡, 1962 年,第 94 页。

〔81〕 夏尔马:《重新发现达拉维》(Sharma, *Rediscovering Dharavi*), 第 20, 27 章, 第 18 页。

\* *Dantesque degradation*) 但丁《神曲》的叙述顺序是:地狱—炼狱—天堂,悲惨程度依次降低。——译者注

〔82〕 詹姆斯·德拉蒙德:《为更好的未来而提供抵押》,载于《金融时报》(James Drummond, “Providing Collateral for a Better Future,” *Financial Times*), 2001 年 10 月 18 日。

〔83〕 苏珊娜·塔施纳:《巴西擅自定居区和贫民窟》(Suzana Taschner, “Squatter Settlement and Slums in Brazil”), 第 196, 219 页。

亚大学科学家们在研究城市山崩危害时,为日渐贫穷的委内瑞拉人所面临的爬坡挑战而震惊。“实际上,一些居民被迫爬相当于25楼的高度才能到达他们的简陋住房(rancho house),而普通的贫民窟居民需要步行将近30分钟才能到公共交通站点。”〔84〕在波哥大,向南扩展的贫困区已经保持了很高的密度,尽管许多房子不断向周边扩展。〔85〕

拉各斯最大的贫民窟阿伊冈勒是世界上最糟的例子:过度拥挤并极端边缘。1972年,阿伊冈勒在8平方公里的沼泽地上容纳了9万人;今天,150万人住在略大一点的土地上,平均每天花3小时往返工作地点。〔86〕同样,在超级拥挤的内罗毕贫民窟克比拉,80万人在稀泥和污水中为尊严而奋斗,贫民窟居民们被(鸽子笼般的棚屋)暴涨的租金和不断上升的交通费压得喘不过气来。联合国人居署的作者罗斯娜·瓦拉锡(Rasna Warah)引用了一个典型的克比拉居民的案例:一名蔬菜小贩,要花费他月收入(21美元)的一半左右在往返市内市场的交通上。〔87〕

在人口众多但缺乏工作机会的都市中,住房和下一代城市土地的商品化是这一怪圈——先前所描绘的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伦敦和那不勒斯不断暴涨的租金和过度拥挤——的理论处方。换句话说,世界银行目前用作第三世界城市住房危机解决方案的市场力量正是同一危机的经典教唆者,但市场很少单独起作用。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思索南部城市中关于城市空间的阶级斗争,以及土地商品化过程中国家暴力的作用。埃哈德·

〔84〕 城市规划研究院:《加拉加斯的灾难防御》(Urban Planning Studio, *Disaster Resistant Caracas*),第27页。

〔85〕 穆罕:《理解发展中的大都市》(Mohan,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ing Metropolis*),第55页。

〔86〕 派尔:《拉各斯》(Peil, *Lagos*),第178页;派尔:《西非英语地区的城市住房与服务》(Peil, “Urban Housing and Services in Anglophone West Africa”),第180页。

〔87〕 罗斯娜·瓦拉锡:“内罗毕的贫民窟:那儿的生活对妇女而言是龌龊、残酷和短暂的”,载于联合国人居署:《论争》(Rasna Warah, “Nairobi’s Slums: Where Life for Women is Nasty, Brutish and short,” UN-HABITAT, *Debate*), 2002年9月,第8期,第3页。

伯纳酸楚而又准确地发现：“请注意：政府在毁坏大众住房方面比建筑大众住房更有效率。”〔88〕

---

〔88〕 伯纳：《向非正规市场学习》(Berner, “Learning from Informal markets,”)，第 230 页。

## 第五章 热带地区的奥斯曼

---

城市贫民窟的根子

不在城市贫民而在城市富人

——吉塔·维尔玛〔1〕

第三世界的城市不平等即使从空间上看也是显而易见的：内罗毕的卫星侦察显示，半数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 18% 的土地上。〔2〕当然，这暗示着人口密度的巨大对比。新闻记者吉万·瓦萨迦 (Jeevan Vasagar) 在《卫报》(Guardian) 上写道：“内罗毕(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城市之一)的贫富悬殊，被其居住区分布严酷地展示出来。据 1999 年的人口普查，在克伦邦(Karen)森林茂密的郊区，每平方英里只有不到 360 个居民；而在克比拉同样大小的区域内则居住了 8 万人。”〔3〕但内罗毕并非唯一

---

〔1〕 吉塔·维尔玛：《贫民窟印度》(Gita Verma, *Slumming India*)，第 19 页。

〔2〕 G. 斯塔托瑞、G. 南布里尼和 F. 斯托弗：“据航拍照片和卫星图像估计的城市非正规居住区和人口增长情况监测”，载于日内瓦基金会《临时报告 6》(G. Startori, G. Nembrini, and F. Stauffer, “Monitoring of Urban Growth of Informal Settlements and Population Estimation from Aerial Photography and Satellite Imaging,” Occasional Paper #6, Geneva Foundation)，2002 年 6 月。

〔3〕 吉万·瓦萨迦：《推土机参与清理肯尼亚贫民窟城市》，载于《卫报》(Jeevan Vasagar, “Bulldozers Go in To Clear Kenya’s Slum City,” *Guardian*)，2004 年 4 月 20 日。

强迫贫民住到蚁冢般 (anthill-like) 拥挤的贫民窟中,而富人则享有花园和开放空间的城市。在达卡,70%左右的人口集中在仅为20%的地域中。〔4〕同样,在圣多明戈\*,2/3的人住在仅占1/5城市空间的廉价公寓和擅自定居区中;市中心贫民窟中最穷的18%挤在城市1.6%区域中。〔5〕一些城市地图表明,孟买的不平等可能是最极端的:“富人拥有90%的土地、舒适地居住在有许多开放空间的地区,与此同时,贫民却挤在10%的土地上。”〔6〕

这些土地使用和人口密度的两极分化模式重述了帝国控制和种族统治的旧有逻辑。整个第三世界,后殖民精英们继承并贪婪地再现了种族隔离时代殖民城市的实际足迹。尽管采用了民族解放和社会公正的修辞学,他们仍然激进地采用殖民时代的种族区划以维护他们自己的阶级特权和空间排他性。

---

〔4〕 谢哈布丁·马哈茂德和乌穆特·杜亚尔-基纳斯特:《土耳其与孟加拉国的自发居住区:一夜建成区和贫民窟出现的先决条件及环境质量》,载于《城市》(Shihabuddin Mahmud and Umut Duyar-Kienast, “Spontaneous Settlements in Turkey and Bangladesh: Preconditions of Emergence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Gecekondu Settlement and Bustees,” *Cities*)18:4(2001),第272页。

· \* Santo Domingo, 多米尼加首都及海港城市。——译者注

〔5〕 埃德蒙多·莫雷尔和曼努埃尔·梅希亚:《多米尼加共和国》,收入安东尼奥·阿苏埃拉、艾米尼奥·杜豪和恩里克·奥蒂茨编:《驱逐与居住权:加拿大、智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南非和韩国的经验》(Edmundo Morel and Manuel Mejía, “The Dominican Republic,” in Antonio Azuela, Emilio Duhau, and Enrique Ortiz, *Evictions and the Rights to Housing: Experience from Canada, Chile, The Dominican Republic, South Africa, and South Korea*),渥太华,1998年,第90页;费与华伦斯坦:“守住一个人头顶上的屋檐”(Fay and Wellenstein, “Keeping a Roof Over One’s Head”),第97页。

〔6〕 奥·赫尔、艾伯特和巴克:《孟买贫民窟住房政策评论》(O’Hare, Abbott, and Barke, “A Review of Slum Housing Policies in Mumbai”),第276页。阿尔琼·阿帕杜莱提供的一个图表显示:600万穷人居住在仅为城市土地8%的区域中。(“深层民主:城市的政府至上性与政治视野,”载于《环境与城市化》13:2)[Arjun Appadurai gives the figure of 6 million poor people on only 8 percent of the city’s land area. (“Deep Democracy: Urban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Horizon of Politics,”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3: 2)],2001年10月,第27页。

不用奇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是极端的例子。夸铎·科纳杜-阿杰曼(Kwawo Konadu-Agyemang)写道:“在阿克拉,本土精英(在独立后)占据了‘欧洲人的位置’,并因此攫取了所有利益。他们不仅维持了现状,还通过区划和其他规划机制创造了另外一些取决于收入、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层阶级居住区。”〔7〕同样,在卢萨卡,殖民样板为政府官员和来自他们更贫穷同胞中的非洲专业人士提供了一个几乎是总体种族隔离的基础。哈拉雷的政治家和公务员在1980年后搬进了白人郊区和花园城市,他们在维持旧政治和社会体制(ancien régime)的空间障碍和居住特权方面有着更多的利害关系。〔8〕开普敦地理学家尼尔·迪尤尔(Neil Dewar)写道,“这些黑人运动产生了一种显著影响:进一步影响到社会主义住宅分配体系的最终完成。”〔9〕

与此同时,在金沙萨,蒙博托政府领导下的“扎伊尔化(Zaireanization)”对消除(新兴政客们继承的)白人城市(La Ville of the blancs)与黑人城市(La Cité of the Noirs)的巨大鸿沟毫无用处。另一方面,利隆圭\*是一个为展示马拉维独立而建造的新兴城市;然而它坚持一种殖民模式的都市控制。据艾伦·霍华德(Allen Howard)所言,“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Hastings Kamuzu Banda)总统监督其建设并让南非白人和

---

〔7〕 夸铎·科纳杜-阿杰曼:《非洲城市发展与住房政治经济学》(Kwawo Konadu-Agyema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Africa*),第73页。

〔8〕 艾莉森·布朗:《津巴布韦城市贫民的城市: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资源的都市空间》,收入卫定达和伊德合编:《城市与发展》(Alison Brown, “Cities for the Urban Poor in Zimbabwe: Urban Space as a Resour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Westendorff and Eade, *Development and Cities*, ),第269页;沙洛·姆温巴“津巴布韦城镇规划的殖民遗产”,非洲规划2002年年会论文(Chalo Mwimba, “The Colonial Legacy of Town Planning in Zambia,” Paper, Planning Africa 2002 Conference),第6页。

〔9〕 尼尔·迪尤尔:《哈拉雷:南非未来的窗口?》收入安东尼·雷蒙编:《分隔的家: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都市》(Neil Dewar, “Harare: A Window on the Future for the South African City?” in Anthony Lemon (ed.), *Homes Apart: South Africa's Segregated Cities*),开普敦,1991年,第198页。

\* Lilongwe, 马拉维共和国首都。——译者注

其他欧洲人来管理规划。结果是种族隔离政策式 (apartheid-like) 的隔离模式、‘封闭化管理’的居住区和防护带 (buffer zone)。”〔10〕与此同时,罗安达两极分化为葡萄牙人移交给新贵们 (novos ricos) 的“柏油 (asphalt)”城市与城市周边灰尘漫天的贫民窟和平民社区 (musseques)。即便是亚的斯亚贝巴\*, 一个有着土生土长源头的、相对新兴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城市,在今天的经济隔离形式中仍然保留了其短暂的意大利占领期 (1936—1941) 的种族主义印记。

在印度,独立对调整殖民时期的排斥性地理学毫无用处。卡尔帕纳·夏尔马 (Kalpana Sharma) 在其关于亚洲最大贫民窟的书《重新发现达拉维》(Rediscovering Dharavi) 中强调,“把孟买限定为一个殖民港口城镇的不平等正在继续。……投资总是被用来美化城里有着天然优势的部分。但没有任何资金来提供即便是最基本的服务设施给穷一点地区。”〔11〕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印度城市而言,南迪尼·古普图 (Nandini Gooptu) 展示了“社会主义”国大党 (Congress Party) 中产阶级——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抽象地赞美贫穷的普通人 (garib janata)——在独立后摇身一变为城市排斥和隔离的殖民设计的热忱维护者。古普图写道:“暗示或明确地,贫民被否定了在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中的位置,被看作日后社会进步和改善的障碍。”〔12〕

## 消除“人类拖累”

城市隔离政策不仅是一个冷酷的现状,而更是一场无穷无尽的社会

---

〔10〕 艾伦·霍华德:《非洲城市:过去与现在》,载于《加拿大非洲研究杂志》(Allen Howard, “Cities in Africa, Past and Present,”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37: 2/3), 2003 年,第 206 页。

\* Addis Ababa, 埃塞俄比亚首都。——译者注

〔11〕 夏尔马:《重新发现达拉维》(Sharma, *Rediscovering Dharavi*), 第 8 页。

〔12〕 古普图:《21 世纪印度城市贫民的政治》(Gooptu, *The Politics of the Urban Poor in Twentieth-Century India*), 第 421 页。

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国家时时以“进步”、“美化”甚至“对贫民的社会公正”等名义介入其中,重新划定空间边界以保护土地所有者、外国投资者、私房房主精英和中等阶层上班族的利益。如1860年代的巴黎,在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的狂热统治下,城市发展仍然在努力同时保证最大限度的私人利益和社会控制。当代的人口迁移规模是巨大的:每年数以千计的,有时是上百万的贫民——合法房客和擅自定居者——被强行逐出第三世界的居住区。其结果是,城市贫民成了流浪者,“处在一种永恒流浪状态中的短暂过客”。(正如规划师通德·阿博拉(Tunde Agbola)对他自己祖国拉各斯城市贫民困境的描绘)。<sup>[13]</sup>正如被奥斯曼从他们古老的街区(quartiers)中逐出的无裤党\*——布朗基(Blanqui)省略了一个对他的著名抱怨——他们“厌倦了大屠杀……这种暴君手中的花招”<sup>[14]</sup>。他们也对现代化把他们界定为“人类拖累”(引自在1970年代把9万居民逐出中心的都市外围贫民窟(Bidonvilles)的达喀尔当局)的古老语言愤怒不已。<sup>[15]</sup>

当然,城市空间最集中的阶级冲突发生在城市商业区和主要的城市交叉点上。在一个案例研究中,埃哈德·伯纳讨论了马尼拉的例子,

---

[13] 通德·阿博拉:《恐怖建筑学》(Tunde Agbola, *Architecture of Fear*), 伊巴丹, 1997年, 第51页。

\* sans-culottes, 据黄仁宇先生的解释,“雅各宾所动员之群众称为 sans culottes, 直译为‘不穿马裤之人’, 以别于18世纪中等以上的装束。我们不妨称之为‘无裤党’。巴黎之无裤党, 以小商店老板及独立营业之技工领头。但是他们动辄在街头聚集数万人, 而巴黎人口以户计半数为佣工, 所以当中不可能没有长期的佣工与短期的雇工参与行列。”(《资本主义与21世纪》, 第七章“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11月, 第2版)——译者注

[14] 奥古斯特·布朗基:《工人之都》(1885), 转引自瓦尔特·本雅明:《拱廊计划》(Auguste Blanqui “Capital er Travail” (1885), quoted in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剑桥, 2002年, 第144页。

[15] 理查德·斯特伦:《非洲的城市住房》(Richard Stren, “Urban Housing in Africa.”), 第38页。

那儿的全球化财产价值与贫民对靠近市中心收入来源的绝望需要相抵触。

马尼拉主城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之一。商业中心附近任何地方的每平米价格都远远超过了任何卡车司机或保安的年收入。然而,正是获得收入的(income-generating)可能性要求人们呆在离工作地点更近的地方,因为距离工作地点的距离意味着在时间和金钱上的巨大浪费……这一逻辑导致了广泛的擅自定居。最终,所有被城市发展所留下的空地都立即被打破任何人口密度记录的临时居住区填满。〔16〕

街头小贩和其他非正规私营企业主们也挤满了马尼拉的中心广场、街道拐角和公园。伯纳描述了市场机制甚或私人保安对这种贫民入侵行为的束手无策,毕竟,他们仅仅是表现得像理性经济参与者——最后,土地所有者们依靠国家暴力来把擅自定居者和小贩们限制在海湾地区,并帮助驱逐剩余的工人阶级房客和廉价公寓房客。

不管其政治复杂性及其对在它们周边擅自定居和非正式居住区的忍耐程度有多么不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市政府都永远锁定与核心区域贫民的冲突。在一些城市——里奥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贫民窟清理已经进行了好几代人的时间,但在1970年代地价暴涨时遭到了不可抵抗的冲击。一些国际大都市——开罗、孟买、德里和墨西哥市,这里仅列了几个——政府建立了卫星城市以诱使贫困居民重新安置在边缘地区,但大多数情况下,新兴城镇挤满了来自临近乡村的更多人口(或新孟买例子中的中层上班族),而原来的城市贫民绝望地抓住靠市中心工作地点和服务区域稍近一些的居住区。其结果是,擅自定居者和房

---

〔16〕 伯纳:《捍卫一块土地》(Berner, *Defending a Place*),第15页。

客,有时甚至是小房东,被例行驱逐,仅仅给予很少的客套、补偿或上诉权。在第三世界大城市中,“奥斯曼”的强制性全景监控(Panoptican)角色往往由那些受海外信贷机构如世界银行等支持而无视当地否决权、有着特定目的的发展机构扮演。他们的指令是清理、建筑和保卫——处于未满足的城市需要和广泛不发达地区中的——网络现代性(cyber-modernity)岛屿。

都市主义者所罗门·本雅明(Solomon Benjamin)研究了班加罗尔(Bangalore)的例子:紧紧掌握在首相和主要公司的利益者们手中的议程任务小组(Agenda Task Force)主导了从头到尾的决策,对当地选举出来的代表们则仅仅给予一些无关紧要的解释。“精英们把班加罗尔变成一个新加坡的政治热情导致了对居住区——特别是处于生产性城市地点的小商业聚集区——的集中驱逐和拆迁。这些拆迁土地被总体规划并再分配给包括公司在内的高收入利益群体。”〔17〕

德里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巴纳什里·查特吉米特拉(Banashree Chatterjimita)发现,通过放任这些土地被中产阶级所攫取,政府完全“颠覆了提供低收入住宅用地的目标”——开发局制订了驱逐或“自愿重新安置(voluntary relocation)”50万擅自定居者的目标〔18〕。印度首都提供了对于杰瑞米·西布鲁克观点的残酷明证:“‘基础设施’这个词对于贫民们摇摇欲坠的破房子的粗暴清理而言是一个新编码的词。”〔19〕沿德里亚穆拉河(Yamuna River)堤岸展开,亚穆拉(Yamuna Pushta)是一个有

〔17〕 所罗门·本雅明:《全球化对当地政府的影响》,载于《联合国世界人居组织论坛》(Solomon Benjamin, “Globalization Impact on Local Government,” UN-HABITAT Debat),第7卷,第4期,2001年12月,第25页。

〔18〕 巴纳什里·查特吉米特拉:《德里的低收入住宅用地》,收入巴肯和范·德·林登:《第三世界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土地分配》(Banashree Chatterjimita, “Land Supply for Low-Income Housing in Delhi,” in Baken and van der Linden, “Land Delivery for Low-Income Groups in Third World Cities”),第218-229页;尼莉玛·里斯巴德:“德里财产安全局”(Neelima Risbud, “Policies for Tenure Security in Delhi”),第61页。

〔19〕 西布鲁克:《在南部城市中》(Seabrook, *In the Cities of the South*),第267页。

着 15 万居民的非常贫困的大型擅自定居者城镇(jhuggi),主要居住着孟加拉国的穆斯林避难者。尽管有过抗议和骚乱,为了给一个河滨大道和旅游文化设施腾出地方,2004 年开始了对于这一地区的清理。当政府为其新的“绿化计划”所受到的国际赞扬而惬意不已之时,居民们被强制安置到了 20 公里外一个新兴边缘贫民窟中。不管官方证据如何,《印度时报》(*Hindustan Times*)的报道揭露,“首都的擅自定居者城镇改革使得重新安置家庭的平均收入降低了约 50%”。〔20〕被驱逐者们向另一份报纸的记者们抱怨:“我们不得不花费至少是半数以上的收入来往返城里的工作地点。”〔21〕

当然,城市非洲不断上演为公路和豪宅扫清道路而强制拆迁的场景。最臭名昭著和令人心碎的例子之一——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对索菲亚镇(Sofiatown)和十字镇(Crossroads)的毁坏不相上下——是 1990 年拉各斯马罗可(Maroko)的重建。马罗可原本是一个渔村,位于列克半岛(Lekki Peninsula)沼泽地尽头。1950 年代末,贫民们因为政府要“排干维多利亚岛屿和伊柯伊(Ikoyi)的水,并由欧洲人和富裕的非洲人来开发”而流离失所。他们占据了马罗可。尽管很贫困,马罗可因其民粹主义的生活乐趣(joie de vivre)、黑色幽默和壮观的音乐而闻名。到 1980 年代早期,这个一度边缘的列克半岛被看做是高收入居住区扩展的理想地点。1990 年代,马罗可的推土机清理使得 30 万人流离失所。”〔22〕诗人奥丁·欧菲姆(Odia Ofeimum)写道:“很少有尼日利亚(Nigerian)幸存者能忘记那种被军靴驱逐所带来的背叛感和心灵创伤。它被从诗歌到戏剧和散文的

---

〔20〕 华伦·索里:《使之成为贫民窟》,载于《印度时报》(Varun Soni, “Slumming It,” *Hindustan Times*),2003 年 10 月 24 日。

〔21〕 兰吉特·德夫雷吉:《贫民窟居民的唯一出路是干活》,载于《亚洲时报》(Ranjit Devraj, “No Way but Down for India’s Slum Dwellers,” *Asia Times*),2000 年 7 月 20 日。

〔22〕 玛格丽特·派尔:《西非英语地区的城市住宅与公共设施》(Margaret Peil, “Urban Housing and Services in Anglophone West Africa”),第 178 页。

所有尼日利亚文学所记忆。”〔23〕

在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的统治下,内罗毕的政治大亨和有影响力的贫民窟房东们被允许在标记为公路的公共用地(包括穿过克比拉中心的一条60米宽的地带)上兴建用于出租的廉价公寓。如今,姆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总统的后莫伊(Post-Moi)政府想要清理30多万房客和擅自定居者以“恢复规划秩序”。〔24〕在近来的拆迁中,居民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曾联合起来把毕生积蓄投资来购买已经被划为公路用地的土地——被荷枪实弹的警察们告知他们必须在两小时内撤离他们的家。”〔25〕

图表 10 一些著名的贫民窟驱逐〔26〕

年 代	城 市	驱逐人数
1950	香港	107 000
1965—1974	里约热内卢	139 000
1972—1976	达喀尔	90 000
1976	孟买	70 000
1986—1992	圣多明戈	180 000
1988	首尔	800 000
1990	拉各斯	300 000
1990	内罗毕	40 000
1995—1996	仰光	1 000 000

〔23〕 奥丁·欧菲姆:《无形的篇章和大胆的预想》,载于《今天》(Odia Ofeimum, “Invisible Chapters and Daring Visions,” *This Day*), 2003年7月31日。例如:克里斯·阿巴尼谵妄而优美的《恩赐之地》(Some Exemples: Ogaga Ifowodo, *Red Rain* (originally, *Maroko's Blood*); Maik Nwosu, *Invisible Chapters*; J. P. Clark, “Maroko” (in *A Lot From Paradise*); and Chris Abani's deliriously wonderful *Graceland*.)

〔24〕 瓦萨迦:“推土机参与清理肯尼亚贫民窟城市”(Vasagar, “Bulldozers Go in to Clear Kenya's Slum City.”)

〔25〕 参见《东非标准》(*The East Africa Standard*, 内罗毕, 2004年2月8-9日)中的文章。

〔26〕 各种报纸资料为数甚多,无法一一注明。

(续表)

年 代	城 市	驱逐人数
1995	北京	100 000
2001—2003	雅加达	500 000
2005	哈拉雷	750 000 +

考虑到高价土地的开拓,许给贫民的意识形态象征和承诺对当权者们而言几乎毫无意义。例如,在共产主义统治下(Communist-governed)的加尔各答,擅自定居者们从市中心被驱逐到边缘,当需要为中产阶级用地创造空间时又再次被驱逐。正如规划师阿南亚·罗伊(Ananya Roy)指出的那样,“加尔各答地区的版图界线不断被拓居、驱逐和再拓居的无情循环所标记。”<sup>[27]</sup>同样,先前的“马克思主义”安哥拉解放人民运动(MPLA)在安哥拉的统治,在把成百上千罗安达人逐出他们简陋的房屋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据经济学知识分子联合会(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托尼·霍奇斯(Tony Hodges)解释:“80%到90%的城市居民生活在没有清晰界定其法律地位的居住区或建筑中……对城乡结合地带(大多数城市居民目前居住的)的贫民窟居民而言,问题就更严峻了。在这些非正式居住区中,大量擅自定居者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乡下搬迁或移民而来——没有正式身份,也就没有占有权。其结果是,他们将永远生活在被驱逐的恐惧之中……”这种恐惧牢牢地盘踞在他们的内心深处:2001年7月,省政府派武装警察和推土机去清理罗安达海湾博阿维阿塔(Boaviata)贫民窟的1万多个家庭,从而为豪华住宅的开发开路。两名居民被枪杀;其余的被强行转移到离他们老家40公里外的乡村,任他们自

[27] 阿南亚·罗伊:《绅士们的城市:新兴共产主义加尔各答的城市非正规》,收入罗伊和阿萨伊德:《城市非正规化现象》(Ananya Roy, “The Gentleman’s City: Urban Informality in the Calcutta of New Communism,” in Roy and Al Sayyad, *Urban Informality*),第159页。

生自灭。〔28〕

然而,残留意识形态与当前实践间最非凡的冲突发生在中国,政府允许城市发展机器让千百万历史上从前的英雄们流离失所。在一篇令人深思的、比较中国近来的内城再发展和美国 1950 年代末至 1960 年代初城市复兴的文章中,言章(Yan Zhang)和葛方(Ke Fang)指出,上海在 1991 至 1997 年为兴建摩天大厦、豪华公寓、购物中心和新建基础设施而拆迁了 150 多万人;同期,北京旧城的近 100 万居民被迁到郊区。〔29〕

一开始,中国城市再发展,正如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时期的美国一样,包含了看起来对传统城市组织造成了一些威胁的强占住房计划。

然而,当各地把他们的试验登峰造极化并加速了住房再开发步伐时,没有对这一项目进行住房和非住宅用途房屋的市场比率限制。因此,一般和低收入住宅迅速失去支持:开发商们利用这一漏洞,兴建尽可能多的豪华公寓和商业房开发。在一些例子中,如北京的虎北口(Hubeikou 音译)规划,没有一个原来的居民能负担搬回来的费用。在另一些例子,如新东方广场(New Oriental Plaza),没有兴建任何一套住宅,代之而起的是亚洲最大的商务综合楼。〔30〕

## 城市美化

在第三世界城市中,贫民害怕备受瞩目的(high-profile)的国际事

〔28〕 霍奇斯:《安哥拉》(Hodges, *Angola*),第 30-31 页。

〔29〕 “历史的重演?从美国的城市复兴到中国内城的再开发”,载于《规划教育与研究杂志》(Yan Zhang and Ke Fang, “Is History Repeating itself? From Urban Renewal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Inner-City Redevelop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2004 年第 23 期,第 286-289 页。

〔30〕 同上。

件——会议、国事访问、体育赛事、选美比赛和国际庆典——这些都会使得当局发动对城市的清理整顿：贫民窟居民知道他们是其政府不希望世界看到的“肮脏”或“颓废”。例如，在1960年代尼日利亚的独立庆典上，新政府的第一个行动是把通往机场的路围起来，这样一来，伊丽莎白女王的代表——亚历山大王子——就看不到拉各斯的贫民窟了。<sup>[31]</sup>近些年来，政府更喜欢通过铲平贫民窟并把居民赶出城外来改善城市面貌。

马尼拉人对这些“美化运动”有一种特殊的恐惧。在伊梅尔达·马科斯的市政府统治时期，地处游行路线的棚户居民遭到一系列清理：1974年的世界小姐盛会(Miss Universe Pageant)，1975年的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访问和1976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会议。<sup>[32]</sup>总共16万擅自定居者被搬迁到媒体视野之外，他们中的许多人暂住在离他们老家30公里外的马尼拉郊区。<sup>[33]</sup>接下来的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Aquino)的“人民政权”更是变本加厉：“阿基诺统治期间，60万擅自定居者被驱逐，常常没有提供再安置的地方。<sup>[34]</sup>尽管城市美化运动承诺为城市贫民保留住房，在阿基诺之后的另一任总统约瑟·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继续了这种大规模的驱逐：仅仅是1999年上半年就拆毁了2.2万间棚屋。<sup>[35]</sup>接下来，为了准备东南亚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峰会，1999年12月拆毁成员进攻赛市(Pasay)的达布-达布(Dabu-Dabu)贫民窟。当2000名居民组成一

---

[31] 本·奥米伊：《拉各斯的城市：短论十篇》(Ben Omiyi, *The City of Lagos: Ten Short Essays*)，纽约，1995年，第48页。

[32] 埃哈德·伯纳：《缓解贫困和驱逐赤贫者》，载于《国际城市与区域研究杂志》(Ehard Berne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Eviction of the Poore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0年9月，第24卷第3期，第559页。

[33] 德拉卡克斯-史密斯：《第三世界城市》(Drakakis-Smith, *Third World Cities*)，第28页。

[34] 伯纳：《捍卫一块土地》(Berner, *Defending a Place*)，第188页。

[35] 菲律宾被拘禁者特别小组：《城市贫民，拆毁与享有适当住房的权利》(Task Force Detainees of the Philippines (TFDP-AMRSP), “Urban Poor, Demolition and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论文摘要，马尼拉，2000年。

道人墙时,一个配有 M16 突击步枪的反恐特警队(SWAT)被叫来,4 人被杀、20 人受伤。家园和所有东西被烧得精光,达布-达布的悲惨居民被重新安置到一个下水道边上,他们的孩子很快患上了致命的胃肠感染。〔36〕

1965 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将臭名昭著的“大独裁者”胡安·巴拉格尔(Juan Balaguer)扶上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总统宝座。1986 年主权回归之后,老朽的独裁者决定重建圣多明戈,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500 周年和罗马教皇(Pope)访问作准备。在欧洲政府和基金的支持下,他制订了一系列多明戈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超大规模计划:哥伦布灯塔,阿玛斯广场和一个新建的中产阶级居住区岛屿。在纪念他本人之外,巴拉格尔也试图奥斯曼化(Haussmannize)城市抵抗运动的传统温床。他的主要目标是市中心东北部萨巴纳佩蒂达(Sabana Perdida)的广大低收入人群的城镇地区。在萨巴纳佩蒂达工作的研究者们写道:“计划是把他们推到郊区,以消除上流城镇中工人阶级贫民窟的麻烦因素。1965 年起义和 1984 年暴动的记忆暗示着:最明智的做法是消灭这个政治抗议和反抗中心。”〔37〕

在受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支持的贫民窟右翼协调会(coordinadora)的强烈抗议下,圣多明戈上半城被保留下来,但军队经常卷入其中的大规模拆毁在圣多明戈的市中心、西南和东南部进行。1986 到 1992 年,40 个贫民窟被铲平,18 万人被驱逐。在一份关于居住区拆毁的重要报告中,埃德蒙多·莫雷尔和曼努埃尔·梅希亚描绘了政府恐吓贫民的战役。

---

〔36〕 海伦·巴斯里:《消除城市贫民的瘟疫》,载于《转换》(酷刑和精神创伤幸存者治疗和康复服务小组的新闻通讯六)(Helen Basili, “Demolition the Scourge of the Urban Poor,” Transitions newsletter of Service for the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of Torture and Trauma Survivors [STARTTS], #6), 2000 年 5 月。

〔37〕 莫雷尔和梅希亚:《多米尼加共和国》(Morel and Mejía, “The Dominican Republic”), 第 85 页。

不管房里还有没有人,住房都一样被拆毁;准军事部队胁迫和恐吓人民以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家园。家里的东西被任意破坏或偷窃;驱逐公告在一个家庭被赶出去那天才贴出来;人们被绑架;孕妇和孩子遭受身体暴力;贫民窟的公共服务被切断——一种高压策略,家庭被羞辱和威胁;警察就是法官。〔38〕

现代奥运会有一段特别黑暗而又鲜为人知的历史。在筹备 1936 年奥运会时,纳粹分子残酷地清除了柏林地区可能被国际参赛者们看到的无家可归者和贫民窟居民。而接下来的奥运会——包括墨西哥、雅典(Athens)和巴塞罗那(Barcelona)奥运会在内——都伴随着城市复兴和贫民驱逐。1988 年汉城(首尔)奥运会对贫穷的私房房主、擅自定居者和房客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官方镇压,72 万人被重新安置在首尔。这导致一个天主教的非政府组织把韩国与南非并列为“最残酷和最不人道的、暴力驱逐的国家”。〔39〕

2008 北京奥运会的筹备看起来将追随汉城的先例:单单为了运动场馆建设,就有 35 万人将被重新安置。〔40〕开发商利用人们对奥运会的爱国热情,使北京市中心的大规模驱逐和自私的土地攫取变得冠冕堂皇。〔41〕安妮-玛丽·布鲁德乌(Anne-Marie Broudehoux)在其优秀著作《后毛泽东时代北京的制造与销售》(*The Making and Selling of Post-Mao*

---

〔38〕 莫雷尔和梅希亚:《多米尼加共和国》(Morel and Mejía, “The Dominican Republic,”),第 95-97 页。

〔39〕 国际关系天主教协会:《可随意处置的人们:韩国的暴力驱逐》(Cathol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posable People: Forced Evictions in South Korea*),伦敦,1988 年,第 56 页。

〔40〕 亚洲居住权联合会:《亚洲人的住房》(新闻通讯)(Asian Coalition for Housing Rights, *Housing by People in Aisa* (newsletter)),2003 年 10 月 15 日,第 12 页。

〔41〕 参见人权观察网([hrw.org/reports/2004/china](http://hrw.org/reports/2004/china))当前新闻报道及“拆迁:中国的强制驱逐与房客权利运动”一文(See Human Rights Watch, current news report, and “Demolished: Forced Evictions and the Tenant’s Right Movement in China” at [hrw.org/reports/2004/china](http://hrw.org/reports/2004/china).)

*Beijing*, 2004) 中宣称中国首都目前倾向于把贫困隐藏在“波样 (Potemkin-like)”外观的背后,而不是改善它。

两年多来,北京人备受以掩饰城市社会和自然污点为出发点的不同美化运动困扰。数百所住房被拆迁,数千人被迁移,无数纳税人的钱被花在建设一个有序和进步的外观上。为确保精心准备的开幕式顺利进行,首都将举行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北京居民被命令像他们曾在亚运会开幕式期间所做的那样,呆在家里看电视上的庆祝活动。〔42〕

然而,近年来亚洲最奥威尔式的“城市美化”项目毫无疑问是“1996 缅甸旅游年 (Visit Myanmar year 1996)”的筹备。该活动由仰光和曼德勒 (Mandalay) 靠海洛因提供资金的 (heroin-financed) 缅甸军事独裁政府承办。1989 年到 1994 年间,150 万居民——难以置信的城市人口总数的 16%——被 (经常是被政府指使的纵火) 搬迁到仓促建成的竹墙茅顶 (bamboo-and-thatch) 小屋中,它们位于城市周边,如今被令人毛骨悚然地重命名为“新领地”。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连死人都被从墓地里驱逐出去。莫尼卡·斯基德摩尔在其著作《卡拉 OK 法西斯主义》 (*Karaoke Fascism*) 中对仰光和曼德勒残酷景象的描绘令人回忆起波尔布特罪大恶极的金边大屠杀 (Phnom Penh depopulation)。“整座城市的交通堵塞了许多天,人们被装到卡车上强制安置到政府在大城市之外的稻田中新建的小镇。”城市居住区被诸如面向西方旅游者和日本商人的新仰光高尔夫球场 (Rangoon Golf Course) 等计划所取代。“大部分人搬离了他们生活了 40 年的街区。那些反抗者或被逮捕,或被强制搬到 15 公里以外

---

〔42〕 安妮-玛丽·布鲁德乌:《后毛泽东时代北京的制造与销售》 (*Anne-Marie Broudehous, The Making and Selling of Post-Mao Beijing*), 纽约, 2004 年, 第 162 页。

的地方。”〔43〕

斯基德摩尔认为,这些经常性的空间迁移已经成为“恐怖政治”的统治基础。“通过更名、重建和重置熟悉的地标及军队和武装的隆重登场,军事集团把一种新的空间结构强加给仰光……镇压潜在民主的居住区;拆毁内城和创造新的城市中心以纪念独裁主义原则。”在传统居住区和历史建筑地点,通过投资玻璃混凝土的高层建筑——“毒枭建筑”(narco-architecture)、使用硬通货(hard-currency)的度假酒店和极尽奢华的佛塔等综合设施来洗钱。仰光已经变成了佛教旅游仙境、大型棚户区 and 墓地的噩梦复合体:它是“一种赞美其领导人的控制和独裁的景观。”〔44〕

### 判贫民窟为非法

当然,缅甸将军们的城市清理策略在西半球有过灾难性先例。如1960年代和1970年代南部会议(Southern Cone)军事独裁政府对贫民窟和临时营地的宣战。它们把贫民窟和棚户区理解为潜在的抵抗中心或纯粹的城市资产阶级化障碍。因此,在写到1964年后的巴西时,苏珊娜·塔施纳说:“军事时期一开始的特征是一种独裁主义态度,在公共安全力量帮助下强制搬迁擅自定居区。”为了唤起人们对城市小型马克思主义游击中心的恐惧感,军队铲平了80个贫民窟,并从俯瞰里奥的山上驱逐了近14万人。〔45〕得到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资金支持,其他贫民窟后来被拆毁,从而为工业扩张或高级居住区周边的美化扫清道路。尽管当局没有能达成其“十年内

---

〔43〕 莫尼卡·斯基德摩尔:《卡拉OK法西斯主义》(Monique Skidmore, *Karaoke Fascism*),费城,第88页。也参见 [www.idpproject.org](http://www.idpproject.org) 关于缅甸的文件。

〔44〕 斯基德摩尔:《卡拉OK法西斯主义》(Skidmore, *Karaoke Fascism*),第84-85、89、159-160页。

〔45〕 塔施纳:《巴西擅自定居区和贫民窟》(Taschner, “Squatter Settlements and Slums in Brazil”),第205页。

消灭里奥所有贫民窟”的目标：独裁政府引发了资产阶级居住区与贫民窟的冲突，以及警方与贫民窟青年的冲突。这些冲突一直持续到30年后。<sup>[46]</sup>

与此同时，在1973年的圣地亚哥，皮诺切特(Pinochet)独裁政府的第一个行动——在民粹主义左翼领导人被谋杀之后——是驱逐阿连德(Allende)政府容许的移民区(poblaciones)和棚户区(callampas)中的擅自定居者(约3.5万个家庭)，以重建中产阶级在市中心的霸权。<sup>[47]</sup> 社区组织研究者汉斯·哈姆斯(Hans Harms)说：“创建一个同质城市社会经济区的做法遭到公开反对。……在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政府的30年统治中，所有的居住区组织遭到解散，这制造了一种孤立和恐惧的气氛。”<sup>[48]</sup> 随着政治激进主义的复兴，政府再次放开了破坏分子对周围移民区的“根除”。正如凯丝·施奈德(Cathy Schneider)在其对居住区抵抗独裁政府历史的重要研究中解释的那样，其累积结果是被逐者及年轻家庭被迫与他们的亲朋们同宿一室。“作为集体宿舍(allegados, 每间卧室住三人或三人以上)而生活的家庭百分比从1965年的25%上升到1985年的41%。”<sup>[49]</sup>

阿根廷在1967—1970年间军人集团统治时期首先采用了一种反暴动驱使之下的(counterinsurgency-driven)贫民窟消灭策略。正如塞西莉亚·萨内塔(Cecilia Zanetta)强调的那样，政府的“清除临时住所计划

---

[46] 迈克尔·巴克、托尼·埃斯卡萨尼和格雷格·奥·赫尔合著：《桑巴舞：里奥贫民窟的一个隐喻》，载于《城市》(Michael Barker, Tony Escasany and Greg O'Hare, "Samba: A Metaphor for Rio's Favelas," *Cities*)第18卷,第4期,2001年,第263页。

[47] 阿尔弗雷多·罗德里格斯和安娜·玛丽亚·伊卡萨：《智利》，收入阿苏埃拉、杜豪和奥蒂茨编：《驱逐与居住权》(Alfredo Rodriguez and Ana Maria Icaza, "Chile," in Azuela, Duhau, and Ortiz, *Evictions and the Right to Housing*),第51页。

[48] 哈姆斯：《住在市中心》(Harms, "To Live in the City Centre"),第198页。

[49] 凯丝·施奈德：《皮诺切特统治时期智利的棚户区抗议》(Cathy Schneider, *Shantytown Protest in Pinochet's Chile*),费城,1995年,第101页。

(Plan de Erradicación de Villas de Emergencia)”特别针对棚户区的极端自治,被逐者在被安置到边缘之前被迫忍受一个“社会调整”期。然而,在保留 1970 年代早期的民事法规情况下,击退非正式居住区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贫民窟再次成为培育激进皮诺切特分子和社会主义煽动者的温床。当将军们在 1976 年 3 月重新掌权时,他们决定一劳永逸地摧毁贫民窟;在《审判》\* 的恐怖年代,租金控制被撤销,大布市\*\* 94% 的“非法”居住区被铲平,使得 27 万贫民无家可归。普通平民\*\*\* 组织,包括世俗天主教和左翼在内,被系统化地“清除”了。如在智利,每一轮城市土地投机都伴随着消除对贫民窟的社会抵抗。因此,有研究表明,根除行动特别集中在“重要城市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都市区北部地价较高的地区。”〔50〕

在埃及,1970 年代这十年也是一个国家直接猛烈镇压“破坏性”城市居住区的时代。〔51〕一个著名案例是开罗 1977 年 2 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暴动的余波。萨达特(Sadat)对外开放政策(Infitah)新自由主义策略的失败导致了巨额财政赤字。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对埃及总统施压要求其补上这一缺口。新闻记者基内维·阿卜

---

\* (西班牙语:el Proceso 英语:The Trial, el Proceso 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最具代表性的中篇作品之一,主题是对极权主义政治和司法制度的批判。)——译者注

\*\* Gran Buenos Aires,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由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其周围 22 个卫星城组成。有些情况下,大布市仅指上述 22 个卫星城。——译者注

\*\*\* Rank-and-file,本意是“横队与纵队”的意思。由于英国部队集合时要求普通士兵站成列队,可以并排成横队或是按序列成纵队,而军官却不用这么做。因而,“rank and file”也用来喻指“普通士兵”。后来这一短语又进一步引申为“普通百姓,平民;普通成员”。——译者注

〔50〕 塞西莉亚·萨内塔:《世界银行对民族国家住房和城市政策的影响:以 1990 年代的墨西哥和阿根廷为例》(Cecilia Zanetta, *The Influence of the World Bank on National Housing and Urban Policies: The Case of Mexico and Argentina in the 1990s*), 奥尔德肖特,2004 年,第 194-196 页。

〔51〕 哈里斯和沃赫拜:《低收入住房的都市地理学》(Harris and Wahba, “The Urban Geography of Low-Income Housing”),第 68 页。

杜(Geneive Abdo)写道：“为了补上这个窟窿，萨达特只有两个选择：结束津贴或者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来压榨富人。资产阶级，关键的支持者，对萨达特而言太重要了，于是国家削减了半数(对贫民日常食品)的津贴。”〔52〕结果，狂怒的开罗人进攻那些在他们眼皮底下的对外开放政策奢华生活方式的象征，如五星级酒店、豪华赌场、夜总会和公寓商场及警察局。起义中80人被杀，1000人受伤。

把左翼分子填满监狱后(一场反而使得埃及伊斯兰激进组织得以崛起的镇压)，萨达特把愤怒集中到开罗市中心附近布拉克(Bulaq)区的伊萨西阿-图古曼(Ishash al-Turguman)贫民窟。他将宣称其为“共产主义分子领导的盗贼暴动”根源。他告诉外国记者，这一地区是彻头彻尾的破坏分子老巢，共产主义分子藏在“鞭长莫及的地方，既然狭窄的街道阻止了警车的进入。”〔53〕人类学者费尔哈·甘纳姆(Farha Ghannam)说，就像拿破仑三世当年那样，萨达特想要“市中心被重新规划以达到更有效的控制和监督。”伊萨西阿-图古曼(Ishash al-Turguman)贫民窟中这些被视为耻辱的居民被分为两群并驱逐到不同的边缘地区，而他们旧有的街区成了公园带。甘纳姆认为，清除布拉克区是一个“用洛杉矶和豪斯顿为模型”重建开罗的野心勃勃的巨大蓝图的第一步，尽管萨达特最终并没有时间或资源来实现这一构想。〔54〕

197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共同把清理贫民窟美化为打击犯罪的必要手段。此外，贫民窟经常被看作是威胁，仅仅因为它们游离于监督和有效的“全景监视”(off-Panopticon)之外。因此，1986年津巴布韦总统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下令铲除和驱逐整个卢萨卡贫民窟。他宣

---

〔52〕 基内维·阿卜杜：《无神之神：埃及与伊斯兰的胜利》(Geneive Abdo, *No God but God: Egypt and the Triumph of Islam*)，牛津，2000年，第129-130页。

〔53〕 费尔哈·甘纳姆：《重塑现代：全球化开罗的空间、迁移与身份政治》(Farha Ghannam, *Remaking the Modern: Space, Relo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a Global Cairo*)，伯克莱，2002，第38页。

〔54〕 同上书，第135页。

称,这是因为“正是由于这些缺乏正常监控体系的贫民窟存在,大部分犯罪分子在擅自定居区中找到藏身之地。”〔55〕

殖民时代的法律也经常被用来美化驱逐。例如,在约旦河西岸(West Bank),以色列军队在驱逐普通家庭并炸毁“恐怖分子”之家时,经常援引英国甚至土耳其帝国(Ottoman)的成文法。同样,为佐证其“到2005年完全消灭贫民窟”的目标,吉隆坡曾援引1950年代紧急法案(当时的英国人铲除他们宣称为共产主义者堡垒的中国散居者社区)。如今,反暴乱法为那些由政治家和开发商组成的土地所有者们——他们被吉隆坡激进主义分子描绘为“巨大和腐败的霸占土地者”——服务:“到1998年中期,城市散居者们被驱逐,12.9万人生活在220个肮脏和可怕的新居住区中。”〔56〕与此同时,1999年,以帮会谋杀了一个警察为借口,达卡政府铲平了19个“罪犯聚居的贫民窟”,从而让5万人露宿街头。〔57〕

当然,北京为了“安全”驱散了浙江村(Zhejiang Village)——首都南部边缘的一个不断延展的贫民窟。作家迈克尔·达顿(Michael Dutton)指出:“传统上,城市南边是贫民区,正如老北京俗语所总结的那样,‘东富,西贵,南穷’。”〔58〕贫民窟的大部分居民(约10万人左右)来自浙江温州:一个以其居民的商业头脑和耕地缺乏而闻名的地区。大部分是没有正式身份的低学历年轻盲流(Mangliu or “floaters”),他们由基于宗族的帮会所组织,租住当地农民的简陋住房并在生产廉价冬装和皮革商品的血汗工厂里工作。〔59〕政治科学家多萝西·索林杰(Dorothy Solinger)描

---

〔55〕 姆潘吉拉瓦·穆卢万达和厄玛努埃尔:《不用担心人民,棚户区必须拆走》,载于《城市》(Mpanjilwa Mulwanda and Emmanuele, “Never Mind the People, the Shanties Must Go,” *Cities* 11:5),1994年,第303,311页。

〔56〕 亚洲居住权联盟:《亚洲人的住房》(Asian Coalition for Housing Rights, *Housing by People in Asia*),第18-19页。

〔57〕 BBC新闻(BBC News),1999年8月8日和23日。

〔58〕 达顿:《中国街头生活》(Dutton, *Streetlife China*),第149页。

〔59〕 刘晓莉和梁伟:《浙江村:北京边缘非正式城市化的社会和空间含意》,载于《城市》,(Liu Xiaoli and Liang Wei, “Zhejiangcun: Social and Spatial Implications of Informal Urbanization on the Periphery of Beijing,” *Cities* 14:2),1997年,第95-98页。

绘了浙江村中随处可见的现象：“十平米的房间里面有四五台缝纫机、四五个成人、至少一个婴儿，仅有两三张床。”〔60〕

索林杰说，浙江村因其可疑的帮会、毒品、犯罪和高发的性病而备受指责，……作为对所有城市非法冒险的警告。1995年12月初五千名警察和政府官员开始对浙江村贫民窟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清理。最后，9917个家庭被迁移，1645个“非法”生意（从三轮车到私人诊所）被关闭，18621个“非法”居民被驱逐。〔61〕但如像索林杰指出的那样，“然而，在这种巨大拆迁之后的短短几个月内，许多临时住户又住回了原地。”〔62〕

大规模的贫民窟清理——正如浙江村的拆迁所展现的那样——经常与对街头小贩和非正式工人的管制连在一起。雅加达的实权统治者苏迪约梭（Sutiyoso）将军对亚洲贫民人权的伤害可能仅次于缅甸将军们。因其对苏哈托独裁统治下不同政见者的迫害而臭名昭著，苏迪约梭从2001年开始“制订了其个人的清理雅加达非正式低收入城市居住区（*Kampung*）及小贩、街头卖唱者、无家可归的贫民和三轮车夫等的改革运动。”在大企业、大开发商和近来梅加瓦蒂（Megawati）总统本人的支持下，这个省长已经驱逐了超过5万名贫民窟居民，打破了3.4万名三轮车夫的饭碗，取缔了2.1万名小贩的货摊并逮捕了数百名街头卖唱者。他表面的目标是使得（1200万人口的）雅加达成为“第二个新加坡”，但基层反对者，如城市贫民联盟（Urban Poor Consortium）控诉他清理贫民窟只是为了其有力靠山和政治盟友们未来的开发。〔63〕

〔60〕 索林杰：《争取中国城市户口》（Solinger,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第233页。

〔61〕 达顿（转引自官方文件）：《中国街头生活》[Duton (quoting from official documents), *Streetlife China*]，第152-159页。

〔62〕 索林杰：《争取中国城市户口》（Solinger,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第69页。

〔63〕 亚洲居住权联盟：《亚洲人的住房》，以及亚洲人权委员会和城市穷人联盟的通讯稿（参见城市穷人网：[www.urbanpoor.or.id](http://www.urbanpoor.or.id)）（Asian Coalition for Housing Rights, *Housing by People in Asia*, as well as press release from the As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nd Urban Poor Consortium see Urban Poor website: [www.urbanpoor.or.id](http://www.urbanpoor.or.id)）

如果说一些贫民窟居民犯下了阻碍进步的“罪行”，另一些则错在敢于实践民主。在腐败透顶的2005年津巴布韦选举之后，总统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把怒火转到哈拉雷和布拉瓦约(Bulawayo)的街头市场和棚户区，那儿的贫民们大多投票给其对手民主运动组织(Movement for Democratic, MDC)。5月初，打着驱逐渣滓(Drive Out Trash)的阴险旗号，净化行动(Operation Murambasvina)的第一步是警察对城市34个流动市场的袭击。一名警官公开督促他的手下：“从明天起，我要在我办公桌上看到我们已枪击人数的报告。总统已经全力支持这一行动，所以没什么好怕的。你们应该把这一行动当成一场战争。”〔64〕

警察们照办了。货摊和存货全部被烧毁或洗劫，1.7万多商人和廉价小公共汽车司机被捕。一周后，警察开始铲除位于新开发区的民主运动总部和前穆加贝贫民窟，如契莫瓦(Chimoi)和纳德佐尼奥(Nyadzonio)中的棚屋。另外在哈拉雷西边的泛哈特克利福区(Hatcliffe Extension)，警察驱逐了一个棚户区的上千居民，他们是在一个更早的——因伊丽莎白女王一次国事访问而进行的——“清理”运动后于1990年代初搬到此地的。到7月中旬，超过70万贫民窟居民——官方术语“人渣”——被驱逐，而那些试图反抗的人被当即枪杀、鞭打或逮捕。〔65〕联合国调查者们发现，“受害者的范围极广，特别是寡妇、单身母亲、孩子、孤儿、老人和残疾人”。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宣称净化行动是一个“灾难性非正义行为”。〔66〕

---

〔64〕 穆尼亚拉齐·古维赛：《大众行动能阻止净化运动》，载于《津巴布韦国际社会主义者组织》，2005年5月30日；《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05年5月27日；《卫报》，2005年5月28日；《洛杉矶时报》，2005年5月29日。Munyaradzi Gwisai, “Mass Action Can Stop Operation Murambasvina,”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Organisation Zimbabwe*, 30 May 2005; *BBC News*, 27 May 2005; *Guardian*, 28 May 2005; *Los Angeles Times*, 29 May 2005.)

〔65〕 英国广播公司新闻(BBC News), 2005年6月8日；以及南非知名媒体《守护者邮报》(*Mail & Guardian*)在线([www.mg.co.za](http://www.mg.co.za)), 2005年7月21日。

〔66〕 英国广播公司新闻(BBC News), 2005年7月22日。

这一统治的一个社会主义反对者,来自津巴布韦大学的布赖恩·拉夫托普洛斯(Brian Raftopoulos)把穆加贝对城市贫民的种族清洗比作殖民时代和伊恩·史密斯(Ian Smith)时代的种族歧视政策。

像过去的殖民时代一样,当前统治开展犯罪和城市流浪汉的斗争来“重新恢复城市秩序”,和过去的尝试一样,这并不解决问题……因为城市贫困的基础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当前稳定城市工人生活的经济政策的持续失败。事实上,如今的劳动力生活得比1980年代更艰难,他们一直以来不得不忍受各种问题:实际工资的不断下降、食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和社会补贴的大幅削减……在1980年代后没有多长时间,也许甚至是在此之前,资本城市运作得如此之糟,以至于与其大多数居民几乎毫无关联。〔67〕

## 世外桃源

与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相比,当代奥斯曼化经常为了那些口袋已经被郊区收入塞满的上层阶级而夺回市中心,他们对此却并不领情。如果说贫民悲愤地抵抗从城中心的驱逐,富人则自愿把他们的旧街区换成城市周边地区的幻想主题(fantasy-themed)公园。当然,旧的黄金海岸——如开罗的扎马雷克(Zamalek)、阿比让的里维埃拉(Riviera)、拉各斯的维多利亚岛等等——保留下来,但1990年代早期以来,第三世界城市周边排外而封闭的郊区爆炸性地增长,这已成为新的全球趋势。在中国,有大门和保安的小区(gated community)甚至(或特别)被称作“近来规划与设

---

〔67〕 布赖恩·拉夫托普洛斯:《城市战争》对互联网上正在进行的津巴布韦论争的一篇文章(Brian Raftopoulos, “The Battle for the Cities,” a contribution to an ongoing Internet debate on Zimbabwe) (<http://list.kabissa.org/mailman/listsinfo/debate>)

计中最有意义的发展”〔68〕。

这些“外世界”——采用《银翼杀手》\* 的术语——经常被想象为南加利福尼亚的翻版。因此，“贝弗利山(Beverly Hill)”并不仅仅存在于邮编 90210, 它也同乌托邦和梦乡一样作为开罗的一个郊区, 一座“其居民能远离看起来弥漫在当地的贫困景象, 远离严酷、暴力和政治的伊斯兰”的富庶私人城市而存在。〔69〕同样, 北京北郊的“橘郡(Orange County)”也是一个有着围墙的楼盘, 该楼盘百万富翁们不断延展的加利福尼亚式房子由美国新港滩市建筑公司(Newport Beach architect)和玛莎·史都华装饰公司(Martha Stewart décor)设计。(正如郊区开发商给一个美国记者解释的那样:“美国人可能会把橘郡看作一个地方, 但在中国, 人们觉得橘郡是一个品牌, 有点类似于著名奢侈品品牌乔治·阿玛尼(Giorgio Armani)”〔70〕)。橘郡(水印长滩)楼盘——《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称之为“中国的小洛杉矶(faux L.A.)中心”——也在北京北部, 横跨一条新的六车道高速公路。〔71〕与此同时, 棕榈泉(Palm Spring)是香港一个戒备森严的独立王国, 那儿的富裕居民们能“在主题公园内打网球或散步, 迪斯尼连环漫画的人物为仿希腊柱和新古典亭子所环绕。”都市理论家劳拉·鲁杰里(Laura Ruggeri)把这些住在他们宽大联体别墅中的

---

〔68〕 缪朴:《拥挤小镇上的废弃街道:中国城市中有大门和保安的住宅小区及其解决方案》(Pu Miao, “Deserted Street in a Jammed Town: The Gated Community in Chinese Cities and Its Solution,”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8: 1), 2003年, 第8卷第1期, 第45页。

\* *Blade Runner*, 经典黑色科幻电影, 摄于1982年, 改编自菲利普·K. 迪克(Philip K. Dick)的小说《机器人梦到电动羊了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小说设定的场景是2019年的洛杉矶(位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这部未来派的经典之作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灰暗的未来时代, 并使得所谓“反乌托邦(dystopia)”式非理想社会状况再次流行于银幕。——译者注

〔69〕 阿塞夫·巴亚特和埃里克·丹尼斯:《谁害怕Ashiwaiyat?》, 载于《环境与城市化》(Asef Bayat and Eric Denis, “Who Is Afraid of Ashiwaiyat?”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7:2 October 2000), 2000年10月, 第17卷第2期, 第199页。

〔70〕 《橘郡纪事》(*Orange County Register*), 2002年4月14日。

〔71〕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2003年2月3日。

居民们奢华的、进口的加利福尼亚式生活方式与其菲佣的生活状况相比较,他们睡在阁楼上鸽子笼大小的小房间里。〔72〕

当然,班加罗尔因在其北部重新创造的、堪与星巴克(Starbucks)等多元生活方式相媲美的、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和森尼维耳市(Sunnyvale)式生活方式而闻名。据规划师所罗门·本雅明(Solomon Benjamin)所言,这些富裕移民(官方用语“非本地印第安人”)生活得就像他们身处“加利福尼亚的私人庄园(farmhouse cluster)和公寓,有他们自己的游泳池和健身房,有私人保安和围墙,24小时供电设施和会员制俱乐部设施。”〔73〕位于雅加达西面文登区(Tangerang)的现代卫星城市力宝·卡拉雅奇(Lippo Karawaci)没有采用美国名字,但实际上也是美国西海岸郊区的一个拷贝,鼓吹或多或少自给自足的基础设施如医院、购物中心、电影院、运动和高尔夫俱乐部、宾馆和一个大学。它也有内部保护区,当地人称为“完全保护区”。〔74〕

对安全和社会隔离的要求是令人困扰和普遍的。在马尼拉市中心和近郊,富有的私房房主协会筑栅栏防御公共街道,并呼吁铲除贫民窟。埃哈德·伯纳描绘了排外的洛约拉顶级社区(Loyola Heights district):

铁门、路障和检查站的复杂体系划分了这一地区的界线,将其从城市其他部分分割开来,至少在晚上。富有的居民们普遍关注的是

---

〔72〕 劳拉·鲁杰里:《棕榈泉:香港的加利福尼亚梦幻工程》,作者主页:www.spacing.org,另一个“棕榈泉”是北京的一个优雅的公寓楼盘。(Laura Ruggeri,“Palm Springs: Imagineering California in Hong Kong,”1991/94, author website (www.spacing.org). Another “Palm Springs” is an elegant condominium complex in Beijing).

〔73〕 所罗门·本雅明:《班加罗尔的统治、经济环境与贫困》,载于《环境与城市化》(Solomon Benjamin, “Governance, Economic Settings and Poverty in Bangalor,”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2:1 (April 2000)), 2000年4月,第12卷第1期,第39页。

〔74〕 哈拉尔德·莱施:《印度尼西亚有大门和保安的住宅小区》,载于《城市》(Harald Leisch, “Gated Communities in Indonesia,” *Cities*), 2002年,第19卷第5期,第341,344-345页。

生命安全、独立和财产。环绕着顶上插玻璃片的高墙、带刺铁丝网和所有窗户上扎实的铁栅栏,住房变成了实际上的堡垒。〔75〕

正如通德·阿博拉(Tunde Agbola)对拉各斯防御性生活方式的描绘一样,这种“恐怖建筑”在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部分地区是很普遍的,但它在南非、巴西、委内瑞拉和美国等社会经济最不平等的大都市社会达到全球极端。〔76〕在约翰内斯堡,即使是在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当选之前,大型商业区商家和富裕白人居民从市中心转移到北郊[杉腾(Sandton)、兰德堡(Randburg)和罗斯班克(Rosebank)等等],那儿已经变成类似于美国“周边城市”的高度安全区。人类学家安德烈·采格莱迪(Andre Czegledy)发现,在这些有着它们普遍存在的大门、住宅群和防御公共街道的栅栏的、不断延展的郊区临时防御营(laager)中,安全已经成为一种荒谬的文化。

高高的围墙上经常装有金属墙头钉、利刀网和近来与紧急情况报警器相连的电网。再加上便携式“应急按钮”装置,屋内报警器直接与保安公司的“武装防卫反应”联通。有一天,当我和一个同事一起走在北郊一个中产阶级的社区威斯特顿(Westdene)时,这种暗示暴力的超现实本质突然闪现在我脑海中。在街上,停着一辆当地保安公司的小卡车,车厢上用很大的字体鼓吹他们对于“枪支和爆炸”的反应。爆炸?〔77〕

---

〔75〕 伯纳:《捍卫一块土地》(Berner, *Defending a Place*),第163页。

〔76〕 对于拉各斯的堡垒式住房,参见阿博拉:《恐怖建筑》(For a description of Lagos's fortress homes, see Agbola, *Architecture of fear*),第68-69页。

〔77〕 安德烈·采格莱迪:《高级别墅:约翰内斯堡及其北郊的文化透视》,收入理查德·汤姆林森等编:《新兴的约翰内斯堡:后隔离城市透视》(Andre Czegledy, "Villas of the Highveld: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Johannesburg and Its Northern Suburbs," in Richard Tomlinson et al. (eds), *Emerging Johannesburg: Perspectives on Post-apartheid City*),纽约,2003年,第36页。

然而,在开普敦贵族化的郊区地带西索默塞特(Somerset West),后隔离(post-Apartheid)时代的堡垒住房正被有着复杂安全设备的单纯住房所取代。这些温和居民的秘密是环绕着整个社区或正如他们当地人所说的“安全地带”的最先进的(state-of-the-art)电子栅栏。这种一万伏电压的栅栏最初被发明来阻止狮子靠近家畜,释放巨大的震颤电击以使得入侵者丧失能力而无须实际杀戮。对这种居住安全技术的全球需求增长迅速,南非的电子栅栏公司有望开拓郊区安全的出口市场。〔78〕

阿尔伐城(Alphaville)地处泛圣保罗西南部,是巴西最著名的围墙和美国化边缘城市,(正是)以戈达尔(Godard)1965年反乌托邦电影《阿尔伐城》(Alphaville)中的黑暗新世界来命名的。阿尔伐城是一个有巨大官僚机构的、完全私有的城市。超级购物中心和有大门和保安的小区——所有这一切由800名私人保安所守卫。特蕾莎·卡尔代拉(Teresa Caldeira)在其研究巴西军事化城市空间的优异著作《围墙城市》(City of Wall, 2000)一书中写道:“在其宣传和所有涉入其中的成见中,安全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联防队员对犯罪分子或流浪汉闯入者们的滥用私刑,而阿尔伐城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则被允许到处乱逛;卡尔代拉引用了一个居民的话:“法律只针对普通人,而不针对阿尔伐城的居民”。〔79〕

约翰内斯堡和圣保罗的边缘城市(正如班加罗尔和雅加达一样)是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因为他们合并了传统市中心的大量就业基础和大多数零售和文化设施。在更纯粹的居民圈,高速公路建设——如在南美——对于富裕的郊区化而言,已经成为必要条件(sine qua non)。正如

---

〔78〕 默里·威廉斯:《城市超级富豪中流行的有大门有保安的庄园》(Murray Williams, “Gated Village Catch on among City’s Super-Rich”),开普敦,2004年2月6日。关于郊区电子栅栏技术的细节,参见 [www.electerrific.co.za](http://www.electerrific.co.za)。

〔79〕 特蕾莎·卡尔代拉:《围墙城市:圣保罗的犯罪、隔离和公民权》(Teresa Caldeira, *City of Walls: Crime, Segreg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São Paulo*),伯克莱,2000年,第253、262、278页。

拉丁美洲主义者丹尼斯·罗杰斯(Dennis Rodgers)在研究马那瓜(Managua)精英案例时指出的那样,“正是这些私人保护空间的互相联络把它们建构为一种自我发展‘系统’,尽管这一点还存在争议:允许这种‘独立网络’的存在是不是过去五年间马那瓜路况佳、照明好和发展快的道路发展策略的最关键因素。”〔80〕

罗杰斯继续讨论保守市长(1996年度总统)阿诺尔多·阿莱曼(Arnoldo Alemán)的“新马那瓜”计划。除了摧毁革命壁垒、反复袭击小贩和擅自定居者而外,阿莱曼还兴建了新的道路系统,密切关注富人驾驶者们在他们运动型多功能车\*中的安全。

环状交叉路口的改建……能与这样的事实联系起来:他们减少了撞车的危险(既然车不用停),而支路的原本目标看起来是允许司机绕开因极高的犯罪率而闻名的部分马那瓜地区……不仅是道路工程看起来主要与城市精英的生活相连,而且同时几乎是全部通往城市负面的道路都不与城市精英相连。\*\*〔81〕

同样的例子是,如今布宜诺斯艾利斯私人修建的高速公路使得富人完全生活在他们地处偏远比拉尔(Pilar)区的“国度”(乡村俱乐部)并减

---

〔80〕 丹尼斯·罗杰斯:《城市脱嵌:马那瓜的犯罪、不安全和空间组织》,载于《环境与城市化》,(Dennis Rodgers, “‘Disembedding’ the city: Crime, Insecurity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Managua,”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6:2), 2004年8月,第120-121页。

\* SUVs, Sports Utility Vehicles的缩写,中文意思是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里主要是指那些设计前卫、造型新颖的四轮驱动越野车。——译者注

\*\* 阅读:先前的桑地诺支持者(Sandinista,即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员。——译者注

〔81〕 丹尼斯·罗杰斯:《城市脱嵌:马那瓜的犯罪、不安全和空间组织》,载于《环境与城市化》,(Dennis Rodgers, “‘Disembedding’ the city: Crime, Insecurity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Managua,”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6:2), 2004年8月,第120-121页。

少他们在市中心的事务。大布市也有一个蓬勃发展的边缘城市或“高档乡村别墅区”，叫做诺德尔塔(Nordelta)，其经济发展潜力不可限量。<sup>〔82〕</sup>同样，在拉各斯，穿过人口密集的贫民窟，一个非常宽阔的地带被清理出来，为生活在阿贾(Ajah)富人区的经理和政府官员们新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这种新建道路网络的例子数不胜数，罗杰斯强调“都市大量的分割都是为城市精英而进行的……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强占以大刀阔斧而非逐步包围的方式进行”<sup>〔83〕</sup>。

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是都市政治空间的基本重组，包括对贫民和富人生活交叉点的激烈缩减。这种重组超越了传统的社会种族隔离和城市分割。一些巴西作家最近谈到“回归到中世纪城市”，但中产阶级脱离于公共空间——和与贫民共享的城市生活遗迹——的暗示意味是更极端的。<sup>〔84〕</sup>罗杰斯，沿着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思路，把这一核心过程概念化为精英行动主义者对当地区域背景的“脱嵌(disembedding)”，一种力图摆脱令人窒息的贫困和社会暴力的半乌托邦尝试。<sup>〔85〕</sup>劳拉·鲁杰里(Laura Ruggeri)(在讨论香港的棕榈泉时)也指出，第三世界精英追求一种“仿真生活”——以电视影像中神话了的南加利福尼亚为模型——的当代诉求，意味着“要成功就必须划界——(特

---

〔82〕 居伊·蒂利埃：《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都市区有大门和保安的住宅小区》(Guy Thuillier, “Gated Communities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of Buenos Aires”), 第258-259页。

〔83〕 罗杰斯：《城市“脱嵌”》(Rodgers, “‘Disembedding’ the city”), 第123页。

〔84〕 奥马利亚·吉兰基思·德·莱莫斯、弗朗西斯科·斯卡托拉和雷纳尔多·马沙多：《回到中世纪的城市：关闭大都会保利斯塔纳的公寓》，收入刘易斯·菲利佩·卡夫拉莱斯·巴拉哈斯编：《拉丁美洲：国家开放与城市封闭》(Amália Geraiges de Lemos, Francisco Scarlato, and Reinaldo Machado, “O Retorno a Cidade Medieval: Os Condomínios Fechados da Metrópole Paulistana,” in Luis Felipe Cabrales Barajas (ed.), *Latinoamérica: Países Abiertos, Ciudades Cerradas*), 瓜达拉哈拉, 2000年, 第217-236页。

〔85〕 罗杰斯：《城市“脱嵌”》(Rodgers, “‘Disembedding’ the city”), 第123页。

别)是隔绝于日常景观”。〔86〕

加强了梦幻主题的独立王国和边缘城市,脱嵌于他们自己的社会景观,而整合到飘浮在数字虚拟中的全球化数码-加利福尼亚(cyber-California)——这使得我们的话题又绕回到了菲利普·K. 迪克\*。杰罗姆·西布鲁克补充说,在这种“金色囚笼”中,第三世界城市资产阶级“不再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居民,而成为一个属于和自我效忠于一个超地球金钱王国的流浪者,他们变成了财富王国的爱国者,无所不在和不可捉摸的金钱国度的国家主义者”〔87〕。

与此同时,回到当下世界,城市贫民们绝望地陷入贫民窟生态学。

---

〔86〕 鲁杰里:“棕榈泉”(Ruggeri, "Palm Springs")

\* Philip K. Dick,有五部著名科幻影片是根据其小说改编的:《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宇宙威龙》(*Total Recall*, 1990)、《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 2002)、《记忆裂痕》(*Paycheck*, 2003)、《黑暗扫描仪》(*Scanner Darkly*, 2006)。——译者注

〔87〕 西布鲁克:《在南部城市中》(Seabrook, *In the Cities of the South*,)第211页。

## 第六章 贫民窟生态学

---

那些去大都市的人都陷入了绝境

——佩佩·卡里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外的一个贫民窟也许有世界上最糟糕的风水：它建在“一个先前的湖，一个毒气蔓延的沼泽和公墓之上，并处于一个洪泛区”。〔1〕危险和有害健康的地点往往成为擅自定居区的地理定义：无论是危险地建在马尼拉粪便堵塞的巴石河（Pasig River）上的贫民窟，还是印度东南部城市维查雅瓦达（Vijayawada）的贫民窟，“那儿的居民把门牌号写在各件家具上，因为房子和家具每年都会被洪水卷走。”〔2〕擅自定居者把生命安全和公共健康全部押在几平方米的土地上并抵抗驱逐。他们是沼泽地、冲积平原、火山坡、山体随时可能滑坡的山脚、垃圾山、化工垃圾堆、铁道侧线和沙漠边缘的先驱拓居者。参观达卡后，吉里米·西布鲁克描绘了一个小型贫民窟：“人们的避难所被腐蚀、飓风、洪水和饥荒或近来发生的不安全、开发所置换”。他发现介于毒气工厂和被污染湖泊之间一块危险的矿层土地

---

〔1〕 斯蒂尔瓦根：《发育不良的生命，停滞的经济体》（*Stillwaggon, Stunted Lives, Stagnant Economies*），第 67 页。

〔2〕 维尔玛：《贫民窟印度》（*Verma, Slumming India*），第 69 页。

上正在进行一个浮士德式(Faustian)交易。确切地说,正因为此地如此危险和没有吸引力,它才得以免除“城市土地价格飞涨”的威胁。〔3〕在城市生态学看来,这样的地点是安置贫困人口的最佳位置,贫民们几乎毫无选择地住在这种灾难性环境中。

## 非自然灾害

贫民窟开始于糟糕的地质学。例如,约翰内斯堡的棚户区边缘毫无疑问处于一个危险的、不稳定的、被历代采矿所破坏的镁矿土壤地带。该地区至少一半的非白人住在位于有毒废弃物和地表逐渐下沉区域的非正式居住区中。〔4〕同样地,滑坡和山崩灾难性地毁灭了贝洛奥里藏特(Belo Horizonte)以及巴西城边山脚下高度风化土地上的其他贫民窟。〔5〕1990年的地形学调查显示,圣保罗1/4的贫民窟位于危险的被侵蚀区,而其他贫民窟处于悬崖或可能被侵蚀的岸边。16%的擅自定居者处于随时可能“失去生命或丧失他们财产”的危险之中。〔6〕里奥最著名的贫民窟建在同样不稳定的风化花岗岩拱形结构顶上的土壤上,以及经常腾出来埋葬死人(1966—1967年2000名、1988年200名和2001年

---

〔3〕 西布鲁克:《在南部城市中》(Seabrook, *In the Cities of the South*)第177页。

〔4〕 马尔科姆·勒普顿和托尼·沃尔夫森:《威特沃特斯兰德的低收入住宅、环境与矿业》,收入梅因和威廉斯:《第三世界的环境与住房》(Malcolm Lupton and Tony Wolfson, “Low-Income Housing, the Environment and Mining on the Witwatersrand,” in Main and Willimas, *Environment and Housing in Third World Cities*),第115,120页。

〔5〕 克劳迪娅·维亚纳和特雷珍哈·高尔奥:《铝红土土壤腐蚀性灾害索引》,载于《自然灾害评论》(Claudia Viana and Terezinha Galvão, “Erosion Hazards Index for Lateritic Soil,” *Natural Hazards Review* 4:2),2003年5月,第82-89页。

〔6〕 塔施纳:《巴西擅自定居区和贫民窟》(Taschner, “Squatter Settlements and Slums in Brazil”)第218页。

圣诞节70名被害者尸骸)的山脚下。〔7〕与此同时,战后美国最糟的自然灾难是雪崩和随之而来的暴雨,这使得波多黎各岛(Puerto Rico)庞塞市(Ponce)危险山脚下玛玛伊斯(Mamayas)棚户区的500名居民丧生。

然而,加拉加斯(2005年,520万人)才是土壤地质学家的“完美风暴”:几乎2/3城市人口的贫民窟住房建在地质极不稳定的山脚,或围绕着加拉加斯峡谷地震带的深谷。最初,植被使得易碎的、高度风化的片岩保持下来,但灌木砍伐和充填建筑使得人口密集的山坡不再稳定,结果是山崩和滑坡的极速增加:从1950年代前的10年难遇一次到近来的平均每月两次以上。〔8〕然而,地质不稳定性的不断增加并没有能够阻止擅自定居者们在危险的山腰、扇形淤积区的山坡或经常遭受洪水泛滥的峡谷口拓居。

1999年12月中旬,委内瑞拉北部,特别是阿维拉山区(El Avila massif),遭遇特大暴风雨灾害。年均降雨量在几天之内悉数渗透到土壤中:事实上,某些地区的降雨被称作是“千年一遇”的事件。〔9〕突如其来的洪水和泥石流涌入加拉加斯——特别是沿加勒比海岸阿维拉山的那一面——使得大约3.2万人丧生,14万人无家可归、20万人丢了工作。海岸淤积了来自卡拉瓦列达(Caraballeda)的被洪流毁坏的180万吨泥石,

---

〔7〕理查德·帕克、戴维·豪威尔和拉塞尔·格雷梅:《滑坡与城市:讨厌的共生》,收入格兰特·海肯、罗伯特·法昆迪尼和约翰·索特编:《城市地球科学读本》(Richard Pike, David Howell, and Russell Graymer, “Landslides and Cities: An Unwanted Partnership,” in Grant Heiken, Robert Fakundiny, and John Sutter (eds), *Earth Science in the City: A Reader*) 华盛顿,2003年,第199页。

〔8〕弗吉尼亚·希门尼斯-迪亚兹:《加拉加斯贫民窟滑坡的发生率与原因》,收入梅因和威廉斯:《第三世界的环境与住房》(Virginia Jimenez-Diaz, “The Incidence and Cause of Slope Failure in the Barrios of Carracas,” in Main and Williams, *Environment and Housing in Third World Cities*), 第127-129页。

〔9〕杰拉尔德·F. 维乔雷克等:《与1999年12月委内瑞拉海岸暴雨相关的泥石流和洪灾及应对策略》,载于《美国地理调查》,01-0144号公开报告(Gerald F. Wiczorek et al., “Debris-Flow and Flooding Hazards Associated with the December 1999 Storm in Coastal Venezuela and Strategies for Mitigation,” *US Geological Survey, Open File Report 01-0144*), 华盛顿,2000年,第2页。

包括房子般大小的圆石。〔10〕一位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暗示说这是神对于近来雨果·夏维惹(Hugo Chávez)左翼政府选举的报复,但外国牧师约瑟·文森特·兰赫尔(Jose Vincente Rangel)反驳说:“这是残酷的神对这一地区最穷区域的报复。”〔11〕

加拉加斯地区是山崩,都市区马尼拉则经常是洪灾。位于三条河流边缘的半冲积平原,遭受暴雨和台风的侵袭,马尼拉是一个天然的洪灾盆地。1898年美国殖民当局开挖了运河之后,用挖泥机疏浚通海的河道,并兴建管道系统来排干暴风雨淤积的水以保护市中心。然而,近年来这一系统的改善功能被一系列事实抵消殆尽:大量废弃垃圾排放到下水道和通海河道中(巴石河底估计有12英尺厚的垃圾)、〔12〕地下水的过度抽取导致地表下沉、里基纳市(Marikina)和蒙特班(Montalban)的森林滥伐和(最主要的)棚户区不断侵入湿地。换句话说,住房危机已经改变了洪水问题的特征和危害程度,最穷的1/5人口暴露在经常的危险和财产损失中。例如,1998年12月,洪水伤害或摧毁了30多万人的家园,另一方面,塔特隆(Tatlon)的擅自定居区被淹没在6多米深的水中。此外,2000年7月,奎松城(quezon)柏雅塔斯(Payatas)贫民窟臭名昭著的“垃圾山”倒塌。这导致了一场大洪水的泛滥,冲毁了500间棚屋,并导致至少1000人丧生。(柏雅塔斯已经被日本电影制片人四乃宫浩(Hiroshi Shinomiya)拍成许多著名的纪录片)〔13〕。

加拉加斯和马尼拉的例子展示了贫困如何加剧了当地的地理和天气

〔10〕 帕克、豪威尔和格雷梅:《滑坡与城市》(Pike, Howell and Graymer, “Landslides and Cities,”),第200页。

〔11〕 转引自理查德·戈特:《在解放者的阴影下:雨果·夏维惹与委内瑞拉的改革》(Quoted in Richard Gott, *in the Shadow of the Liberator: Hugo Chávez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Venezuela*,),伦敦,第3页。

〔12〕 伯恩:《捍卫一块土地》(Berner, *Defending a Place*),第14页。

〔13〕 班科夫:《构造弱点》(Bankoff, “Constructing Vulnerability,”),第224-236页;《亚洲经济新闻》(*Asian Economic News*),2001年12月31日,(关于柏雅塔斯灾难的影片,如四乃宫浩导演的《悲怜上帝的孩子》。——译者注)

风险。城市环境的薄弱环节(或风险)有时累积为一种灾害(自然灾害的频率和危害程度)乘以资产(遭受灾害的人群和房屋)乘以脆弱性(建筑环境的物理特征)的结果:危险系数 = 灾害 × 资产 × 脆弱性。非正式城市化到处繁殖——有时是通过一种十进位甚至更多的比率——城市环境的固有灾害。课本上的一个例子是 1988 年 8 月的暴风雨和尼罗河洪水泛滥使得喀土穆 80 万贫民流离失。科学家们指出,尽管洪水的最高水位低于 1946 年的高峰,但它造成了十倍于 1946 年的伤害,主要是因为毫无排水系统的洪泛区中贫民窟的不断扩展。〔14〕

地处危险区域的富裕城市如洛杉矶或东京,能通过大量的公共工程和“艰巨工程”减少地理或气象的风险:如利用土工织物网络、泥浆、岩石栓、漫滩阶地和重整坡度来稳定滑坡、通过钻挖深度排水井和排水管来排干饱和土壤、利用小型堤坝和盆地来拦截砂石流、把暴风雨径流量分流到广大混凝土渠道和下水道系统中等等。国家洪灾保险项目,以及跨地区的火灾和地震保险,保证了重大灾害事件中的居民区修理和重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缺乏饮用水和厕所的第三世界贫民窟不可能得到昂贵的公共工程的保护或灾难保险的覆盖。研究者们强调指出,外国债务和随之而来的“结构调整”使得“产品、竞争和效益,不利的环境后果以及潜在地容易导致灾难的居住区之间的权衡”越发困难。〔15〕“脆弱性”只不过是(常常面临外国资金压力的)政府有意忽略环境安全的同义词。

然而政府干涉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风险繁殖。在 2001 年 12 月,阿尔及利亚的巴勃-圣-乌尔德区(Bab-el-Oued)、弗雷斯瓦隆(Frais Vallon)

〔14〕 汉密希·梅因和斯蒂芬·威廉斯:《作为低收入住房天堂的边缘城市环境》,收入梅因和威廉斯:《第三世界城市环境与住房》(Hamish Main and Stephen Williams, “Marginal Urban Environments as Heavens for Low-income Housing,” in Main and Williams, *Environments and Housing in Third World Cities*), 第 159 页。

〔15〕 穆哈默德·哈姆扎和罗杰斯·策特:《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城市体系和灾难性弱点》,载于《城市》(Mohamed Hamza and Rodger Zetter, “Structural Adjustment, Urban Systems, and Disaster Vulnerab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ities* )15:4 (1998), 第 291 页。

和布思弗雷斯尔(Beaux Fraisier)等贫民窟都遭到破坏性的洪水和泥石流的侵袭。持续36小时的暴雨冲刷着山坡和低洼公寓区中脆弱的棚屋,造成至少900人死亡。面对滞后的官方反应,当地人特别是青年人采取了救援措施。三天后,当总统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 Abdelaziz Bouteflika)最终露面时,愤怒的居民们高呼反政府口号。布特弗利卡告诉受害者们,“灾难只是上帝的意志。人对此无能为力。”〔16〕

当地人知道这是无稽之谈。正如基层工程师当即指出的那样,山坡居住区是迟早要发生的一场灾难:暴雨是这种脆弱建筑的致命伤。由于建筑质量低劣、年久失修和无人照管,整个国家的这种住房建筑都遭受雨灾。〔17〕此外,更重要的是,许多灾害是政府抗击伊斯兰游击队战争的一种直接后果——为了捣毁叛乱分子的藏身之地和逃跑路线,当局砍伐了巴勃-圣-乌尔德山上的森林并密封了下水道。社会科学家阿泽丁·拉雅希(Azzedine Layachi)写道:“堵塞的排水管道使得雨水无处排放。腐败当局还允许在河床上修建棚屋和其他建筑,以公共安全为代价养肥了私人承包商。”〔18〕

比滑坡和洪灾更严重的是地震对城市住房危机的严峻考验。尽管一些长波地震——如1985年的墨西哥市地震——只波及了高层建筑,但因地震而引起的破坏经常可怕地命中品质低劣的砖、泥或混凝土住房,特别是当其与滑坡和土壤液化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地震灾害是非正式住房魔鬼交易的最好罪证。杰弗里·佩恩强调,“对规划规范和标准的散漫态度曾使得土耳其城市贫民在几十年中相对容易地获得了一些土地和公共设施,然而对于加强建筑规范的散漫态度则导致了1999年大地震中大批建

---

〔16〕 阿泽丁·拉雅希:《阿尔及利亚:洪灾与混乱状态的社会关联》,载于《中东研究和信息规划》(Azzedine Layachi, “Algeria: Flooding and Muddle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The Middle Eas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Project (MERIP) Online*, 2001年12月11日。

〔17〕 《阿尔及利亚的洪水和泥石流》,载于《地质时代》(“Flood and Mudslides in Algeria,” *Geotimes*), 2002年1月。

〔18〕 拉雅希:“阿尔及利亚”(Layachi, “Algeria”)。

筑物的致命伤。”〔19〕

灾害地理学家肯尼思·休伊特(Kenneth Hewit)宣称,地震在21世纪摧毁了超过1亿户住房,主要是贫民窟、廉价公寓区和贫困乡村。地震威胁在大多数城市分布如此不均以至于“阶级地震(classquake)”一词被生造出来描述地震破坏的偏振模式。

也许,这一问题的最惨明证是使得120万人流离失所的1978年2月危地马拉(Guatemala)大灾难。在危地马拉市,几乎所有被毁坏的5万9千所住房都位于城市贫民窟,它们建在深谷、悬崖上下,不稳定的陡崖或新近形成的火山灰堆积层上。城市其他地区和更富裕居住区中的损失均可忽略不计,因为它们都位于更稳定的地理位置。〔20〕

世界上大部分城市人口如今都集中在(或靠近于)地层构造板块边缘,特别是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地区。数十亿人处于地震、火山、海啸、暴雨和台风的危险之中。如果说2004年12月苏门答腊(Sumatra)大地震和海啸是相对少见的事件,其他灾难则是下个世纪所无法避免的。例如,伊斯坦布尔的一夜建成区是沿北安纳托利亚(North Anatolia)不断恶化的体系的“开口拉链(opening zipper)”向西扩展的地震的最终要害。同样,利马当局预测至少10万幢建筑物——大多数在贫民窟(西班牙语:turgurios)和城市贫民窟——将会在下个时代某个时候的大地震中坍塌。〔21〕

但是城市贫民并没有为地震或洪灾而寝食难安。他们的主要焦虑是

---

〔19〕 杰弗里·佩恩:《降低阶梯: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框架》,收入卫定达和伊德合编:《城市与发展》(Geoffrey Payne, “Lowering the Ladder: Regulatory Framework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Westendorff and Eade, *Development and Cities*), 第259页。

〔20〕 肯尼思·休伊特:《危险区域:灾难的地理学介绍》(Kenneth Hewit, “Regions of Risk: 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Disasters”), 1997年,第217-218页。

〔21〕 伦纳德:《利马》(Leonard, “Lima”), 第439页。

另一种更经常和无所不在的威胁：火灾。贫民窟——而非课本上宣称的地中海灌木丛或澳大利亚桉树——是世界上最易燃的。对同时发生的燃烧来说，易燃的住房、超常的人口密度以及依靠明火来取暖和煮饭等因素的混合是一种最佳组合。一次小小的煤气或煤油事故可能迅速变成一场毁掉成百甚至上千所住房的大火。火势以超常速度沿着棚户蔓延，救火车，即便它们作出反应，也常常无法进入狭窄的贫民窟街道。

然而，贫民窟火灾通常不过是人为制造的事故：与其承受法律程序的高昂费用或忍受官方拆迁令的漫长等待，地主和开发商们经常选择简单易行的纵火。马尼拉特别以可疑的贫民窟纵火而臭名昭著。杰里米·西布鲁克解释说：“1993年2月和4月间，发生了8起贫民窟重大火灾，包括对烟雾山、阿诺玛海滩（Aroma Beach）和纳沃塔斯（Navotas）等贫民窟的蓄意纵火。受到威胁最严重是码头附近地区，那儿是扩张的最终极限。”〔22〕

埃哈德·伯恩补充说，菲律宾（Filipino）地主们最喜欢选择一种叫做“热拆迁（hot demolition）”的方式：驱逐一只“浸透煤油的燃烧着的活老鼠或猫——狗死得太快了——进入一个麻烦的片区……这种方式引起的火灾很难扑灭，因为不幸的动物能在临死之前惹燃足够多的棚屋。”〔23〕

图表 11 可燃的贫困

	城市	毁坏户数	流离失所的人数
2004			
1月	马尼拉(Tondo)	2500	22 000
2月	内罗毕		30 000
3月	拉各斯		5000
4月	曼谷	5000	30 000

〔22〕 西布鲁克：《在南部城市中》（Seabrook, *In the Cities of the South*），第271页。

〔23〕 伯恩：《捍卫一块土地》（Berner, *Defending a Place*），第144页。

(续表)

	城市	毁坏户数	流离失所的人数
11月	达卡	150	
2005			
1月	库尔纳市		7000
	内罗毕	414	1500
2月	德里		3000
	海得拉巴	4000	30 000

在地价暴涨的印度灰姑娘城市班加罗尔,贫民常常住在错误的地方,纵火也被用作城市复兴的手段(拉丁语, ad bac)。汉斯·申克写道:“这些火灾,有些被认为是由能获得(部分)政府补偿金的贫民窟领导者所组织;有些是与政党相关的黑帮所为,以清理‘不受欢迎的’城市贫民;有些是因为私人土地所有者想要以一种简易方式清理他们土地上的(非法)擅自定居者并‘开发’该地。”〔24〕

### 贫民窟形式的病理学

如果说城市贫困加剧了自然灾害,贫困、有毒工业、无政府状态的交通以及不断被毁坏的基础设施的相互作用则制造了新的和完全人为的灾害。据都市理论家马修·甘迪(Matthew Gandy)所言,如此之多的第三世界城市杂乱无章的形式——“城市分形图形”<sup>\*</sup>——抵消了城市生活的

〔24〕 汉斯·申克:《班加罗尔贫民窟的生活》,收入申克编:《印度贫民窟生活:班加罗尔个案研究》(Hans Schenk, “Living in Bangalore’s Slum,” in Schenk (ed), *Living in India’s Slum: A Case Study of Bangalore*), 德里, 2001年, 第34页。

\* mandelbrot, 曼德尔布罗特(B. B. Mandelbrot)在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创立了分形几何理论。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和社会活动中广泛存在的无序(无规则)而具有自相似性的系统。——译者注

环境效率,并滋生了经常使都市人恐慌不已的小灾难,如墨西哥市、开罗、达卡和拉各斯。(甘迪解释说“拉各斯并不真正作为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城市而存在;其边界是模糊不清的;其许多构成部分是各自为政的……”)[25] 城市规划的所有经典原则——包括对开放空间的保留,分隔有害土地与居住用地——在贫困城市都是无法实现的。地狱般的分区条例使得危险的工业活动和交通基础设施周围就是密集的棚户群。几乎每一个(至少是那些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大型第三世界城市都有一个位于管道、化工厂和精炼厂附近,时刻遭受污染的贫民窟但丁式(Dantesque)地区:墨西哥的伊兹塔帕拉帕(Iztapalapa)、圣保罗的库巴陶(Cubatão)、里奥的贝尔伍德洛克索(Belford Roxo),雅加达的舍巴巴尔(Cibubur),突尼斯的南部边缘和亚历山大市(Alexandria)西南部等等。

在其关于南部贫困城市的书中,杰里米·西布鲁克编年了夹在码头、化工厂和高速公路中间的曼谷港口贫民窟克朗托伊(Klong Toey)残酷的灾难日历:1989年,一场化学爆炸使数百名居民中毒;两年后一个化学仓库爆炸使得5500名居民无家可归,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死于神秘疾病;火灾在1992年毁坏了63户人家,1993(另一场化学爆炸的那一年)烧毁了160户,1994年烧毁了几百户。[26] 数千个其他贫民窟——包括一些富裕国家的贫民窟——都有过与克朗托伊相似的历史。他们患上了吉塔·维尔玛所称的“垃圾场综合症”:镀金、染色、涂底、鞣革、电池回收、铸造、汽车修理、化工制造等有毒工业活动的集中污染。这些是中产阶级无法忍受出现在他们自己居住区中的。[27] 几乎没有什么研究关注到这些地区的环境健康,特别是这些地区多重毒素和污染物质所引发的增

---

[25] 马修·甘迪:《无定形的都市主义:拉各斯大都市的混乱与复杂》(Matthew Gandy, “Amorphous Urbanism: Chaos and Complexity in Metropolitan Lagos”),手稿,2004年12月(发表于2005年5、6月份的《新左派评论》),第1-2页。

[26] 西布鲁克:《在南部城市中》(Seabrook, *In the Cities of the South*),第192页。

[27] 维尔玛:《贫民窟印度》(Verma, *Slumming India*),第16页。

效作用。

通常,仅仅在贫困和有毒工业以巨大的因果关系爆发出来时,世界才会注意到它们的致命混合——1984年是“恐怖年(annus horribilis)”。2月份,圣保罗“污染谷”库巴陶的一条煤气管道爆裂,烧死了近旁一个贫民窟的500多名居民。8个月后,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的液化天然气工厂像一颗原子弹一样在墨西哥市的圣朱阿尼科(San Juanico)贫民窟爆炸,导致2000名左右的贫困居民丧生(没有确切的死亡人数统计)。

数百人在睡梦中死去。他们甚至在意识到发生什么事情之前就已经丧生。巨大的火焰从附近的天然气工厂冲天而起,一直升到数千英尺的高空。人们在火焰中化为灰烬,完全没有逃生之路。人们跑过街道,一些人的衣服和头发着了火,所有人都恐怖地尖叫。太阳还没有出来,但火焰的光芒使这个场景亮如白昼。〔28〕

不到三周后,中央邦(Madhya Pradesh)省会博帕尔(Bhopal)的联合碳化物厂(Union Carbide Plant)释放了其臭名昭著的、致命的甲基异氰酸盐烟。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2004年的研究表明,7千到1万人当即死亡,另外1.5万人在几年后死于相关疾病和癌症。受害者是贫民中最穷的人,主要是穆斯林。杀虫剂包装厂——“一种相对单纯和安全的活动”——曾建在一个已经长期为擅自定居者占据的地区。随着这个工厂的扩展并转向为更危险的杀虫剂生产,贫民窟萌生在其周边。直到他们发现自己的孩子死在大街上,贫穷的擅自定居者们才意识到工厂究竟在生产什么。这正是大量甲基异氰酸盐烟所导致灾害的预兆。〔29〕

---

〔28〕 约尔·西蒙:《濒临灭绝的墨西哥:周边环境》(Joel Simon, *Endangered Mexico: An Environment on the Edge*)旧金山,1997年,第157页。

〔29〕 国际特赦组织:《非正义的乌云:博帕尔20年来的灾难》(Amnesty International, *Clouds of Injustice: The Bhopal Disaster 20 Years on*)伦敦,2004年,第12、19页。

另一方面,贫民窟居民深切意识到大多数第三世界城市街道上极端严重的全面交通堵塞所造成的交通混乱危险。都市发展不断延展,却没有相应的大型运输或分级公路的社会投资。这使得交通成为一场公共健康的灾难。尽管像噩梦般拥挤,发展中城市的汽车正在暴增(参见图表12)。1980年代第三世界汽车拥有量仅占全球的18%;到2020年,预计世界半数左右的13亿辆小汽车、卡车和公共车——以及数亿辆摩托车和小型摩托车——将塞满更贫穷国家的大街小巷。〔30〕

图表 12 第三世界的机动车化〔31〕

城市	年份	数量(以百万辆计)	类型
开罗	1978	0.5	
	1991	2.6	
	2006	7.0	
曼谷	1984	0.54	私家小汽车
	1992	10.5	
印度尼西亚	1995	12.0	各种机动车
	2001	21.0	

〔30〕 M. 彭伯顿《管理未来世界车辆预测和2020年应对策略》,卷一《需求模式的变更》,2000年;丹尼尔·史贝林和艾琳·克劳森:“发展中世界的机动化挑战”,科技在线网的议题(M. Pemberton, *Managing the Future-World Vehicle Forecasts and Strategies to 2020, Vol. 1: Changing Patterns of Demand*, 2000; and Daniel Sperling and Eileen Clausen, “The Developing World’s Motorization Challenge,” *Issu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line*), 2002年秋,第2页。

〔31〕 M. 艾尔·阿拉比:《城市增长与环境恶化:以开罗为例》,载于《城市》19:6(M. El Arabi, “Urban Growth and Environment Degradation: The Case of Cairo”, *Cities*), 2002年,第294页;曼谷高速公路和高速交通系统局,《1992年统计报告》(*Expressway and Rapid Transit Authority of Bangkok, Statistical Report, 1992*),曼谷,1993年;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管理部门:“印度尼西亚:环境问题”,概况介绍(US Department of Energy,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Indonesia: Environmental Issues,” *fact sheet*), 2004年2月。

汽车数量的剧增是被强有力的不平等力量所驱使的。正如丹尼尔·史贝林(Daniel Sperling)和艾琳·克劳森(Eileen Clausen)解释的那样,大多数城市的交通政策是一个恶性循环:公交质量的下降强化了私家车等交通工具的使用:

几乎所有城市的公共交通都需大力补贴,因为其巨大的客观性(公路需求和拥堵的下降),也因为这能确保贫民的通行。无论如何,许多贫民仍然不能负担私人交通工具。因此城市面临保证低廉交通费用的压力。但在降低费用的过程中,它们牺牲了公共车辆的质量和舒适度。中产阶级人士的反应是尽可能快地购买私家车。中间阶层也迅速作出反应:购买低价的小型摩托车和汽车。随着公交运输收入的下降,管理者开始进一步降低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在为更穷的客户服务。尽管最先受影响的是服务质量,随之而来的是服务数量的下降。〔32〕

通过选择性投资公路而非铁路,跨国发展机构鼓励了破坏性交通政策以及当地交通的私有化。在中国——先前是人人平等的家用自行车——规划者如今给汽车提供了不合理的优先性。大批传统的乡村贫民住宅及风景如画的胡同被拆迁,从而为北京的林荫大道和汽车道腾出了空间。与此同时,自行车上班族被迫忍受一系列不便:承担办理新证件的费用,限制使用主干道,并取消了之前由工作单位提供的自行车补贴。〔33〕

城市贫困与交通拥堵间冲突的结果是全然的屠杀。第三世界每年超过100万人——他们中2/3的是行人、骑自行车的人和乘客——死于交通事故。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一名研究者报道,

---

〔32〕 史贝林和艾琳·克劳森:《发展中世界的汽车化挑战》(Sperling and Clausen, "The Developing World's Motorization Challenge,"),第3页。

〔33〕 例如西特《北京》中的北京(Example of Beijing in Sit, *Beijing*),第288-289页。

“那些没有私家车的人是最冒险的。”〔34〕小公共车和小型巴士,经常是无证行驶而且车况极差,是特别危险的。如在拉各斯,公共车被当地人看作“飞驰的棺材(danfós)”和“移动的太平间(molues)”〔35〕大多数贫困城市交通的蜗牛速度减少了其杀伤力。但尽管小汽车和公共车以平均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穿行在开罗,埃及首都仍然保持每年1000辆机动车中8人死亡、60人受伤的事故率。〔36〕在拉各斯,普通居民平均每天花难以置信的3小时陷在可怕的全面交通堵塞中,私家车上班族和小公共车司机几近抓狂——实际上,如此多的司机跨线行驶或逆向行驶,以至于交通部最近强迫犯规者接受强制性的精神病测试。〔37〕与此同时,在德里,《印度时代》(*Hindustan Times*)近来抱怨中间阶层的上班族在撞倒无家可归的捡垃圾者或穷孩子时很少愿意停车查看。〔38〕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交通死亡和伤害的全部经济损失估计约为“发展中国家收到的世界范围内发展援助的两倍。”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把交通看作是城市贫民面临的最严重的健康危害,并预计到2020年交通事

〔34〕 世界卫生组织基金会道路交通伤害研究网,转引自《底特律自由新闻报》(Study by WHO-funded Road Traffic Injuries Research Network, Quoted in *Detroit Free Press*),2002年9月24日。

〔35〕 维兰·蓝图亚和迈克尔·赖希:《被忽视的流行病:发展中国家道路交通伤害》,载于《英国医学杂志》(Vinand Nantulya and Michael Reich, “The Neglected Epidemic: Road Traffic Injur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ine* 324), 2002年5月11日。

〔36〕 艾尔·阿拉比:《城市增长与环境恶化》(El Arabi, “Urban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第392-394页;奥贝南:《第三世界大都市的人口增长、就业与贫困》(Oberai, *Population Growth, 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Third World Mega-Cities*),第16页(事故率)。

〔37〕 格伦·麦肯齐:《违反交通者的强制性精神病学测试》,载于美国RedNova新闻网(<http://www.rednova.com/>)(Glenn McKenzie, “Psychiatric Tests Required for Traffic Offenders,” *RedNova*),2003年6月20日;派尔:“西非英语地区的城市住房和服务设施”(Peil, “Urban Housing and Services in Anglophone West Africa”),第178页。

〔38〕 《印度时报》(*Hindustan Times*),2004年2月1日。

故将是排名第三的主要死亡因。<sup>[39]</sup> 汽车与自行车和行人争道的中国将不幸地名列前茅:仅仅是2003年的前5个月中,将近25万中国人在交通事故中死亡或重伤。<sup>[40]</sup>

当然,猖獗的机动车化也正在加重第三世界空气污染的噩梦。无数旧汽车,破旧公共车和报废卡车所排放的有毒废气使城区窒息,而小型发动机驱动的脏兮兮的二冲程内燃机排放了十倍于现代汽车的废气。近来的研究表明,墨西哥、圣保罗、德里和北京不断延展的大城市中的脏空气大多数是致命的(每年300个糟糕的臭氧天)<sup>[41]</sup>。与此同时,呼吸孟买的空气相当于每天吸一包半香烟,德里的科学与环境中心(Centre for Science and the Environment)最近发出警告,印度正在变成“毒气室”。<sup>[42]</sup>

---

[39] 世界卫生组织:“道路安全是无事故”,2003年12月;以及道路交通伤害研究网,转引自《底特律自由新闻报》(WHO, “Road Safety Is No Accident”, November 2003; and Road Traffic Injuries Research Network cited in *Detroit Free Press*, 2002年9月24日)。

[40] 《人民日报》英文版(*People's Daily*, English), 2003年6月24日, 24 June, 2003.

[41] 阿斯米·克汉:《世界大城市中的城市空气污染》,载于《格林时报》,1997年春,佩恩环境集团出版。(Asim Khan, “Urban Air Pollution in Megacities of the world,” *Green Times*, Spring 1997); published by Penn Environmental Group 也参见“评论:城市空气污染”,载于《科学前沿》(See also: “Commentary: Urban Air Pollution,” in *Current Science* 77:3) 77:3 (10 August 1999), p. 334; “清理亚洲致命空气世界银行集团会议”(“World Bank Group Meets to Clean Up Asia's Deadly Air”),联合出版社,2003年7月21日。

[42] 苏克图·梅塔:《极限城市:孟买的得失》(Suketu Mehta, *Maximum City: Bombay Lost and Found*), 纽约,2004年,第29页;卡琳娜·康斯坦丁诺-戴维:“非持续发展:菲律宾经验”,收入卫定达和伊德:《城市与发展》(Karina Constantino-David,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 in Westendorff and Eade, *Development and Cities*), 第29页。

## 环境保护区的强占

抽象意义上的城市是全球环境危机的解决办法：城市密度能转化为土地、能源和资源使用的巨大效率，而民主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机构同样能提供无数比私人消费和商业休闲更高水平的享受。然而，正如帕特里克·杰德斯(Patrick Geddes)（真正的生态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之父)以来的都市理论家们长期以来已经认识到：环境效率和公共富裕都需要原始绿色生态系统、开放空间和自然保护区的保留；城市需要与自然合作以回收它们制造的垃圾，并使之成为农场、花园和能源生产的有用投入。可持续发展的都市主义以保留城市周围的湿地和农业为前提。不幸的是，第三世界城市——极少例外——正系统地污染、都市化和毁灭它们最重要的环境支持系统。

例如，城市空地常常被埋在无人收集的废品之下，并成为老鼠和昆虫带菌者(如苍蝇等)的小型乌托邦。垃圾产生率与回收率之间的长期差额经常是惊人的：达累斯萨拉姆(Dar-es-Salaam)的垃圾收集率仅为25%；卡拉奇是40%；雅加达是60%。<sup>[43]</sup>同样，喀布尔的城市规划主管抱怨，“喀布尔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固体垃圾场……每24小时，200万人产生800立方的固体垃圾。如果我们所有的40辆垃圾车每天跑三趟，它们只能把200—300立方垃圾运送到城外。”<sup>[44]</sup>垃圾的内容有时是可怕的：《每日画报》(*Daily Graphic*)近来描述：在阿克拉，“不断增大的垃圾堆，充斥着装有阿克拉女搬运工和十多岁小女孩的堕胎婴儿尸体的黑色塑料袋。据城市首席执行官所言，‘城里75%的黑色聚乙烯塑胶垃圾袋

---

[43] 文森特·伊菲尼·奥古：《贝宁市的私营部分参与与市政废水管理》，载于《环境与城市化》12:2(Vincent Ifeanyi Ogu, “Private Sector Participation and Municipal Waste Management in Benin City,”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2:2), 2000年10月, 第103, 105页。

[44]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2002年8月26日。

里装的是人流胎儿。’”〔45〕

与此同时,边缘的绿化带正被变成生态荒地。多余的城市过剩人口毫无必要地毁坏农田,并危及整个亚洲和非洲的食品安全。在印度,每年有超过5万公顷的有价值的庄稼地消失在城市化进程中。〔46〕中国的“农业灾难”高峰期是1987到1992年。每年有近100万公顷农田被转为城市用地。〔47〕在埃及,地球上最密集的农业国,城市扩展显然已达到了危急时刻:整个开罗,城市开发每年消耗3万公顷土地。弗洛里安·斯坦伯格(Florian Steinberg)指出:“这大致相当于从——以阿斯旺高水坝(Aswan High Dam)为开端的——大型灌溉工程中所获得的全部农用地数量。”〔48〕此外,供给城市人生活所需的城郊农业被人和动物的粪便肥料中发现的毒素所污染。从空中看,亚洲城市传统上曾环绕着明亮的绿晕——高生产率的农田一直延展到经济实用的清粪车周围。但现代工业污水已经变成带有重金属和危险病原体的毒素。河内(Hanoi)郊外,农夫

〔45〕《每日画报》阿克拉(*Daily Graphic, Accra*),2000年8月12日;转引自H. 惠灵顿:“Kelewle, Kpokpoi, Kpanlogo”,收入拉尔夫·米尔斯-达科和阿迪-达科编:《城市视野:21世纪的阿克拉》(quoted in H. Wellington, “Kelewle, Kpokpoi, Kpanlogo,” in Ralph Mills-Tettey and Korantema Adi-Dako (eds), *Visions of the City: Accr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阿克拉,2002年,第46页。

〔46〕萨哈博·法兹尔:《城市扩张与农地的丧失——一项基于全球情报系统(Glob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的、对印度萨哈兰普尔城市的研究》,载于《环境与城市化》(Shahab Fazal, “Urban Expansion and Loss of Agricultural Land—a GIS-Based Study of Saharanpur City, India,” *Environmental and Urbanization* 12:2),2000年10月,第124页。

〔47〕参见 [www.infoforhealth.org/pr/m13/m13/m13chap3\\_3.shtml#top](http://www.infoforhealth.org/pr/m13/m13/m13chap3_3.shtml#top) 网“城市化所丧失的农用地”一文(See “Loss of Agricultural Land to Urbanization” at [www.infoforhealth.org/pr/m13/m13/m13chap3\\_3.shtml#top](http://www.infoforhealth.org/pr/m13/m13/m13chap3_3.shtml#top))“保护耕地免遭工业侵害”,载于《中国日报》(“Farmland Fenced off as Industry Makes Inroads,” *China Daily*),2003年8月18日。

〔48〕弗洛里安·斯坦伯格:《开罗:非正规土地开发和未来的挑战》,收入巴肯和范·德·林登编:《第三世界低收入人群的土地转让》(Florian Steinberg, “Cairo: Informal Land Development and the Challenge for the Future,” in Baken and van der Linden, *Land Delivery for Low Income Groups in Third World Cities*),第131页。

和渔夫常常被城市开发连根拔起,城市和工业废水如今通常被用作免费的人工肥代用品。研究者们质疑这一有毒实践并发现了“蔬菜和鱼类生产者们对‘富有的城里人’的犬儒主义(cynicism):他们并不在意我们,(对农用地)给予无济于事的补偿来愚弄我们,那我们为什么不能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呢?”〔49〕同样地,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贫民窟扩展到田地,“一种被称作‘垃圾栽培(Keera Kotu)’的独一无二的耕种形式出现了,城市垃圾(包括那些不卫生的)被用来使蔬菜尽可能快地生长在任何可能的地方”。〔50〕。

随着大多数城市中住房危机的日益恶化,贫民窟也直接侵入重要的生态保护区和被保护流域。在孟买,贫民窟居民已经深入到桑贾伊·甘地国家公园(Sanjay Gandhi National Park)如今经常有人被豹吃掉(仅仅2004年6月就有10人),一只被激怒的猫科动物甚至攻击一辆城市巴士。在伊斯坦布尔,贫民窟强占着重要的奥梅利森林(Omerli forest)流域;在基多,棚户区环绕着安提萨那山(Antisana)保护区。在圣保罗,贫民窟威胁到瓜那皮朗加(Guarapiranga)保护区水源——已经因其讨厌的气味而臭名昭著——的进一步污染,而该水源占城市供水的21%。实际上,圣保罗正在进行一场吃力不讨好的战争,它每年被迫使用17万吨(或1.7万车)水处理化学品来保证饮用水的供应。专家们警告,这一权宜之计是一个不可持续的解决措施。

圣保罗半数的贫民窟位于城市供水保护区的河岸上,这把公共健康置于危险之中。擅自定居者们把自己的垃圾丢到保护区或城市供水的溪流中,致使市政供水网络的质量控制系统在最近这些年来

---

〔49〕 范·登·伯格、范·维吉克和范·霍伊:《河内农业和乡村生活的向下转换》(Van den Berg, van Wijk, and Van Hoi,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Life Downstream of Hanoi”),第52页。

〔50〕 达亚拉丁和拉贾·萨马拉维克勒马:《授权社区》(Dayaratne and Samarawickrama, “Empowering Communities”),第102页。

有很大问题。除了提高水的氯化以防止肠道疾病之外,他们很难控制水藻繁殖,既然它随着有机物的累积而生长迅速。〔51〕

各地污水污染着饮用水源。在坎帕拉(Kampala),贫民窟的污水排放污染了维多利亚湖(Lake Victoria),而在蒙罗维亚(Monrovia)——战后暴增到130万人,但其下水道系统设计仅能保证25万以下的人口的使用——贫民窟分布弄脏了全部景观:海滩、街道、庭院和溪流。〔52〕在内罗毕更穷的地区,由于水源地的粪便污染,管道水不再能供人饮用。〔53〕与此同时,墨西哥市最重要的生态缓冲区——阿加斯科补给区(Ajusco recharge area)——如今被周围贫民窟的污水严重污染。〔54〕实际上,专家们估计足足90%的拉丁美洲污水被毫无处理地倾倒入溪流和河流中。〔55〕从公共卫生的观点看,每个洲的贫困城市都面临下水道堵塞和溢出的问题。

## 活在粪便中

实际上,排泄物过剩是最初的城市冲突。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

---

〔51〕 塔施纳:《巴西擅自定居区和贫民窟》(Taschner, "Squatter Settlements and Slums in Brazil"),第193页; 刘易斯·加尔奥:《美国的水污染危机》,载于《人居辩论》(Luis Galvão, "A Water Pollution Crisis in the Americas," *Habitat Debate*),2003年9月,第10页。

〔52〕 《新闻》(蒙罗维亚)(*The News (Monrovia)*),2004年2月23日。

〔53〕 彼得·穆特武:《非正规居住区卫生与保健教育计划的提出,旨在推动饮用水的安全处理及公共卫生设施的合理使用》。收入《简报》(Peter Mutevu, "Project Proposal on Health and Hygiene Education to Promote Safe Handling of Drinking Water and Appropriate Use of Sanitation Facilities in Informal Settlements,"),内罗毕,2001年4月。

〔54〕 因帕拉托和鲁斯特:《贫民窟升级与参与》(Imparato and Ruster, *Slum Upgrading and Participation*),第61页;佩佐利:《人居》(Pezzoli, *Human Settlements*),第20页。

〔55〕 斯蒂尔瓦根:《发育不良的生活,停滞的经济体》(Stillwaggon, *Stunted Lives, Stagnant Economies*),第97页。

早期,霍乱和伤寒蔓延在伦敦和欧洲的工业城市,忧虑的英国中产阶级被迫面对一个沙龙中不曾讨论过的课题。维多利亚时代学者史蒂芬·马尔库塞(Steven Marcus)解释说:“资产阶级意识突然被一种认识所打扰:数百万英国男人、女人和孩子几乎正生活在粪便中。直接的问题看来是他们是否被溺于其中。”〔56〕流行病被确信为源自贫民窟臭烘烘的粪便“毒气”,精英们中间突然迸发了一种对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曼彻斯特相关状况编目的兴趣:那儿的一些街道上,“200多人共享一个单个蹲位的厕所”,一度清澈见底的尔克河(River Irk)成了“一条又黑又臭的充满污物和垃圾的河”。马科斯在对恩格斯的一种弗洛伊德式注释中诠释了这一讽刺,“一代又一代人,他们被排除在他们生产出来的英国财富之外,被迫生活在财富象征的否定对应面。”〔57〕

恩格斯之后8代人的时间,粪便仍然作为“贫民社会状况和社会地位的一个体现”(再次引自马科斯)而病态地笼罩着城市贫民的生活。〔58〕实际上,我们可以把恩格斯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in 1844*)与现代非洲都市小说——如梅亚·姆万吉(Meja Mwangi)的《走下河道》(*Going Down River Road*)——放在一起作比较,来沉思排泄物与现实生存的关联。恩格斯写道,“在曼彻斯特的一个庭院,入口处顶棚下的走廊尽头就是一个没有门的厕所。这个厕所是如此的脏而居民只能蹚过臭烘烘的粪便池来出入这个庭院。”〔59〕相似地,姆万吉写到1974年的内罗毕:“大多数十字路口带露水的草地上散落着人的粪便……又冷又湿的风吹过并带走它。风里带着屎尿

---

〔56〕 史蒂芬·马尔库塞:《恩格斯,曼彻斯特与工人阶级》(Stephen Marcus, *Engels, Manchester and the Working Class*),纽约,1974年,第184页。

〔57〕 同上。

〔58〕 同上,第185页。

〔59〕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条件》,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Friedrich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第4卷,莫斯科,1975年,第351页。

的气味……时常的抱怨,很少表达出来的悲惨、不确定性和认命。”〔60〕

当然,这个话题并不优雅,但这是城市生活一个几乎无法逃避的基本问题。数万年来,城市社会一直在与它们自己垃圾的累积作殊死斗争;甚至连最富裕的城市也只能把他们的排泄物冲入或倒入附近的海洋。今天的贫困大城市——内罗毕、拉各斯、孟买、达卡等等——臭气熏天的屎尿山将使得即便是最有经验的维多利亚人也惊骇不已。(也许,鲁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是个例外,他在其《暗夜之城》(*The City of Dreadful Night*)中愉快地区分“泛加尔各答臭味(Big Calcutta Stink)”与孟买、白沙瓦(Peshawar)和贝拿勒斯(Benares)的独有臭味。)〔61〕此外,接触他人废弃物的程度是一个最深远意义上的社会区分。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知道的那样,生活在粪便中的贫民身上普遍的寄生虫效应真正划分了两种生存方式的人类。

全球环境卫生赤字危机使得一切夸张都黯然失色。其根源,正如许多其他第三世界城市问题一样,起源于殖民主义。欧洲帝国普遍拒绝提供现代下水道设备和供水基础设施给当地社区,而选择用种族区划和卫生隔离区来把驻军和白人郊区与传染病源隔离开来;从阿克拉拉到河内的后殖民统治因此遗留了巨大的卫生赤字问题,却几乎没有统治者打算积极进行补救。(拉丁美洲城市也有严重的卫生赤字问题,但无法与非洲或南亚的严峻程度相比。)

大城市金沙萨的人口迅速达到1000万,却完全没有任何下水道系统。整个内罗毕大陆,1998年克比拉的莱利萨巴(Laini Saba)贫民窟仅有10个可以使用的厕所供4万人使用,而在玛萨瑞4A(Mathare 4A)贫民窟,仅有2个公厕供2.8万人使用。其结果是,贫民窟居民依靠“移动厕所”或“飞毛腿导弹”(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他们把屎拉在聚

---

〔60〕 梅亚·姆万吉:《河床的下降》(Meja Mwangi, *Going Down River Road*),内罗毕,1976年,第6页。

〔61〕 吉卜林:《暗夜之城》(Kipling, *The City of Dreadful Night*),第10-11页。

乙烯塑胶袋里并把它丢到最近的屋顶或人行道上。”〔62〕然而,排泄物的普遍催生了一些城市地区生活的特性:在内罗毕,开车上班族如今面临这样的尴尬:“十多岁的孩子手拿装满粪便的塑料瓶,或挥舞着粪便捏成的球——等着把它们丢进开着的车窗中——以迫使司机给他们钱。”〔63〕

南亚和东南亚的卫生状况仅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稍好一点。十年前,达卡仅有能供给6.7万个家庭的饮用水管道和8500条下水道处理系统。同样,马尼拉主城区不到10%的住户连接了下水道系统。〔64〕雅加达,尽管有着炫目的摩天大楼,仍然依靠阴沟处理其大多数废水。在当代印度——约7亿人被迫露天排便——3700个城市和大城镇中仅有17个在最终排放前进行某种初级的污水处理。对印度22个贫民窟的研究表明,有9个贫民窟完全没有任何厕所设施;另外10个贫民窟,仅有19个厕所供10.2万人使用。〔65〕电影制作人、孟买电影导演普拉拉德·卡卡尔(Prahlad Kakar)告诉一个震惊的访问记者,在孟买,“半数人没有厕所来排便,所以他们在外面排便。那是500万人。如果他们每个人排便半公斤,每天早晨就是250万公斤粪便。”〔66〕与此相似,苏珊·卓别林(Susan Chaplin)报道:“1990年代德里的一份调查表明,1100个贫民窟中当4.8万个家庭仅仅拥有160个厕位和110辆流动厕所车。贫民窟地区厕所设施的缺乏迫使贫民窟居民使用开放空间(如公共公园等)进行排便,因此他们和中产阶

---

〔62〕 卡迪·萨尔蒙:《内罗毕的“流动厕所”:冰山一角》,载于《地球万岁》(约翰内斯堡)(Kary Salmon, “Nairobi’s ‘Flying Toilets’: Tip of an Iceberg,” *Terra Viva* (Johannesburg)), 2002年8月26日;穆特武:《保健和卫生教育项目建议》(Mutevu, “Project Proposal on Health and Hygiene Education”)

〔63〕 安德鲁·哈丁:《内罗毕贫民窟的生活》(系列),载于《卫报》(Andrew Harding, “Nairobi Slum Life” (series), *Guardian*), 2002年10月4日、8日、10日和15日。

〔64〕 伯纳:《捍卫一块土地》(Bernier, *Defending a Place*), 第14页。

〔65〕 联合国人居署:《辩论》(UN-HABITAT, *Debate* 8:2), 2002年6月8:2, 第12页。

〔66〕 转引自梅塔:《极限城市》(Quoted in Mehta, *Maximum City*), 第127页。

级居民在排便权问题上关系紧张。”〔67〕实际上,阿兰达蒂·罗伊谈到,三个德里贫民窟居民在1998年“因为在公共空间排便而被枪击”。〔68〕

与此同时,在中国,城市棚户区在市场改革之后重新出现,许多民工生活在没有下水道设备或饮用水的地方。多萝西·索林杰写道:“据报道,人们挤在北京的棚屋中,6000多人共享一个厕所;深圳的一个棚户区有50间房,那里的数百人没有自来水……1995年上海的一份调查表明,近4500个民工家庭中仅有11%真正拥有一个厕所。”〔69〕

北京被迫通过条例:对任何人而言,随地大小便是违法行为,但是,首先,这是一个女权主义事件。贫困的城市妇女被陷入“第22条军规”\*

---

〔67〕 苏珊·卓别林:《城市,下水道和贫困:印度的公共卫生政治》,载于《环境与城市化》(Susan Chaplin, “Cities, Sewers and Poverty: India’s Politics of Sanitation,”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1:1), 1999年4月,第152页。这种关于“排便权”的阶级斗争,是殖民地城市遗留下来的一种长期冲突。如古普图所举例子:在市议会断然拒绝他们获得饮用水和清洁的公共厕所的尝试后,坎普尔1932户擅自定居居民侵占了附近的一所公务员房屋,并用它作为他们的公用厕所(以示抗议)。警方的介入使其迅速演化为一场暴乱。(古普图:《21世纪早期印度城市穷人的政治》,第87页)(Such class struggles over the “right to defecate” are a continuation of a chronic conflict in colonial cities. Gooptu, for example, cites the 1932 case of squatters in Kanpur who, after the Municipal Board rebuffed their attempts to acquire potable water and sanitary latrines, invaded a field next to civil service bungalows and used it (in protest) as their communal latrine. The police were promptly called in and a riot ensued (Gooptu, *The Politics of the Urban Poor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India*, p. 87.))

〔68〕 阿兰达蒂·罗伊:《生活费用》,载于《前线》(Arundhati Roy, “The Cost of Living,” *Frontline* 17:3), 2000年2月5日至8日。

〔69〕 索林杰:《争取中国城市户口》(Solinger,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第121页。

\* *Catch - 22*, 美国著名黑色幽默派作家约瑟夫·海勒的代表作。它不仅仅是一本非常杰出的小说,还给英语带来了一个现在被收入英语辞典的短语: *Catch - 22*, 二十二条军规,专指那些自相矛盾、让人两难的规定与做法。它的出处是这样的:小说的主人公,约塞连,是一名二战期间的轰炸机上的军官。他不想为这场可笑而荒诞的战争卖命,于是找到军医丹尼尔帮忙,让他证明自己疯了,就可以遣返回国了。根据第22条军规规定,疯子是可以免于飞行的,但是必须本人申请。而一旦本人申请,就说明他想逃避兵役,并没有真疯。这样每个飞行员就掉入了一个圈套中。——译者注

般的恐怖统治中,既希望维持严格的道德标准而又缺乏任何私人卫生条件。新闻记者亚夏·克里希纳库马尔(Asha Krishnakumar)写道:“厕所的缺乏对妇女而言是毁灭性的。它严重影响了她们的尊严、健康、安全和私密感,并间接影响了她们的学习能力和生产效率。为了排便,妇女和女孩们不得不等到天黑,这使得她们被暴露在骚扰甚或性侵犯的危险中。”〔70〕

在班加罗尔——被称作“印度之光”的高科技招牌城市——贫民窟中的贫穷妇女,不能负担当地的付费厕所,必须等到晚上去洗澡或排泄。研究者勒施·申克-桑德贝根(Loes Schenk-Sandbergen)写道:

男人能随时随地小便,而妇女只能在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才能解决这种自然需求。为了避免伤害,妇女们不得不在清晨5点钟结伴去排便……经常是去可能藏着蛇的沼泽地,或一些周围有老鼠和其他白齿类动物的垃圾堆。妇女们经常说她们白天不吃东西只是为了避免晚上不得不去空地。〔71〕

同样,在孟买,妇女们不得不在“每天清晨2点到5点间排便,因为那是她们仅有的私密时间”。作家苏克图·梅塔(Suketu Mehta)解释说,公共厕所很少能成为妇女的解决办法,因为它们很少能用:“人们在厕所周围排便,因为便坑已经堵塞了数月或数年。”〔72〕

卫生危机的解决措施——至少是坐在舒服扶手椅上的芝加哥和波士顿经济学教授们所相信的——是使城市排泄成为一个全球事务。实

〔70〕 亚夏·克里希纳库马尔:《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载于《焦点》,20:24(Asha Krishnakumar, “A Sanitation Emergency,” *Focus* 20:24),2003年11月22日至12月5日。

〔71〕 勒施·申克-桑德贝根:《班加罗尔贫民窟的妇女,水和公共卫生:行为研究个案》,收入申克:《印度贫民窟生活》(Loes Schenk-Sandbergen, “Women, Water and Sanitation in the Slums of Bangalore: A Case Study of Action Research,” in Schenk, *Living in India's Slums*),第198页。

〔72〕 转引自梅塔:《极限城市》(Quoted in Mehta, *Maximum City*),第128页。

实际上,华盛顿发起的新自由主义的最大成就之一是把公厕变为偿付外债的收费处——在整个第三世界贫民窟,收费厕所是一个增长型工业。在加纳(Ghana),军事政府于1981年兴建了第一个使用者付费的公厕;到1990年代末,厕所被私有化了,现如今被描述为一个赚钱的“金矿”。<sup>[73]</sup>再如,在库马西(Kumasi),加纳成员(Ghanaian Assembly)赢得了这份有利可图的合同,一个家庭一天使用一次私人厕所,需要支付10%的基本工资。<sup>[74]</sup>同样地,在肯尼亚贫的民窟如玛萨瑞,上一次私人厕所需要付6美分:这对于大多数贫民而言太贵了,他们可能宁愿选择露天排便并把钱花在水和食物上。<sup>[75]</sup>坎帕拉的贫民窟如索韦托或卡姆沃亚(Kamwokya)也一样,那儿上一次公厕要花费令人畏惧的100先令。<sup>[76]</sup>

## 儿童杀手

洛夫利·约沙法(Lovly Josaphat)住在海地首都太子港(Port-au-Prince)的最大贫民窟,他说:“在太阳城(Cité-Soleil)贫民窟,我们得忍受一切。”

下雨时,我居住的城区处于洪水之中,水灌到家里。地上经常有水,墨绿色的难闻的水,它们无处排放。蚊子叮咬我们。我四岁的孩

---

[73] 参见德博拉·佩罗:《免费公厕!》收入米尔斯-泰特莱和阿迪-达科:《城市视野》(Deborah Pellow, “And a Toilet for Everyone!” in Mills-Tetley and Adi-Dako, *Visions of the City*),第140页。

[74] 尼克·德瓦斯和戴维·科勃:《城市治理和贫困:以库马西为例》,载于《环境与城市化》(Nick Devas and David Korboe, “City Governance and Poverty: The Case of Kumasi,”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2:1),2000年4月,第128-130页。

[75] 萨尔蒙:《内罗毕的“流动厕所”》(Salmon, “Nairobi’s ‘Flying Toilets.’”)

[76] 哈利玛·阿布达拉:《坎帕拉的索韦托》,载于《警戒报》(坎帕拉)(Halima Abdalah, “Kampala’s Soweto,” *The Monitor* (Kampala)),2003年11月19日至25日。

子得过支气管炎和疟疾,现在又得了伤寒。……医生说给他喝开水,不要给他吃油腻的食物,不要让他沾水。但到处都是水;一到屋外就不可能不沾水。医生说如果照顾不周,我会失去他。〔77〕

到处都是墨绿色的臭水。据公共健康专家艾琳·斯蒂尔瓦根所言,“每天,全世界与饮水供应、废物排放和垃圾相关的疾病杀死3万人,并构成折磨人类疾病的75%。”〔78〕实际上,源于糟糕的公共卫生和饮用水污染的消化道疾病——包括痢疾、肠炎、结肠炎、伤寒和副伤寒热病——高发人群为婴儿和幼童,是全世界最主要的致死因素。〔79〕露天下水道和受污染的水还伴随着鞭虫、蛔虫和钩虫等肠道寄生虫的蔓延,影响了上千万贫困城市的儿童。霍乱——维多利亚市的灾难——也继续在被排泄物污染的城市,特别是安塔那那利佛、马普托、卢萨卡等非洲城市的供应水中繁殖。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e Fund,简称UNICEF)估计,城市80%的死亡率源自糟糕公共卫生所导致的可预防疾病(艾滋病除外)。痢疾与艾滋病的联合增加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80〕

饮用水和食物普遍受到污水和废品污染,这使得贫民窟居民拼命采取的任何保护性卫生措施都毫无用处。在内罗毕的大型贫民窟克比拉,

---

〔77〕 贝弗莉·贝尔:《水深火热:海地妇女的生存和抵抗故事》(Beverly Bell, *Walking on Fire: Haitian Women's Stories of Survival and Resistance*),伊萨卡,2001年,第45页。

〔78〕 斯蒂尔瓦根:《发育不良的生活,停滞的经济》(Stillwaggon, *Stunted Lives, Stagnant Economies*),第95页。

〔79〕 参见佩罗:《免费公厕!》(See Pellow, “And a Toilet for Everyone!”) 尼基尔·塔帕尔和伊恩·桑德森:《儿童痢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界面》,载于《柳叶刀》(Nikhil Thapar and Ian Sanderson, “Diarrhoea in Children: an Interface Betwee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Lancet*), 363期,2004年2月21日,第641-650页;米尔斯-泰特莱和阿迪-达科:《城市视野》(Mills-Tettey and Adi-Dako, *Visions of the City*),第138页。

〔80〕 联合国综合地区资讯网(UN Integrated Reg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s),新闻发布于2003年2月19日。

联合国人居署的罗斯娜·瓦拉锡研究了一个蔬菜小贩穆贝瑞塔·卡特拉 (Mberita Katela) 的日常生活,她每天早晨步行 1/4 英里路去买水。她使用就在她门外的一个公共厕所。这一厕所是和她的 100 个邻居共享的,她的屋子里弥漫着下水道的恶臭。她经常为她煮饭和洗菜用水发愁——近年来克比拉的痢疾和其他与排泄物污染相关的疾病发生率高得吓人。〔81〕同样地,在加尔各答,母亲们对她们被迫使用的公共厕所糟糕透顶的服务毫无办法。这些直接位于粪便坑之上的、砖砌的窄小厕所蹬位几乎从来没有定期清扫过,因此使得“贫民窟厕所周围的人直接在人们洗澡、洗衣和洗碗的水塘和水槽中排便”。〔82〕

贫民们面对公共卫生危机时束手无策,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墨西哥市的居民们每天闻着粪臭生活:堵塞了德斯科科湖 (Lake Texcoco) 的粪便垃圾在闷热、干旱的季节引起了伤寒和肝炎。成千上万内城区居民被军事政权残酷地强迁到仰光附近的“新领地”。莫里卡·斯基德莫尔描绘了生活在这个烂泥地狱中的家庭与第一世界公共卫生的天渊之别:他们直接在他们睡觉的塑料棚前面的烂泥中煮饭和排便。这也难怪“新领地”霍乱、痢疾、骨痛热和疟疾肆虐。〔83〕在巴格达的大型贫民窟萨德尔城,肝炎、伤寒传染病盛行,完全无法控制。美国轰炸严重破坏了本已超负荷的饮用水供应和下水道设施,其结果是原来的下水道渗进家庭水供应。美国入侵之后两年,这一系统仍然处于瘫痪状态,肉眼就能辨别出自来水中的粪便纤维丝。在 115°F 高温的夏天,并没有提供其他贫民负担得起的饮水供应。〔84〕

---

〔81〕 罗斯娜·瓦拉锡:《内罗毕的贫民窟:那儿的生活对妇女而言是龌龊、残酷和短暂的》,载于联合国人居署:《论争》(Rasna Warah, "Nairobi's Slums: Where Life for Women is Nasty, Brutish and short," UN-HABITAT, *Debate*), 2002年9月,第8期,第3页。

〔82〕 卓别林:《城市下水道与贫困》(Chaplin, "Cities Sewer, and Poverty"), 第151页。

〔83〕 斯基德摩尔:《卡拉 OK 法西斯主义》(Skidmore, *Karaoke Fascism*), 第156页。

〔84〕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第156页。

与此同时,这些年来公共卫生改革运动变化不断。1980年是“联合国国际饮用水和卫生”十周年(UN's Decade of International Drinking Water and Sanitation)。但正如世界银行研究者石安庆(Anqing Shi)强调的那样,“到1980年代末,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85〕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到2025年,预计仍将有大约50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于(可防治的)疾病……大多数由传染性疾病导致,其中痢疾将继续起主导作用。”〔86〕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报告补充说:“在任何时候,南部城市近半数的人口都在遭受一种或多种——与饮水供应和卫生设施不足相关联的——疾病的折磨。”〔87〕尽管洁净的水是世界上最廉价和最重要的药,但公共水供应——正如免费厕所一样——经常与有权势的私人利益相冲突。

在贫困城市,水销售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工业。内罗毕,和往常一样,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例子,那儿有政治影响力的私营企业主们在贫民窟以昂贵的价格转售市政供水。而原本的市政供水使得贫民几乎不需要花什么钱就能负担得起一个家用水龙头。正如市长乔·阿克齐(Mayor Joe Aketch)近来所抱怨的那样,“研究表明,克比拉贫民窟的人们为每公升水支付的费用是普通美国居民的五倍以上。这是一种耻辱:内罗毕的富人利用为贫民提供的服务设施来赚钱,以实现他们的特权。”〔88〕两位当地

---

〔85〕 石安庆:《城市饮用水及下水道驳引设施对儿童死亡率的影响》(Shi, “How Access to Urban Portable Water and Sewage Connections Affects Child Mortality”), 第2页。

〔86〕 塔帕尔和桑德森:《儿童痢疾》(Thapar and Sanderson, “Diarrhoea in Children”), 第650页。

〔87〕 戴维·萨特尔斯怀特,转引自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城市地区贫困与环境联系》,载于《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术年鉴》(1996 WHO report paraphrased by David Satterthwaite, “The Links Between Pov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Urban Areas of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90), 1993年,第80页。

〔88〕 《中间技术开发集团东非时事通讯》(*Intermediat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Group (ITDG) East Africa Newsletter*), 2002年8月。

研究者写道,无力或不愿以天价向商贩们买水,一些内罗毕居民求助于饮鸩止渴的权宜之计,包括“使用下水道里的水,不洗澡不洗衣,用井水和雨水,从破管子里舀水等等”。〔89〕

图表 11 商贩水与管道水(价格构成百分比)

城 市	百分比
费萨拉巴德	6800
本通	5000
马尼拉	4200
孟买	4000
金边	1800
河内	1300
卡拉奇	600
达卡	500

表格表明,水:贫民付更多〔90〕。

罗安达的状况更糟:那儿最穷的住户被迫花费 15% 的收入来购买私人公司从附近遭受下水道污染的本戈河(Bengo River)中接过来的管道水。〔91〕地理学家安吉林·姆瓦坎(Angeline Mwacan)和人类学家西奥多·特雷冯(Theodore Trefon)指出:“位于世界第二大河沿岸的金沙萨,水也同撒哈拉沙漠(Sahara)一样稀缺。尽管管道水相对廉价一些,但水龙头经常是干的,于是贫民必须走几公里路去从被污染的河中取水。

〔89〕 玛丽:《内罗毕非正规居住区贫困、环境与儿童健康的三位一体》,载于《发展中国家健康与人口杂志》(Mary Amuyunzu-Nyamongo and Neskussie Taffa, “The Triad of Poverty, Environment and Child Health in Nairobi Informal Settlements,” *Journal of Health and Popul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4 年 2 月 8 日,第 7 页。

〔90〕 霍奇斯:《安哥拉》(Hodges, *Angola*), 第 30 页。

〔91〕 来自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提供的数据(Figures from 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1997 年。

炭也贵得不能浪费来烧水,其结果是30%的病是与水相关的疾病如霍乱、伤寒和志贺氏菌痢疾等等。<sup>[92]</sup>与此同时,在达累斯萨拉姆贫民窟,市政当局迫于世界银行的压力把日用水供应权转给私营的英资公司汇津集团(Biwater)——据救援机构报道,其结果是水价的上涨和服务的下降;贫民不得不求助于不安全的水源。据《卫报》报道,塔巴塔贫民窟(Tabata)的私人水井,一桶20公升的水卖到8分钱,城里大部分贫民窟的许多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50分。穷得买不起水的家庭只好自己打井。”而政府官员们却因他们对私有化的支持而赢得了华盛顿的掌声。<sup>[93]</sup>

## 双重负担

最极端的健康差别不再存在于城乡之间,而体现在城市中产阶级与城市贫民之间。内罗毕贫民窟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15.1%)比城市整体水平高出2到3倍,是贫困乡村的一半。<sup>[94]</sup>同样,在基多,贫民窟婴儿死亡率比富人区高出30倍;而在开普敦,贫困黑人区的结核病发生率比富裕白人区高出50倍。<sup>[95]</sup>孟买,正如旧孟买一样,仍然是一个停尸房,其贫民窟死亡率比近旁乡村地区高出50%。此外,40%的惊人总体死亡

---

[92] 安吉林·姆瓦坎和西奥多·特雷冯:《水龙头在罢工》,收入特雷冯编:《重建刚果秩序:人民如何应对政府在金沙萨的失败》(Angeline Mwacan and Theodore Trefon, "The tap Is on Strike", in Trefon, *Reinventing Order in the Congo: How People Respond to State Failure in Kinshasa*),坎普拉,2004年,第33、39、42页。

[93] 吉万·瓦萨迦:《坦桑尼亚水管干涸》,载于《卫报》(Jeevan Vasagar, "Pipes Run Dry in Tanzania," *Guardian*),2004年9月27日。

[94] 黑尔和卡尔:《全球贫民窟居民评估》(Herr and Karl, *Estimating Global Slum Dwellers*),第14页。

[95] 卡罗琳·斯蒂芬斯:《健康城市或不健康孤岛?城市不平等的卫生和社会影响》,载于《环境与城市化》8:2(Carolyn Stephens, "Healthy Cities or Unhealthy Islands? The Health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Urban Inequality,"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8:2),1996年10月,第16、22页。

率主要源自水污染和糟糕卫生状况所导致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96〕在达卡和吉大港(Chittagong),据医学卫生人员报道:“在任何时候,贫民窟社区总有将近1/3的人口是病人。”——相当于其他城市背景中全国性流行病的发生率。〔97〕

卫生研究者们强调,贫民窟居民背负着疾病的双重负担。一个研究小组写道:“城市贫民处于不发达和工业化的交界点,他们的疾病模式反映了两者的问题。首先,他们背负传染疾病和营养不良的沉重负担;同时他们遭受一系列典型慢性病和社会疾病的折磨。”〔98〕《柳叶刀》(*Lancet*)杂志编辑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补充说:“伴随着城市化,产生了一些在这之前通常仅限于乡村地区的流行病,如绦虫病、蛔虫病、血吸虫病、锥虫病和骨痛热病等等。”〔99〕然而糖尿病、癌症和心脏病也在城市贫民中发生率最高。〔100〕此外,这种双重负担在那些“收入偏低国家的小型 and 不太繁华的城市,或中等收入国家的低收入地区”经常是最重的。看起来,以政治为中心的大城市相对容易转嫁一些环境和公共卫生问题,利

---

〔96〕 雅克曼:《第三世界城市发展与新兴城镇》(*Jacquemin, Urban Development and New Towns in the Third World*),第90-91页。

〔97〕 阿布尔·巴卡特、马蒂·乌尔·拉赫曼和马尼克·波士:《孟加拉国共和国贫民窟中的计划生育选择行为:一种计量经济学方式》,载于《亚太人口杂志》12:1 (Abul Barkat, Mati Ur Rahman, and Manik Bose, “Family Planning Choice Behavior in Urban Slum of Bangladesh: An Econometric Approach,”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12:1),1997年3月,选刊,第1页。

〔98〕 埃德蒙多·沃娜、伊洛娜·布鲁和特鲁迪:《变化中的城市卫生议程》,收入柯恩等人编:《为城市未来作准备》(Edmundo Werna, Ilona Blue, and Trudy Harpham, “The Changing Agenda for Urban Health,” in Cohen et al. *Preparing for the Urban Future*),第201页。

〔99〕 理查德·霍顿:《卫生战争:全球现代医药前线》(Richard Horton, *Health War: On the Global Front Lines of Modern Medicine*),纽约,2003年,第79页。

〔100〕 因此全世界170万死于中风和心脏病的人中110万在发展中国家,参见D. 亚齐等编:《全球慢性病》,载于《科学》(Thus 11 millions of the 17 millions deaths from strokes and heart attacks worldwide a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ee D. Yach et al., “Global Chronic Diseases,” *Science*; ),2005年2月21日,第317页;以及往来书信(as well as the exchange of letters),2005年7月15日,第380页。

用其他地区作为废物和污染接受端。<sup>[101]</sup>

1970年代末以来的第三世界城市经济的新自由主义重构已经对公众(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医疗服务产生了破坏性影响。正如全球妇女生育权网站(Women's Global Network for Reproductive Rights)指出的那样,结构调整计划——债务国将其经济独立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协议——“经常要求削减公共费用,包括卫生费用(而不是军事费用)。”<sup>[102]</sup>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980年代结构调整计划所强化的财政紧缩削减了公共卫生和饮用水的公共投资,因此降低了贫民们先前所拥有的婴儿存活率优势。在墨西哥,随着1986年第二个结构调整计划的实施,医护人员参与的出生率从1983年的94%下降到1988年的45%;而产妇死亡率从1980年代的每10万人94人暴增到1988年的每10万人150人。<sup>[103]</sup>

在加纳,“调整”不仅导致了1975年和1983年间80%的健康和教育费用缩减,而且导致全国半数以上的医生移民。同样地,在1980年代早期的菲律宾,人均卫生费用缩减一半。<sup>[104]</sup>在靠石油致富(oil-rich)但整个地“结构调整计划”化了的尼日利亚,如今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

[101] 戴维·萨特思韦特:《城市得到更大、更富和更好的管理时的环境转换》,载于《地理杂志》(David Satterthwaite, “Environmental Transformations in Cities as They Get Larger, Wealthier and Better Managed,”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63: 2), 1997年7月,第217页。

[102] 全球妇女生育权网站:《开罗独立十年: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妇女健康》(Women's Global Network for Reproductive Rights, *A Debate After Cairo: Women's Health in a Free Market Economy*, Corner House Briefing 30), 斯特敏斯特牛顿, 2004年,第8页。

[103] 石安庆:《城市饮用水及下水道驳引设施对儿童死亡率的影响》(Shi, “How Access to Urban Portable Water and Sewage Connections Affects Child Mortality”), 第4-5页。

[104] 弗朗丝·斯图尔特:《调整与贫困:选项与选择》(France Stewart, *Adjustment and Poverty: Options and Choices*), 伦敦, 1995年, X第196、203、205页。

15%。<sup>[105]</sup> 经济学家米歇尔·乔苏多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谴责臭名昭著的1994年苏拉特瘟疫的爆发,“在199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支持的调整项目压力下,国家和市政预算不断缩减。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基础设施状况的不断恶化。”<sup>[106]</sup>

例子还很多:服从国际债权人支配的每个国家都被迫削减医疗费用(使得医生和护士大批移民)、停发食物补贴并把农业生产从自给自足转轨到粮食出口。正如联合国首席债务专家凡图·谢吕(Fantu Chertu)强调的那样,第三世界被迫向第一世界进贡,这使得数百万贫民挣扎在生死线上。

今天,全世界3600多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其中,95%生活在南半球,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那是2500多万艾滋病患者的家园……在非洲,每天都有5000多人死于艾滋病。专家们强调,全世界需要每年投资70-100亿美元来战胜艾滋病及其他疾病(如结核病和疟疾等)。然而,面临这一人类危机,非洲国家继续每年向债权国和债权机构支付高达135亿美元的债务费用,一笔远远超过美国建议的全球艾滋病信托基金的数目。巨大的资源从贫穷非洲国家向富裕的北半球债权国转移,这正是那些受全国流行性疾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削减其卫生和教育经费的最主要因素之一。<sup>[107]</sup>

近来,世界银行把女权主义修辞——提倡妇女生育权和社会性别医疗平等——与被援助国所承受的无情压力(以“改革”的名义)复合在一起。被援助国被迫开放,并同私营的第一世界医疗服务供应商和医药公

[105] 《金融时报》所引世界银行数据(World Bank statistic quoted in *Financial Times*), 2004年9月10日。

[106] 转引自《开罗独立十年》(*A Decade After Cairo*), 第12页。

[107] 凡图·谢吕:《债务、调整与政治对非洲艾滋病的实际影响》,载于《第三世界期刊》(Fantu Cheru, “Debt, Adjust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Effective Response to HIV/AIDS in Afric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3:2, 2002年,第300页。

司一起参与全球竞争。世界银行 1993 年《卫生投资》报告概述了市场机制医疗服务的新范式：“有限的公共支出、严格限制的服务内容；使用者为公共服务付费；医疗服务和资金的私有化。”<sup>[108]</sup>新范式的一个真实例子是津巴布韦，1990 年代早期使用者付费方式的引入导致那儿的婴儿死亡率翻倍。<sup>[109]</sup>

但第三世界的城市卫生危机也不单是外国债权人的错。搬到有大门有保安的郊区住宅之后，城市精英们很少担心贫民窟的疾病威胁，而更多关注住家安全和高速公路建设。例如，在印度，苏珊·卓别林 (Susan Chaplin) 看到由腐败政府官员和漠不关心的中产阶级所决定的卫生改革状况：

印度城市的环境状况继续恶化，因为中产阶级把大部分人排除到基本公共服务之外。国家资源和福利独占的后果是：当一种环境问题意识在中间阶级中间兴起时，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他们所遇到的道路阻塞以及各种空气污染所造成的不便，而不是流行疾病和地方疾病的威胁。<sup>[110]</sup>

但在面对诸如艾滋病这样“惊天动地 (shake the earth and churn the

---

[108] 凡图·谢吕：《债务、调整与政治对非洲艾滋病的实际影响》，载于《第三世界期刊》(Fantu Cheru, “Debt, Adjust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Effective Response to HIV/AIDS in Afric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3:2, 2002 年, 第 9 页。

[109] 德博拉·波茨和克里斯穆泰波瓦：《基本生存如今成为一种奢侈：结构调整对津巴布韦城乡区域的影响》，载于《环境与城市化》(Deborah Potts and Chris Mutambirwa, “Basics Are Now a Luxury: Perceptions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s Impact o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n Zimbabwe,”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0:1), 1998 年 4 月, 第 75 页。

[110] 卓别林：《城市、下水道与贫困》(Chaplin, “Cities, Sewers and Poverty”), 第 156 页。

skies)”的灾难时,城市卫生提供的仅仅是一种生态保护幻象。<sup>[111]</sup>实际上,今天的大型贫民窟是能以载人飞船的速度传播到全世界的新兴疾病和再发疾病的空前发生器。正如我近来在关于即将发生的禽流感病毒威胁的《近在咫尺的幽灵》(*The Monster at our Door*, 2005)中指出的那样,没有相应的全球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全球化是某种灾难的配方。<sup>[112]</sup>

---

[111] 梅加·姆万吉:《最后的瘟疫》(Meja Mwangi, *The Last Plague*),内罗毕,2000年,第4页。

[112] 迈克·戴维斯:《近在咫尺的幽灵:禽流感的全球威胁》(Mike Davis, *The Monster at Our Door: The Global Threat of Avian Flu*),纽约,2005年。

## 第七章 结构调整计划中的第三世界

---

在神秘笑声之后,他们很快把话题转向其他事物。

结构调整计划中幸存的人如何找到回家的路?

——菲德利斯·巴洛贡〔1〕

无论如何威胁生命和不安全,贫民窟仍将有一个辉煌的未来。乡村在短期内仍将容纳世界上大多数的贫民,但可疑的分化将在2035年之前席卷城市贫民窟。即将来临的第三世界城市人口爆炸的至少半数以上的人口肯定会加入到非正式社区。〔2〕到2030年或2040年将会有20亿贫民窟居民。这是一个怪异的、几乎是不可理喻的前景,但城市贫困每天都在新增贫民窟人口。联合国城市观测项目(UN Urban Observatory project)警告说,到2020年“全世界城市贫困将达到城市总人口的45%到50%”。〔3〕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新兴的城市贫困革命已经成为一个非线性历史进程。城市周边棚户区的缓慢增加已经被贫困风暴和贫民窟建筑

---

〔1〕 菲德利斯·奥敦·巴洛贡:《调整过的生活:结构调整的故事》(Fidelis Odun Balogun, *Adjusted Lives: Stories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s*),特伦顿,1995年,第75页。

〔2〕 马丁·拉瓦莱昂:《论贫困的城市化》,世界银行论文(Martin Ravallion, *On the Urbanization of Poverty*, World Bank paper),2001年。

〔3〕 爱德华多·洛佩斯·莫雷诺:《世界贫民窟:新千年的城市贫困面孔》(Eduartdo López Moreno, *Slums of the World: The Face of Urban Poverty in the New Millennium*),内罗毕,2003年,第12页。

的突然暴增所打断。在其题名《调整过的生活》(*Adjusted Lives*)的故事集中,尼日利亚作家菲德利斯·巴洛贡把1980年代中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托管的)结构调整计划描绘为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它永久性摧毁了拉各斯的旧有精神并“重新奴役”城市尼日利亚人。

这一经济计划的怪异逻辑看起来是:为了复兴垂死的经济;所有好处首先被结构调整计划(*be SAPed*)到大多数贫困阶层的市民之外。中间阶层迅速消失,极少数人进入富裕阶层,而绝大多数沦为悲惨贫民。富人们的垃圾堆成为贫民的餐桌。靠石油而致富的阿拉伯国家向西方世界的人才流失成为一场巨大灾难。〔4〕

巴洛贡抱怨了“今天人头攒动的私有化和更多的饥饿”,并列举了结构调整计划的恶果。不仅是非洲另外30个结构调整计划国,而且是数以亿计的亚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将很快尝到这一恶果。19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利用债务杠杆来重新建构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这使得贫民窟成为一个不仅是贫困的乡村移民,而且是被“调整”暴力弄得流离失所或前途暗淡的数百万传统市民无法回避的未来。

## 城市贫困大爆炸

1974至1975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追随世界银行,把焦点从发达工业国转移到受石油价格暴涨影响的第三世界上。随着其贷款力度的一步步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逐渐扩大了强加于贷款国的强制性“限定”和“结构调整”范围。正如经济学家弗朗西斯·斯图尔特在其重要研究中强调的那样,“被迫调整的扩展性后果不是由这些制度——主要是不断下调的商品价格和日渐高昂的债务服务——而是由各国的每一个国内政

---

〔4〕 巴洛贡:《调整过的生活》(*Balogun, Adjusted Lives*),第80页。

策和公共计划(所谓‘公平游戏’的财政紧缩措施)所决定的。”〔5〕到1982年8月,当墨西哥威胁说不再履行其还贷义务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与最大的商业银行们同步——成为了由里根(Reagan)、撒切尔(Thatcher)、科尔(Kohl)王国所提倡的国际资本家革命的直接工具。1985年《巴克计划》\*赤裸裸地要求15个最大的第三世界债务国放弃政府主导的(state-led)发展策略以回报新的信贷措施,并放弃其在世界经济中一贯的会员资格。《巴克计划》把世界银行推到几十个结构调整计划长期管理者的核心位置。这些结构调整计划正在形成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勇敢新世界。

当然,这是一个由外国银行和信贷机构的宣言掌控城乡贫民生存需求的世界;这是一个如乌干达一样的贫困国家每年为艾滋病危机中的卫生贷款支付12倍利息的世界。〔6〕正如《贫民窟的挑战》强调的那样,结构调整计划“本质上是彻底反城市的”,并被设计来逆转先前存在于福利政策、财政结构或政府投资中的任何“城市偏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自命为大银行的监理,并以里根和乔治·H. 布什(George H. Bush)政府为靠山——给各个贫困国家提供了同样的毒药杯:货币贬值、私有化、进口控制和食品津贴的取消、卫生和教育收支平衡的加强、公共部门的无情收缩。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发给海外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官员们的一封臭名昭著的电报命令:“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共部门应该被私有化。”〔7〕与此同时,结构调整计划取消小块土地并将其推

〔5〕 斯图尔特:《调整与贫困》(Stewart, *Adjustment and Poverty*),第213页。

\* *Baker Plan*,得名于当时的财政部长詹姆斯·巴克(James Baker),但实为其副部长理查德·达曼(Richard Darman)所起草的。

〔6〕 马拉比:《世界的银行家》(Mallaby, *The World's Banker*),第110页。

〔7〕 转引自托尼·奇里科:《发展中的25年:市场解决办法的兴起与即将到来的衰落》,载于《发展政策评论》(Quoted in Tony Killick, “Twenty-five years in Development: The Rise and Impending Decline of Market Solutions,”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第4期,1986年,第101页。

落或任其沉浮于第一世界农业综合企业统治下的全球商品市场中,这实际上消灭了乡村小块土地拥有者。

正如威廉姆·塔布在其近来的全球经济管理史中提醒我们的一样,债务已经成为权力从第三世界国家向美国和其他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下的布雷顿森林机构划时代转换的温室。在塔布看来,银行职业雇员是一种殖民化市政服务的后现代对应物。“像殖民地行政人员一样,他们看起来绝不会离开,除非被一个对当地经济和社会有着同样见解和权力的新顾问咨询团所取代。”〔8〕

尽管债权人宣称他们是在为经济发展服务,但他们很少允许贫困国家采用富裕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常用来推动其增长的相同游戏规则。正如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在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结构调整伪善地“踢开梯子(kicked away the ladder)”——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国家历史上用保护主义关税和津贴作为从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爬到以城市高价货物和服务为基础的经济的梯子。〔9〕在审视津巴布韦结构调整和南非自愿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悲惨后果时,斯蒂芬·安德烈森(Stefan Andreasson)想知道:当其宏观经济政策听命于华盛顿时,第三世界是否能够期望获得任何超越“虚拟民主(virtual democracy)”的东西?但他发现“虚拟民主的到来有着沉重代价:一切共享和参与的民主以及社会民主计划提供公共福利的任何可能性都不复存在。”〔10〕

《贫民窟的挑战》持有同样的观点:“1980年代和1990年代贫困和不

---

〔8〕 威廉·塔布:《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统治》(William Tabb, *Economic Governanc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纽约,2004年,第193页。

〔9〕 张夏准:《踢开梯子:历史透视中的婴儿工业推进》,载于《牛津发展研究》(Ha-Joon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Infant Industry Promo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第31:1,2003年,第21页。

〔10〕 斯蒂芬·安德烈森:《南非经济改革与“虚拟民主”》,载于《当代非洲研究杂志》(Stefan Andreasson, “Economic Reforms and ‘Virtual Democracy’ in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 Studies* 21:3)21:3,2003年9月,第385页。

平等增加的主要和唯一的原因是政府职能的隐退。”在谈到结构调整计划对公共部门费用和权力的直接削减之外,作者还强调“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y)”对政府职能更微妙的缩减:它要求政府向下级机构——特别是非政府组织——授权,并使之直接联系到主要的国际援助机构。

总体说来,明显去中心化的结构对于发达国家中运作良好的国家代表型政府而言是不必要的,而对全球霸权的操纵来说则是可接受的。主导的国际观点(即华盛顿共识)成为事实上的发展范例,结果是整个世界迅速成为捐赠人和国际组织所支持下殊途同归的统一体。<sup>[11]</sup>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白宫对城市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为打击最为严重——实际上,1980年代结构调整计划——与长期的干旱、上升的油价、暴增的贷款利率、暴跌的商品价格串联在一起——对许多国家经济产生了比美国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还严峻和持久的影响。最糟的是,它使第三世界城市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不断增加的移民、不断减少的正式就业,不断下降的工资收入和不断退化的财政税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通过向贫民收取公共服务费用来推进退化的税收,但并没有作出相应努力来削减军费,或向富人收取个人所得税或遗产税。其结果是,各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远远落后于人口的增加。西奥多·特雷冯写道:“在金沙萨,人们提及公共服务时将其当作‘久远记忆’”。<sup>[12]</sup>

卡罗尔·拉科迪(Carole Rakodi)评论说,非洲结构调整的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包括了资本贬值、制造业崩溃、出口收入边际增长或负

---

[11] 《挑战》(Challenge),第48页。

[12] 西奥多·特雷冯:《导论:重建秩序》,收入特雷冯:《重建刚果秩序》(Theodore Trefon, "Introduction: Reinventing Order," in Trefon, *Reinventing Order in the Congo*),第1页。

增长、城市公共服务剧烈减少、商品价格暴涨以及实际工资陡降。<sup>[13]</sup>整个非洲大陆的人学着以说“我感冒了”的方式来轻描淡写地说“我面临着危机”。<sup>[14]</sup>在达累斯萨拉姆(Dares Salam),1980年代人均公共服务费用每年下降10%,这意味着当地政府实质上的隐退(virtual demolition)。<sup>[15]</sup>当地研究表明,自由化和结构调整在喀土穆制造了110万“新贫民”。他们大多来自公共部门所分离出来的等级。<sup>[16]</sup>在众多热带非洲城市中,阿比让属于极少数拥有重要制造业部门和现代城市服务的一个城市。结构调整计划管理却实实在在地导致了其在工业化、建设崩溃以及公共运输和卫生状况的迅速恶化;其结果是,象牙海岸(Ivory Coast)——西非经济的假定“龙头”——的城市贫困在1987—1988年翻了一番。<sup>[17]</sup>在巴洛贡的尼日利亚,极度贫困变得越来越城市化,在拉各斯、伊巴丹(Ibadan)及其他城市,极度贫困率从1980年的28%上升到1996年的66%。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今天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是260美元,低于40年前刚独立时的水平和1985年所达到的370美元水平。”<sup>[18]</sup>地理学家德博拉·伯茨(Deborah

---

[13] 拉科迪:《全球势力、城市变革与非洲城市管理》,收入拉科迪:《城市挑战》(Rakodi, “Global Forces, Urban Change, and Urban Management in Africa,” in Rakodi, *Urban Challenge*),第50、60-61页。

[14] 阿希尔·姆本贝和珍妮特·罗特曼:《危机时代的主题特征》,收入思维佐等人编:《围攻之下》(Achille Mbembe and Janet Roitman, “Figures of the Subject in Times of Crisis,” in Enwezor et al., *Under Siege*),第112页。

[15] 迈克尔·马丁利:《城市地区城市贫困制造中的政府角色》,收入休·琼斯和尼斯·纳尔逊编:《非洲的城市贫困:从理解到缓和》(Michael Mattingly,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of Urban Areas in the Creation of Urban Poverty,” in Sue Jones and Nici Nelson (eds), *Urban Poverty in Africa: From Understanding to Alleviation*),伦敦,1999年,第21页。

[16] 阿迪尔·穆斯塔法·艾哈迈德和阿塔·艾-哈桑·艾-巴萨里:《喀土穆的贫困》,载于《环境与城市化》(Adil Mustafa Ahmad and Atta El-Hassan El-Batthani, “Poverty in Khartoum,”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7:2),1995年10月,第205页。

[17] 塞瑟罗曼:《城市贫困与非正经济部门》(Sethuraman, “Urban Poverty and the Informal Sector”),第3页。

[18] 世界银行:《尼日利亚:国情简报》(World Bank, *Nigeria: Country Brief*),2003年9月。

Potts)指出,总的来说,非洲城市的工资水平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以至于研究者们无法估算贫民如何维生:这就是所谓的“工资困境”。〔19〕

在拉丁美洲,从1973年皮诺切特将军的新自由主义集团开始,结构调整与军事独裁统治和对民粹主义左翼的抑制紧紧连在一起。这一反革命行动席卷了整个南半球,其最严重的影响之一是贫困的迅速城市化。在1970年,格瓦拉主义者(Guevarist)乡村起义的游击中心理论仍然符合拉丁美洲大陆的现实,那里的乡村贫困(7500万贫民)超过了城市贫困(4400万贫民)。然而,1980年代末,生活在城市贫民窟的贫民有1.15亿而在农场或乡村的是8000万。〔20〕

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简称ILO)研究表明,拉丁美洲城市贫困在1980到1986年间就惊人地上升了50%。〔21〕委内瑞拉工人群体的平均收入下降了40%,阿根廷是30%,巴西和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是21%。〔22〕在墨西哥,1980和1987年非正式就业几乎翻了一番,而社会消费下降到1980年水平的一半。〔23〕在秘鲁——其1980年代以结构调整诱发的一个“超级衰退(hyper-recession)”而告终——城市劳动力的正式就业率在3年内从60%下降到11%,并拉开了利马贫民窟神秘的光明之路革命(revolution of Sendero Luminoso)序幕。〔24〕

〔19〕 伯茨:《城市生活》(Potts, “Urban Lives,”),第459页。

〔20〕 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UN,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第12页。

〔21〕 伯茨:《城市生活》(Potts, “Urban Lives,”),第459页。

〔22〕 阿尔贝托·米努金:《挤压:拉丁美洲的中间阶层》,载于《环境与城市化》(Alberto Minujin, “Squeezed: The Middle Class in Latin America,”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7:2),1995年10月,第155页。

〔23〕 奥古斯丁·埃斯科巴和梅赛德斯·冈萨雷斯·德·拉·罗查:《墨西哥的危机,重建和城市贫困》,载于《环境和城市化》(Agustín Escobar and Mercedes González de la Rocha, “Crisis, Restructuring and Urban Poverty in Mexico,”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7:1),1995年4月,第63-64页。

〔24〕 亨利·迪茨:《城市贫困,政治参与和政府:利马,1970—1990年》(Henry Dietz, *Urban Povert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State: Lima, 1970—1990*),匹兹堡,1998年,第58、65页。

与此同时,广大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习惯于住家仆人和欧洲假期——突然发现他们自己处于新贫民的等级。有时候,下降流动性在非洲也一样突然,例如,1年间(1980—1981年)智利和巴西上升到5%。<sup>[25]</sup>结构调整压碎了贫民和公共部门中间阶层,却给个体户、外国进口商、毒贩、军队人士和政界内部人士提供了赚钱机会。拉丁美洲和非洲1980年代显而易见的消费达到幻觉水平,当新富们(Nouveaux riches)继续在迈阿密和巴黎狂欢之时,他们的棚户区同胞们却在挨饿受冻。

不平等的层面在1980年代达到历史最高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1/10最富有的人收入份额增加了10倍,而最穷的人收入则在1984年到1989年间下降了23倍。在里奥,经典的基尼指数(GINI coefficient)从1981年的0.58攀升到1989年的0.67。<sup>[26]</sup>事实上,整个拉丁美洲,1980年代加深了世界上最极端的、有着天渊之别的社会地形学。据一份2003年世界银行报告,拉丁美洲的基尼指数高出亚洲10个百分点;高出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17.5个百分点;高出东欧20.4个百分点。即便是拉丁美洲最平等主义的国家乌拉圭(Uruguay),也有着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更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状况。<sup>[27]</sup>

## 自下而上的调整

第三世界各国,1980年代的经济休克迫使个人围绕综合家庭资源(特别是生存技能)和妇女不顾一切的独创性重新组合。随着男性就业

---

[25] A. 奥贝南:《第三世界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就业与贫困》(A. Oberai, *Population Growth, 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Third World Mega-Cities*),第85页。

[26] 刘易斯·爱因斯坦:《布宜诺斯艾利斯:不断加深的社会两极分化个案》,收入吉尔伯特编:《拉丁美洲的特大城市》(Luis Ainstein, "Buenos Aires: A Case of Deepening Social Polarization," in Gilbert, *The Mega-City in Latin America*),第139页。

[27] 世界银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不平等:历史的断裂》(World Bank,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Breaking with History*),纽约,2003年。

机会的消失,母亲、姐妹和妻子们往往被迫担负起远不止半数的城市结构调整重负:一个印度学者写道:“尽管(家庭)生存压力很大,妇女们的压力更大。”〔28〕正如地理学家西尔维亚·钱特(Sylvia Chant)强调的那样,结构调整计划之下的贫困城市妇女不得不在家里和外面更加努力工作,以弥补社会服务费用和男性收入的缩减;与此同时,新的或增加的使用者付费进一步限制了她们的教育和卫生可能性。〔29〕不知何故,她们被期望能应付这一切。实际上,一些研究者们认为结构调整计划冷酷地利用了一种信念:在面临家庭生存需要时,妇女的劳动能力几乎是无限弹性的。〔30〕这是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调整公式中一个罪恶的秘密变量:贫困妇女和她们的孩子被期望举起压在他们肩上的第三世界债务重负。

因此,在中国和东南亚正在工业化的城市中,数百万年轻妇女与肮脏不堪的装配线和工厂签约。近来的研究表明,“妇女构成了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270万左右工人的90%。”〔31〕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除外),这种情形并不存在。相反,随着男性移民的增加,在工业化和男性在正式经济部门工作机会的减少,妇女们被迫临时找寻新的生计,如临时工、酒水推销员、街头小贩、兜售彩票者、理发师、裁缝、清洁工、洗衣工、捡垃圾的人、保姆和妓女。在一个城市妇

---

〔28〕 U. 卡帕加姆:《处理印度城市贫困》,载于《亚洲学者简报》(U. Kalpagam, “Coping with Urban Poverty in India,”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7:1), 1985, 第18页。

〔29〕 西尔维亚·钱特:《城市生计、就业与社会性别》,收入罗伯特·格温和克里斯托瓦尔·凯编:《拉丁美洲变革:全球化与现代性》(Sylvia Chant, “Urban Livelihoods, Employment and Gender,” in Robert Gwynne and Cristóbal Kay (eds), *Latin America Transformed: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伦敦,2004年,第214页。

〔30〕 凯若琳·莫瑟和琳达·匹克:《看见无形的:妇女、社会性别和城市发展》,收入理查德·斯特伦编:《发展中国家城市研究 卷4:专题卷》(Caroline Moser with Linda Peake, “Seeing the Invisible: Women, Gender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Richard Stren (ed.), *Urban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Volume 4: Thematic Issues*), 多伦多,1996年,第309页。

〔31〕 全球妇女生育权网:《开罗独立之后十年》(Women’s Global Network for Reproductive Rights, *A Decade After Cairo*), 第12页。

女劳动力参与率一直低于其他大陆的地区,拉丁美洲妇女进入 1980 年代非正式第三产业的浪潮尤其引人注目。

在其对于“自下而上的调整 (adjustment from below)”的详细研究中,社会人类学家卡罗琳·莫瑟描绘了 1982 至 1988 年间 8 个连续结构调整计划对于位于瓜亚基尔 (Guayaquil) 沼泽地边缘一个棚户区的影 响,该棚户区先前处于(个人或群体在经济或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上向流动倾向 (upwardly mobiles)。尽管厄瓜多尔 (Ecuador) 公开的失业率翻了一番,1980 年代危机的主要影响还是瓜亚基尔和基多半数劳动力处于不充分就业的爆炸。在印地欧盖亚斯省 (Indio Guayas) 的这个贫民窟,先前全日工作的丈夫们发现他们自己每年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只能打零工或根本没有工作。其结果是家庭只好让更多家庭成员包括妇女和孩子出去工作。结构调整开始之后,女性参与率从 40% 上升到 52%,但随着工厂就业机会的减少,妇女被迫彼此竞争以获得诸如佣人或街头小贩等就业机会。尽管所有家庭资源都整体动员,生活状况——特别是孩子的营养——仍然严重降低。莫瑟发现,近 80% 的贫民窟孩子都患有某种营养不良的疾病。医疗服务——如今大部分私有化和更加昂贵——不再属于印地欧盖亚斯省先前乐观的贫民窟家庭所能支付的范围。<sup>[32]</sup>

1982 年债务危机余波期间,瓜亚基尔的悲剧在瓜达拉哈拉 (Guadalajara) 重演。在这个传统上一直是墨西哥小型家庭工厂和作坊中心的城市,1986 年关税暨贸易总协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简称 GATT) 之后,紧跟着残酷的外国竞争而来的是 1980 年代早期的工资暴跌和社会费用暴减。瓜达拉哈拉特殊的专门市场 (niche)——生产大

---

[32] 卡罗琳·莫瑟:《自下而上的调整:厄瓜多尔瓜亚基尔的低收入妇女,时间及三重角色》,收入莎拉·拉德克利夫和萨利·威斯特伍德编:《“万岁”:拉丁美洲的妇女和民众抗议》(Caroline Moser, “Adjustment from Below: Low-Income Women, Time, and the Triple Role in Guayaquil, Ecuador,” in Sarah Radcliffe and Sallie Westwood (eds), “Viva’”: *Women and Popular Protest in Latin America*), 伦敦,1993 年,第 178-185 页。

众消费品的小型作坊——无法在东亚进口的全面冲击下生存。据奥古斯丁·埃斯科巴 (Augustín Escobar) 和梅赛德斯·冈萨雷斯 (Mercedes González) 的研究,其结果是非正式就业的猛增(1980至1987年间至少增加80%),向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移民以及(更重要的)正式工作的重新结构。“不稳定就业变得越发普遍。工作不再稳定,零工变得更现实,工人和雇员被要求为了保留职位而承担更多义务。”正如瓜亚基尔一样,家庭的反应是让更多女性成员去做家庭女佣,并让孩子辍学去工作。埃斯科巴和冈萨雷斯警告说,这些短期的生存策略将最终减小长期的经济发展空间。“进一步恶化的经济状况限制了城市工人阶级家庭实行长期的社会流动策略,既然他们被迫动员其潜在资源并扩大劳动力投入来维持基本生存。”〔33〕

如像非洲和亚洲一样,通过把没有工作能力的成员送回生活成本较低的乡村,许多拉丁美洲城市家庭“自行调整以适应结构调整 (adjusted to adjustment)”。塞德里克·佩什写道:“在哥斯达黎加,夫妻两地分居,妇女和孩子经常被迫搬到家庭花费更经济的更贫困地区。有时这增加了分居家庭由于生活水平和住房短缺的长期结果而导致的破裂和离婚。”〔34〕

这种城市悲剧在非洲甚至变得更惨不忍睹:妇女儿童不得不在艾滋病(此病本身就部分源于贫困妇女因生活所迫的卖淫)、频发的旱灾、内战与结构调整的夹缝之间求生存。在哈拉雷,1991年结构调整计划使得当年生活费用上涨45%,10万人提前出院并遭受营养不良的折磨。正如娜芝琳·坎吉 (Nazneen Kanji) 和克莉丝汀·罗杰森 (Christine Rogerson) 在各自的研究中讲到的那样,当妇女为了她们家庭的食物而奋斗时,残酷竞争已经成为非正式市场经济的规则——特别是对市场妇女和街头小贩

---

〔33〕 埃斯科巴和冈萨雷斯:《墨西哥的危机、重组和城市贫困》(Escobar and González, “Crisis, Restructuring and Urban Poverty in Mexico”),第63-73页。

〔34〕 佩什:《世界银行在住房问题中的角色》(Pugh, “The Role of the World Bank in Housing”),第55页。

而言。“一般说来,她们的收入来自于这样一些行业——大部分雇用妇女,经常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并几乎没有什么资本投入,完全没有技能培训的行业。只是她们被迫选择的一个勉强维生的职业。”〔35〕“与此同时,正如婴儿死亡率翻倍一样,艾滋病盛行,儿童营养下降。哈拉雷绝望的母亲们把幼小的孩子送回到乡下,或把以前各自独立的家庭成员重组为一个大家庭来节约房租和电费。”〔36〕成千上万年纪稍大一点的孩子被迫辍学去工作或捡垃圾,几乎永远不再有复学的希望。这种金字塔式的压力经常来势汹涌,以至于家庭团结彻底崩溃。据研究专家,“那些家庭单位一度能支持和养活其成员,如今家庭成员却为了生存而彼此竞争”。〔37〕

不是坐视他们的家庭毁灭,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贫民窟居民(一般是妇女打前站)复苏和改组了城市贫民的阶级抗议——食品暴动(food riot)。非洲/拉丁美洲和南非的贫民窟不是温和地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美好之夜的——相反,他们暴动。在他们对于基层抵抗结构调整的开创性研究,在《自由市场与食品暴动》(*Free Market and Food Riots*, 2004)中,约翰·沃尔顿(John Walton)和戴维·塞登(David Seddon)编录了1976年至1992年间39个债务国的146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暴动

---

〔35〕 罗杰森:《全球化或非正规化》(Rogerson, “Globalization or Informalization”),第347页。

〔36〕 娜芝琳·坎吉:《津巴布韦哈拉雷的社会性别,贫困与结构调整》,载于《环境与城市化》(Nazneen Kanji, “Gender, Poverty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Harare, Zimbabwe,”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7:1),1995年4月,第39,48-50页;德拉卡克斯-史密斯:《第三世界城市》Drakakis-Smith, *Third World Cities*, p. 148 (malnutrition); 德博拉·波茨和克里斯·穆泰波瓦:“基本生存如今成为一种奢侈”, Also see Deborah Potts and Chris Mutambirwa, “Basics Are Now a Luxury”),第73-75页。

〔37〕 B. 鲁韦绍拉等编,转引自米里亚姆·格兰特:《艰难亮相:津巴布韦布拉瓦约城市青年的社会和经济认同》,载于《加拿大非洲研究杂志》(B. Rwezaura et al., quoted in Miriam Grant, “Difficult Debut: Social and Economic Identities of Urban Youth in Bulawayo, Zimbabwe,”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37:2/3 2003年,第416-417页。

(IMF riots)”。<sup>[38]</sup> 无论 1990 年代早期的结构调整计划有多少“人性的一面(human face)”——所谓的“调整的社会维度”，它都已经为应对这一全球抗议的超常爆发而大幅改进。

在对于旅行社、外国汽车、豪华酒店和国际机构办公室的攻击中，严酷的国际维度被象征性地承认。抗议采用了不同的形式，经常呈现为阶级食品暴动(摩洛哥、巴西和海地)、一度是和平的而后变成暴力的示威游行(苏丹、土耳其和智利)或普遍罢工(秘鲁、玻利维亚和印度)。然而，抗议经常开始是一种形式，尔后变为另一种形式——游行变成暴动，自发暴力在政治组织中被转向。

作为一种大众抗议方式，食品暴动是市场社会一种共同的、也许更普遍的特征——不是一种政治工业革命的残余，而是贫民和被剥夺权力的群体宣称要求社会公正的一种赋权策略。现代政府和国际经济席卷到大多数世界人口的系统中，民众抗议的爆发点已经转移到全球积累进程、国家发展和大众公正相交织的城市。<sup>[39]</sup>

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抗议的第一次浪潮在 1983 年至 1985 年间达到顶峰，而第二次浪潮在 1989 年后再次兴起。1989 年 2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决议要求提高燃油价格和交通费用，这一决议非常不得民心。这引发了一场愤怒的公交车搭乘者们和激进的大学生们的暴动。警棍迅速把冲突升级为一场准暴动(semi-insurrection)。在这场持续一周的暴乱中，成千上万贫民从山上的贫民窟冲下来洗劫购物中心，焚烧豪华轿车并设置街垒。至少 400 人被杀。一个月后，拉各斯爆发了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抗议：三天之内 50 人死于洗劫和街头战。这个城市大多数贫民

---

[38] 约翰·沃尔顿和戴维·塞登：《自由市场与食品暴动：结构调整的政治》(John Walton and David Seddon, *Free Market and Food Riots: The Politics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牛津出版社，1994 年，第 39-45 页。

[39] 同上，第 43 页。

都满怀对于克里斯·阿巴尼《恩赐之地》中“国王(the King)”的沸腾愤怒:

我们的人大部分是诚实的、努力工作的人。但他们受发展中国家军队的杂种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的强盗(dose tiefs)所支配……如今,我们——你和我——都是贫民,莫名其妙就欠着世界银行1亿美元。我恨他们——我们的人和世界银行的人!〔40〕

### 乌托邦的十年?

据新古典理论和世界银行计划,1990年代应该修正1980年代的错误:允许第三世界城市重新获得失去的土地,并沟通结构调整计划所创造的不平等鸿沟——调整的创伤将被全球化的止痛剂抚平。实际上,1990年代,正如《贫民窟的挑战》片面强调的那样,是全球城市发展——据新古典主义市场自由的乌托邦式参数的第一个十年。

在1990年代,贸易继续以几乎难以想象的比率扩展,非经特许不得进入的(no-go)地区开放了,而军事费用下降了。……所有生产的基本投入降低,利润率随着基本商品价格一起迅速下降。资本流动越来越从国家控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能迅速流动到最有生产力的地区。在这种几乎是完美地符合于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信条的经济状况中,一个人可以想象这十年将成为无比繁荣和社会公正的时代之一。〔41〕

然而,据联合国《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前所未有的、越来越多的国

〔40〕 阿巴尼:《恩赐之地》(Abani, *Graceland*),第280页。

〔41〕 《挑战》(*Challenge*),第34页。

家把发展看作是滑坡到1990年代之前的水平。今天,在46个国家里,人民比1990年代时更穷。今天,在25个国家里,比十年前还多的人在挨饿。”<sup>[42]</sup> 整个第三世界结构调整计划的新浪潮和自我强加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加速了政府雇佣、当地制造业和国内市场(home-market)农业等行业就业机会的减少。拉丁美洲的大型工业大都市——墨西哥市、圣保罗、贝洛奥里藏特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遭受了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巨大损失。在圣保罗,制造业就业份额从1980年代的40%下降到2004年的15%。<sup>[43]</sup> 债务服务费用吞噬了社会项目和住房补贴的资源:用唐·罗博萨姆(Don Robotham)的话说,这是对正式城市贫民的“社会遗弃(social abandonment)”。<sup>[44]</sup>

从其自身的立场出发,世界银行在《1990年代城市政策与经济发展议程》(*Urban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Agenda for the 1990s*, 1991)——把公共部门重新定义为市场的单纯“授权者(enabler)”的文件——中支持当地政府的角色隐退。在评论世界银行在墨西哥和阿根廷的城市计划时,地理学家塞西莉亚·萨内塔解释说:“集中关注市场机制的重新评价(revalorization),明智的城市政策如今被定义为旨在消除那些限制正式和非正式城市经济代理机构生产率的障碍,以最大化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贡献。”<sup>[45]</sup> 对“城市生产率(urban productivity)”的盲目崇拜实际上导致了私人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巨大压力,而不顾其对于就业或公正分配的影响。正如世界银行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在各个部门就业都没有

---

[4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4*),纽约,2004年,第132页。

[43] 亨利·朱:《圣保罗的失业者》,载于《洛杉矶时报》(Herry Chu, “Jobless in São Paulo,” *Los Angeles Times*),2004年5月30日。

[44] 唐·罗博萨姆:《金斯敦如何受伤的》,收入简·施奈德和伊达·苏塞编:《受伤的城市:全球化世界的解构与重构》(Don Robotham, “How Kingston Was Wounded,” in Jane Schneider and Ida Susser, *Wounded Cities: De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牛津,2003年,第111-124页。

[45] 萨内塔:世界银行对国家住房政策的影响(Zanetta, *The Influence of the World Bank on National Housing Policies*),第25页。

机会重新收复 1990 年代的失地。

出口繁荣经常也只让一个很小的阶层获利。最极端的例子是安哥拉,一个主要的石油和钻石生产商。在罗安达,1993 年近 84% 的人口没有工作或未充分就业,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相差数十个百分点,“仅在 1995 至 1998 年间就从 10% 上升到 37%”。<sup>[46]</sup> 尽管有许多大肆炒作 (much-hyped) 的墨西哥边境上的美国装配厂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简称 NAFTA) “成功故事”,在墨西哥,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口百分比仍然从 1992 年代的 16% 上升到了 1999 年的 28%。<sup>[47]</sup> 同样地,在(1990 年当选的)塞萨尔·加维里亚 (César Gaviria) 统治时期的哥伦比亚,城市工资下降,但是可可的种植田亩数翻了 3 倍。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一份报告指出,贩毒集团“是其新自由主义政策最始终如一的拥护者”。<sup>[48]</sup>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对全世界人口的调查表明,世纪末的全球不平等基尼指数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0.67——这在数学上相当于这样一个状况:世界上最穷的 2/3 人口是零收入,而最富的 1/3 得到一切。<sup>[49]</sup>

此外,这个十年中最后一段日子的全球骚动——以不可思议的准确性——发生在不平等最尖锐上升的城市和地区。整个中东和南非穆斯林

[46] 保罗·詹金斯、保罗·罗布森和艾伦·凯恩:《罗安达》,载于《城市》(Paul Jenkins, Paul Robson, and Allan Cain, “Luanda,” *Cities* 19:2), 2002 年,第 144 页。

[47] 萨内塔:世界银行对国家住房政策的影响 (Zanetta, *The Influence of the World Bank on National Housing Policies*), 第 64 页。

[48] 福雷斯特·希尔顿:《邪恶时刻:历史视野中的乌里韦总统的哥伦比亚》,载于《新左派评论》(Forrest Hylton, “An Evil Hour: Uribe’s Colombi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Left Review*), 2003 年 9-10 月,第 23 期,第 84 页。

[49] 陈少华和马丁·拉瓦兰:《1990 年代世界上最穷的人如何活下去》,收入《世界银行工作报告》(Shaohua Chen and Martin Ravallion, “How Did the World’s Poorest Fare in the 1990s”,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华盛顿,2000 年,第 18 页。(陈少华 (schen@worldbank.org) 是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研究小组的高级统计学家; Martin Ravallion (mravallion@worldbank.org) 是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研究小组组长。——译者注)

地区,城市中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与穆斯林分子和更极端的萨拉菲斯特分子(Salafists)对于统治阶层不可变革的腐败的争论结合在一起。在阿尔及利亚,对于民族解放阵线(FLN)政府“社会主义”残余的进攻开始于1995年,230个公司和近13万国家工人私有化;而贫困率从1993年的15%上升到1995年的23%。<sup>[50]</sup>同样地,在德黑兰,当伊斯兰革命背离了其原来的扶贫(pro-poor)政策,1993年至1995年间贫困率从26%飚升到31%。<sup>[51]</sup>在埃及,尽管有着五年的经济增长,1999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贫困家庭(界定为年收入不超过610美元的家庭)数目并没有减少,而人均消费却有所降低。<sup>[52]</sup>巴基斯坦同样面临着一种双重危机:因纺织品出口被中国排挤而导致工业竞争力日渐下降,以及因长期的灌溉投入不足而引起的农业生产率降低。其结果是,临时和非正式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减少,贫困率以一种被《国家人类发展报告》(*National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描绘为“巴基斯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unprecedented in Pakistan's history)”步伐剧增,城市收入不平等,正如基尼指数所测定的那样,从1992年的31.7%上升到1998年的36%。<sup>[53]</sup>

然而,1990年最大的事件是先前的“第二世界”——欧洲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一个新的第三世界。1990年代早期,先前的、被联合国称作“转型期国家(transitional countries)”中那些被认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口,从1400万猛增到1.68亿:一种史无前例的、几乎是瞬间

---

[50] 拉布斯·贝勒卡塞姆:《阿尔及利亚的贫困动态》,载于《阿拉伯规划研究所工作报告》(Laabas Belkacem, "Poverty Dynamics in Algeria," *Arab Planning Institute, working paper*),科威特,2001年6月,第3,9页。

[51] 德贾瓦德·沙雷西-伊斯法哈里:《伊朗贫困的流动性与动态:我们能从1992—1995年专门小组数据中学到什么》,收于《世界银行工作报告》(Djavad Salehi-Isfahani, "Mobility and the Dynamics of Poverty in Ira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1992—1995 Panel Data,"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2003年12月,第17页。

[52] 索利曼:《可能的出路》(Soliman, *A Possible Way Out*),第9页。

[53] 阿克马尔·侯赛因:《巴基斯坦2003年国民发展报告:贫困、增长与管理》(Akmal Hussain, *Pakistan National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Poverty, Growth and Governance*),卡拉奇,2003年,第1,5,7,15,23页。

发生的大众贫困化。〔54〕当然,贫困的确以一种不被承认的形式存在于先前的苏联,但世界银行研究者们认为,这个比率不超过6%到10%。〔55〕如今,阿列克谢·克拉舍宁尼科夫(Alexey Krashenninokov)在其给联合国人居署的报告中指出,60%的俄国家庭生活在贫困中,剩下的人口“只能被归入到一种扩大化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俄国人花费收入的40%在食物上,而全球中等收入标准是低于1/3。)〔56〕

尽管最糟糕的“转型期贫困”隐身于前苏联被废弃的乡村,但是城市上演着令人震惊的新极端:一夜暴富和同样突然的破产。如在圣彼得堡,贫富差距从1989年的41%暴增到1996年的132%。〔57〕莫斯科如今的百万富翁也许比纽约还多,但它也有100多万擅自定居者——许多是来自乌克兰(20万)、中国(15万)、越南和摩尔达维亚\*的非法移民。这些人住在废弃建筑物、拥挤的集体宿舍和先前的兵营中,过着一种原始的生活。血汗工厂——经常被西方赞誉为资本主义先锋——“选择雇用那些非法劳工,付他们少得可怜的工资,每个房间安排10到15个人同住”,而又完全不缴纳任何工资税。〔58〕俄国研究者们估计非正式或隐形经济可能相当于正式经济40%的交易额。〔59〕

---

〔54〕 《挑战》(*Challenge*),第2页。

〔55〕 布雷思韦特、格鲁塔尔特和米拉诺维合编:《转型国家的贫困与社会援助》(*Braithwaite, Grootaett, and Milanovic, Poverty and Social Assistance in Transition Countries*),第47页。

〔56〕 阿列克谢·克拉舍宁尼科夫:《莫斯科》,收入《世界人居署个案研究》(*Alexey Krashenninokov, "Moscow," UN-HABITAT Case Study*),伦敦,2003年,第9-10页。

〔57〕 塔季扬娜·普罗塔先科:《五年经济改革中的生活水平动态》,收入《国际城市和地区研究杂志》(*Tatyana Protasenko, "Dynamics of the Standard of Living During Five Years of Economic Refor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1:3,1997年,第449页。

\* Moldavia,苏联加盟共和国。——译者注

〔58〕 克拉舍宁尼科夫:《莫斯科》(*Krashenninokov, "Moscow"*),第10页。

〔59〕 普罗塔先科:《五年经济改革中的生活水平动态》(*Protasenko, "Dynamics of the Standard of Living During Five Years of Economic Reform"*),第449页。

在旧时的苏联,城市住房虽是配给的,但几乎免费——2%到3%的家庭收入用于租金和设施——并取决于一个由地区供暖、主城区和基于工作单位的文化与娱乐构成的独一无二的社会公共建设。然而,1990年代末以来,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契约,把住房和供暖价格提升到市场水平,尽管人们收入降低了。<sup>[60]</sup>同时,对关键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基于工厂的社会服务大量忽略以及缩减投资甚至被遗弃。其结果是,老旧的公寓区——实际上,整个街区,有时是整个城市——退化到贫民窟水平。许多工人阶级居住区以破裂的管子,满溢的下水道,老旧的照明以及冬季取暖设施的缺乏(最危险的)为特色。其结果是,成百万的俄罗斯城市贫民——像二战期间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列宁格勒 Leningrad 即今天的圣彼得堡)一样——忍受着寒冷、饥饿和隔绝。

俄罗斯式的过渡期贫困也存在于东欧城市中,最著名的是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在索菲亚市,由于在工业化和工厂倒闭,贫困和不平等在1995—1996年间爆发出来,特别是在罗马和土耳其境内上了年纪的妇女和大家庭中间。43%的保加利亚人如今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索菲亚市可能有着欧洲最多的贫民窟人口。它还有着全欧最悲惨的贫民窟——法库尔特塔(Fakulteta)的“柬埔寨(Cambodia)”——3.5万名罗曼人(他们中有90%失业)生活在犹太人街道,其状况使人联想起印度达利人的悲惨处境。<sup>[61]</sup>然而,欧洲最穷的城市是爱尔巴桑(Elbasan)——阿尔巴尼亚先前的重工业中心——如今能存活只是因为它有意大利和希腊的许多移民的汇款。同样,地拉那(Tirana)被半贫民窟的棚户区所包围,一些贫民

---

[60] 普罗塔先科:《五年经济改革中的生活水平动态》(Protasenko, “Dynamics of the Standard of Living During Five Years of Economic Reform”),第449页。

[61] 世界银行:《保加利亚:过渡期的贫困》,转引自《保加利亚社会权利》(World Bank, “Bulgaria: Pover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quoted by *Social Rights Bulgaria*),2003年6月29日,网址:www.socialrights.org.

擅自定居在霍查(Hoxha)独裁政府兴建的火柴盒式建筑中。〔62〕

## 成功故事？

1990年代全球化的两个巨大的成功故事是：中国沿海城市持续的就业和收入繁荣，以及一个高技术飞地和办公室公园“印度之光”的出现。在这两个例子中，发展不是幻象——上海周围林立的摩天大厦，以及班加罗尔新兴的购物中心和星巴克咖啡连锁店都验证了经济动力论(dynamism)——但这些市场奇迹以经济不平等的增加为昂贵代价。

1970年代晚期以来，中国已经从亚洲最激进的平等主义者变为亚洲最不平等地区之一。实际上，正如阿齐兹·汗(Azizur Khan)和卡尔·罗斯金(Carl Riskin)在一项重要研究中指出的那样：“城市不平等的加剧相应地大于乡村不平等的加剧。”〔63〕与新贵(法语, Nouveaux Riches)相并列的是新兴的城市贫民：非工业化的传统工人及其他未登记的乡村移民劳动力。中国城镇居民不再像贫困但安全的毛泽东时代(Maoist time)一样“吃大锅饭(eat from the same big pot)”。1997年9月，江泽民主席在一次共产党会议(Communist Party conference)上说，“工人应当转变他们的就业意识。”他认为，在一个市场动力社会，从摇篮到坟墓(Cradle-to-grave)的社会保障不再可行。〔64〕对近年来在改制中失去工作的数千万

〔62〕 世界银行工作报告：《阿尔巴尼亚：贫困》(World Bank, “Albania: Growing Out of Poverty,” working paper), 1997年5月20日, 第41页。

〔63〕 阿齐兹·拉曼·汗和卡尔·罗斯金：《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不平等与贫困》(Azizur Rahman Khan and Carl Riskin,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牛津：2001年, 第36页。正如作者强调的那样，中国城市收入数据不包括大批乡村移民流动人口，因此造成了一种低估不平等的偏向。(As the authors emphasize, Chinese urban income statistics do not include the hug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rural migrants, thus creating a bias toward underestimation of inequality.)

〔64〕 帕梅拉·亚茨科：《新上海：中国传奇城市困难重重的复兴》(Pamela Yatsko, *New Shanghai: The Rocky Rebirth of China's Legendary City*), 新加坡, 2003年, 第113页。

工业工人和政府职员而言,这意味着缩减开支甚至取消社会保障体系。

1996年至2001年间,国有企业数量减少了40%,近3600万工人过剩。官方数据中的失业率几乎没有证据,但这是统计学的常用手法,因为被解雇的(laid-off)国企工人被归入一个特殊的“下岗(off post)”范畴而不计入失业,因为他们仍然从他们的工作单位获得一些社会安全福利。事实上,城市失业率估计约为8%到13%。据《远东经济评论》的分社主任、新闻记者帕梅拉·亚茨科(Pamela Yatsko)所言,下岗女工占很高的比率,因为“政府预计下岗妇女对社会安全的威胁将比失业男人小。”先前的女工——焊工、车工和造船工人——如今被迫去找服务行业的低薪工作,如女仆、女侍、保姆或街头小贩。〔65〕

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英雄——大部分是官员——的城市社会地位和财产特权被保留下来。然而,“流动农民(Peasant flood)”只有在他们所逃离的贫困山村才享有官方的社会权利。例如,上海估计约有300万农民工,现在缺乏医疗保险、社会福利或其他权益。乡村移民还成为了新兴城市市场经济矛盾的替罪羊。一些观察家比较了当代中国城市对乡村移民的印度种姓制度式(caste-like)隔离,以及“1990年前南非城市对黑人的隔离或整个21世纪前半期美国城市对黑人和亚洲人的隔离”。〔66〕事实上,亚茨科发现,上海1990年代晚期重演的这一幕令人不安地类似于这个城市在1930年代的罪恶。

这个城市,正如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只允许移民做某些低等工作,把他们限制在更好的工作之外,并在他们不能证明他们已经被雇佣时把他们踢出这个城市。移民很少与上海人有结交。上海人瞧不

---

〔65〕 帕梅拉·亚茨科:《新上海:中国传奇城市困难重重的复兴》(Pamela Yatsko, *New Shanghai: The Rocky Rebirth of China's Legendary City*),新加坡,2003年,第113-115页。

〔66〕 索林杰:《争取中国城市户口》(Solinger,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第5页。

起他们乡下来的亲戚,并把这个城市发生的犯罪首先归咎于他们。大多数农民工是到城市普遍存在的建筑工地上找工作的男人。他们晚上睡在工地上临时搭建的工棚中,或在城市郊区租金低廉的地方居住,或者(如果他们还没有找到工作的话)睡在人行道上。移民妇女在上海人家里当女仆或在镇上糟糕的破旧理发店中做洗头妹——10元人民币(折合1.29美元)洗个头,有时还提供一点性服务。脸上脏兮兮的移民乞丐儿童衣着褴褛——跟着他们的母亲或独自一人——在一些热闹的、特别是外国人经常去的酒吧外面讨些零钱。〔67〕

中国官员对国民经济的进步指数——特别是自1980年以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的赞美并非毫无道理;但他们很少预见到即将到来的贫困和掠夺。中国的社会指标非常不可靠。2002年,政府的主要智囊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对于被极度低估的城市贫困发出警告。该中心建议把城市贫民的官方数据从1470万提升到至少是3710万,尽管它承认这个修订后的数字仍然未能包括1000万下岗工人或1亿仍被计入农业人口的“流动工”。〔68〕

城市贫困在印度——比在中国——得到更诚实的承认,并引起了更多的公共争议。但当地科学家和社会公正行动者们试图把公众注意力集中到近来经济增长的底部,他们不得不与“当前形势大好”的官方修辞相抗衡。正如任何商业界读者都知道的那样,1991年之后,印度经济巨大的新自由主义重组形成了高科技繁荣和股票市场的经济泡沫——以一批

〔67〕 亚茨科:《新上海》(Yatsko, *New Shanghai*),第120-121页。

〔68〕 人民日报(英文版),2002年10月30日;阿特尔·侯赛因:《中国城市贫困:测量、模式和政策》,收入《国际劳工组织工作报告》(Athar Hussain, "Urban Poverty in China: Measurement, Patterns and Policies," *ILO working paper*),日内瓦,2003年。

灰姑娘(Cinderella)城市:班加罗尔、浦那(Pune)、海德拉巴和金奈(Chennai)为疯狂中心。199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以6%的速度增长,而孟买证券交易所(Bombay Stock Exchange)的资本几乎是每年翻一番。结果之一是造就了100万新的百万富翁——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美国加州森尼维耳市(Sunnyvale)和雷德蒙市(Redmond)回国的印度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然而,很少公之于众的是伴之而起的贫困增长:在“繁荣”过程中,印度增加了5600万乞丐。实际上,正如杰里米·西布鲁克概述的那样,1990年代早期可能是“自独立以来,对贫民而言最糟糕的时代”:解除管制后的食物谷物价格在1991年至1994年间暴涨了58%。<sup>[69]</sup>

经济增长惊人地不平衡,信息技术部门的大量投资预算使得农业停滞,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被搁置。新自由主义印度人民党(Janata,即Bharatiya Janata Party)政府不是靠向新的百万富翁征税,而是靠大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来筹措资金。美国安然能源公司\*如今以民用电价格的三倍来出售孟买附近的电。新自由主义政策,正如中国一样,对印度乡村而言是一场浩劫:那儿3/4的家庭没有办法获得医疗服务和未被污染的饮用水,贫民无望地叫道“电、路和水(印度语,Bijli, Sadaak, Paani)”。正如帕尔夫·彼得万(Praful Bidwai)在2000年《亚洲时代杂志》中报道的那样:

婴儿死亡率正在上升,即使是在诸如卡拉拉邦(Kerala)和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这样一些有着相对良好社会指标的省份……政府正在削减用于(包括农业计划、乡村就业和反贫困方案在内的)乡村发展、健康、饮用水供应、教育和卫生的费用。70%印度人居住的乡村地区,收入增长率在1980年代是平均3.1%。它迅速下降

[69] 西布鲁克:《在南部城市中》(Seabrook, *In the Cities of the South*),第63页。

\* Enron,美国第七大公司。——译者注

到 1.8%。乡村工人的实际工资,去年至少下降了 2%。〔70〕

当城市中产阶级沉迷于他们的加利福尼亚式宽敞住宅和健身俱乐部时,破产的乡村贫民撞车自杀。在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一个地方,新闻记者爱德华·鲁斯(Edward Luce)在 2004 年 7 月写道:“仅仅今年就有 500 名农民自杀,经常是通过喝赊购来的杀虫剂。”〔71〕乡村的绝望在增加,结果驱逐了大批农民和劳动力。他们唯一的选择是被迫移民到班加罗尔这样的高科技繁荣市镇的郊区贫民窟中。

作为印度软件和计算机服务工业的总部和军用飞机的主要制造中心,班加罗尔(600 万人口)以其加利福尼亚式的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和新式烹饪(Nouvelle Cuisine)的餐馆,五星级酒店和英语原声影院而著名。许多科技园体现着甲骨文(Oracle)、英特尔(Intel)、戴尔(Dell)和宏媒体(Marcomedia)的理念,当地大学和工业院校每年毕业 4 万名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班加罗尔把自己包装为一个“繁荣的花园城市”,其南郊事实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的香格里拉(Shangrila)。与此同时,严酷的城市复兴计划把无特权的居民从市中心驱逐到边缘的贫民窟,他们在那儿与贫困的乡村移民生活在一起。估计约有 200 万贫民,他们中的许多人经常受到排挤,擅自定居在 1000 个左右散发着恶臭的贫民窟,大多数在政府所有的土地上。贫民窟人口增长速度是普通人口增速的两倍,研究者们把班加罗尔边缘特征描绘为“这片斜坡是给那些城市贫民的,他们的劳动力是城市经济所需要的,而他们的视觉存在则被尽可能地减少。”〔72〕

半数的班加罗尔人口缺乏管道水和非常廉价的卡布基诺咖啡,捡垃

---

〔70〕 帕尔夫·彼得万:《印度泡沫经济繁荣与贫困增长》(Pratul Bidwai, “India’s Bubble Economy Booms as Poverty Grows,” *Asia Times*), 2000 年 3 月 17 日。

〔71〕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2004 年 7 月 24-25 日。

〔72〕 汉斯·申克和迈克尔·德威特:《班加罗尔边缘生境》,收入申克编:《印度贫民窟生活》(Hans Schenk and Michael Dewitt, “The Fringe Habitat of Bangalore,” in *Living in India’s Slums*), 第 131 页。

圾的人和街头儿童乞丐(9万)比软件工人(6万)多得多。在10个贫民窟中的一个,研究者们发现10.2万人只有19个厕所。〔73〕所罗门·本雅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班加罗尔事务顾问——报道“儿童腹泻情况严重,寄生虫肆虐,营养不良的比例很高,贫民窟婴儿死亡率远远高于国家平均水平。”此外,20世纪末,印度和班加罗尔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泡沫破裂:尽管软件业继续增长,“几乎所有部门——特别是公共部门——的就业都极速缩水或面临不稳定前景。因此,班加罗尔那些用花岗石、钢材和有色玻璃建成的豪华办公室——大部分属于软件公司——与因管理不善而陷入混乱和资金短缺的工厂形成了鲜明对比。”〔74〕一位重要的西方经济顾问被迫承认:“令人沮丧的是,班加罗尔的高科技(繁荣)只不过是贫困海洋中的一滴水珠。”〔75〕

---

〔73〕 申克:《班加罗尔贫民窟的生活》和《班加罗尔:概论》,收入《印度贫民窟生活》(Schenk, “Living in Bangalore’s Slums” and “Bangalore: An Outline,” in *Living in India’s Slums*), 第23, 30-32, 44, 46页; H. 拉玛钱德朗和 G. S. 萨斯特里:《班加罗尔贫民窟的详细目录及类型》, 出处同上(H. Ramachandran and G. S. Sastry, “An Inventory and Typology of Slums in Bangalore,” in *ibid.*), 第54页。本雅明:《班加罗尔的管理、经济环境和贫困》(Benjamin, “Governance, Economic Settings and Poverty in Bangalore”), 第39页; [www.agapeindia.com/street\\_children.htm](http://www.agapeindia.com/street_children.htm) for ragpickers and waifs.

〔74〕 本雅明:《班加罗尔的管理、经济环境和贫困》(Benjamin, “Governance, Economic Settings and Poverty in Bangalore”), 第36-39页。

〔75〕 威廉·刘易斯, 转引自伯纳德·索因卡:《象征超过实质》, 载于《华尔街日报》(William Lewis quoted in Bernard Wysocki, “Symbol Over Substance,” *Wall Street Journal*), 2000年9月25日。

## 第八章 一种过剩的人性？

---

没有工厂、作坊和工作，也没有老板的无产阶级，处于众多就业机会的混乱中，在生存的泥淖中挣扎，过着一种劫后余生的生活。

——帕特里克·沙穆瓦佐〔1〕

1978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残酷构造学类似于维多利亚帝国主义晚期(1870—1900)在第一世界地盘上形成一个“第三世界”的灾难性进程。在19世纪末，亚洲和非洲农民被强制性融入生存压力更大的世界市场，这使得数百万人死于饥荒并让数千万人背井离乡。最终结果(拉丁美洲也一样)是乡村“半无产阶级化”，创造了一个由大量不能融合的、丧失了生存资料的准农民和农民工组成的全球性阶级。结果，21世纪没有成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曾想象过那种城市革命时代，而成了一个划时代的乡村起义和农民民族解放战争的时代。〔2〕

近来，结构调整——如同其原本设想的那样——从根本上重塑了人类未来。正如《贫民窟的挑战》的作者所总结的那样：“尽管焦点是发展

---

〔1〕 帕特里克·沙穆瓦佐：《德士古》(Patrick Chamoiseau, *Texaco*)，纽约，1997年，第314页。

〔2〕 参见作者：《维多利亚晚期的大屠杀：厄尔尼诺饥荒和第三世界的形成》(See my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伦敦，2001年，尤其是第206—209页。

与繁荣,城市已经成为一个过剩人口——在无需专门技能、无最低工资限制的非正式服务业和商业部门中工作——的斜坡。”他们无情地宣称“(这种)非正式部门兴起是……自由化的直接后果。”一些巴西社会学家们称这一进程为——类似于失去土地的农民们的半无产阶级化——“被动无产阶级化”,包括“对绝大部分直接生产者而言,传统(再)生产形式的解体并没有转化为一种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工薪阶层。〔3〕

非正式工人阶级——没有任何法律的认可或权利——有着重要的历史前身。在现代欧洲史上,那不勒斯甚至比都柏林或伦敦下东区(London's East End)更像一个城市非正式经济的案例。弗兰克·斯诺登(Frank Snowden)在其优秀研究中指出,在这个“19世纪最令人震惊的城市”,一种“长期的劳动力超级过剩(chronic super-abundance of labour)”在应运而生的经济奇迹和生存专门市场的经常细分中得以生存。正式工作的结构性缺乏——永久失业率约为40%——被转化为一种势不可挡的非正式竞争奇观。(斯诺登笔下所描绘的)重组的(Risorgimento)那不勒斯街头场景是对当代利马或金沙萨一种丰富多彩而又悲观失望的预期。

这正是当地经济衰退的特征:成千上万的人通过在城市泥泞的大街小巷上沿街叫卖他们的货物来维生。这些贫困的个体户赋予了那不勒斯一种大型商业中心的热闹色彩。这些男男女女都不是工人,而是“衣衫褴褛的资本家”,他们充当了无法估量的、令人迷惑的不同角色。当地政府把他们称为“微型企业主”。这些街头小贩的精英是报贩——他们一年到头只做一种生意并收入稳定。其他个体

---

〔3〕《挑战》(Challenge),第40、46页;托马斯·密歇根、亨里克·米兰达和马利奇里·帕拉恩斯:《亚马逊野性城市化与被动无产阶级化——以伯利恒为例》,伯利恒,1989年。(Thomas Mitschein, Henrique Miranda, and Mariceli Paraense, *Urbanização Selvagem e Proletarização Passiva na Amazônia-O Caso de Belém*, Belém 1989)——转引自布劳德和戈弗雷:《热带雨林城市》(quoted in Browder and Godfrey, *Rainforest Cities*),第132页。

户是“吉卜赛式商人”——市场上永远的流浪者,不断从一行转到另一行寻找机会。他们卖蔬菜、板栗和鞋带;卖比萨饼、淡菜、二手衣服还有矿泉水、玉米棒和糖果。一些人做邮差、商业传单分发者和(每周只赚几块意大利辅币的)疏通下水道或搬运家庭垃圾的私人清洁工。其他人做职业的送葬者——跟着灵车,抬着尸体送到设在波焦雷亚莱(Proggioireale)的公墓。职业乞丐大量出现,通过他们的存在,有教养的阶级能确认他们的人气和权力感。〔4〕

今天,那不勒斯街头有成百上千甚至是成千上万的个体户。可以确信的是,在1970年代,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和其他激进的批评家令人信服地批判了把贫民窟住房与经济非正式性关联起来的“边缘神话(myth of marginality)”。他们指出,大量工人和公务员被迫生活在加拉加斯和圣地亚哥等城市的劣质住房中。〔5〕此外,至少是在拉丁美洲,先前的进口替代(import-substitution)工业化时代主流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在非正式就业中被相对削弱——整个地区的正式就业率从1940年的29%下降到21%。〔6〕

然而,1980年以来,非正式经济开始复仇:把城市等同于职业边缘性已成为不可否认和势不可挡的趋势:据联合国数据,非正式工人构成了发展中世界经济活动人口的近2/5。〔7〕在拉丁美洲,加上美洲开发银行

---

〔4〕 斯诺登:《霍乱时代的那不勒斯》(Snowden, *Naples in the Times of Cholera*),剑桥,1995年,第35-36页。

〔5〕 卡斯特尔:《城市与基层》(Castells,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第181-183页。

〔6〕 德·奥利维拉和布赖恩·罗伯茨:《非正规经济部门在发展中的多重角色:来自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证据》,收入凯丝·拉科夫斯基编:《对位法:拉丁美洲非正规经济部门论争》(Orlandina de Oliveira and Bryan Roberts, “The Many Roles of the Informal Sector in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Urban Labor Market Research, 1940-1989,” in Cathy Rakowski (ed.), *Contrapunto: The Informal Sector Debate in Latin America*),奥尔巴尼,1994年,第56页。

〔7〕 《挑战》(*Challenge*),第40,46页。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非正式经济目前雇用了 57% 的劳动力,提供了 4/5 的新“工作”〔8〕(实际上,墨西哥在 2000 至 2004 年间创造的“仅有(only)”工作都是在非正式部门的)。其他资料显示,半数以上的城市印度尼西亚人,60% 到 75% 的中美洲人(Central American),65% 的达卡人和喀土穆人,75% 的卡拉奇人靠非正式部门维生。〔9〕

小型城市,如秘鲁的万卡约(Huancayo)或印度的阿拉哈巴德(Allahabad)和斋浦尔(Jaipur)趋向于更不正式化:3/4 或更多的劳动者生活在不入账的(off-the-books)经济的阴影中。〔10〕同样,在中国,数百万农民工被(经常是非法的)牢牢捆在了城市生活上。据阿普劳德·拉奎因(Aprodicio Laquian)所言,“小城镇的大部分就业均在非正式部门:食品摊和小餐馆、美容院和理发店、女装缝纫店(dressmaking salon)或小商品店。尽管这些非正式部门的就业趋向于劳动密集型(labour-intensive)并能吸纳大量人员,但它们的经济效率和生产潜能存在诸多问题。”〔11〕

在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城市,正式就业机会的创造几乎不复存在。国际劳工组织对 1990 年代早期“滞胀的(stagflationary)”结构调整下的津巴布韦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发现,正式部门每年只创造了 1 万个工作

〔8〕 转引自《经济学家》(Cited in *The Economist*),1998 年 3 月 21 日,第 37 页。

〔9〕 《挑战》(*Challenge*),第 103 页;尤迪内利和卡萨达:《创造第三世界城市就业机会的需要》,收入卡萨达和帕内尔等编:《第三世界城市》(Rondinelli and Kasarda, “Job Creation Needs in Third World Cities”, *Third World Cities*);哈桑:《导论》,收入汗:《欧兰治试点项目》(Hasan, “Introduction,” in Khan, *Orangi Pilot Project*)第 11 页(转引自《1989 年卡拉奇总体规划》)(cites *Karachi Master Plan of 1989*);乌拜杜尔·罗伯、M. 柯比尔和 M. 穆塔哈拉:《孟加拉国的城市化》,收入盖伊尔·勒施和仁罗华:《新世纪的亚洲城市化》(Ubaidur Rob, M. Kabir, and M. Mutahara, “Urbanization in Bangladesh,” in Gayl Ness and Prem Talwer (eds), *Asian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新加坡,2005 年,第 36 页。

〔10〕 尤迪内利和卡萨达(Rondinelli and Kasarda),第 107 页。

〔11〕 拉奎因:《中国国家城市策略和地区发展政策对城市增长模式的影响》(Laquian, “The Effects of National Urban Strateg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on Patterns of Urban Growth in China”),第 66 页。

机会,而城市劳动力的增加每年超过30万人。〔12〕同样,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对西非的一个研究显示,到2020年,不断收缩的正式部门仅能雇佣1/4甚至更少的劳动力。〔13〕这与联合国的残酷计划——在下一个十年中,非正式就业将吸纳90%的城市非洲新工人——相一致。〔14〕

## 非正式经济的神话

总之,全球非正式工人阶级——与贫民窟人口有所重叠但又不完全等同——有10亿多人口,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增长最快、人数最多的社会阶级。自从在阿克拉工作的人类学家基思·哈特(Keith Hart)于1973年第一次提出“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这一概念以来,大量著作一直在思索这一可怕的理论和经验主义问题,这是在研究新兴城市贫民的生存策略时必然要涉及到的。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买办资本主义时期的上海及城市殖民印度的确存在大量非正式部门——南迪尼·古普图写道:“一个势不可挡的和长期持续的现实”,非正式经济当前的宏观经济角色是革命性的。〔15〕

研究者们有一种基本的共识:1980年代危机期间,非正式部门比正式部门的增长速度快2到5倍,已经颠倒了它们的相对结构位置,把非正式的生存第一主义(survivalism)建构为第三世界城市中大多数人新的首要生存模式。即使是在迅速工业化的中国城市,“仍然存在剧增的、为城

---

〔12〕 盖·莫宏:《结构调整对于津巴布韦城市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影响》,收入“发展问题”讨论文件(Guy Mhone, “The Impact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on the Urban Informal Sector in Zimbabwe,” “Issues in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2),日内瓦,第19页。

〔13〕 库尔和斯勒瑞希编:《预备未来》(Cour and Snrech,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第64页。

〔14〕 《挑战》(*Challenge*),第104页。

〔15〕 古普图:《21世纪早期印度的城市穷人政策》(Gooptu, *The Politics of the Urban Poor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India*),第2页。

市贫民提供生存方式的初级非正式经济活动。”〔16〕可以肯定的是,部分非正式无产阶级是正式经济的潜在人选。大量研究表明,沃尔玛和其他超级大公司的外包\*网络是多么深入地扩展到贫民窟的悲惨中。同样地,在不断随意化的正式就业世界和非正式部门的渗透之间存在一种持续而非突然的分化。最后,大多数住在贫民窟的贫穷劳动者成为当代国际经济中真正的无家可归者。研究者们被迫相应地抛弃1960年代现代化理论家和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理论家们所主张的乐观主义“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Todaro model)”。这一模式认为非正式部门只是一个毕业后到正式部门工作的大多数乡村移民学习城市技能的一个学校。〔17〕尽管流动性不断增加,但看起来不情愿的正式部门工人和下岗公务员只有一个向下通往黑市经济的楼梯。

然而,有许多学者反对作出这样的直接论断,即非正式性的增长是一座失业“活火山(active)”的爆发——国际劳工组织的奥贝南将其概括为,“因不断增加的公开失业而未充分就业或虚假失业的替代品”。〔18〕事实上,当经验丰富的研究者们例如简·布雷曼(Jan Breman)(花了40年的时间研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贫困)得出结论说,非正式经济中不断增加的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一厢情愿的思维方式所激起的神话”。自助和非政府组织型项目的倡导者们对此无言

---

〔16〕 汗和罗斯金:《全球化时代中国的贫困与不平等》(Khan and Riskin,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第40页。

\* subcontracting,外包是美国对其公司把美国国内的工作外包给中国、印度等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这种方法的统称。外包工作是世界全球化浪潮下的必然趋势。——译者注

〔17〕 参见M.托达罗的经典表述:《次发达国家的劳工移民和城市失业模型》,载于《美国经济评论》(See the classic formulation: M. Todaro,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1, 1969年,第138-145页。

〔18〕 奥贝南:《第三世界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就业与贫困》(Oberai, *Population Growth, 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Third-World Mega-Cities*),第64页。

以对。<sup>[19]</sup>相反,无数研究——常常是世界银行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其他主要势力所资助的——已经在这样一种信仰中寻求到了安慰:非正式部门是城市的第三世界潜在解围者(*deus ex machina*)。

当然,赫尔南多·德·索托因这样一个主张而闻名于世:边缘化劳工和剩余农民的大量人口是一个要求非正式所有权和无秩序竞争空间的元资本主义(*proto-capitalist*)的马蜂窝。他指出:“马克思可能会震惊地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喧哗的大众不包括真正受压迫的工人阶级而包括被排挤的非法小企业主。”<sup>[20]</sup>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德·索托的辅助程序(*bootstrap*)发展模型因其方法的简单易行——把政府(及正规部门工会)一脚踢开,加强微型企业主的小型信贷,并把土地所有权赋予擅自定居者,然后让市场自由发展实现贫困向资本的转换——而特别流行。德·索托所激发的乐观主义,在其最荒谬的方面,已经导致一些援助发展的(*development-aid*)官僚机构重新定义贫民窟为“策略化的低收入城市管理体系统(*Strategic Low-Income Urban Management Systems*)”。<sup>[21]</sup>然而,这种对于非正式部门的半乌托邦观点在一系列方法论谬见中产生出来。

首先,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者没有注意到威廉·豪斯(*William House*)1978年在其对于内罗毕贫民窟的个案研究中发出的警告——需要区分小型积累(*micro-accumulation*)的非正式经济和低于最低生活费(*sub-subsistence*)的非正式经济:“将欠发达国家中的城市经济简单二分为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显然不够的。非正式部门至少可以进一步分为

---

[19] 简·布雷曼:《正在劳工化的穷人:利用、从属与排斥》(*Jan Breman, The Labouring Poor: Patterns of Exploitation, Subordination, and Exclusion*),新德里,第174页。

[20] 转引自唐纳德·柯鲁基柏:《约翰·洛克或厄兰多·德·索托的教训:假如你的梦想成真》,载于《住房政策论坛》(Quoted in Donald Krueckeberg, “The Lessons of John Locke or Hernando de Soto: What if Your Dreams Come True,” *Housing Policy Debate* 15:1),2004年,第2页。

[21] 英国国家发展部的米歇尔·穆特,转引自《环境与城市化》(*Michael Mutter,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quoted in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第15期第1卷,2003年4月,第12页。

两个次级部门：一个是中间部门，作为企业的动力储备池而出现；另一个是贫民阶层，包含大量剩余和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22〕

近来，亚历桑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和凯利·霍夫曼（Kelly Hoffman）沿着豪斯的路子，评估了1970年代以来结构调整计划和新自由主义化对拉丁美洲城市阶级结构的全部影响。他们仔细地区分了非正式小资产阶级（informal petty bourgeoisie）和非正式无产阶级（informal proletariat）。前者是“雇工少于5人的小企业主，加上个体户（own-account）中的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的总和”；而后者则是“工人减去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家务佣人和微型企业中付费和不付费的工人”。他们发现，差不多每个国家的非正式部门就业扩张与公共部门及正式无产阶级的就业缩减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强烈的相互关联：德·索托笔下英勇的“微型企业主”经常被公共部门的专业人士或下岗的技术工人所置换。自1980年代以来，他们已经从城市经济活动人口的约5%上升到超过10%：这一趋势反映出“正式部门的就业下降强加给先前的工薪雇员们的被迫自创业主义（forced entrepreneurialism）。”〔23〕

第二，非正式部门的雇员，付费和不付费的，在第三世界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几乎——和大多数住房研究中的贫民窟房客一样——是隐形的。〔24〕尽管有着英勇的自谋职业者原型，大部分非正式经济的参与者

---

〔22〕 参见威廉·豪斯：《内罗毕的非正规经济部门：动态企业或剩余劳动力》载于《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See William House, “Nairobi’s Informal Sector: Dynamic Entrepreneurs or Surplus Lab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第32期，1984年1月，第298-299页；也参见“非洲英语地区劳动力市场特权研究”，载于《发展中地区杂志》（also “Priorities for Urban Labour Market Research in Anglophone Africa,” *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第27期，1992年10月。

〔23〕 亚历桑德罗·波茨和凯利·霍夫曼：《拉丁美洲阶级结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构成与变化》，载于《拉丁美洲研究评论》（Alejandro Portes and Kelly Hoffman, “Latin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Their Composition and Change during the Neoliberal Era,”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38:1），2003年，第55页。

〔24〕 奥贝南：《第三世界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就业与贫困》（Oberai, *Population Growth, 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Third-World Mega-Cities*），第109页。

们直接或间接(如,通过寄卖食物或租借手推车或黄包车的方式)为某人工作。

第三,正如简·布雷曼提醒我们的那样,“非正式就业”的确切含义是正式合约、权利规则和交易权的缺乏。非正式部门的本质是小型剥削,在其内部及其与正规部门之间有一种不断增加的不平等。〔25〕德·索托的非正式资本“隐形革命”实际上是无数的隐形剥削网络。简·布雷曼和阿文德·达斯(Arvind Das)描绘了苏拉特总统无情的小型资本主义:

喧闹的劳动力剥削之外,非正式部门的特征是简陋技术、低资本投资、人工密集型生产。与此同时,这一部门的标志是——伴随着非正式部门的非注册和逃税而来的——高利润率和大量资本积累。这一部门最显著的图画是垃圾店的“绅士”老板,西装笔挺地坐在闪闪发光的汽车里,从垃圾工们辛辛苦苦从垃圾堆中捡出来的东西中获利。靠垃圾发财,的确如此。〔26〕

第四,这是前面两点的一个必然结果——非正式化现象确保了对妇女儿童虐待。正是布雷曼再一次在其对于印度贫困工人的权威研究中明确展示了这一框架:“出乎公众意料之外,经常是最病弱和最瘦小的肩膀不得不担起非正规化的最重压力。分担贫困的形象并未公正对待这种现实以及家庭内部盛行的不平等。”〔27〕

第五,相较于满怀希望的辅助程序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非正式部门——正如弗雷德里克·托马斯在加尔各答发现的那样——不是通过扩大劳动力分工,而是通过把现存工作框架化,因此再分配收入的方式来生

〔25〕 布雷曼:《贫苦穷人》(Breman, *The Labouring Poor*),第4、9、154、196页。

〔26〕 简·布雷曼和阿文德·达斯:《一败涂地:全球化资本主义下的劳动》(Jan Breman and Arvind Das, *Down and Out: Labouring Under Global Capitalism*),新德里,2000年,第56页。

〔27〕 布雷曼:《贫苦穷人》(Breman, *The Labouring Poor*),第231页。

产就业机会：

三四个人分做一个人就能做的工作，市场上的妇女们数小时坐在一小堆水果或蔬菜前面，理发师和擦鞋匠整天在人行道上游荡却只有寥寥几个顾客，小男孩穿梭在车流中卖餐巾纸、擦车窗、兜售杂志或香烟，建筑工人每日清晨经常徒劳地枯等，满心希望能等到一份工作。<sup>[28]</sup>

剩余劳动力变成非正式“企业主”的顺差经常是令人震惊的。1992年，达累斯萨拉姆贫民窟的一份调查估计：这个城市20多万小商贩中的大多数不是人种学知识中著名的女食物小贩（*Mama Lishe*）而是失业青年。研究者们指出：“总的说来，对大多数经济困难的城市居民而言，非正式小生意是最后的就业手段。”<sup>[29]</sup>此外，非正式企业和小型正式企业不停地彼此争夺经济空间：如街头小贩与小店店主、私人小巴与公交车的竞争。<sup>[30]</sup>正如布赖恩·罗伯特（Bryan Robert）在21世纪初所言，在拉丁美洲，“‘非正式部门’在发展，但部门内部收入下降”。<sup>[31]</sup>

城市非正式部门中的竞争变得如此集中，以至于它使人回想起达尔文关于热带雨林大自然生态斗争的著名论断：“成千上万个锋利的楔子[即城市生存策略]一个靠一个堆在一起并被不断地敲击推到更里面，有时一个楔子被敲打，然后另一个被敲打得更厉害。”为新进入者提供经济空间的只有劳动密集化——人均赚钱能力缩减和（或）边际收益递减。

[28] 托马斯：《加尔各答穷人》（Thomas, *Calcutta Poor*），第114页。

[29] 威廉姆：《环境规划与管理概念的制度化》收入卫定达和伊德合编：《城市与发展》（William Kombe, “Institutionalising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Westendorff and Eade, *Development and Cities*），第69页。

[30] 塞瑟罗曼：《城市贫困与非正式部门》（Sethuraman, “Urban Poverty and the Informal Sector,”），第8页。

[31] 布赖恩·罗伯特：《从边缘到社会排斥：从自由放任到普遍深入》，载于《拉丁美洲研究评论》（Bryan Roberts, “From Marginality to Social Exclusion: From Laissez Faire to Pervasive Engagement,”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39:1），2004年2月，第196页。

“在整个系统中给每个人提供一个合适职位,无论多小”的努力被同样过度拥挤和“哥特式细化(Gothic elaboration)”——克利福德·德勒兹(Clifford Geertz),从其艺术史中借来的一个术语——的专门市场继续推进。克利福德·德勒兹著名地将其表述为殖民地爪哇(Java)农业经济中的“内卷(involution)”。因此,“城市内卷(Urban involution)”,看来是一个对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城市非正式就业结构革命的恰当描绘。〔32〕

可以确信的是,城市内卷的趋势存在于19世纪。欧洲城市工业革命不能完全吸纳流离失所的乡村劳动力,特别是在欧洲大陆农业自1980年代以来被暴露在北美大牧场和阿根廷大草原的灾难性竞争之后。但大量到美国、澳大拉西亚\*和西伯利亚(Siberia)移居者社会的移民提供了一个动态安全阀。它能阻止超大都柏林和超级那不勒斯的兴起,并防止这种植根于南非最不融合部分的下层社会无政府主义的扩散。相反,今天,剩余劳动力想要移民到富裕国家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障碍。

第六,因为贫民在与这些绝望状况作斗争,也许并不奇怪他们带着幻想和希望转而求助于一种城市生存的“第三经济”:包括赌博、传销、彩票及其他魔术般的(quasi-magical)财富窃取(appropriation)方式。例如,在他们对于位于曼谷空堤(Klongtoey)贫民窟家庭经济的研究中,汉斯-迪特尔·埃弗斯(Hans-Dieter Evers)和吕格迪·科尔夫(Rüdiger Korff)发现整整20%的社区收入通过赌博和股市(share game)重新分配。〔33〕此外,

---

〔32〕 克利福德·德勒兹:《农业革命: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进程》(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伯克利,1963年,第80-82页。在“滩头堡和飞地:1945年以来南亚的都市论争与城市化进程”一文中使用了“城市内卷”的比喻,收入:《改变东南亚城市:解读都市主义》(T. McGhee uses the “urban involution” metaphor in “Beachheads and Enclaves: The Urban Debate and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Southeast Asia since 1945,” in Y. M. Yrung and C. P. Lo (eds), *Changing South-East Asian Cities: Readings on Urbanization*),伦敦,1976年。

\* Australasia,泛指澳洲、新西兰及附近南太平洋诸岛。——译者注

〔33〕 埃弗斯和科尔夫:《东南亚都市主义》(Evers and Korff, *Southeast Asian Urbanism*),第143页。

整个第三世界的城市,宗教捐款总是围绕着试图影响财运和幸运。

第七,在这样一些条件下,并不惊讶发现原初的小额信贷和合作社借贷(尽管能帮助那些非正式企业渡过难关)对缓解贫困却没有太大的影响,即使在达卡——世界著名的孟买乡村银行(Grameen Bank)的老家。<sup>[34]</sup>事实上,亚米·约瑟夫(Jaime Joseph)写道,在“调控微型企业”的顽强信念中,利马一个成熟的社区组织者,已经变成好心的非政府组织中的某种城市物质崇拜物:“有许多强调把小型或微型企业作为解决城市贫民经济发展的魔术手段。我们最近20年来围绕小型企业,在大城市中是多层次的工作表明:它们中的大部分只能维持生存,很少或根本没有机会积累。”<sup>[35]</sup>

第八,非正式部门内部不断增加的竞争耗尽了社会资本并消解了真正的贫民们——特别是妇女儿童——赖以生存的自助网络和团结本质。在海地,一个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约勒特·艾蒂安(Yolette Etienne)描绘了在一个绝对不相融合的语境中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最终逻辑:

如今所有东西都是可以出售的。妇女过去常常给你提供住宿、给你咖啡,分享她家里所有的一切。我能在邻居家里得到一盘食物;孩子能在她教母那儿得到一个椰子,在另一个阿姨家里得到两个芒果。但这些团结都随着贫困的增加而消失了。如今当你到了某地,妇女卖给你而不是送给你一杯咖啡,或者她根本就没有咖啡。使得我们彼此帮助和生存下来的这种相互给予的传统——已经完全失落了。<sup>[36]</sup>

---

[34] 塞纳加尔·霍克:《孟加拉的小额信贷与贫困缓解》,载于《当代亚洲杂志》(Serajul Hoque, “Micro-credit and the Reduction of Poverty in Banglades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4:1), 2004年,第21、27页。

[35] 亚米·约瑟夫:《特大城市中的可持续发展与民主》,收入卫定达和伊德合编:《城市与发展》(Jaime Josep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in Megacities,” in Westendorff and Eade, *Development and Cities*), 第115页。

[36] 转引自贝尔:《水深火热》(Quoted in Bell, *Walking on Fire*), 第120页。

同样,在墨西哥,梅赛德斯·德·拉·罗查(Mercedes de la Rocha)“警告说二十多年来一直存在的贫困已经使得贫民无计可施。”海地的一个 NGO 工作者西尔维亚·钱特(Sylvia Chant)进一步指出:“过去,家人、家和社区团结是人们精神力量的主要来源;如今,这一切都不再可靠。对于人们响应别人的号召以及在面对美好生活的巨大结构障碍时的有效交流而言,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限制啊!特别是,有许多忧虑:落在妇女肩上的不相称的(disproportionate)负担使得她们的个人能力发挥到极限,没有任何‘放松’余地。”〔37〕

第九点,也是最后一点,在这些竞争的极端状况下,使得劳工更具有流动性的新自由主义处方——如开始于世界银行 1995 年《世界发展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简直就是一场灾难。〔38〕德·索托(De Soto)口号完全是滑向霍布斯式(Hobbesian)地狱的润滑剂。在无限富余的劳动力供应情况下,那些对于非正式部门内部竞争的干预经常导致了全面冲突;而冲突经常变形为民族宗教(ethnoreligious)或种族暴力。非正式部门的教父或老板(在大多数作品中是隐形的)聪明地运用强制(coercion),甚至长期暴力来控制竞争并保护他们的投资。正如菲利普·埃米斯(Philip Amis)强调的那样:“有许多资本入场障碍,经常是政治意义上的,创造了一种非正式部门的地区垄断趋势;外人很难插足。”〔39〕

政治上,非正式部门缺乏强制实施的劳动权,是一个回扣(kick-back)、贿赂(bribes)、部落忠诚(tribal loyalties)和种族排斥的半封建王

〔37〕 转引自西尔维亚·钱特:《城市生计、就业与社会性别》,收入格维尼和凯(Paraphrased in Sylvia Chant, “Urban Livelihoods, Employment and Gender,” in Gwynne and Kay),第 212-214 页。

〔38〕 布雷曼:《正在劳工化的穷人》(Breman, *The Labouring Poor*),第 5, 201 页。

〔39〕 菲利普·埃米斯:《理解城市贫困》,载于《环境与城市化》(Philip Amis, “Making Sense of Urban Poverty,”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7:1),1995 年 4 月,第 151 页。

国。都市空间绝不是免费的。人行道上的一块地方,一辆黄包车的租借,建筑工地上一个劳工名额,或给一个新雇员的家务指南:所有这些都要求赞助者和成员有密切的关系网,经常是一个种族的民兵(militia)或街头帮派。鉴于传统的非正式工业如印度的纺织业或中东的石油业等趋向于通过联盟或激进政党培育种族团结,无保护的非正式部门的兴起经常伴随着恶化的民族宗教隔离和宗派暴力。〔40〕

## 剥削博物馆

于是,非正式部门不是其新自由主义热心者们所预想的勇敢新世界,而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类剥削博物馆。〔狄更斯、左拉或高尔基所叙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悲惨条目没有一条不存在于今天的第三世界。我所指的不光是悲惨的生存和历史的重演,更是被后现代全球化赋予了新生命的原始剥削形式——童工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尽管儿童很少为资本主义自身的意识形态所讨论,他们的非法劳动,经常代表了全球的出口商,构成了大多数非正式城市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除了美国和索马里(Somalia)之外的所有国家都批准——禁止这种最糟糕的虐待,但正如人权观察网(Human Rights Watch)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所揭露的那样,这在贫困城市或所有种族隔离和种姓偏见的地区都很少被强调。当然,当代

---

〔40〕 然而,作者认为曼纽尔·卡斯特尔和亚历桑德罗·波茨在1989年的一篇论文中的主张言之过早,该文指出:面对“工作处境和社会状况中不断增加的异质性”,无产阶级正在“衰落下去”(卡斯特勒和波特:“世界底层:非正规经济的起源、动态及影响”,收入波特、卡斯特勒和劳伦·本顿合编:《非正规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研究》,巴尔的摩,1989年第31页。)事实上,非正规工人试图拼命挤入为数不多的几个主要位子,在那儿,有影响的组织和“阶级意识”也许成为可能,如果真有劳动权和规则存在的话。正是经济市民权的缺乏,而不是生计的异质性,使得非正规劳工易于从属于委托人和种族愤怒。因此作者同意简·布雷曼的观点,当他说非正规化中非正规经济部门的主要问题是劳动权和保护权,而不是财产权。(第201页)

童工的整体状况被大力掩盖并防止任何直接的考察;尽管如此,暴露出来的一切还是令人震惊。

例如,近来对达卡贫民窟儿童的一项研究显示,“将近半数的10—14岁男童和女童被迫承担起了赚钱的工作”,“仅有7%的5—16岁学龄儿童上学”。达卡有着亚洲最多的童工(约75万),他们的收入构成贫困的单身母亲(female-headed)家庭收入的一半或单身父亲家庭收入的1/3。<sup>[41]</sup> 尽管孟买吹嘘其高入学率,阿尔琼·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发现其“大型餐馆和食品服务经济计划完全依靠一支庞大的童工大军”<sup>[42]</sup>。在开罗和其他埃及城市,12岁以下的儿童占劳动力总数的7%;这包括了成千上万聚在一起兜售香烟(一天一包要花掉一个贫困男人半个月工资)的街头儿童。<sup>[43]</sup>

然而,全世界奴役和剥削儿童的中心城市可能是印度圣地——北方邦的瓦腊纳西(Varanasi)。以其纺织品、寺庙及圣人而闻名,瓦腊纳西(旧称贝拿勒斯)让20多万有担保的14岁以下童工来纺织地毯和刺绣纱丽(Saris)。<sup>[44]</sup> 为了偿付小额贷款和现金欠款,无数贫困乡村达利人(Dalits,属于印度社会种姓制度最底层“贱民”阶层)和穆斯林教徒把他们的孩子——或他们全家——卖给掠夺性的纺织品承包商。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道,地毯工业中成千上万的儿童是被“他们的父母为了微不足

---

[41] 珍·普瑞尔:《达巴卡贫民窟中的贫困与弱点:城市生计研究》(Jane Prier, *Poverty and Vulnerability in Dhaka Slums: The Urban Livelihoods Study*), Aldershot, 2003年,第176页;维多利亚·德·拉·薇拉和马太·S. 维斯特福合编:《管理城市的城市指示物:城市数据手册》(Victoria de la Villa and Matthew S. Westfall (eds), *Urban Indicators for Managing Cities: Cities Data Book*), 马尼拉, 2001年(童工数目)。

[42] 阿尔琼·阿帕杜莱:《深层民主:城市的政府至上性与政治视野》,载于《环境与城市化》(Arjun Appadurai, “Deep Democracy: Urban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Horizon of Politics,”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3:2), 2001年10月,第27页。

[43] 内多罗谢克:《死者之城》(Nedoroscik, *The City of the Dead*), 第64页。

[44] 扎马·科森—内夫:《零钱:印度丝绸业中有担保的童工》(人权观察报告)(Zama Coursen-Neff, *Small Change: Bonded Child Labor in India's Silk Industry* (Human Rights Watch Report 15:2), 2003年1月,第30页。

道的一丁点儿钱而诱拐、诱骗或哄骗去的”。

他们中的大多数被囚禁和鞭打,并被迫每天不眠不休地工作 20 个小时。孩子们几乎连弯腰都不被允许,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在发育期的生长发育受到严重影响。由于地毯纺织机主们被这一地区强大的黑手党式(Mafia-like)控制,这一地区的社会工作者们发现很难开展工作。〔45〕

人权观察网调查表明,瓦腊纳西丝绸纱丽工业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儿童们每天工作 12 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每周 6 天半或 7 天,体罚和谩骂是家常便饭。从 5 岁开始,他们从没有任何工资到每个月 400 卢布(8.33 美元)。”在一个作坊,研究者们发现一个 9 岁的孩子被锁在他的纺织机上;随处可见因煮蚕茧的危险工作而浑身是伤的男童和因长期在昏暗灯光下刺绣而视力严重受损的女童。〔46〕

另一个臭名远扬的童工中心是印度的玻璃制品中心费洛扎巴德(Firozabad),也是在北方邦(Uttar Pradesh)。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已婚妇女们所热爱的这些玻璃手镯是由 400 个左右印度次大陆条件最糟糕的工厂中 5 万名童工制作的:

孩子们做所有的工作,比如把粘在铁条顶端的玻璃熔化(他们离熔炉只有两米远);从 1500 到 1800 度高温的熔炉槽中倒出熔化的玻璃(因为孩子们的手太短,他们的的手臂几乎要碰着熔炉);连接和打磨玻璃手镯,(这个工作在一个点着煤油灯的房间进行——房间几乎不通风,因为风会吹熄灯)。整个工厂的楼梯撒满了碎玻璃,而孩子

---

〔45〕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简称 UNICEF):《1997 年世界儿童状况》(UNICEF,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1997*),牛津,1998 年,第 35 页。

〔46〕 科森—内夫:《零钱》(Coursen-Neff, *Small Change*),第 8, 30 页。

们赤脚来回搬运这些烧红的玻璃。到处悬吊着裸露的电线,因为工厂主不愿意费神去安装绝缘的墙内线路。〔47〕

然而,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童工部门无疑是家政服务。第三世界相当一部分城市中产阶级直接雇佣贫困儿童和十几岁的青少年。例如,“科伦坡(Colombo)的中等收入家庭的一次调查显示,1/3的家庭雇佣一个14岁以下的儿童作为家务佣人”——雅加达的百分比也一样。在太子港,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和危地马拉市(Guatemala city),每周工作90个小时,每月只休一天的七八岁仆人并不少见。同样,在吉隆坡和其他马来西亚城市,佣人经常是印度尼西亚女孩,标准工作时间是每天16小时,每周7天,没有休息日。〔48〕

尽管贫困的城市儿童仍被当作仆人或契约劳工,他们中一些人的父亲处境也比牲口好不了多少。黄包车一直被看作亚洲压迫劳动者的臭名昭著的象征。1860年代黄包车发明于日本,它使得“人畜”取代骡车和马车成为东亚和南亚主要的交通方式。除日本外,即便是在市内有轨电车的竞争下,黄包车在一战之后仍然因其便利、廉价和小资产阶级的地位“通行证”而留存下来。(1920年代的北京小说家陈西滢写道:“人们会想,如果你甚至连一辆私人黄包车都没有,那你如何显示你的身份呢?”)〔49〕拉黄包车被算作最糟糕的城市劳动,至少在上海是这样,大多数车夫(如果幸运的话,每天能挣一块钱)都在几年中染上心脏病或结核病。〔50〕

〔47〕 《1997年世界儿童状况》(*State of World's Children*),第37页。

〔48〕 《1997年世界儿童状况》(*State of World's Children*),第30页;人权观察:“童仆:世界隐形劳工”(Human Rights Watch, “Child Domestics: The World's Invisible Workers”),2004年6月10日,第3页。

〔49〕 戴维:《北京黄包车:1920年代的城里人与城市政治》(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伯克莱,1989年,第28页。也参照詹姆斯·沃伦:《黄包车苦力:一个人的新加坡史,1880—1940》(See also James Warren, *Rickshaw Coolie: A People's History of Singapore, 1880—1940*),新加坡,2003年。

〔50〕 斯特拉:《上海:一个堕落之城的兴衰》(Stella Dong, *Shanghai: The Rise and Fall of a Decadent City*),纽约,2000年,第162—163页。

当然,革命谴责黄包车,并向成百上千的黄包车苦力允诺有一天会解放他们。但在亚洲一些地区,这一天一直被长期延后。实际上,在今天,非正式人力交通工具,包括旧式的黄包车和人力三轮车(发明于1940年)雇佣和剥削了比1930年代更多的贫民。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亚洲街道上有超过300万黄包车车夫。〔51〕在达卡[“上帝自己的城市(God's Own City),”一个都市规划师告诉杰里米·西布鲁克,“它自动运转”],黄包车行业是“该城第二大就业机会提供者,仅次于100万左右雇员的服装业。”20万黄包车车夫——第三世界无名的兰斯·阿姆斯特朗\*——平均每天在达卡噩梦般的交通和污染环境中的蹬行60公里才挣1美元。〔52〕因为在一个变得越来越穷的城市里,这是最后一个男性职业。有执照和无执照的黄包车车夫之间出现了暴力竞争,而后者生活在害怕不时被警察抓住并焚烧其非法“车辆”的恐惧之中。〔53〕

加尔各答情况也大致相似,简·布雷曼把黄包车车夫贴切地比作“城市佃户(urban share-cropping)”,5万名印度比哈尔邦移民(Bihari immigrants)是这一行业的骨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抛家别子、孤身一人生活,有时是几十年。他们一起挤在小棚屋或马厩中,靠紧密结合(tight-knit)的小群体来规范就业。布雷曼强调,他们不是“[非正式经济神话中]个体单干的小业主,起劲地推进他们的事业和积累,而是以一种防御姿态来生活的、不独立的无产阶级生活”。他们可怜的象征性补偿使他们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的命运属于贱民(印度语:thelas),贱民本人及其全家都处

---

〔51〕 塞瑟罗曼:《城市贫困与非正规经济部门》(Sethuraman, “Urban Poverty and the Informal Sector,”),第7页。

\* Lance Armstrong,出生于美国得州的普莱诺,是一名退役的美国公路自行车赛职业车手。他因从睾丸癌中康复过来后连续7次(1999—2005)获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而闻名。——译者注

〔52〕 西布鲁克:《在南部城市中》(Seabrook, *In the Cities of the South*),第35—37页。

〔53〕 参见《亚洲人居》(亚洲人权联合会出版)第15辑中的文章,See the article in *Housing by People in Asia* 15 (published by Asian Coalition for Housing Rights),2003年10月。

于社会最底层并承受最多的重压。〔54〕

非正式经济最可怕之处——甚至超过儿童卖淫——是外科界对人体器官的需求,一个因1980年代肾脏移植外科手术的突破性进展所开创的市场。在印度,挣扎在贫困边缘的金奈(马德拉斯)[Chennai(Madras)]贫民窟是世界著名的“肾脏农场(kidney farms)”。据《前线》(*Frontline*)杂志调查,1987至1995的8年间,金奈郊区维利瓦卡姆(Villivakkam)的巴哈蒂村(Bharathi Nagar)贫民窟是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的肾脏贸易中心。在最繁荣的时候,部分是因为蜂拥到印度南部购买肾脏的外国人的刺激,这个贫民窟被称作肾脏村庄(Kidney Nagar)或肾脏农场(Kidney-bakkam)。这个地区的贫民窟居民大部分是靠拉黄包车或打短工而勉强糊口的旱灾灾民。新闻记者们估计,500多人(或每户一人)曾把他们的肾脏卖给当地的移植手术机构或出口到马来西亚;大多数出卖器官的人是妇女,包括“许多被遗弃的妇女……被迫卖掉自己肾脏来养活她们自己及其孩子。”〔55〕

近年来,开罗的贫民窟也被发展为人体器官供应地。杰弗里·雷多罗谢克解释说:“大多数顾客是富裕的波斯湾阿拉伯人(Persian Gulf Arabs)。鉴于在中东其他一些有移植中心的国家,很少国家有大量愿意出售他们器官的贫民。在过去,实验室将派遣招募人员到开罗的贫民窟和贫困地区如死亡之城(City of the Dead)去招募潜在的器官捐赠人。”〔56〕

---

〔54〕 布雷曼:《正在带工化的穷人》(Breman, *The Labouring Poor*),第149-154页。

〔55〕 其他贫困社区——如双子镇帕里帕纳亚姆和库玛纳帕拉亚姆(Pallipalayam and Kumarapalayam)——都被卷入泰米尔纳德邦的肾脏贸易。器官捐赠人中的大多数是受临时解雇和海外竞争影响的动力梭织机(powerloom)纺织工人。见于“一肾社区”(调查报告),载于《前线》(Other poor communities, like the twin towns of Pallipalayam and Kumarapalayam, were also involved in the Tamil Nadu kidney trade. Many of the donors were powerloom weavers coping with layoffs and oversea competition. “One-Kidney Communities” (Investigation), *Frontline* 14:25) (13-26 December 1997).

〔56〕 内多罗谢克:《死者之城》(Nedoroscik, *The City of the Dead*),第70页。

## 金沙萨的童巫

非正规化的弹性结构能在多大程度上为新兴城市贫民提供避难所和生计？一个被华盛顿工头正式驱逐出世界经济的大城市，在其被背叛梦想的幽灵中为最低限度的生存而奋斗：正如蒙博托总统（President Mobutu）自己所言，“金沙萨是天生富裕和人为贫困的首都，可以出售一切而又可以买到一切。”作为世界特大城市之一——只有达卡和他一样穷——金沙萨在其绝望的非正式生存策略方面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一个人类学家不无恐惧地发现，这是一个“神奇而又可怕”的大城市。那儿的正式经济和国家机构——除了镇压机构而外——已经完全崩溃。〔57〕

金沙萨是一个被其居民公开描绘为“尸体，残骸（法语 *cadavre épave*，英语 *cadaver, a wreck*）”或“金沙萨，垃圾堆”（法语 *Kin-la-poubelle*，英语 *Kinshasa, the rubbish heap*）的城市。〔58〕人类学家勒内·德维西（René Devisch）写道：“今天，估计只有不到 5% 的金沙萨人有固定薪水。”〔59〕居民们靠“遍布各地的蔬菜地和他们的智慧、买卖、走私和讨价还价”维生。“第 15 条（Article 15）（偷盗罪）”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宪章，而“应付

---

〔57〕 勒内·德维西：《金沙萨的疯狂、暴力和种族复兴》，载于《公共文化》（René Devisch, “Frenzy, Violence, and Ethical Renewal in Kinshasa,” *Public Culture* 7: 3），1995 年，第 603 页。

〔58〕 蒂埃里·马扬巴·恩兰杜，《金沙萨：超越二分法》，收入城市贫困会议的论文集：《非洲新闻简报——非洲信息补充简报》（Thierry Mayamba Nlandu, “Kinshasa: Beyond Dichotomies,” conference paper, Conference on Urban Poverty, *African News Bulletin-Bulletin d'Information Africaine Supplement*），347 号，1998 年，第 2 页。

〔59〕 勒内·德维西：《金沙萨牺牲精神对基督教的模仿》，载于《轮廓线》（René Devisch, “Parody in Matricentered Christian Heading Communes of the Sacred Spirit in Kinshasa,” *Contours* 1:2），2003 年秋，第 7 页。

(法语 *se débrouiller*, 英语 *to cope in spite of all*)”是非官方的城市口号。〔60〕实际上,以其正式经济和非正式经济的重要性(*figure-foreground*)逆转,金沙萨几乎改写了政治经济学和都市分析的范畴。正如研究刚果儿童的人类学家菲律普·德·伯克(*Filip De Boeck*)所质问的那样:

一个约有 600 万居民的城市却几乎没有任何汽车交通或公共交通,就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时不时地,数周甚至数月没有一滴油供应——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当钞票每天都面临着被贬值为毫无价值的光滑纸片时,社会继续习惯在提到一张钞票时称之为“钱”?……当非正式经济已经成为普遍,而正式经济已经几乎消失的时候,对正式和非正式或平行经济的区分有何用处?〔61〕

金沙萨人用一种压抑不住的幽默感来揶揄他们的废墟之城,但即使是夹枪带棒的(*flake-jacketed*)讽刺都对社会领域的无情甘拜下风:人均年收入下降到 100 美元以下;2/3 的人口营养不良;中产阶级消失不见;1/5 的成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62〕3/4 的人不能负担正规的医疗费用,而不得不求助于圣灵降临教派(*Pentecostal*)的信仰疗法(*faith-healing*)或本地巫术。〔63〕此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金沙萨穷人的孩子正在变成童巫。

---

〔60〕 朗:《沿着库尔兹先生的足迹》(*Wrong, In the Footsteps of Mr. Kurtz*),第 152 页。

〔61〕 菲律普·德·伯克:《金沙萨:“看不见的城市”和第二世界的故事》,收入思维佐等编:《在围攻之下》(*Filip De Boeck, “Kinshasa: Tales of the ‘Invisible City’ and the Second World,”* in Enwezor et al., *Under Siege*),第 258 页。

〔62〕 詹姆斯·阿斯蒂尔:《刚果遗弃了其童巫》,载于《观察者周刊》(*James Astill, “Congo Casts out its Child Witches,” Observer*),2003 年 5 月 11 日。

〔63〕 林恩·克里佩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儿童遗弃和隔离”,无家可归的儿童和孤儿及莱希战争受害者联盟领导下的美国国际开发署评估报告(*Lynne Cripe et al., “Abandonment and Separ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report conducted by the Displaced Children and Orphans Found and Leahy War Victims Contract* (2002 年 4 月),第 5-7 页。

金沙萨——正如刚果-扎伊尔(Congo-Zaire)的其他国家一样——受到“盗贼统治”<sup>\*</sup>、冷战地缘政治学(Cold War geopolitics)、结构调整和长期内战的典型风暴袭击。系统地掠夺了刚果32年的蒙博托独裁统治是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凯道赛<sup>\*\*</sup>为支撑而创造出来和支持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怪物。世界银行——被各国政府部门在必要时推出来——鼓励蒙博托用国家矿业作抵押向外国银行借贷巨额资金。众所周知,大部分贷款直接来自私营的瑞士(Swiss)银行。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77年启动了第一个结构调整计划,介入并确保普通的刚果人偿付贷款本息。早期的条件限制——为扎伊尔银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小组和财政部的法国员工所强化——大量裁减市政服务人员:25万公务员(正式经济中最大的职业群体)被两手空空地下岗。那些留下来的人员开始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盗用公款和贪污受贿(“15条”),并得到了蒙博托的公开支持。

十多年后,随着刚果一度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共建设纷纷朽坏或失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强了新的结构调整计划。齐卡拉·比阿雅(Tshikala Biaya)描绘了1987年协定如何“寻求给予非正式部门‘法定权力’,并使之成为一头将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刚刚摧毁的福利国家的新奶牛。”作为进一步紧缩公共部门、开放更多市场,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外汇控制及增加钻石出口等措施的交换,巴黎俱乐部(Club of Paris)使蒙博托的债务翻了一番。扎伊尔外国进口商品泛滥成灾,国内工业倒闭,金沙萨丧失了10万个就业机会。恶性通货膨胀迅速摧毁了货币体系和所有经济理性的假象。〔64〕

\* Kleptocracy,指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员贪污公产的行为。——译者注

\*\* 法语 Quai d'Orsay,巴黎市内一地名,为法国外交部所在地。——译者注

〔64〕 齐卡拉·比阿雅:《结构调整计划: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管理不发达和私人化的催化剂,1997—2000》,载于《DPMN 新闻简报》(Tshikala Biaya, “SAP: A Catalyst for the Underdevelopment and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1997—2000,” *DPMN Bulletin* 7:3),第7期,第3页,2000年12月。

勒内·德维西写道：“金钱看来好像是一种神秘和奇妙的实体，与劳动或生产没有任何关系。人们逐渐开始以一种财富经济中寻找避难所。”〔65〕实际上，金沙萨人被一种绝望的赌博狂热缠住。法式赛马、大啤酒厂组织的抽奖、软饮料公司的瓶盖抽奖和最为致命的、军方秘密控制的金字塔式集资盛行。〔相似地，有着同样灾难性后果的半魔术“金字塔骗局（pyramidania）”在1996—1997年间横扫阿尔巴尼亚，吸收和摧毁了半数的贫困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66〕最初的投资者们从南非赢得了收音机或器具，诱使其他人去赌博，他们能扩大赌局并在其垮台之前全身而退，但这种不可避免的灾难中极少有幸存者。正如德维西解释的那样，“金沙萨的大部分人口卷入了这些金融赌局，对经济特别是非正式部门的毁灭性影响是灾难性的。人们的痛苦失败导致了一种幻想而堕落的魔法心态。”〔67〕

持续通货膨胀的直接余波是1991年9月最大的城市扎克雷农民起义（jacquerie）：在军方默许下，金沙萨的贫民窟居民对工厂、商店和仓库进行了一场巨大的狂欢式抢劫。德维西描绘了“欣快而有害的失范宣泄（euphoric and perverse unleashing of anomie），飞速通膨和劳动力市场破产压力之下的人们把无生命的暴力内在化了。”〔68〕其他灾难也接踵而至。

---

〔65〕 德维西：《金沙萨的疯狂、暴力和种族复兴》（Devisch, “Frenzy, Violence, and Ethical Renewal in Kinshasa,”），第604页。

〔66〕 参见世界银行研究者的分析：卡洛斯·埃尔比特：《传销（金字塔销售法）阴影下的阿尔巴尼亚》和乌特帕尔·巴塔查里亚：《论经济转型期庞氏骗局的可能性》，载于《转型经济通讯》（世界银行集团出版的新闻简报）See analyses by World Bank researchers: Carlos Elbirt, “Albania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Pyramids” and Utpal Bhattacharya, “On the Possibility of Ponzi Schemes in Transition Economics,” in *Transition Newsletter* (newsletter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ank Group), 2000年1-2月, 网址: [www.worldbank.org/transition-newsletter/janfeb600/pgs24-26.htm](http://www.worldbank.org/transition-newsletter/janfeb600/pgs24-26.htm)

〔67〕 德维西：《金沙萨的疯狂、暴力和种族复兴》（Devisch, “Frenzy, Violence, and Ethical Renewal in Kinshasa,”），第604页。

〔68〕 德维西：《金沙萨的疯狂、暴力和种族复兴》（Devisch, “Frenzy, Violence, and Ethical Renewal in Kinshasa,”），第606页。

1993年1月,金沙萨再次被洗劫,但这次只有士兵参与。银行系统陷入了崩溃,公共管理基本消失,企业求助于易货贸易,小公务员发现他们现在的工资实际价值只相当于1988年的1/8。据德·伯克所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93年从这个国家撤出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刚果不再参与世界经济。”〔69〕随着国民经济的崩溃和刚果财富被冻结在瑞士银行的贵重物品保管库中,蒙博托在1997年最终被推翻;然而,“解放仅仅导致了外国干涉和无休止的内战。据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估计,截至2004年,内战夺去了300万条生命(大多数是因为饥饿和疾病)。”〔70〕流窜在刚果东部的军队杀人越货——类似于欧洲30年战争(Europe's Thirty Years War)的场景——掀起了难民们纷纷拥入本已拥挤不堪的金沙萨贫民窟的新高潮。

面对正式城市及其制度的死亡,普通的金沙萨人——首先是母亲们和祖母们——为了生存而奋斗,把金沙萨“村落化(viallagizing)”:她们重建了赖以生存的农业和传统的乡村自给自足形式。每一块几平方米的空地,包括公路中间,都种植了树薯;而没有地的妇女们,女食物小贩(Mamas miteke),在垃圾堆里翻寻食物。〔71〕随着工作世界和赌博梦幻宇宙的相继崩溃,人们回归到信赖乡村魔术和预兆的膜拜仪式。他们希望从“白人病”(yimbeefu kya mboongu)——金钱决定命运的病——中解脱出来。〔72〕面对废弃工厂和洗劫一空的商店,小教堂和祈祷者们组织起来重新开设了有着粗糙但很光鲜招牌的商店。在大型贫民窟如马斯纳(Masina)——因其人口密度而被当地人称为“中华共和国(The Repub-

〔69〕 德·伯克:《金沙萨》(De Boeck, “Kinshasa,”),第258页。

〔70〕 据美国国际开发署刚果代表团前任主席安东尼·刚比诺的实际估计是380万:《审视非洲:刚果告急》(美国)合众国际社,2004年12月28日。(3.8 million is the actual estimate of Anthony Gambino, retiring director of the USAID mission to the Congo (Mvemba Dizolete, “Eye on Afric: SOS Congo,” UPI, 28 December 2004).)

〔71〕 德·伯克:《金沙萨》(De Boeck, “Kinshasa”),第266页。

〔72〕 德维西:《金沙萨的疯狂、暴力和种族复兴》(Devisch, “Frenzy, Violence, and Ethical Renewal in Kinshasa”),第625页。

lic of China) ”——五旬节教派 (Pentecostalism) 在这个热带国家迅速传播,“到 2000 年底,据报道金沙萨有 2177 个新兴的宗教派别。它们中的许多宗派都组织通宵祈祷集会。”〔73〕

正如德维西和其他人已经强调的那样,五旬节教派现象是多种多样和纷繁复杂的,包含着一系列当地和外来的形式。例如,一些教会是由那些缺乏财力或教育来获得教士资格的天主教一般信徒或从前的神学院学生所建,提倡一种基于信仰疗法和福音繁荣的、美式的、有利可图的祈祷权。〔74〕其他教会,如 Mpeve Ya Nlongo 教堂,是女性领导的疗救团体,在预见将消灭贫困和不平等的“未来世界”时,催眠、梦兆和“天堂之音 (celestial tongues)”等被用作与圣灵和部落祖先通灵的方式。德维西写道:“这些以母亲为中心的社团谈论城市未来所需要的道德中心,安慰的重要性,安全感和归宿感。”〔75〕无论如何,在一个政治完全败坏的历史背景中,五旬节教派在金沙萨的复兴与民间精神的复苏相一致——灾难性的现代性魅力再生。

但金沙萨人的自我组织和应付 (法语 *se débrouiller*) 才能有着真正的物质限制和阴暗面。尽管是一种英雄式的——特别是妇女们的——努力,传统社会结构是具有腐蚀性的。面对绝对的不相融合,人类学家们描绘了一度让扎伊尔社会井然有序的礼物互换和相互关系的解体:如无法负担婚礼费用的年轻人遗弃孕妇,而无力养家糊口的父亲们抛妻离

---

〔73〕 阿卜杜·马利奇·西蒙娜 (Abdou Maliq Simone), 第 24 页。

〔74〕 赛德萨斯·卡尔库内访谈:《刚果民主共和国:8 岁儿童的酷刑与死亡》,基督徒废除酷刑行动 (Sedecias Kakule interviewed in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Torture and Death of an Eight-Year-Old Child,”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cat (Action des Chrétiens pour L’Abolition de la Torture) (FIATCCAT)), 2003 年 10 月。

〔75〕 勒内·德维西 (简要记录的谈话):《“掠夺耶稣”:中非治疗教堂对全球化的反应》,载于《解放神学论坛 1997—1998 年年度报告》[René Devisch, précis of talk (“‘Pillaging Jesus’: The Response of Healing Churches of Central Africa to Globalization”), *Forum for Liberation Theology, Annual Report 1997—1998.*]

子。〔76〕与此同时,艾滋病的猖獗留下了大量孤儿和儿童艾滋病毒携带者。贫困都市家庭承受巨大压力——失去了乡村亲属支持网络,或相反地,不堪承受团结链条的必要重负——而被迫遗弃他们最没有自立能力的成员。一名儿童救助(Save the Children)研究者沉痛指出:“刚果家庭和社区保证基本温饱和保护他们孩子的能力看来即将丧失。”〔77〕

此外,家庭危机还与五旬节教派的繁荣以及对巫术重新生出的恐惧结合在一起。据德维西所言,许多金沙萨人把他们的命运解释为更大的城市灾难——“一种诅咒或迷惑(curse or ensorcellement)”——的一部分。〔78〕其结果是,对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的邪恶信仰抓住了金沙萨,导致了大量歇斯底里的、对成百上千童巫的谴责、驱逐甚至谋杀。这些孩子,一些只是幼儿,被指控应对一切恶行负责。人们还相信,至少是在恩吉利(Ndjili)贫民窟,他们在晚上成群结队地用扫帚飞行。救援人员强调,此现象的奇特之处在于:1990年代以前,很少有人谈论金沙萨的童巫。如今被指控会巫术的儿童都有相同处境:他们变成他们不再有抚养能力父母的无收益负担。被称为有“魔力”的儿童大多数来自非常穷的家庭。〔79〕

有影响力的教会合谋加深对有魔力儿童的恐惧,并使这种恐惧合法化:实际上,五旬节教派教徒们把他们的信仰描绘为抵抗巫术的、上帝的铠甲(God's armor)。成人和儿童中的歇斯底里(被发展为对于猫、蜥蜴和灯火管制的漫漫长夜的集中恐惧)被可怕的基督教电影进一步加剧。

---

〔76〕 对菲律普·德·伯克演讲:“金沙萨的儿童、神秘仪式与街道”的评论,载于《来自非洲的新闻》(Review of lecture by Filip De Boeck, “Children, the Occult and the Street in Kinshasa,” *News from Africa*), 2003年2月。

〔77〕 马欣伯·姆铎,转引自阿斯蒂尔:“刚果遗弃了其童巫”(Mahimbo Mdoe quoted in Astill, “Congo Casts Out its ‘Child Witches’”)

〔78〕 德维西:《金沙萨的疯狂、暴力和种族复兴》(Devish, “Frenzy, Violence, and Ethical Renewal in Kinshasa,”), 第608页。

〔79〕 《刚果民主共和国:8岁儿童的酷刑与死亡》(“DRC: Torture and Death of an Eight-Year-Old Child,”), 2003年10月。

这些电影展示“魔鬼附身的儿童”的忏悔和接下来的驱邪,有时是饿死或被烫死。<sup>[80]</sup>美国国际开发署研究者们直接谴责“自我制造的布道者 (self-made preacher)”行业,他们自己设立讲道坛,并向那些为他们的悲痛和不幸寻找容易接受理由的人发出预言。

一旦祈祷失败,祈祷者们可以轻易地把继续的痛苦归咎于虚假理由。如巫术经常把孩子当作祸端,因为他们很容易被责难,很少能自我辩护。例如,一个寻求祈祷者帮助的家庭可能被告知他们的残障儿是导致他们继续痛苦的原因,把孩子的残障当作他或她是一个巫师的清晰暗示。<sup>[81]</sup>

另一方面,德·伯克宣称这些宗派是在维持一种正在普遍崩溃中的非正式道德秩序,“教会领导人自己并不生产这些指控,而仅仅是使人确信并因此合法化这些指控。”本堂牧师们组织公众忏悔和驱邪 (cure d'âmes):“孩子被置于祈祷圈的中央,经常有圣灵附体而滔滔不绝的妇女出来指控他们。”但一旦孩子被指控,家庭经常拒绝把孩子领回家中,他们被迫流浪街头。一个孩子告诉德·伯克,“我是瓦利 (Vany),我三岁了。我病了。我的腿开始肿胀。于是他们开始说我是一个巫师。这是真的。祈祷师确认了这一点。”<sup>[82]</sup>

---

[80] 参见“散布非洲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团体”,德国的亲近自然伙伴 (Friends of People Close to Nature) 运动 (See “Christian Fundamentalist Groups Spreading over Africa,” German campaign of Friends of People Close to Nature), 2004年7月17日, 网址: [www.fpen-global.org](http://www.fpen-global.org)

[81] 克瑞普等编:《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儿童遗弃与隔离》(Cripe et al., “Abandonment and Separ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第16页。

[82] 菲利普·德·伯克:《排除地理学:金沙萨的教堂和童巫》,载于 *BEople* (See extracts from Filip De Boeck, “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Churches and Child - Witches in Kinshasa,” *BEople*), 第6期, 2003年3-8月。(为全英文、全球发行的季刊,涉及艺术、时装、文学、建筑等生活方式的各方面,向读者传达了比利时文化、艺术、生活方式、时装、音乐的信息和内涵。——译者注。)

魔鬼附身的孩子,正如 17 世纪塞勒姆(Salem)礼拜堂着魔的少女(possessed maiden)一样,看来已经对那些针对他们的指控产生幻觉,接受了他们自己作为家庭不和及都市混乱牺牲品的角色。一个孩子告诉摄影师文森·贝克曼(Vincen Beekman):

我已经吃了 800 个人。我让他们在飞机上或汽车上失事。我甚至去过比利时(Belgium),一条美人鱼一路带我到了安特卫普(Antwerp)港。有时我用扫帚旅行,有时用鳄梨树皮。每到晚上,我就变成了 30 岁,并有 100 个孩子。我父亲因为我而丢掉了他工程师的工作——于是我和美人鱼一起杀了他。我还杀了我的兄弟姐妹。我把他们活埋了。我还杀死了我母亲所有还未出生的孩子。〔83〕

贝克曼主张,因为金沙萨没有正常运转的儿童福利系统,家庭对被指控童巫的驱逐不仅是合理化的遗弃,而且是“一个让他们进入一个宗教团体的机会,在那里他们将得到某些让他们活下去的教育和食物,或者使得他们进入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管理的中心”。但大多数童巫,特别是那些生病或携带有艾滋病毒的孩子,只能死在街头,或成为都市乞丐大军的一员,至少有 3 万人,包括“离家出走的儿童虐待受害者、因战争而无家可归的儿童、绝望的儿童兵、孤儿和私生子。”〔84〕

金沙萨的童巫,正如印度和埃及出口器官的贫民窟一样,看起来把我们带到一个只有死亡、饥荒和库尔茨式恐怖(Kurtzian horror)的生存新起点。实际上,一个真实金沙萨人,蒂埃里·马扬巴·恩兰杜(Thierry Mayamba Nlandu),以一种尖锐但惠特曼式(Whitmanesque)方式质问:“这

---

〔83〕 文森·贝克曼:《生长在金沙萨街头》,收入《信使: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和欧盟发展合作杂志》(Vincen Beeckman, “Growing Up on the Streets of Kinshasa,” *The Courier ACP EU*), 2001 年 9-10 月,第 63-64 页。

〔84〕 比克曼:《生长在金沙萨街头》(Beeckman, “Growing Up on the Streets of Kinshasa”), 第 64 页。

些生活在金沙萨混乱而悲惨的生活中的数百万人怎么办？”他的答案是“金沙萨是一个死掉的城市。它不是一个死者之城。”非正式部门不是解围者，而是“没有精神的荒原(a soulless wasteland)”，是把恐怖带给贫民的“抵抗经济(an economy of resistance)”。除此之外，“其市场逻辑还导致了总体的绝望。”〔85〕金沙萨人，正如帕特里克·沙莫索·沙莫索的著名小说《德士古》中那些被称作“德士古(Texaco)”的马提尼克(Martinican)贫民窟居民一样，“通过其成千上万的生存裂缝”紧紧抓住这个城市并固执地拒绝放开。〔86〕

---

〔85〕 蒂埃里·马扬巴·恩兰杜，《金沙萨：超越二分法》，收入恩维佐等编：《围攻之下》(Thierry Mayamba Nlandu, “Kinshasa: Beyond Chaos,” in Enwezor al.), 第186页。

〔86〕 沙穆瓦佐：《德士古》(Chamoiseau, *Texaco*), 第316页。

## 结语 走在“越南街”上

---

诺言再三重申,从垃圾、漫天飘散的羽毛、灰烬和残骸中,  
一种新的和美好的东西将会诞生。

——约翰·伯杰〔1〕

于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人性分类已经产生。正如简·布雷曼关于印度的论著中所警告的那样:“当一个后备军等着加入劳动进程时,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point of no return),他变成一种耻辱,一个永远的多余,一个既不属于现在亦不属于未来的额外经济和社会负担。这种变形——至少在我看来——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真正危机。”〔2〕同样地,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简称CIA)于2002年痛苦地指出:“到1990年代末,占世界劳动力1/3的十多亿工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南半球,处于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状态。”〔3〕除了德·索托所提倡的不确定的、灵活的非正规主义模式而外,官方没有任何方案来把大量剩余劳动力重新结合到世界经济主流中去。

---

〔1〕 约翰·伯杰:《流言》,序克莉斯汀(John Berger, “Rumor,” preface to Tekin, Berji Kristin),第8页。

〔2〕 布雷曼:《贫苦穷人》(Breman, *The Labouring Poor*),第13页。

〔3〕 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华盛顿州,2002年,第80页。

这与1960年代的对比是非常鲜明的:40年前两大冷战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战争催生了各种竞争性的、消除世界贫困和重新安置贫民窟居民的方法。有着自己的人造卫星和洲际弹道导弹(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简称ICBM),通过重工业和五年计划而实现快速工业化的苏联模型仍然是貌似有理的。另一方面,肯尼迪(Kennedy)当局正式把第三世界革命诊断为“现代化弊病”,并开出药方——除了绿色贝雷帽(指美国、英国的特种部队成员)(Green Berets)和B-52轰炸机之外——野心勃勃的土地改革和住房项目。例如,为了使哥伦比亚人免于城市崩溃,进步联盟资助了巨大的住房计划如波哥大的坚尼地城(Ciudad Kennedy)计划(8万人)和麦德林(Medellín)的索科罗贫民窟(Villa Socorro)计划(1.2万人)。进步联盟被鼓吹为将把泛美洲\*生活水平迅速提升到南欧水平——即使不能达到英美白佬\*\*水平——的西半球马歇尔计划(Western Hemisphere Marshall Plan)。与此同时,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有号召力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如纳赛尔、恩克鲁玛、尼赫鲁和苏加诺都转述了他们自己版本的革命和进步。

但1960年代的乐土不再出现在新自由主义的未来蓝图上。发展理想主义的最后机会是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简称MDGs)运动——被一些非洲援助工作者们戏称为“极简抽象派艺术发展目标(Minimalist Development Goals)”。该运动的目标是:到2015年,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口比率减少到一半;第三世界婴儿和产妇死亡率显著降低。尽管富裕国家的团结也时有插曲——如2005年7月格伦伊格尔斯八国集团首脑会议(Gleneagles G8 Summit)期间,英国“让贫穷成为历史”\*\*\*和现场八方\*\*\*\*事件——千年发展目标在可预

\* Pan-American, 包括南美、北美及中美洲。——译者注

\*\* gringo, 拉丁美洲人所用的蔑称。——译者注

\*\*\* Make Poverty History, 是英国一百多个非政府组织联合推动的一个公益活动, 诉求有三:第一,公平贸易,第二,解除债务,第三,更多真正的援助。——译者注

\*\*\*\* Live 8 是现场援助(Live Aid)在G8国家和南非举办的一次系列音乐会。此次盛会安排在举办第31届G8峰会(6日-8日)之前进行,并作为现场援助音乐会20周年的纪念活动。现场八方计划向世界各国领导人施压,目的是减免世界最贫穷国家的负债、提高和改善援助,并且为较贫穷国家商议“更平等的”贸易规则。——译者注

见的未来几乎是肯定不会实现的。在其《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4*)中,顶级的联合国研究者们警告:以当前的“进步”率,撒哈拉以南非洲要到22世纪方能达到大多数千年发展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非洲不发达国家的主要合作伙伴——在其2005年4月的《全球监控报告》(*Global Monitoring Repeat*)议案中重复了同样悲观的申明。<sup>[4]</sup>

伴随着高科技“长城”对向富裕国家大规模移民障碍的强化,只有贫民窟仍然是一个解决本世纪剩余人口安置问题的可行办法。据联合国人居署报告,贫民窟人口目前正以每年2500万的惊人速度增长。<sup>[5]</sup>此外,正如上一章所强调的那样,安全防线——各地的可擅自定居土地——正在消失。城市周边的新来者们面临着一种只能被描绘为“边缘中的边缘”——或用一个绝望的巴格达贫民窟居民辛辣的词汇“半死不活”——的生存状况。<sup>[6]</sup>实际上,城郊贫困(*peri-urban poverty*)——一个悲惨的人类世界,大部分切断了来自乡村的生存团结并游离于传统城市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之外——是不平等的最新面孔。城市周边是一个流亡地带,一个新的巴比伦。例如,据报道,于2003年5月攻击豪华酒店和外国餐馆的年轻恐怖分子中的一些人——生长在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边缘的贫民窟中——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到过城市商业圈并为麦地那(*medina*)的富裕而震惊。<sup>[7]</sup>

但如果非正式城市主义变成了一个死胡同,贫民们能不革命吗?如

[4] 《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2004年,第132-133页;坦尼娅·诺兰:“为适应千年发展目标的需要而迫切采取的行动”,美国广播公司在线(Tanya Nolan, “Urgent Action Needed to Meet Millennium Goals,” *ABC Online*),2005年4月13日。

[5] 联合国人居署:“对于强迫拆迁的振人发聩的警钟”,管理委员会第20次新闻发布会(UN-HABITAT, “Sounding the Alarm on Forced Evictions,” press release, 20th Session of the Governing Council),内罗毕,2005年4月4-8日。

[6] 转引自詹姆斯·格郎兹:《伊拉克城市飞地中少数群体的拆迁斗争》,《纽约时报》(Quoted in James Glanz, “Iraq’s Dislocated Minorities Struggle in Urban Enclave,” *New York Times*),2005年4月3日。

[7] 参见 [www.maroc-hebdo.press.ma](http://www.maroc-hebdo.press.ma) 和 [www.bladi.net](http://www.bladi.net) 网站文章。

狄斯累利 (Disraeli) 在 1871 年所担忧的或肯尼迪在 1961 年发愁的那样——最大的贫民窟不是即将爆发的海底火山吗？残酷无情的达尔文式 (Darwinian) 竞争——正如贫民数量的不断增加与同样增加的非正式经济内部竞争一样——催生而不是自我摧毁了作为“城市内卷”最高形式的社区暴力？一个非正式无产者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拥有最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护身符——“历史机构 (historical agency)”？

这些是必须 (在它们能在任何普遍意义上被回答之前) 经由具体的、比较的案例研究来探索的复杂问题。[至少, 这是我和福里斯特·希尔顿 (Forrest Hylton) 在我们正在写的“贫民政府”相关著述中所采用的观点]。在全球化“根茎空间 (rhizomatic space)”中, 一种新兴“民众”政治所预示的后马克思主义前景——如涅格里 (Negri) 和哈特 (Hardt) 的前景——在任何现实的政治社会学中仍然是不现实的。即使是在单个城市中, 贫民窟人口对于结构忽略和剥夺的反应也是令人眼花缭乱、大不相同的: 从有吸引力的教堂和先知膜拜 (prophetic cult) 到种族民兵、街头帮派、新自由主义非政府组织和革命性社会运动。但全球贫民窟即使没有整体目标或方向一致的趋势, 无论如何也存在大量的抵抗行动。事实上, 人类团结的未来取决于新兴都市贫民对他们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最终边缘性的激进反抗。

这种反抗将采用固有的返祖 (atavistic) 形式和先锋的形式: 放弃现代性并试图恢复其被压制的承诺。这并不奇怪: 在伊斯坦布尔、开罗、卡萨布兰卡或巴黎郊区, 一些贫困青年拥护沙拉法雅圣战组织 (Salafia Jihadia) 宗教虚无主义, 并为该国现代性大多数骄傲象征的解构而高兴。而数百万其他人转而求助于街头帮派、毒贩、民兵和宗派政治组织所操纵的城市生存经济。对于各种打击恐怖主义、贩毒和犯罪毒的国际“战争”的魔幻修辞是如此语义学的隔离: 他们建构了关于一夜建成区 (土耳其语: gecekondus)、(巴西) 贫民窟 (favelas) 和 (印度) 分间出租的宿舍 (chawls) 的方法论围墙, 这使得任何对于隔离经济的日常暴力的诚实讨论都不可能实现。而正如维多利亚时代一样, 城市贫民的非法行为范畴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语言, 保证形成一个无尽街头争斗的未来。随着第三

世界中产阶级越来越使自己陷入他们的郊区主题公园和电子“安全村”的窘境,他们失去了对于他们抛下不管的城市崎岖不平地区的道德和文化洞察力。

此外,在一个没有工作机会的城市世界的暗示面前,统治者们的想象看来有些动摇。的确,新自由主义乐观主义被染上了一些马尔萨斯式(Malthusian)悲观主义的色彩,也许在罗伯特·D. 卡普兰(Robert D. Kaplan)的启示文学旅行作品《地球的终结与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The Ends of the Earth and The Coming Anarchy*)中有着最好的展现。但大美洲及欧洲(big American and Europe)政策的大多数深刻思想家们仍然毫不掩饰他们对于“贫民窟星球”的地缘政治学暗示的念头。更成功的是——也许因为他们无须调和新自由主义信条与新自由主义现实——空军研究院(Air Force Academy)、陆军的兰德公司阿罗约中心(RAND Arroyo Center)和海军的匡堤科(Quantico,位于弗吉尼亚州)战争实验室(Warfighting Laboratory)的战略家和战术策划师。实际上,在缺乏其他范式的情况下,五角大楼(Pentagon)已经逐步形成了自己对于全球城市贫困的直接看法。

1993 年代摩加迪沙(Mogadishu)灾难——当时贫民窟民兵造成 60% 的精锐陆军突击队员(Army Rangers)伤亡——迫使军事理论家们重新思考五角大楼的城市地形军事行动(Military Operations in Urban Terrain,简称 MOUT):“城市化地带的军事作战”。最终,1997 年 12 月,一份国防专题讨论小组(National Defense Panel)评论指责说,军队对于在贫困的第三世界城市里几乎不能通行的、迷宫般街道上的持久战毫无准备。所有军事部门——以及城市作战训练事务委员联合会(Joint Urban Operations Training Working Group)——大力开展在现实贫民窟条件下进行巷战的训练项目。陆军军事学院(Army War College)学报宣称:“未来的战争将在构成世界上破败城市的街道、下水道、高层建筑和擅自定居区中进行……我们近来的军事史强调城市名字——图兹拉(Tuzla)、摩加迪沙、洛杉矶、贝鲁特(Beirut)、巴拿马市(Panama City)、顺化(Hué)、西贡(Sai-

gon)和圣多明戈(Santo Domingo)——但这些遭遇战仅仅是一个序幕,真正的好戏还没有上场。”〔8〕

为了帮助形成城市地形军事行动大的概念框架,军事策划者们在1990年代转而求助于奇爱博士\*的母校,总部设在圣莫尼卡的兰德公司(Santa Monica-based RAND Corporation)。兰德公司\*\*,空军在1948年创建的非盈利性智囊团,因其在1950年代的核战军事演习和1960年代越战的战略策划而臭名昭著。这些日子以来,兰德公司的研究重点是城市战争:其研究者们仔细考察城市犯罪统计数据,内城的公共卫生以及公共教育的私人化。他们还设立了陆军的阿罗约中心,成立了一个关于城市战争社会背景和战略机制研究的小型图书馆。

兰德公司最重要的计划之一,开始于1990年代早期,是对于“人口数目的变迁将对未来冲突会发生怎样的影响”的主要研究。兰德公司发现,底线是世界贫困的城市化已经导致了“暴动的城市化”——这也是他们报告的标题。兰德公司警告说,“暴动随着暴动者们进入城市,在城市棚户区建立了‘解放区’”。他们没有美国的教唆、没有受过任何训练、也没有任何专门为城市反暴动设计的装备。兰德公司研究者们集中关注1980年代萨尔瓦多(El Salvador)的例子,当地政府军事武装,尽管得到华盛顿政府的大力支持仍无法够阻止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arabundo Marti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简称FMLN)游击队开辟一个城市阵线。实际上,“在稍早一些的暴乱中,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

---

〔8〕 拉尔夫·彼得斯少校:《我们的士兵,他们的城市》,《参数》(Major Ralph Peters, “Our Soldiers, Their Cities,” *Parameters*), 1996年春,第43-50页。

\* Dr. Strangelove,著名导演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电影《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 1964)中的主人公,他提出了一个在氢弹中混入半衰期为93年的氯化钴G,再将氢弹的爆发交给电脑托管、一旦遭受某种程度的攻击就开始自动运行、并且再没有任何方法能人为中止的全自动核威慑计划:“末日战争机器计划”——译者注

\*\* RAND,当今美国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一直高居全球十大超级智囊团排行榜首。它的职员有1000人左右,其中500人是各方面的专家。——译者注

线有效反叛了城市的控制,令人怀疑的是,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维持即使是政府与暴乱分子之间的僵局。”〔9〕研究者们指出,特大贫民窟已经成为新兴世界秩序最薄弱的环节。

近来,最重要的空军理论家之一特洛伊·托马斯上尉(Captain Troy Thomas)在2002年春第1期《航空动力杂志》(*Aerospace Power Journal*)上发表了类似观点,他写道:“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城市化导致了一个因为越来越无规划而越来越难认知的作战空间环境。”托马斯比较了现代的和等级制度的城市核心与第三世界边缘不断延展的贫民窟。前者中心化的公共设施在空中攻击(如贝尔格莱德)或恐怖袭击(如曼哈顿)下很容易瘫痪;而后者由“非正规的、去中心化的子系统”组织而成,没有蓝图存在,“系统中的杠杆点不容易辨别。”以卡拉奇周围的“城市肮脏之海(sea of urban squalor)”为主要例子,托马斯描绘了“非节点的(non-nodal)和非等级制度的”城市地带中为“绝望和愤怒”而驱使的部族武装的“不对称战斗(asymmetric combat)”挑战。在其他军旅作家经常写到的太子港之外,他还把喀布尔、拉各斯、杜尚别\*和金沙萨边缘的贫民窟也作为其潜在的噩梦般的战场。托马斯,和其他城市地形军事行动策划者们一样,开出了高科技装备加实地训练的药方,特别是在“我们自我毁灭的城市(our own blighted cities)”一文中指出“大量住房计划已经变得不适于居住,大量工厂变得废旧不堪。然而它们将非常适合城市作战训练。”〔10〕

确切说来,谁是那些在底特律(Detroit)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简称LA)贫民窟中受训的、即将进入第三世界城市迷宫的机

---

〔9〕詹妮弗·莫里森·杜和布鲁斯·霍夫曼:《暴动的城市化:对美军行动的潜在挑战》(Jennifer Morrison Taw and Bruce Hoffman, *The Urbanization of Insurgency: The Potential Challenge to U. S. Army Operations*) 圣摩尼卡,1994年(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在线摘要)

\* Dushanbe,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首都。——译者注

〔10〕特洛伊·托马斯上尉:《贫民窟房东:都市斗争的火箭动力》《航空动态报》(Captain Troy Thomas, “Slumlords: Aerospace Power in Urban Fights,” *Aerospace Power Journal*), 2002年春,第1-15页(网络版)。

械化装备的士兵们(robo-soldiers)的敌人?一些专家们只是耸耸肩回答说“一切皆有可能(whatever)”。在一篇写于1990年代中期的关于“拉丁美洲地缘政治学与城市武装冲突(Geopolitics and Urban Armed Conflict in Latin America)”的有影响力的文章中,利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杰弗里·德马雷斯特(Geoffrey Demarest),提出了一个奇怪的“反政府行动者(anti-state actors)”的阵容,包括“精神混乱的无政府主义者”、犯罪分子、愤世嫉俗的机会主义者、疯子、革命者、劳工领导人、少数民族、房地产投机商等。然而,最后,他选定了一般的“失去产业者(dispossessed)”和特殊的“犯罪集团”。除了倡导对于从建筑和城市规划中借用的研究工具来帮助预测未来的颠覆之外,德马雷斯特还补充说:“安全力量(security force)应更多关注被驱逐人口的社会学现象。”他特别关注“被遗弃儿童的心理”,既然他相信——和许多所谓的“愤青(youth bulge)”犯罪理论的倡导者们一道——贫民窟儿童是反政府武装的秘密武器。〔11〕

总而言之,五角大楼最好的智囊们敢于冒险触及那些大多数美国人、世界银行或政府部门害怕进入的领域:从城市改革的放弃延续而来的道路。在过去,这是一个“司空见惯(street without joy)的事”,实际上,巴格达的萨德尔城——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之一——“救世军(Mahdi Army)”失业的十几岁青年战士们奚落美国占领者们,说他们的主要街道是“越南街(Vietnam street)”。但战争策划者们没有退缩。以冷血般的清晰,他们如今断言,第三世界“野蛮的、失败的城市”——特别是它们的贫民

---

〔11〕 杰弗里·德马雷斯特:《拉丁美洲地缘政治和城市武装》,《小型战争和叛乱》,1995年春,6:1(互联网文本)(Geoffrey Demarest, “Geopolitics and Urban Armed in Latin America,” *Small Wars and Insurgencies* 6:1 (Spring 1995), n. p. (internet text); 论“战略人口统计学”和青年刑事犯罪的兴起,参见安妮·亨德雷森的重要论文:《愤怒的青年男子,戴着面纱的年轻妇女:构成一种新的人口威胁》,载于《角落内务简报》(On the rise of “strategic demography” and the criminalization of youth, see the important paper by Anne Hendrixson, *Angry Young Men, Veiled Young Women: Constructing a New Population Threat, Corner House Briefing* 34),斯特敏斯特牛顿,2004年。

窟郊区——将成为 21 世界的特殊战略空间。五角大楼信条基于对无限持续下去的、对抗城市贫民非法部门的低密度世界战争的支持而重新定型。这是真正的“文明化冲突”。

据斯蒂芬·格雷厄姆(Stephen Graham)——他撰写过集中关注城市战争地理学的著作——所言,城市地形军事行动信条通过一个对立的、幻想的东方他者来界定西方漫长历史的积淀,因此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最高阶段。在斯蒂芬·格雷厄姆看来,这种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如今被布什政府作为“道德专制主义”而提出——“通过分裂‘文明化了的世界’来起作用:必须保卫的‘家园’城市和来自‘黑暗势力’,‘邪恶中心’和伊斯兰城市‘恐怖主义老巢’。后者被宣称为威胁整个‘自由世界’的健康、繁荣和民主的‘坏人’保护者。”〔12〕

结果,这种关于对抗着魔的城市地点的欺骗性安全辩证法支配了一种险恶而无休止的二重奏:每天夜晚,大黄蜂式的螺旋桨武装直升机追踪贫民窟街区狭窄街道上的神秘敌人,把地狱之火发射到棚户或逃跑的车上。每天清晨,贫民窟回报以自杀式炸弹和爆炸。如果帝国能部署奥威尔式的镇压技术,混乱之神将站在那些被驱逐的人一边。〔13〕

---

〔12〕 斯蒂芬·格雷厄姆:《城市与“反恐战争”》即将出版的《理论,文化与社会》(草稿)(Stephen Graham, “Cities and the ‘War on Terror’,” forthcoming i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draft), 2005 年,第 4 页。

〔13〕 参见迈克·戴维斯:《帝国城市化:特大城市与混乱的法律》,载于《社会文本》(See Mike Davis, “The Urbanization of Empire: Megacities and the Laws of Chaos,” *Social Text*), 第 81 期,2004 年冬。

## 关键词索引

### A

- Abani, Chris 阿巴尼, 克里斯 23, 191
- Abdo, Geneive 阿卜杜, 基内维 131
- Abdoul, Mohamadou 阿卜杜勒, 穆罕默德 56
- Abidjan 阿比让 64, 133, 183
- Abrahamsen, Rita 亚伯拉罕森, 丽塔 90
- Abu - Lughod, Janet 阿布 - 卢格霍特, 珍妮特 100
- Accra 阿克拉
- desakota 城乡融合区 11n27
  - informal sector 非正式部门 208
  - landownership 地主所有制 43
  - land speculation 土地投机 100
  - sanitation deficit 卫生赤字 163
  - segregation 种族隔离 114
  - waste 废弃物 158
- Addis Ababa 亚的斯亚贝巴
- Adham, Khaled 阿扎姆, 哈立德 104
- Afghanistan 阿富汗 28, 59
- Africa 非洲
-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62
  - disease 疾病 168

- HIV/AIDS 艾滋病毒 175
- housing 住房 43
- inequality 不平等 73
- informal sector 非正式部门 206
- landownership 地主所有制 99
- renting 租用 52
- semi - proletarianization 半无产阶级化 203
- slum clearances 贫民窟清理 120
-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结构调整计划 182 - 183
- 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233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5 - 6, 9, 10 - 1, 12, 31, 16 - 8, 20 - 21, 70 - 71
- women 妇女 185 - 187, 188 - 189
- Agbola, Tunde 阿博拉, 通德 117
- Agriculture 农业 15, 15, 17, 18, 159 - 160, 200, 213
- Aguilar, Adrian 阿吉拉尔, 阿德里翁 12
- Ajgunle 阿伊冈勒 111
- Aketch, Joe 阿克齐, 乔 170
-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65, 196, 225
- Alemón, Arnoldo 阿莱曼, 阿诺尔多 140
- Alexandra 亚历山德拉 55
- Alexandraia 亚历山大 44
-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69, 73, 78, 194
- Algiers 阿尔及尔 40, 69, 147 - 148
- Alphaville 阿尔伐城 139
- Amazon region 亚马逊流域 20
- Amis, Philip 埃米斯, 菲利普 52, 96, 216
- Andreasson, Stefan 安德烈森, 斯蒂芬 181
- Angola 安哥拉 18, 59, 122, 193
- Ankara 安卡拉 69, 100

- Annan, Kofi 安南,科菲 134
- Antananarivo 安塔那那利佛 168
- apartheid 种族隔离 63
- Appadurai, Arjun 阿帕杜莱,阿尔琼 114n6,217 - 218
- Aquino, Corazon 阿基诺,科拉松 124
- Aranya resettlement Project 亚兰重新安置计划 93
- Argentina 阿根廷 28,91,129 - 130,192
- Asia 亚洲
- inner - city poverty 内城贫困 38
  - land ownership 土地所有权 99
  - megacities (人口超过 100 万的)大城市 5
  - rickshaws 黄包车 220
  - semi - proletarianization 半无产阶级化 203
  - slums 贫民窟 20
- B**
- Baghdad 巴格达 169,234,239
- Baker Plan 巴克计划 180
- Baku 巴库 29
- Balaguer, Juan 巴拉格尔,胡安 125
- Balogun, Fidelis 巴洛贡,菲德利斯 178
- Bamako 巴马科 105
- Banda, Hastings Kamuzu 班达,海斯廷斯·卡穆祖 115
- Bangalore 班加罗尔
- arson 纵火 151
  - cheap labor 廉价劳动力 56
  -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 197,199 - 200,201 - 1
  - evictions 驱逐 119
  - gated communities 有大门有保安的小区 137
  -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18

women 妇女 166

Bangkok 曼谷

chemical disasters 化学灾害 152

fires 火灾 152

gambling 赌博 214

housing 房屋 77

motorization 机动化 154

population 人口 5

poverty 贫困 30 - 31

squatters 擅自定居者 52

Bangladesh 孟加拉 5

Bankoff, Greg 班科夫,格雷格 109

Baróss, Paul 鲍罗什,保罗 49,51

Barriadas 城市贫民区 32,149

barrios 贫民区 66,71,110,111,187

Bayat, Asef 巴亚特,阿塞夫 48,70,91

beautification campaigns 美化运动 123 - 128

Beeckman, Vincen 贝克曼,文森 230 - 231

Beijing 北京

automobiles 汽车 155

beautification campaigns 美化运动 126 - 127

demolitions 拆毁 132

evictions 驱逐 122,123,126 - 127

gated communities 有大门有保安的小区 136

Old City 古城 39 - 40

pollution 污染 157

population 人口 5

public housing 公共住房(供低收入家庭租用的政府住房) 46

sanitation 公共卫生 165

- sweatshops 血汗工厂 56
- Beirut 贝鲁特 57, 236
- Benjamin Solomon 本雅明·所罗门 119, 137, 202
- Berger, John 伯杰, 约翰 232
- Berlin 柏林 18, 38 - 39, 53, 126
- Berner, Erhard 伯纳, 埃哈德 104 - 105
- illegal land speculation 非法的土地投机 104 - 105
- Manila 马尼拉 31, 47, 86, 96 - 97, 99, 117 - 118, 137 - 138
- Singapore 新加坡 75
- squatters 擅自定居者 106
- state role 政府角色 45
- Betancur, John 贝坦库尔, 约翰 80
- Bhopal 博帕尔 153
- Biaya, Tshikala 比阿雅, 齐卡拉 225
- Bidwai, Praful 彼得万, 帕尔夫 201
- Blair, Tony 布莱尔, 托尼 21
- Blanqui, Auguste 布朗基, 奥古斯特 117
- Bogotá 波哥大
- displaced people 流离失所的人 60
- expansion of poverty zone 贫困区域的扩展 111
- housing 住房 80
- land speculation 土地投机 102, 108
- pirate urbanization 强占土地的城市化 49
- population 人口 5
- Bombay *see* Mumbai 孟买
- Booth, Charles 布思, 查理 23, 26
- Bouteflika, Abdelaziz 布特弗利卡, 阿卜杜勒阿齐兹 148
- Brazil 巴西
- demolition 拆毁 139

- hazardous slum location 危险的贫民窟地点 144
- incomes 收入 184
- land speculation 土地投机 102
- poverty 贫困 185
- slum population 贫民窟人口 28
- urban New Deal 城市新政 74
- Brazzaville 布拉柴维尔 5,28,64
- Breman, Jan 布雷曼,简 209,211,216n40,221,232
- Brennan, Ellen 布伦南,埃伦 55,99,101-102,107
- British Empire 大英帝国 62-64
- Brizola, Leonel 布里佐拉,莱昂内尔 74
- Broudehoux, Anne-Marie 布鲁德乌,安妮-玛丽 126-127
- Brown, Gordon 布朗,戈登 21
- Bryceson, Deborah 布赖森,黛博拉 17
-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
- deindustrialization 去工业化 15
  - hazardous slum location 危险的贫民窟地点 143
  - inner-city poverty 内城贫困 39
  - inquilinos 板房 42
  - loss of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损失 192
  - population 人口 5
  - private motorways 私人高速公路 140-141
  - region-based urbanization 区域性城市化 12
  - rural migrants 乡村移民 52
  - slum clearances 贫民窟清理 130
  - squatters 擅自定居者 48
- Bulawayo 布拉瓦约 134
- Bulgaria 保加利亚 196
- Bundun 本通 171

Burma (Myanmar) 缅甸 63 - 64

Bush, George H. W. 布什, 乔治. H. W. 180

Bush, George W. 布什, 乔治. W. 240

bustees 贫民窟 31, 68, 110, 153, 169

## C

Cabinda 卡宾达 59

Cairo 开罗

agricultural land 农用地 159

child labor 童工 218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环境灾害 151 - 1

gated communities 有大门有保安的小区 135

housing crisis 住房危机 104

human organ trade 人体器官贸易 222

land speculation 土地投机 101, 104

motorization 机动车化 154

population 人口 5

roof - dwellers 屋顶居民 44

satellite cities 卫星城市 118

slum - dwellers 贫民窟居民 28, 32

squatters 擅自定居者 35, 41, 48, 52

state repression 国家镇压 130 - 131

traffic accidents 交通事故 156

urbanization 城市化 70

youth disaffection 愤青 235

Calcutta (Kolkata) 加尔各答

Caldeira, Teresa 卡尔代拉, 特蕾莎 139

Cali 卡利 60

callejones 廉价公寓 42

Cambodia 柬埔寨 18, 65

Cape Town 开普敦 72 - 73, 139, 172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27, 61, 94, 232, 235

crony 伙伴 109

informal sector 非正式部门 209, 211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结构调整计划 180

Caracas 加拉加斯 66, 71, 110

housing 住房 205

riots 暴动 190

soil instability 土壤不稳定 145

squatters 擅自定居者 47, 49

Caribbean 加勒比 174

Carlos Alfredo Díaz 卡洛斯阿尔弗雷多迪亚兹(地名) 60

Casablanca 卡萨布兰卡 234, 235

Castells, Manuel 卡斯特尔, 曼纽尔 105 - 106, 205, 216

Castro, Fidel 卡斯特罗, 菲德尔 73

Ceylon 锡兰 63

Chad 乍得 28

*The Challenge of Slums* 《贫民窟的挑战》 23, 24, 27, 180, 181, 191, 203

Chamoiseau, Patrick 沙穆瓦佐, 帕特里克 203, 231

Chang, Ha - Joon 张夏准 181

Chant, Sylvia 钱特, 西尔维亚 186, 215

Chapin, Edwin 查平, 埃德温 26

Chapin, Susan 查平, 苏珊 164 - 165, 176

Chatterjee, Gautam 查特吉, 高塔姆 20 - 21

Chatterjimitra, Banashree 查特吉米特拉, 巴纳什里 119

Chawls (印度)分间出租的宿舍 42, 45

Chennai 金奈 200, 221

Cheru, Fantu 谢吕, 凡图 175

Chicago 芝加哥

- children 儿童 18
- abandoned 被遗弃的 239
- child labor 童工 211, 217 - 220
- malnutrition 营养不良的 187, 189, 202
- mortality rates 死亡率 29 - 30, 172, 174 - 175, 189, 200, 202, 233
- witchcraft 巫术 224, 229
- Chile 智利 130, 183, 185
- China 中国
- agricultural land 农用地 159
- automobile 汽车 155, 157
-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 197 - 199
- evictions 驱逐 123
- illegal land speculation 非法的土地投机 104
- industrial growth 14
- public housing 公共住房(供低收入家庭租用的政府住房) 38, 74
- rural migration 乡村移民 64
- sewage 污水 165
- slum population 贫民窟人口 28
- social struggle in 社会斗争 78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3, 7 - 8, 10, 13 - 14, 72
- women 妇女 186
- Chittagong 吉大港 173
- Choguill, Charles 科吉尔, 查尔斯 87
- Chossudovsky, Michel 乔苏多夫斯基, 米歇尔 175
- Churches 教会 227, 229
- Cité - Soleil 太阳城 109, 167
- Ciudad Juárez 华雷斯城 18
- civil society 市民社会 90
- class 阶级

## 250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 Clausen, Eileen 克劳森,艾琳 155
- clientelism 保护主义 69,90,91
- Cochabamba 科恰班巴[玻利维亚中西部城市] 29
- Colombia 哥伦比亚 59,60,193,233
- Colombo 科伦坡[斯里兰卡首都] 12,39,102,160,219
-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62-64,114-116,135,163
- 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formerly Zaire) 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扎伊尔) 18,64,222-231
- Connolly, Priscilla 康纳利,普里西拉 19
- corruption 腐败 104-105,148,176,194
- 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 184,188
- criminals 罪犯 50,60
- Cuba 古巴 73,74
- Czegledy, Andre 采格莱迪,安德烈 138
- D
- Dabu - Dabu 达布 - 达布 124-125
- Dadaad 达达阿德 58
- Dakar 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 56,64,88,117,121
- dalas 达拉斯(贫民窟) 50
- Dar - es - Salaam 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首都) 19,62,87,158,172,183,212
- Darman, Richard 达曼,理查德 180
- Darwin, Charles 达尔文,查尔斯 213
- Das, Arvind 达斯,阿文德 211
- Das, P. K. 达斯,P. K. 92
- Datta, Kavita 达塔,卡维塔 7
- Davis, Diane 戴维斯,黛安娜 66
- De Boeck, Filip 德·伯克,菲利普 223,226,230
- debt crisis 债务危机 15,100,175,179,180-181,187
- deindustrialization 去工业化 15,49,183,186

## Delhi 新德里

- evictions 驱逐 119
- fires 火灾 151
- housing 住房 78
- pollution 污染 156
- population 人口 5
- refugees 难民 67
- satellite cities 卫星城市 111
- sewage 污水 164
- slum - dwellers 贫民窟居民 20,28,31
- urban/rural hybridization 城乡一体化 11

Demarest, Geoffrey 德马雷斯特,杰弗里 239

Democracy 民主 81,181

Deregulation 撤销 17

desakotas 城乡融合区 11n27,12

Devas, Nick 德瓦斯,尼克 81

development agencies 发展机构 119

Devisch, René 德维西,勒内 223,225,227,229

Dewar, Neil 迪尤尔,尼尔 115

## Dhaka 达卡

- child labor 童工 217
- disease 疾病 173
-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环境灾害 152
- evictions 驱逐 132
- fires 火灾
- Grameen Bank 孟买乡村银行 214
- hazardous slum location 危险的贫民窟地点 143
- inequality 不平等 114
- informal sector 非正式部门 206

## 252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 land speculation 土地投机 101
- population 人口 5
- poverty 贫困 222
- refugees 难民 67
- renting 租用 52
- rickshaws 黄包车 220 - 221
- sewage 污水 163, 164
- slum - dwellers 贫民窟居民 32, 31, 28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3
- water sales 水销售 171
- Dhapa dump 达尔帕(贫民窟) 57
- Dharavi 达拉维(贫民窟) 109, 110
- Díaz Ordaz, Gustavo 迪亚斯·奥尔达斯, 古斯塔沃 72
- Dick, Philip K. 迪克, 菲利普·K 142
- Dickens, Charles 狄更斯, 查尔斯 27
- disease 疾病 63 - 64, 167 - 177, 202
- domestic service 家政服务 219
- Dominican Republic 多米尼加共和国 125 - 126
- Drakakis - Smith, David 德拉卡克斯 - 史密斯, 戴维 11
- Dublin 都柏林 18, 38 - 39, 204
- Dündar, Özlem 丁达尔, 厄泽勒姆 100
- Durand - Lasserre, Alain 迪朗 - 拉舍维, 阿兰 107
- Dushanbe 杜尚别[塔吉克斯坦首都] 238
- Dutton, Michael 达顿, 迈克尔 132
- E**
- Earthquakes 地震 148 - 149
- East Asia 东亚 7, 14, 46
- Eastern Europe 东欧 196
- Eckstein, Susan 埃克斯坦, 苏珊 53

-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 197 - 202
- Ecuador 厄瓜多尔 187
- Edwards, Michael 爱德华兹, 迈克尔 43
- Egypt 埃及
- land speculation 土地投机 101
  - poverty 贫困 194
  - public housing 公共住房(供低收入家庭租用的政府住房) 82
  - slum population 贫民窟人口 28
  - squatting 擅自定居 47
  - state repression 国家镇压 130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10
- El Paso 埃尔帕索 51
- El Salvador 萨尔瓦多 237
- Elbasan 爱尔巴桑[阿尔巴尼亚中部城市, 爱尔巴桑区首府] 196
- elite 精英 82, 114, 140, 141, 176
- Eltayeb, Galal Eldin 埃尔塔耶比, 贾拉勒·埃尔丁 24n3
- employment 就业 32, 35, 36, 56 - 57
- child labor 童工 211 - 212, 217
  - China 中国 197
  - India 印度 200, 201
  - informal sector 非正式部门 184, 186, 188, 189, 195, 231
  -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结构调整计划 184, 191 - 192
  - surplus labor 剩余劳动力 212, 232
  - women 妇女 186 - 187
- Empowerment 赋权 89
-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23, 27, 162
- England 英格兰 161 - 162
- Entrepreneurs 企业主 19, 56, 94, 170, 209, 210, 212
- environmental issue 环境问题 143 - 177

254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epidemics 流行病 64

Escobar, Augustín 埃斯科巴, 奥古斯丁 188

Estrada, Joseph 埃斯特拉达, 约瑟夫 124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27 - 28, 28

ethnic violence 种族暴力 215

Etienne, Yolette 艾蒂安, 约勒特 214

Europe 欧洲 38, 213

Evers, Hans - Dieter 埃弗斯, 汉斯 - 迪特尔 76, 98 - 99, 214

evictions 驱逐 117, 118 - 120

Bangkok 曼谷 77

beautification campaigns 美化运动 123 - 128

Delhi 德里 78, 119

Manila 马尼拉 108 - 109, 118

excrement 粪便 161 - 167

exploitation 剥削 211, 217 - 21

F

Fabre, Guilhem 法布雷, 吉杨(中文名: 蒲吉兰) 65

Faisalabad 费萨拉巴德 171

Fakulteta 法屈尔特塔 196

family separation 家庭分离 188, 189

Fang, Ke 葛方 123

Favelas 贫民窟 32, 52, 110, 236 - 237

demolition of 拆毁 128

hazardous location 危险的位置 144 - 145

population growth 人口增长 19 - 20

regularization projects 正规化建设项目 96

water contamination 水污染 160 - 161

Findley, Sally 芬德利, 萨莉 16n41

Fire 火灾 149 - 151

- Firozabad 费洛扎巴德 218
- Flight, Thomas 弗莱特, 托马斯 98
- Flooding 洪水 145 - 148
- G
- Gandy, Matthew 甘迪, 马修 151
- gated communities 有大门有保安的小区 135 - 136
- Gauteng (Witwatersrand) 豪登省(威特沃特斯兰德) 5, 12
- Gaviria, César 加维里亚, 塞萨尔 193
- Gaza 加沙 58
- Gazzoli, Rubén 卡佐利, 吕邦 91
- GDP *se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 gecekondus 一夜建成区 45, 47 - 48, 69, 149, 160, 235
- Geddes, Patrick 杰德斯, 帕特里克 158
- Geertz, Clifford 德勒兹, 克利福德 213
- gentrification 绅士化 53, 87
- geology 地质学 144
- Ghana 加纳 43, 167, 174
- Ghannam, Farha 甘纳姆, 费尔哈 131
- Giddens, Anthony 吉登斯, 安东尼 141
- Gilbert, Alan 吉尔伯特, 艾伦 53, 61, 96, 107
- GINI coefficients 基尼系数 185, 193, 194
- Glasser, David 格拉瑟, 戴维 340
-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13, 177, 191, 197, 203
- Goma 戈马 58
- González, Mercedes 冈萨雷斯, 梅赛德斯 188
- “good governance” “善治” 94, 97
- Gooptu, Nandini 古普图, 南迪尼 63, 82, 116, 165n67, 207
- Gorky, Maxim 高尔基, 马克西姆 25
- Goulart, Jão 古拉特, 乔 74

256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 Graham, Stephen 格雷厄姆, 斯蒂芬 240
- Grameen Bank 孟买乡村银行 214
- Grassroots groups 基层团体 91, 92
- Great Britain 英国 161
-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国内生产总值 15
- Guadalajara 瓜达拉哈拉 187
- Guangzhou 广州 18
- Guatemala City 危地马拉市 39, 149, 219
- Guayaquil 瓜亚基尔 19, 187
- Guldin, Gregory 顾定国 10
- H
- Haiti 海地 19, 215
- Hanoi 河内 159 - 160, 163, 171
- Harare 哈拉雷 115, 122, 114, 188 - 189
- Hardt, M. 哈特, M 235
- Harms, Hans 哈姆斯, 汉斯 129
- Harris Nigel 哈里斯, 奈杰尔 16
- Hart, Keith 哈特, 基思 207
- Hausman, Baron 奥斯曼男爵 76, 117
- Havana 哈瓦那 39, 73
- health issues 健康问题 167 - 177
- Hewitt, Kenneth 休伊特, 肯尼思 149
- Highways 公路 139 - 141
- Hilat Kusha 希拉特 - 库沙 57
- HIV/AIDS 艾滋病毒 168, 175, 176 - 177, 180, 188 - 189, 224, 228
- Hodges, Tony 霍奇斯, 托尼 122
- Hoffman, Kelly 霍夫曼, 凯利 210
- Homelessness 无家可归 45
- Hong Kong 香港 38, 43, 44

- evictions 驱逐 121  
 gated communities 有大门有保安的小区 136 - 137  
 public housing 公共住房(供低收入家庭租用的政府住房) 74 - 75  
 Triads 三合会 50
- Horton, Richard 霍顿,理查德 173  
 House, William 豪斯,威廉 209 - 210  
 Housing 住房 32 - 35,36,205,234  
     Beijing 北京 123  
     Hand - me - down 二手的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76,84  
     public 公用的 39,73 - 80,82  
     Russia 俄罗斯 195  
     self - help 自建的 84,85,96,107
- Howard, Allen 霍华德,艾伦 115  
 human organ trade 人体器官贸易 221 - 222  
 Human Rights Watch 人权观察网 217,218  
 Huntington, Samuel 亨廷顿,塞缪尔 68  
 Hyderabad 海得拉巴 9,68,104,200  
 Hylton, Forrest 希尔顿,福里斯特 235  
 hypercities 超大城市 5
- I
- IDPs (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 境内难民 58,59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国际劳工组织 19,184,206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6,17,100,175,182,224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90,92,203  
 India 印度  
     agricultural land 农业用地 159  
     British colonialism 英国殖民主义 63  
     child labor 童工 219

-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 167, 199 - 202
- exclusionary geography 排斥性地理学 116
- housing policy 住屋政策 41, 78, 82
- human organ trade 人体器官贸易 221 - 222
- informal sector 非正式部门 206, 207
- interethnic solidarity 不同种族间的团结 215 - 216
- land ownership 土地所有权 99
-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 176
- sewage 污水 163 - 165
- slum improvement projects 贫民窟的升级计划 93
- slum population 贫民窟人口 28
- surplus labor 剩余劳动力 232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8 - 9, 10 - 11
-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214 - 215
-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11, 28, 31, 206
- Indore scheme 印多尔方案 93
-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15, 16, 18, 69, 173
- inequality 不平等 8, 112, 181, 185
- Africa 非洲 115
- Angola 安哥拉 193
- China 中国 197 - 198
- Colombia 哥伦比亚 193
- India 印度 116
- informal sector 非正式部门 211
- Pakistan 巴基斯坦 194
- Russia 俄罗斯 195
- transport 交通 155
- Infant mortality 婴儿死亡率 29 - 30, 172, 174 - 175, 189, 200, 202
- informal sector 非正式部门 19, 184, 188, 189 - 190, 196, 204 - 207, 231

- inner city poverty 内城贫困 38 - 39
- inquilinos 板房
- insurgency 暴动 237
- Congo 刚果 224, 225, 226
- protests again 抗议 189 - 191
-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结构调整计划 75, 174, 179 - 180, 182, 225
- taxation 税收 81, 182
- involution 内卷 213, 235
- Iran 伊朗 28, 59
- Ishash al - Turguman 伊萨西阿 - 图古曼(贫民窟) 110
- Islamism 伊斯兰主义 193
- Israel 以色列 132
-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46
- Earthquake 地震 149
- Omerli forest 奥梅利森林 156
- Population 人口 5
- property investment 物业投资 100
- Ivory Coast 象牙海岸 183
- J
- Jacquemin, Alain 雅克曼, 阿兰 81
- Jakarta 雅加达
- child labor 童工 219
- desakotas 城乡融合区 111 - 112
- evictions 驱逐 122
- gated communities 有大门有保安的小区 137
- land ownership 土地所有权 108
- motorization 机动车化 154
- NGOs 非政府组织 91
- pollution 污染 152

- population 人口 5,5
- poverty 贫困 31
- public housing 公共住房(供低收入家庭租用的政府住房) 76
- sewage 污水 164
- state repression 国家镇压 133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1
- waste disposal 废物处置 158
- Jamaica 牙买加 79
- Java 爪哇 19,213
- Jellinek, Lea 耶利内克,莱亚 91
- Jiang Zemin 江泽民 197
- Johannesburg 约翰内斯堡 40,138,139
- deindustrialization 去工业化 15
- geology 地质学 144
- Soweto 索韦托 54
- Jones, Gareth A. 琼斯,加雷思. A 85-86
- Jones, Gareth Stedman 琼斯,加雷思·斯特德曼 97
- Josaphat, Lovely 约萨法,洛夫利 167
- Joseph, Jaime 约瑟夫,亚米 214
- K
- Kabul 喀布尔 59,158,238
- Kakkar, Prahld 卡卡尔,普拉尔德 164
- Kalle, Pepe 卡里,佩佩 143
- Kampala 坎帕拉[乌干达首都] 161
- Kamwokya 卡姆沃亚 167
- Kanji, Nazneen 坎吉,娜芝琳 188
- Kanpur 坎普尔[印度北部城市] 165n67
- Kaplan, Robert D. 卡普兰,罗伯特.D 236
- Karachi 卡拉奇

- dalas 达拉斯(贫民窟) 50
- informal sector 非正式部门 206
- land speculation 土地投机 99,105
- military planning 军事计划 238
- population 人口 5,5
- refugees 难民 67
- slum dwellers 贫民窟居民 20,28,31,32,38
- waste disposal 废物排放 158
- waster sales 废品销售 171
- Kaunda, Kenneth 卡翁达,肯尼思 131
- Keeling, David 基林,戴维 48-49,50
- Kelly, Philip 凯利,菲利普 12n30
- Kenya 肯尼亚 19,21
- Keyder, çağlar 凯德尔,恰拉尔 46,69,100
- Khan, Akhtar Hameed 克罕,阿克塔尔·哈默德 50
- Khan, Azizur 汗,阿齐兹 197
- Khartoum 喀土穆
- Flooding 洪水 147
- growth of 增长 19,45
- Hilat Kusha 希拉特-库沙 57
- informal sector 非正式部门 206
- refugees 难民 59
- slum dwellers 贫民窟居民 38
-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结构调整计划 183
- Khulna City 库尔纳市 151
- Kibaki, Mwai 齐贝吉,姆瓦伊总统 121
- Kibera 克比拉 109,111,112,121,163,169,170
- kidney trade 肾脏贸易 221-222
- Kingston 金斯顿 40

Kinshasa 金沙萨 222 - 231

- Inequalities 不平等 115
- military planning 军事计划 238
- population 人口 5
- public services 公共服务 182
- sewage 污水 163
- slum - dwellers 贫民窟居民 28, 29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3
- water 水 171

Kipling, Ruyard 吉卜林, 鲁亚德 25, 163

Kirkby, Richard 柯克比, 理查德 74

Klak, Thomas 克拉克, 托马斯 79 - 80

Kolkata (Calcutta) 加尔各答

- Dhapa dump 达帕(贫民窟) 57
- evictions 驱逐 122
- housing 住房 78 - 79
- informal sector 非正式部门 212
- inner city poverty 内城贫困 39
- Kipling on 吉卜林 25
- NGOs 非政府组织 91 - 92
- overcrowding 过度拥挤 110
- population 人口 5
- poverty line 贫困线 30n20
- privies 厕所 169
- refugees 难民 67
- rickshaws 黄包车 221
- slum dwellers 贫民窟居民 31
- tenure 所有权 94 - 95

Konadu - Agyemang, Kwadwo 科纳杜 - 阿杰曼, 夸铎 100, 115

- Korff, Rüdiger 科尔夫, 吕格迪 77, 98 - 99, 214
- Korogocho 科罗戈乔(贫民窟) 54
- Krashennokov, Alexey 克拉舍宁尼科夫, 阿列克谢 195
- Krishnakumar, Asha 克里希纳库马尔, 亚夏 166
- Krung Thep see Bangkok 曼谷
- Kuala Lumpur 吉隆坡 57, 132, 219 - 220
- Kumasi 库马西 43, 167
- L
- Lagos 拉各斯(尼日利亚首都)
- anti - IMF protests 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抗议 190
  - "architecture of fear" "恐怖建筑" 138
  - beautification campaign 美化运动 124
  - economic recession 经济衰退 16
  -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环境灾害 152
  - evictions 驱逐 121
  - fires 火灾 150
  - land speculation 土地投机 102 - 103
  - military planning 军事计划 238
  - overcrowding 过度拥挤 111
  - population 人口 5, 6
  - relocations 重新安置 117
  - renting 租用 45
  - road networks 道路网络 141
  - sewage 污水 163
- slum - dwellers 贫民窟居民
- street - dwellers 人行道居民 45
  -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结构调整计划 179
  - traffic accidents 交通事故 156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1, 3, 9

- Victoria Island 维多利亚岛 135
- Land speculation 土地投机 97,99 - 106,107 - 108
- Land - titling 土地所有权 94 - 97
- Landlordism 地主所有制 52,54,97 - 99,102 - 104,105
- landslides 滑坡 144 - 146
- Laquian, Aprodicio 拉奎因,阿普劳德 206
- Larkin, Emmet 拉金,埃米特 18
-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 conservative reform 保守改革 96
  - inequality 不平等 185
  - informal sector 非正式部门 206,210,212
  - inner - city poverty 内城贫困 39
- Labor 劳动 57
- Loss of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制造业损失的就业人数 192
- modernization 现代化 17
- NGOs 非政府组织 91
- renting 租用 52
- rural migrants 乡村移民 56
- sanitation problems 公共卫生问题 162,164,174
- semi - proletarianization 半无产阶级化 203
- slow urban growth 缓慢的城市增长 65 - 67
- squatting 擅自定居 46 - 47,48 - 49,99
-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结构调整计划 182,184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6,9 - 10,12,71
- women 妇女 186 - 187
- Layachi, Azzedine 拉雅希,阿泽丁 148
- Lee - Smith, Diana 李 - 史密斯,黛安娜 54
- Lesbet, Djaffar 莱斯比,贾法 77
- Lewis, Oscar 刘易斯,奥斯卡 39

liberalization 自由化 17,183,204

Lilongwe 利隆圭 115

Lima 利马

earthquakes 地震 149

housing 房屋 42,80

middle classes 中产阶级 40

population 人口 5

poverty 贫困 32,40,184

squatters 擅自定居者 105 - 106

urbanization 城市化 1,19

Lisbon 里斯本 51

Lobito 洛比托 59

London 伦敦 97,111,204

Los Angeles 洛杉矶 14,18,44,147,236

Luanda 罗安达

evictions 驱逐 122

growth of 增长 19

poverty 贫困 29

refugees 难民 59

segregation 隔离 116

unemployment 失业 193

water sales 水销售 171

Lubove, Roy 卢博夫,罗伊 109

Luce, Edward 鲁斯,爱德华 201

Lusaka 卢萨卡

demolitions 拆迁 131

disease 疾病 168

poverty 贫困 38

segregation 隔离 115

shantytowns 棚户区 46

sites - and - services scheme 提供建房用地及基础设施的方案 87 - 88

urban migration 城市移民

## M

McNamara, Robert 麦克纳马拉, 罗伯特 84, 85, 89

magic 魔术 222, 227, 229

Malan, Rian 马兰, 瑞安 72 - 73

Malawi 马拉维 115

Malaysia 马来西亚 10, 31, 219 - 220

Mallaby, Sebastian 马拉比, 塞巴斯蒂安 89

Mamayes 玛玛耶斯(棚户区) 145

Managua 马那瓜 140

Manchester 曼彻斯特 18, 162, 162

Mandalay 曼德勒 58, 127

Mangin, William 芒然, 威廉 85

Manila 马尼拉

beautification campaigns 美化运动 124

class conflicts 阶级冲突 117 - 118

fires 火灾 150, 150

flooding 洪水 146 - 147

gated communities 有大门有保安的小区 137 - 138

hazardous slum location 危险的贫民窟地点 143

land ownership 土地所有权 99

land prices 土地价格 108, 117 - 118

land - titling 土地所有权 96 - 97

population 人口 5

poverty 贫困 31

Smoky mountain 烟雾山(贫民窟) 57, 141

water sales 水销售 171

- World Bank project 世界银行计划 86 - 87
- Manshiyet Naser 曼西耶特 - 纳赛尔(贫民窟) 110
- Maoism 毛主义 65, 68
- Maputo 马普托 29, 168
- Marcos, Imelda 马科斯, 伊梅尔达 86, 124
- Marcus, Steven 马尔库赛, 史蒂芬 162
- Maroko 马罗可(地名) 120
- Marx, Karl 马克思, 卡尔 18
-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203
- Mathare 玛萨瑞(贫民窟) 167
- Mathéy, Kosta 马太, 科斯塔 79
- Mayhew, Henry 梅休, 亨利 23
- Mbuji - Mayi 姆布吉马伊(地名) 9
- megacities (人口超过 100 万的)大城市 3, 4 - 5, 5, 61 - 62, 173 - 174
- megaslums 大贫民窟 31, 33, 109, 177
- Megawati Sukarnoputri 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 133
- Mehta, Suketu 苏克图, 梅塔 166
- Mejía, Manuel 梅希亚, 曼纽尔 125 - 126
- Mexico 墨西哥
- debt crisis 债务危机 187 - 188
  - housing 住房 80
  - informal sector 非正式部门 206
  - poverty 贫困 31, 39, 184, 193, 215
  - rural areas 乡村地区 13
  - slum - dwellers 贫民窟居民 27, 28
  -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结构调整计划 174, 180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19
- Mexico City 墨西哥市
- disease 疾病 169

-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环境灾害 148,152,153
- housing 住房 74
- land ownership 土地所有权 108
- Loss of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制造业损失的就业人数 192
- pollution 污染 153,157,161
- population 人口 3n6,4,5
- region - based urbanization 区域性城市化 12
- regularization 正规化 95
- renting 租用 53,55
- rural migrants 乡村移民 56,66 - 7
- Santa Cruz Meyehualco 桑塔 - 克鲁兹 - 迈耶华尔科(贫民窟)
- satellite cities 卫星城市 118
- slum - dwellers 贫民窟居民 28,31,32,38
- taxation 税收 81
- urban growth 城市增长 19,71 - 72
- Meyer, Hannes 迈耶,汉内 74
- micro - enterprise 微型企业 94,209,210,211,212 - 212
- middle classes 中产阶级 40,53,185
- car use 汽车使用 155 - 156,157
- housing policy 住房政策 77 - 78,78 - 79,82
- India 印度 116,119 - 120,176,199 - 200,200
- inner - city housing 内城住房 97 - 98
- land ownership 土地所有权 107 - 108
- property investment 物业投资 102
- Russia 俄罗斯 195
- tax evasion 逃税 80
- World Bank urban projects 世界银行城市计划 86 - 87,88
- Middle East 中东 48,70,193 - 194,216
- Migrant 移民 32 - 36,56 - 57,62 - 73,197n63,198 - 199,201

- Milanovic, Branko 米拉诺维奇, 布兰科 24
- military planning 军事计划 236 - 240
- Mitchell, Timothy 米切尔, 蒂莫西 101
- Mitlin, Dianna 米特林, 黛安娜 90 - 91
- Mobutu, Sese Seko 蒙博托, 塞斯·塞科 70, 222, 224, 225, 226
- Mogadishu 摩加迪沙 236
- Mohan, Rakesh 莫罕, 拉克西 49
- Moi, Daniel Arap 莫伊, 丹尼尔·阿拉普 121
- Molina, Humberto 莫利纳, 温贝托 102
- Mombasa 蒙巴萨 21
- Monrovia 蒙罗维亚 161
- Montevideo 蒙得维的亚 40
- Morel, Edmundo 莫雷尔, 埃德蒙多 125 - 5
- Mortality 死亡率 172 - 173
- Moscow 莫斯科 25, 195
- Moser, Caroline 莫塞尔, 卡罗林 187
- Mugabe, Robert 穆加贝总统, 罗伯特 134, 135
- Mumbai (Bombay) 孟买(印度孟买)
- child labor 童工 217 - 218
  - colonial period 殖民统治时期 63
  - death rates 死亡率 172 - 173
  - deindustrialization 去工业化 15
  - encroachment into protected areas 侵入保护区 160
  - evictions 驱逐 121
  - housing 住房 42, 78
  - inequalities 不平等 114, 116
  - land ownership 土地所有权 99
  - overcrowding 过度拥挤 109 - 110
  - pollution 污染 157

## 270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 population 人口
-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200
- refugees 难民 67
- satellite cities 卫星城市 118
- sewage 污水 163,164
- slum - dwellers 贫民窟居民 20,28,31,38
- street - dwellers 人行道居民 44 - 45
- urban development authorities 城市发展当局 81
- water sales 水销售 171
- women 妇女 166
- World Bank project 世界银行计划 87
- Mwacan, Angeline 姆瓦坎,安吉林 171
- Mwangi, Meja 姆万吉,梅亚 162 - 163
- Myanmar (Burma) 缅甸 63,128
- N
- Nairobi 内罗毕
- child mortality 儿童死亡率 168
- colonial period 殖民统治时期 62
- evictions 驱逐 121,121
- fires 火灾 150
- inequality 不平等 113
- landlordism 地主所有制 54,104
- overcrowding 过度拥挤 111
- population growth 人口增长 21
- rack - renting(年租金几乎与地产值相当的)高额租金 43,51 - 52
- sewage 污水 163,163,168 - 169
- water contamination 水污染 161
- water sales 水销售 170
- Naples 那不勒斯 25,51,98,111,204

- Nasser, Gamal Abdel 纳赛尔,格拉马尔·阿卜杜勒 74,233
- natural disasters 自然灾害 144 - 151
- Navarro 纳瓦罗(贫民窟) 60
- Nedoroscik, Jeffrey 内多罗谢克,杰弗里 41,101,222
- Negri, A. 涅格里,A. 235
- Nehru, Jawaharla l 尼赫鲁,贾瓦哈拉尔 74,233
- neoclassical theory 新古典主义理论 191
-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 18,94,96,167,192,233
- Chile 智利 185
- Colombian drug cartels 哥伦比亚毒品集团 193
- cost - recovery 成本回收 86
- flexible labor 灵活的劳工 215
-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203
- impact on healthcare 对医疗保健的影响 174
- India 印度 199 - 200,200,201 - 202
-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214
- informal sector 非正式部门 210,217
- Mexico 墨西哥 187
- optimism 乐观主义 236
- privatization of toilets 厕所私有化 167
- South Africa 南非 181
- Nepal 尼泊尔 28
- New Bombay 新孟买 78,118
- New York 纽约 4,5,53,109
- Nguyen Duc Nhuan 阮·达克·努安 79
- Nicaragua 尼加拉瓜 47
- Nientied, Peter 涅尼德,彼得 104
- Nigeria 尼日利亚
- beautification campaign 美化运动 124

272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child mortality 儿童死亡率 174 - 175

housing 房屋 79

slum population 贫民窟人口 28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结构调整计划 179, 183

Nkrumah, Kwame 恩克鲁玛, 夸梅 233

Nlundu, Thierry Mayamba 恩南杜, 蒂埃里·马扬巴 231

Nock, Magdalena 诺克, 马格达莱娜 13

Non -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非政府组织 84, 84, 88 - 97, 182

North Korea 北韩 65

Nuru, Karin 努鲁, 卡琳 62

O

Oberai, A. 奥贝南, A. 80, 88, 208

Ofeimun, Odia 欧菲姆, 奥丁 120 - 121

Okome, Onookome 欧柯米, 奥诺欧柯米 1

Old Havana 哈瓦那旧城 39

Olympic Games 奥运会 126

Orientalism 东方主义 240

overcrowding 过度拥挤 64, 109 - 111

P

Pakistan 巴基斯坦

land speculation 土地投机 99

poverty 贫困 194

refugees 难民 59

slum population 贫民窟人口 28

Palm Springs 棕榈泉 51

Paris 巴黎 76, 117

Payatas 柏雅塔斯(垃圾站) 146

Payne, Geoffrey 佩恩, 杰弗里 95, 148 - 149

peasants 农民 64 - 65, 66, 72, 108, 198, 201

- Peattie, Lisa 皮蒂, 丽莎 86
- Peil, Margaret 派尔, 玛格丽特 102 - 103
- Penang 槟榔屿[马来西亚州名] 57
- Pentecostalism 五旬节派(圣神同祷派) 227, 228 - 229
- Pérez Jiménez, Marcos 佩雷斯·希门, 马科斯 66, 71
- peripherality 边缘 46, 110
- Peru 秘鲁
- housing policy 住屋政策 74
  - informal sector 非正式部门 206
  - recession 经济衰退 184
  - rural migrants 乡村移民 32
  - slum population 贫民窟人口 28
  - squatting 擅自定居 47
- Pezzoli, Keith 佩佐利, 基思 108
- Philippines 菲律宾
- beautification campaign 美化运动 124
  - health spending 医疗费用 174
  - slum population 贫民窟人口 28
  - World Bank project 世界银行项目 86
- Phnom Penh 金边[柬埔寨首都] 44, 65, 127, 171
- Pinochet, Augusto 皮诺切特, 奥古斯都 129, 184
- Pol Pot 波尔布特 65, 127
- politics 政治 119, 129 - 132
- pollution 污染 152 - 153, 157, 160 - 161
- polycentric urban systems 多中心的城市系统 11, 12
- population density 人口密度 109 - 110
- Port - au - Prince 太子港 109, 117, 219, 238
- Portes, Alejandro 波茨, 亚历桑德罗 210, 216n40
- Potts, Deborah 波茨, 德博拉 183 - 184

Poverty 贫困 29 - 31, 32, 178 - 202

Africa 非洲 6, 21

Algèria 阿尔及利亚 194

China 中国 199

Eastern Europe 东欧 196

India 印度 5 - 6, 199, 200, 201, 202

inner city 内城 38 - 45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184

Mexico 墨西哥 193, 215

Nigeria 尼日利亚 183

overurbanization 过度城市化 18

Paksitan 巴基斯坦 194

periurban 边缘城市 234

profiting from 从中获利 97 - 106

rural 乡村 51

Russia 俄罗斯 195

UN - HANITAT report 联合国人居署报告 23, 24

urban hazards 城市灾害 147, 151

urbanization of 城市化 61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s (PRSP) 减贫战略文件 89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194

Congo 刚果 225

education 教育

Healthcare 医疗 176, 187

housing 住屋 75, 84

India 印度 200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结构调整计划 179, 180

toilets 厕所 167

- transport 运输 155
- water 水 171 - 172
- World Bank policies 世界银行政策 192
- property rights 产权 55, 94, 209
- protests 抗议 189 - 191
- public transport 公共交通 155
-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 145
- Pugh, Cedric 佩什, 塞德里克 85, 188
- Pusan 釜山 18
- Purtin, Vladimir 普京, 弗拉基米尔 196
- Q
- Quarnatina 科兰蒂那(贫民窟) 57
- Quito 基多 39, 102
- R
- Racial segregation 种族隔离 114
- Raftopoulos, Brian 拉夫托普洛斯, 布赖恩 135
- Rakodi, Carole 拉科迪, 卡罗尔 182 - 183
- RAND Corporation 兰德公司 237 - 238
- Rangel, Jose Vincente 兰赫尔, 约瑟·文森特 146
- Rangoon 仰光 58, 121, 128, 169
- Reagan, Ronald 里根, 罗纳德 180
- refugees 难民 59, 67 - 68, 119 - 120, 227
- regularization 正规化 95
- renting 租用 52 - 55
- resistance 抵抗 129 - 131, 189 - 191, 235 - 236
- rickshaws 黄包车 220 - 221
- Rigg, Jonathan 里格, 乔纳森 30 - 31
- Riis, Jacob 里斯, 雅各布 23
- Rio de Janeiro 里约热内卢, 简称里奥

- hazardous slum locations 危险的贫民窟地点 144 - 145
- inequality 不平等 185
- inner city poverty 内城贫困 39
- pollution 污染 152
- population 人口 5
- slum clearances 贫民窟清理 118 - 119, 121, 128
- Slum dwellers 贫民窟居民 32, 38
- Verticalization of favelas 贫民窟的立体化 110
- Rio/São Paulo Extended Metropolitan Range (RSPER)s 里奥 - 圣保罗泛都市区 6
- riots 暴动 190
- Riskin, Carl 罗斯金, 卡尔 197
- road networks 道路网络 140
- Roberts, Bryan 罗伯茨, 布赖恩 212
- Robotham, Don 罗博萨姆, 唐 192
- Rocha, Mercedes de la 罗查, 梅塞德斯·德·拉 215
- Rodenbeck, Max 罗登贝克, 马克斯 41
- Rodgers, Dennis 罗杰斯, 丹尼斯 140
- Rogerson, Christine 罗杰森, 克莉丝汀 188
- Roma 罗马 196
- Roy, Ananya 罗伊, 阿南亚 122
- Roy, Arundhati 罗伊, 阿兰达蒂 94, 165
- Ruggeri, Laura 鲁杰里, 劳拉 136 - 137
- rural areas 乡村地区 11, 13, 188
- China 中国 10, 64
- India 印度 200 - 221
- Russian Federation 俄罗斯联邦 29, 194 - 196
- S
- Sabana Perdida 萨巴纳佩蒂达 125
- Sadat, Anwar 萨达特, 安华 130 - 131

- Sadr City 萨德尔城 169,239
- S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 196
- San Salvador 圣萨尔瓦多 219
- sanitation 公共卫生 161 - 167,169 - 170,173 - 174,176,177
- colonial period 殖民时期 63 - 64,64
  - India 印度 200
  - Mumbai 孟买 87
- Santa Cruz Meyehualco 圣克鲁兹-迈耶华尔科 57
- Santiago 圣地亚哥 12,39,129,205
- Santo Domingo 圣多明戈 114,121,125 - 126,236 - 237
- São Paulo 圣保罗
- deindustrialization 去工业化 15
  - favelas* 贫民窟 19,42
  - gated communities 有大门有保安的小区 139
  -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18
  - inner - city poverty 内城贫困 40
  - loss of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损失 192
  - pollution 污染 152,153,157
  - population 人口 4
  - region - based urbanization 区域性城市化 12
  - regularization 正规化 95
  - rent prices 租金价格 102
  - slum dwellers 贫民窟居民 28
  - water contamination 水污染 160 - 60
- SAPs *see*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参见结构调整计划
- Schenk, Hans 申克,汉斯 56,151
- Schnek - Sandbergen, Loes 申克 - 桑德贝根,勒施 166
- Schneider, Cathy 施奈德,凯丝 129
- Schultz, George 舒尔茨,乔治 180

Scott, James 斯科特,詹姆斯 48

SCRSs (substandard commercial residential subdivisions) 不符合标准的商品房地皮  
50 - 52

Seabrook, Jeremy 西布鲁克,杰里米 10,83,85,119 135 - 142

Dhaka 达卡 220 - 221

hazardous slum locations 危险的贫民窟地点 141,152

India 印度 200

slum fires 贫民窟火灾 150

Third World urban bourgeoisie 第三世界城市资产阶级 142

security 安全 139

Seddon, David 塞登,戴维 189

segregation 隔离 114 - 115,116,136 - 142,176

self - help 自助 84,86,90,96,107,209

Seoul - Injon 首尔 4,5,14,44,121,126

sewage 污水 93,159,161 - 167,168,171

Shanghai 上海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 197,198 - 199

Economic Zone 经济区 7

evictions 驱逐 123

informal sector 非正式部门 207

peasant labor 农民工 72

population 人口 5,5

rickshaws 黄包车 220

sanitation 公共卫生 165

slum - dwellers 贫民窟居民 28

Shantytown 棚户区 27,31,41,56

colonial states 殖民政府 62,64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65

Lusaka 卢萨卡 46

- see also favelas; shantytowns; squatters* 参见贫民窟;棚户区;擅自定居
- Shapiro, Ann - Louise 夏皮罗,安 - 路易丝 76
- Sharma, Kalpana 夏尔马,卡尔帕纳 116
- Shi, Anqing 石安庆 170
- Shinomiya, Hiroshi 四乃宫浩 146
- Sieverts, Thomas 西韦特,托马斯 11
- Simon, Joel 西蒙,约埃尔 153
- Singapore 新加坡 38,74,75
- sites and services projects 提供建房用地及基础设施的方案 84,85,86,88
- Skidmore, Monique 斯基德摩尔,莫尼卡 58,128,169
- slums 贫民窟
- Asia 亚洲 20 - 21
  - Bangkok 曼谷 77
  - British colonialism 英国殖民主义 63 - 64
  - clearances 清理 118 - 123,123 - 135
  - criminalization of 犯罪 128 - 135,235
  - definitions of 定义 25,27
  - disease 疾病 167 - 76
  - ecology of 生态学 143 - 177
  - growth of 增长 235
  - India 印度 78 - 79,82,201
  - Kinshasa 金沙萨 227
  - land - titling 土地所有权 94 - 97
  - military planning 军事规划 236 - 240
  - poverty 贫困 29 - 31
  - profiting from 从中获利 97 - 106
    - sewage and sanitation 污水和卫生 161 - 167,169
  - typology of 类型学 31 - 38
  - upgrading of 升级 83,84 - 88,93

Smart, Alan 斯马特, 艾伦 75 - 76

Smith, Marlene 史密斯, 马琳 79 - 80

Smoky Mountain 烟雾山 57, 150

Snowden, Frank 斯诺登, 弗兰克 98, 204 - 205

social capital 社会资本 90

Social class 社会阶层 40, 53, 67

class struggle 阶级斗争 92, 111, 116 - 117

informal working class 非正式工人阶级 204, 207, 210

semi - proletarianization 半无产阶级化 203

socialism 社会主义 123

Sofia 索菲亚[保加利亚首都] 196

solidarity 团结 215, 216, 235

Soliman, Ahmed 索利曼, 艾哈迈德 35, 70, 82

Solinger, Dorothy 索林杰, 多萝西 132 - 133, 165

Soto, Hernando de 索托, 赫尔南多·德 84, 94, 209, 210, 211

South Africa 南非

apartheid 种族隔离 63

gated communities 有大门有保安的小区 138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 181

squatting 擅自定居 47

urban migration 城市移民 72

South Asia 南亚

inequality 不平等 193

sanitation 卫生 164

slums 贫民窟 20 - 21, 31, 32

South Korea 南朝鲜 28

landownership 地主所有制

sanitation 公共卫生 164

squatting 擅自定居 48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10
- women 妇女 186
- Soviet Union, former (USSR) 前苏联 195, 233
- Soweto 索韦托 54, 167
- Sperling, Daniel 史贝林, 丹尼尔 155
- Squatters 擅自定居者 20, 35, 43, 45 - 49, 51 - 35, 106 - 110
- Bangkok 曼谷 52
-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 42
- evictions 驱逐 121
- landowner manipulation of 地主操纵 105 - 106
-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65 - 66, 99
- Manila 马尼拉 117 - 118, 124
- Mexico City 墨西哥市 66 - 67
- Renting 租用 52
- Turkey 土耳其 69
- World Bank projects 世界银行项目 87
- Stalinism 斯大林主义 64
- state 政府 75, 111, 118
- Steinberg, Florian 斯坦伯格, 弗洛里安 159
- Stewart, Frances 斯图尔特, 弗朗西斯 179 - 180
- Stiglitz, Joseph 斯蒂格利茨, 约瑟夫 90
- Stillwaggon, Eileen 斯蒂尔瓦根, 艾琳 48, 143, 168
- street dwellers 人行道居民 44 - 45
- street vendors 街头小贩
- Dar - es - Salam 达累斯萨拉姆(贫民窟) 212
- Manila 马尼拉 118
- Naples 那不勒斯 204 - 205
- repression of 镇压 133
- women 妇女 186 - 187

*see also* informal sector 也见非正式部门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SAPs) 结构调整计划 17, 75, 179 - 190, 191, 203

Congo 刚果 224

environment consequences 环境后果 147

impact on health spending 对医疗费用的影响 174

land speculation 土地投机 99

Urban class structures 城市阶级结构 210

Zimbabwe 津巴布韦 207

subsidiarity 辅助性原则 182

suburbs 郊区 135 - 142

Sudan 苏丹 28

Sukarno 苏加诺 74, 233

Surat 苏拉特 56 - 57, 175, 211

Suret - Canale, Jean 叙雷 - 卡纳勒, 让 64

Sutiyoso, General 苏迪约梭将军 133

## T

Tabb, William 塔布, 威廉 181

Tanzania 坦桑尼亚 28, 74

Taschner, Suzana 塔施纳, 苏珊娜 95 - 96, 128

Tatlon 塔特隆 146

Taussig, Michael 陶西格, 迈克尔 60

taxation 税收 80 - 81, 182

Tehran 德黑兰(伊朗首都) 5, 48, 70, 194

Tekin, Latife 泰金, 拉蒂菲 47

terrorism 恐怖主义 234, 235, 240

Thatcher, Margaret 撒切尔, 玛格丽特 180

Thomas, Frederic 托马斯, 弗里德里克 78 - 79, 91 - 92

Thomas, Troy 托马斯, 特洛伊 238

Tibaijuka, Anna 蒂拜朱卡·安娜 27n12

- Tirana 地拉那 196
- titling 所有权 94 - 97, 106
- Tokyo 东京 5, 109, 147
- tourism 旅游 127, 128
- toxic industry/waste 有毒工业/废物 144, 152, 159 - 160
- traffic 交通 153 - 157
- transit camps 临时营地 57
- Trefon, Theodore 特雷冯, 西奥多 171, 182
- Truman, Harry 杜鲁门, 哈里 123
- Tunis 突尼斯 152
- Tunisia 突尼西亚[北非的共和国] 78
- Turkey 土耳其 28, 47, 69 - 70, 148
- Turner, John 特纳, 约翰 35, 84 - 85
- U
- Uganda 乌干达 180
- UN - HANITAT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联合国人居署译序  
3, 4, 8, 23, 27, 102, 234
- 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88
- unemployment 失业 16, 192, 208, 232
- China 中国 198 - 199
- Congo 刚果 225
- Naples 那不勒斯 204 - 205
-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结构调整计划 187
- UNICEF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168, 218
- United Nations (UN) 联合国
- HIV/AIDS trust fund proposal 艾滋病毒/艾滋病信托基金倡议 175
-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人类发展报告 191, 194, 234
- Urban Indicators Programme 城市指标方案 24, 29
- United States 美国 28, 37

urban involution 城市内卷 213,235

urban planning 城市规划 119,152

Urbanization 城市化 2,5-12,13-22

Africa 非洲 16-18,70-1

China 中国 7-8,9,13-4,72

disease 疾病 173

East Asia 东亚 14

India 印度 8-9,67-8,159

Insurgency 暴动 237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71

Middle East 中东 70

natural hazards 自然灾害 147

pirate 强占土地 45-52,72,107

region-based 区域性 12

South Africa 南非 63

Turkey 土耳其 69-70

Vietnam 越南 68

Uruchurtu, Ernesto 乌鲁丘尔图,欧内斯特 66,71-2

Uruguay 乌拉圭 185

USSR (Soviet Union, former) 前苏联

## V

van der Linden, Jan 范·德·林登,让

van Westen, August 范·韦斯顿,奥古斯特 49,51,104

Varanasi 瓦腊纳西[印度东北部城市](旧称贝拿勒斯) 218

Varley, Ann 瓦利,安 96

Vasagar, Jeevan 瓦萨迦,吉万 112

Vaux, James Hardy 沃克斯,詹姆斯·哈代 25

Velasco Alvarado, Juan 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胡安 74

Venezuela 委内瑞拉 66

Verma, Gita 维尔马, 吉塔 92 - 93, 112

Vietnam 越南 28, 65, 79

Vijayawada 维查雅瓦达[印度东南部城市] 143

Violence 暴力 216

## W

Walton, John 沃尔顿, 约翰 190

Warah, Rasna 瓦拉锡, 罗斯娜 111, 169

Ward, Peter 沃德, 彼得 12, 55, 61, 95

Washington Consensus 华盛顿共识 75, 90, 180, 209

waste 废弃物 159 - 159

water 水 160, 161, 168 - 169, 170 - 171

Weber, Max 韦伯, 马克斯 18

West Bank 约旦河西岸 132

Whitelaw, James 怀特劳, 詹姆斯 23

Wiseman, Cardinal 怀斯曼, 卡迪纳尔 25

Witchcraft 巫术 224, 229 - 231

Wolfensohn, James 沃尔芬森, 詹姆斯 89

## women 妇女

Africa 非洲 188 - 189

China 中国 198, 199

employment 就业 186 - 187

human organ trade 人体器官贸易 221 - 222

informal sector 非正式部门 211

Kinshasa 金沙萨 227

reproductive rights 生育权 175

Sanitation issues 卫生问题 165 - 166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17, 21, 23, 183, 191, 234

Congo 刚果 223 - 224, 226 - 227

development agencies 发展机构 119

- GINI coefficients 基尼指数 185
- healthcare 医疗服务 176
- influence on urban policy 对城市政策的影响 83
- informal sector 非正式部门 209
- market forces 市场力量 111
- NGOs 非政府组织 88 - 89
- self - help paradigm 自助范式 84,96
- slum upgrading projects 贫民窟升级项目 83,84 - 88,93
-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结构调整计划 17,75,179 - 190,191
- taxation 税收 80 - 81,182
- urban productivity 城市生产率 192
- water privatization 水私有化 172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世界卫生组织 155,156 - 157,170
- X
- Xi Ying 陈西滢 220
- Y
- Yamuna Pushta 亚穆拉河 119
- Yatsko, Pamela 亚茨科,帕梅拉 197 - 199
- Yeboah, Ian 耶博阿,伊恩 11n27
- Yerevan 耶烈万(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即埃里温) 29
- Yonder, Ayse 约德尔,艾谢费 51
- Young, Marilyn 杨,玛丽莲 68
- Z
- Zaire ('Congo) 扎伊尔(刚果)58,70 - 71,222 - 231
- Zanetta, Cecilia 萨内塔,塞西莉亚 192
- Zhang, Yan 言章 123
- Zhejiang Village 浙江村 132
- Zimbabwe (Rhodesia) 津巴布韦 62,134 - 135,176,181,2